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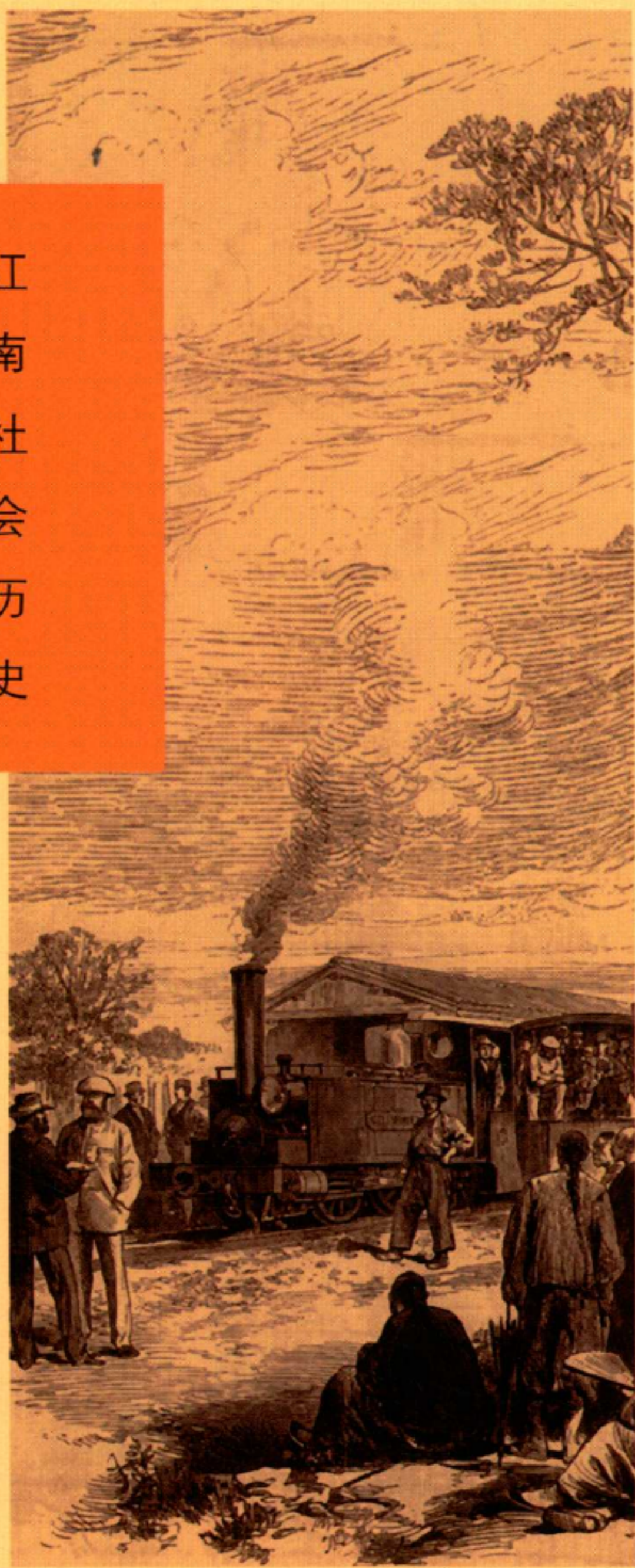
学术寻踪

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

研究概览（1978—2013年）

张国义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江南社会历史
研究丛书

唐力行主编

学术寻踪

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
研究概览（1978—2013年）

张国义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江南社会历史
研究丛书

唐力行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
1978~2013年/张国义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江南社会历史研究丛书)

ISBN 978-7-208-12901-6

I. ①学… II. ①张… III. ①经济史-研究-华东地
区-1978~2013 IV. ①F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66485 号

责任编辑 罗俊华

封面装帧 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学术寻踪

——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
(1978—2013年)

张国义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1 插页 4 字数 293,000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2901-6/K·2335

定价 55.00 元

总 序

唐力行

近三十年来，社会史尤其是区域社会史研究已成为史学界关注的学术前沿，人们希望通过对各个区域社会历史的深入剖析而获得对中国整体史的新认知。在众多的区域中，江南社会历史尤其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青睐。关于江南的区域范围，学界虽无统一看法，但大致可包括今日之苏南、浙北、上海与皖南，其核心则为苏、松、常、嘉、湖、杭、徽地区。江南地区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自宋代以来，一直是中国与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区域内有六朝古都金陵、南宋古都临安、明清都会苏州以及今天的国际大都市上海。近代以降，传统文明与西方文明在这里激荡交汇，开始了中国区域社会最早的近代转型。今天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圈是以传统的江南区域为核心发展而来的。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研究江南社会的学术潮流兴起于20世纪前半期，百年来学者对江南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等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探讨，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讨论所涉及的苏、松、杭、嘉、湖地区和徽商等方面的研究，为我们在此领域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近三十年来，随着社会史研究在我国蓬勃兴起，江南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已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学者们以整体史的新视野重新审读历史。不再满足于政治史和经济史，而是将目光向下，关注长时段的文化、心态、习俗、信仰、仪式、组织、结构、区域、普通人的生活、地方社会对国家的制衡等等。鸿篇高论，不胜枚举，可谓是“千里莺啼绿映红”，令人目不暇接，研究

水平之高是没有一个地区能望其项背的。

我们研究历史离不开对当下的关心。中国近代化是在传统与现代的缠绕纠葛中进行的，历史学界对明清以来江南区域社会经济的研究，揭示了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特色。江南社会历史还有着诸多的问题等待着我们去探幽索微。江南研究也引起海外汉学家的关注。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中国未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城市中缺乏理性的经济团体和自治的公民社会。这一理论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西方学术界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即到了清代，中国经济的成长已经跌入了“陷阱”，没有外力的推动，难以自拔。黄宗智有关江南农村内卷化的观点就是其中之一。近年来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指出1800年以前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没有一个经济中心。他比较了欧洲的英格兰和中国的江南地区，认为江南经济似乎略有优势，只是在19世纪两地发展才出现了大分流。这些国内外学术界所关注的焦点提醒我们，江南研究，不仅需要运用大量丰富的史料，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一套能够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理论框架和范畴。只有掌握了理论话语的主导权，才能使本领域的研究成果达到国际学术水准。我们希望通过构筑江南社会历史研究的平台，包括出版“江南社会历史研究丛书”、《江南社会历史评论》杂志，以及每年主办一次江南研究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推动江南社会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以江南社会史研究为主要研究方向，已形成以整体中国与区域社会研究相结合、长时段与短时段研究相结合、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研究相结合，注意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创新的研究特色，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我们与海外学者合作编纂了《江南区域史论著目录（1900—2000）》、《明清徽商资料选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等资料集，在勉力于江南研究基础工程建设的同时，我们还出版了《苏州与徽州——16至20世纪两地互动与社会变迁的比较研究》、《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徽州宗族社会》、《商人与文化的双重变奏——徽商与宗族社会的历史考察》、《江南儒商与江南

社会》、《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库域型水利社会研究》、《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传统与转型：江西泰和农村宗族形态——一项社会人类学的研究》、《上海：近代新文明的形态》、《近代上海黑社会》等研究论著，受到学界的广泛好评。近年来我们在学科建设上也有所发展，建置了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并先后被评为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上海市重点学科，2008年被列为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市重点学科（编号 S30404）与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编号 SJ0703）为我们出版“江南社会历史研究丛书”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衷心希望丛书能为海内外江南研究的学者，包括卓有成就的资深学者和崭露头角的年轻学人，提供一片圣洁的学术园地，共同为繁荣江南研究贡献绵薄之力。

序

唐力行

注重第一手材料的发掘、搜集和整理是史学研究的题中之义，也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但史学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哪怕点滴的创新也须在掌握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才能取得。对于20世纪兴起的江南区域史研究，学界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学术的前瞻需要以学术的回顾为基础，如果要将中国的江南学立于更坚实的基础上，学术史应是一项基础工程。基于这样的想法，我曾与著名的江南史研究专家、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的陈忠平教授合作主编了《江南区域史论著目录（1900—2000年）》（2007）。就在这部目录的后期编订过程中，张国义参与了进来。他当时正好博士毕业来我这里做博士后，因为他学的是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做目录的整理应是他的长处。基于这一想法，我就向国义建议索性以江南社会经济史的学术史作为博士后出站报告的题目，一方面可以得资料之便，另一方面发挥他史学史专业的强项。我相信系统的学术史研究应该会对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有所裨益。考虑到江南学研究是改革开放以来才渐成显学，而且研究成果也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后，故与国义商量，出站报告定为《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史》，本书即是在其博士后出站报告的基础上修订而成。

一直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方面的学术史研究主要是对某一研究领域的回顾，如江南的市镇、乡村、市场、城市史等，对于整个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系统总结不多。近年来，王家范教授主编的《明清江南史研究三

十年（1978—2008）》（2010）、范金民教授撰写的《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入门》（2012）和王振忠教授所著的《徽学研究入门》（2011）分别用不同方式回顾了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是个人体验式的，汇集了许多江南史研究老中青三代学人代表的个人学术总结和对江南学的学术史研究。《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入门》和《徽学研究入门》则是规范化的学术史书写，论述精当，况且范金民和王振忠在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浸淫有年，是江南区域史研究的翘楚，见解自然高屋建瓴。这些学术史著作以不同体裁从不同侧面回顾和概括了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主要成就，对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定有推波助澜之功。

国义这本书将江南区域的整体研究和苏南浙北、近代上海、徽州分区域研究结合起来，分列章节进行回顾总结，使读者对江南研究能够有个清晰系统的认识。特别是本书在近代上海社会经济史和徽州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方面用了很多篇幅，系统梳理和论述了相关研究，将之整合进江南社会经济史的学术史之中，使得读者能够对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有一个较为宏观的整体认识，尤其像明清以来徽州与江南其他各区域有广泛的社会、经济互动，如果不将其纳入江南社会经济史的学术史研究的视野，那么我们对于江南研究的印象可能是不完整的。另外，近代上海以其惊人的成长速度和规模令世人瞩目，对其研究的热度伴随上海的发展不断升温，早就有了“上海学”的呼吁。但相对而言，对“上海学”的学术史研究还不太充分，而将其置于整个江南社会经济史的学术史中应该有利于我们对于该领域学术史研究的总体把握。书中对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总结与展望对于我们未来在该领域的研究应该会有些启发和借鉴。

本书的最后两章进行个案研究也较有特色，以江南地区专门研究江南地方史的学术机构作为研究对象是个比较新颖的做法。我们知道，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为我们摆脱那种个体户式、手工作坊式的研究模式提供了可能，一些高校和地方社科院设立专门研究机构，凝聚团队，协调和积聚资源，在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中颇有创获。相信将来江南区域史研究中一些

主要研究成果的取得、研究特色的形成、重大学术研究的突破可能更加依靠团队的协作、学术平台的构建。因此，国义在从考察学术机构入手梳理江南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颖的学术史视角，应也可能会带来一些启发。最后一章以我个人的研究作为学者个案主要在于国义不是研究江南社会经济史出身，但由于他自大学时就听过我的课，对我的研究更为熟悉，以我的研究为个案可谓驾轻就熟。当然以学者和文本作为研究对象也是他出身史学史专业比较擅长的写法。

国义在二十多年前我任教安徽师范大学时即是我的学生，近十年来我们交往更为密切，他为人坦率、真诚，重情义，学问方面也踏实肯干，希望将来他能在学术上更加努力，再上层楼。是为序！

2014年中秋

目 录

总序 ...1

序 ...1

引言

- 一、选题的缘由 ...1
- 二、关于“江南”的界定 ...3
- 三、写作思路与本书结构 ...6

第一章

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述论

- 一、学术史概况及相关理论探讨 ...9
- 二、江南经济、农业经济、赋税、土地制度研究 ...26
- 三、手工业发展、工业资本和劳动力转移研究 ...33
- 四、商业与市场、市镇、城市史研究 ...35
- 五、区域社会经济综合研究 ...48
- 六、社会群体、社会控制研究 ...51
- 七、文化社会史研究 ...66

- 八、社会生活史研究 ...70
- 九、区域经济社会比较研究 ...77
- 小结 ...79

第二章

明清以来苏南、浙北社会经济史研究述论

- 一、苏南、浙北社会经济史的综合研究 ...81
- 二、农村经济研究 ...85
- 三、手工业、工商业、市场研究 ...90
- 四、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基层社会研究 ...94
- 五、社会生活史研究 ...108
- 六、市镇、城市史研究 ...111
- 小结 ...118

第三章

明清以来上海社会经济史研究述论

- 一、上海史的史学史研究概况 ...120
- 二、通论性的上海史研究 ...128
- 三、综论性的上海社会经济史研究 ...137
- 四、城市史和市镇史研究 ...151
- 五、租界社会与社会治理研究 ...154
- 六、社会阶层与社会运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社会群体研究 ...160
- 七、文化社会史研究 ...169
- 八、望族、社会组织、社会控制、社会保障研究 ...178
- 九、社会生活史研究 ...203
- 小结 ...212

第四章

明清以来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述论

- 一、学术史及相关理论问题研究 ...214
- 二、研究的兴起：佃仆制、徽商、宗族等领域的研究 ...224
- 三、研究的深化：徽州文书及相关领域研究 ...253
- 四、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其他专题与区域整体研究 ...263
- 小结 ...272

第五章

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史个案之一： 研究机构举例

- 一、关注整体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机构举例 ...276
- 二、从事苏南、浙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机构举例 ...280
- 三、聚焦近代上海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机构举例 ...283
- 四、主要徽学研究机构举例 ...285
- 小结 ...286

第六章

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的学术史研究个案之二： 唐力行教授的江南区域史研究

- 一、以徽学为底色的区域史研究 ...288
- 二、注重史料搜集和观点创新，终成一家之言 ...296
- 三、组建研究团队，构建学术研究平台 ...306
- 小结 ...316

结语 ...317

后记 ...320

引言

一、选题的缘由

江南社会经济史，尤其是明清以来的江南社会经济史，随着 20 世纪傅衣凌等先贤开辟了这一研究领域，渐成显学，不管是新中国成立后依傍“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还是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学界将江南视为观察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文化转型的标本，无疑都推动了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也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学术研究环境的改善，国际交流更为便捷和频繁，以及新材料的发掘、新理论的运用、新领域的开辟、新观点的层出不穷，研究成果甚为可观，因而也有进行学术史梳理的必要。

事实上很多从事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的学术史研究，如王家范主编的《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2010）是一部江南区域史研究的学术史文集，有关于改革开放后江南区域史研究的学术史简介，也有江南区域史研究的名家、新锐对自己学术道路的回顾总结，以及相关的理论探讨和学术史文章。范金民的《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入门》（2012）从“研究综述”、“研究示例”、“资料集录”等方面对江南社会经济史做了概览式的总结评析。范金民因在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用功 30 年，自然能化繁为简，如数家珍。王振忠的《徽学研究入门》（2011）包括“徽州何以成学？”、“徽学研究的历史回顾”、“徽学研究之前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瞻”、“参考书目”等。王振忠以拓展徽学史料见长，为当代徽学研究引领风气的学者，其对徽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自是切中肯綮。范金民和王振忠的两本书是研究生的入门书，因而评介主要围绕一些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大家名著，如果要对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进行较为全面的回顾和总结，可能还有一点补充的余地。此外，还有一些专文对某一阶段或某一领域或专题的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进行总结和回顾。后面将在江南社会经济史的学术史研究概况中详述，暂且略过。

之所以选择明清以来的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作为学术史研究的对象，在这里也要作个说明。在《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一书中，傅衣凌提出“明清社会变迁论”，认为从16世纪开始，中国在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发生一系列变化，但因种种原因，这些变化有中断以至倒退，但最后仍未脱离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吴承明也认为，中国市场的转化是从16世纪，即明嘉靖、万历年间开始的，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具有全国影响的大商帮，社会风气、社会群体组织也有一定变化，出现了“离经叛道”的文学作品和启蒙思潮。“明清以来”主要指16—20世纪中国近代化的转型。^①但由于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社会经济有明显的断裂，为研究的方便，本书的“明清以来”主要指明清至新中国成立。总之，明清以来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有很多文章可作，学术成果蔚为大观，因而也更具学术史研究的价值。

另外，对于“社会经济史”的界定有利于确立选择文本的标准。本书的“社会经济史”界定主要是指社会史研究，或由社会史研究而及于经济史，其次也会适当选择一些由经济史入手而及于社会史研究的文本，而纯粹的经济史研究则不在本书的研究之列。

本书将学术史的段限定于1978—2013年的缘由主要在于中国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虽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由前辈学者傅衣凌等开启端绪，

^① 可参看傅衣凌的《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吴承明的《吴承明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等，吴承明认为近代化过程即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我国尚未完成这种转变。

但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春天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到来的，况且 20 世纪 80 年代傅衣凌等依旧活跃于学术界。所以本书将选取研究的文本时间限定于 1978 年至 2013 年基本无损明清以来江南区域社会经济史的学术史的完整性。

二、关于“江南”的界定

有关江南研究的论著大多要界定“江南”的地域范围，而研究江南区域社会经济史的学术史也需界定“江南”地域，以便于研究文本的选择，而且也可借机将有关“江南”范围的争论作一个简要的回顾。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江南区域史研究专著都要做这种看似重复性的工作。

关于江南区域范围的界定谈得比较透彻的有李伯重、周振鹤、徐茂明等，他们都有专文论述。李伯重认为学界对江南区域划分产生分歧的原因主要在于“对作为经济区域的江南地区的界定缺乏统一的或公认的标准”，在对江南地区进行界定时须注意到“地理上的完整性”、“内部经济联系的紧密与经济水平的接近”，而且作为“一个特定的概念”已“得到历史的承认”。基于此，李伯重指出明清时期作为经济区域的江南应为今天的苏南、浙北，包括苏、松、常、宁、镇、杭、嘉、湖以及由苏州府划出的太仓州等“八府一州”，“与本来意义上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大致相若”。^①他的观点得到了多数江南研究者的认同。周振鹤认为近代以来江南主要指苏南、浙北，更狭义的范围仅指太湖流域。^②

徐茂明统计了关于“江南”区域界定的多种说法，认为江南地域范围的内涵应该包括自然地理、行政地理、经济地理、文化地理等四个层面。指出“江南”从春秋到明清，无论是自然地理，还是行政地理，都有一个由西到东、由大到小、由泛指到特指的变化趋势。指出镇、宁与其他“六

① 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② 周振鹤：《释江南》，《中华文史论丛》第4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府一州”还有较明显差异。认为将苏、松、常、杭、嘉、湖和太仓等“六府一州”视为明清时期的“江南”更为合理。^①徐茂明在其专著《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年）》（2004）中即把“江南”界定为“六府一州”。

在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论著中，李伯重的说法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如范金民、金文的《江南丝绸史研究》（1993）所指江南是指北界长江，南临杭州湾，东濒大海，大体相当于长三角的范围，包括今天的苏、锡、常、镇、宁、杭、嘉、湖和上海。范金民的《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1998）对江南的界定大体相当于长三角的范围，特别指出其理由参见李伯重的《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一文。^②不过范金民并不完全认可李伯重将明代的应天府或清代的江宁府置于江南的范畴。他指出明清时期人谈及江南赋税、水利和民风，往往将明代的应天府或清代的江宁府与其他七府区别开来，说明它们之间还是有差异的，但若出于应天府或江宁府在地域上与镇江等府相连，在功能上又是江南的政治中心，也可以将“八府一州”视为江南的整体进行研究。^③

龙登高的《江南市场史——十一至十九世纪的变迁》（2003）中的“江南”即是明清江南的“八府一州”；余新忠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2003）中的“江南”在“八府一州”外，再加上绍、甬两府。

刘石吉的《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所指的江南是常、镇、宁、苏、松、太、杭、嘉、湖等“八府一州”。而樊树志的《明清江南市镇探微》（1990）和《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2005）将明清至民国时期的苏、松、杭、嘉、湖等五府视为他所研究的“江南”。但在附录的江南市镇分布表中又将常镇宁和浙江和皖南的部分地区纳入其考察的范围。包伟民的《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1998）认同李伯重对

① 徐茂明：《江南的历史内涵与区域变迁》，《史林》2002年第3期。

② 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③ 范金民：《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10页。

明清时期江南的区域界定，但指出开埠之后的江南经济重心已经由运河沿线向沿海平原转移，所以其所研究的近代江南区域主要指近代上海及其辐射圈，包括清末的苏、松、太、常、镇、宁，以及浙江的杭、嘉、湖、宁、绍等地。陈国灿的《江南农村城市化历史研究》（2004）认为“杭州以南和以东的浙江地区显然具有长江三角洲经济圈附属地带的特征”，因而也属于江南范围，所以江南范围应限定在“长江三角洲及周边附属地区”，包括今苏南、上海、浙江大部地区。^①

日本学者森正夫的《明代江南土地制度研究》（1988）中的江南包括苏、松、常、镇、嘉、湖等六府。杨念群的《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2010）认为狭义的江南应指苏、松、常、镇、杭、嘉、湖等七府之地。

马学强的《从传统到近代——江南城镇土地产权制度研究》（2002）考察范围涵盖今上海、苏南、浙北。冯贤亮的《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2002）所指江南包括苏、松、常、嘉、湖、太等五府一州，以及镇江府大部和杭州府的余杭、海宁两县。

严耀中的《江南佛教史》（2000）中“江南”的地域界定依据佛教传播史，划定闽、浙、赣，以及苏南、皖南、淮南的沿江部分。吴仁安的《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2001）所指“江南”是明清时期江苏省长江以南的常、镇、宁、苏、松、太等府州，浙江省的杭、嘉、湖、绍、甬以及安徽省的皖南诸府郡，即苏南、浙北、皖南。日本学者田仲一成的《明清的戏曲——江南宗族社会的表象》（中译本 2004）研究的江南亦包括徽州，斯波义信等日本学者也将徽州纳入江南。王桂平的《清代江南藏书家刻书研究》（2008）对江南的界定更广，包括江苏的江宁、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松江、扬州，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金华、宁波、绍兴、台州，安徽的徽州、宁国、池州、太平等府，共 18 府。余同元认为江南分大（文化江南）、中（经济江南）、小（核心江南）三层次，构成

^① 陈国灿：《江南农村城市化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8 页。

江南的一体三相，《禹贡》及《汉书·地理志》所说的江南“三江”“五湖”水系，包括现今的苏南、皖南、浙江和上海。^①钱杭、承载的《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1996）指出明代的江南包括南直隶 14 府、江西 13 府、浙江 11 府，即在长江中下游以南，远大于前面关于江南的界定。

总体看来，江南的界定见仁见智，除前述李伯重主张从地理、经济等方面界定江南区域，徐茂明主张从行政、自然、经济、文化等层面划定江南区域外，研究者的取舍标准也往往根据自己研究的时段、领域、研究的侧重点，甚至掌握材料的多寡和便捷而定。本书则在“江南”的区域界定上取浙北、苏南、徽州，因而就今日之苏南、浙北、上海、皖南等区域研究选取研究的文本，其中有关上海的研究主要是指近代上海，对明清时期的上海除文本明确为“上海”的，则主要归入苏南研究。

三、写作思路与本书结构

本书主要采取史学史的写法，作文本的研究，介绍相关研究成果的内容及其要义，分门别类地归纳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成就、特点并略作评析。

本书共六章：第一章是对以整个江南区域作为研究范围的成果进行综述，包括对江南社会经济史的学术史研究和理论探讨的回顾，对有关江南农业、手工业、土地、赋税、工业资本、劳动力、商业、市场、市镇，商人、商帮和商人组织，以及文化社会史与社会生活史等方面的研究进行分类总结。第二章是有关苏南、浙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史综述。因近代上海的特殊地位，将其单独列为第三章。该部分包括“上海史的史学研究概况”、“通论性的上海史研究”、“综论性的上海社会经济史研究”，并梳理了上海城市史、市镇史、租界与社会治理、社会阶层与社会运动、国

^① 余同元：《明清江南战略地位与地缘结构的变化——兼论文化江南的空间范围》，《江南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家与社会的关系、社会群体、望族、社会组织、社会控制、社会保障，以及文化社会史和社会生活史等方面的研究。如前述，由于明清时期的上海地区主要属于苏南地区，其古代的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史主要纳入第二章。而徽州地区具有其封闭和独特的一面，且徽学已被公认为一门学问，成果丰硕，海内外研究者众多，对其学术史研究作为本书的第四章。本章首先就徽州社会经济史的学术史及相关理论问题研究进行了回顾，然后分“研究的兴起：佃仆制、徽商、宗族等领域的研究”、“研究的深化：徽州文书及相关领域研究”和“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其他专题与区域整体研究”等三个部分进行综述，力求大体呈现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徽学研究的发展历程。第五、六章是有关江南社会经济史的学术史个案研究。第五章主要是对江南地区的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机构及其学术人物、学术活动、学术成就进行简介。第六章是选取了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位代表人物作为研究个案，介绍了唐力行教授对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贡献。此外，每章均有小结，对于各区域的社会经济史研究略作点评。最后的“结语”部分对于改革开放后的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进行了简要评述。

第一章

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述论

本书的研究时限虽是 1978—2013 年，但也需略作一点追本溯源的工作。作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开创者，傅衣凌 20 世纪 30 年代涉足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尤其对江南区域比较关注。新中国成立后，研究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江南理所当然成为关注的焦点。傅衣凌的《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1956）、《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1957）两书确立了其在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奠基者地位。《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一部分“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发展概述”提出江南专业乡村市镇的概念，这一概念为后来的江南研究者所沿用，当然，也有当代学者对于所谓“江南专业市镇”范式提出质疑。^①该书还专门研究了明代的徽商和洞庭商人。第二部分“明代徽州商人”对徽商的概念、徽商出现的时间、经营行业、资本来源、与政权的关系等都有精辟的见解。该书第三部分“明代江苏洞庭商人”论述洞庭商人因受到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的限制，始终停留在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阶段，不能发展为工业资本，说明了中国封建社会商业资本的脆弱。

傅衣凌主张将资本主义萌芽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现象结合起来

^① 包伟民、黄海燕的《“专业市镇”与江南市镇研究范式的再认识——以浙江乌青镇个案研究为基础》（熊月之、熊秉真主编：《明清以来江南社会与文化论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年）反思类似于“一镇一品”的“专业市镇”研究范式，认为它忽视了市镇作为农村一般性商业聚落的特性，而且由于范式的强化，有些专业市镇的界定有些勉强。

研究，对前者要看它的新生、发展的因素，对后者主要看它迟滞、落后的一面。傅衣凌将两者结合研究，得出了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整体认识，即“早熟又不成熟”、“死的拖住活的”的状态，称中国封建社会为“弹性的封建社会”。^①后来的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者大多受到了这一观点的影响。

一、学术史概况及相关理论探讨

1. 学术史概况

综合性的学术史回顾

由于江南社会经济史是国内最繁荣的区域史研究之一，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丰富，涵盖面也相当宽广，如果要对江南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进行较完整的学术史回顾是一项较繁琐的工作。王家范主编的《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分“追忆篇”、“体验篇”、“展望篇”，“追忆篇”有陈学文对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江南史研究的回顾，他罗列了江南史研究者中老中青三代的代表人物，老一辈有邹逸麟、樊树志、王家范、蒋兆成；中年一代有李伯重、唐力行、陈忠平、范金民、钱杭、承载、王卫平、吴建华等；青年一代有张海英、王振忠、冯贤亮、陈江、徐茂明、马学强、陈国灿、洪璞、夏惟中等。当然由于陈学文倾向于以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之地作为江南，故那些在徽学方面研究有成的学者大多未被纳入其视野。陈学文对进一步深化江南史研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回顾以往的研究；广泛深入地开展专题研究；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建立研究中心，创办刊物。并对自己的研究进行了回顾总结。“追忆篇”还包括唐力行、范金民、王振忠、包伟民、马学强、冯贤亮、丁贤勇、张剑光等学者的个人学术研究的回顾、总结。“体验篇”有邹逸麟、樊树志、王家范、钱杭、周武、梁敬民、张海英、李学昌、董建波等学者的研究体验与心得。“展望篇”包括刘昶、吴建华、徐茂明、陈江、陈国灿、叶文宪等

^① 陈支平：《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前言》，中华书局2008年版。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学者有关江南区域史、江南人口社会史、家族史、生活史、市镇史、政治史研究的理论探究或学术史研究之作。该书囊括了当今活跃于江南区域史研究领域一些重要学者的个人学术史及研究心得，可以多角度地赏析江南史研究的来路和动态。

范金民的《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入门》（2012）包括“前言”、“研究综述”、“研究示例”、“资料集录”等几个部分。“前言”部分主要就“江南”地域范围的界定进行了综述和辨析。“研究综述”部分进行了分类总结，包括理论方法、区域开发与经济发展、农业经营、水利兴修、赋税徭役（重赋）与地租、手工行业、城镇经济、商业贸易与商品市场，以及会馆、公所、商会与商人商帮、资本主义萌芽、人口问题、士习民风、家族宗族、生活与消费、园林与旅游、江南区域内外比较、杂缀、余论等18个部分。其中“杂缀”包括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产业技术理论化问题、经济史料的介绍或探讨等；“余论”对江南史研究的相关理论和史料问题进行了评析。“研究示例”部分简要评介了江南社会经济史领域的25部著作。“资料集录”介绍了与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相关的一些史料资料集。总的看来，该书较为系统地对江南社会经济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回顾和总结。正如前面提及，范金民本人即是研究江南史的名家，作为参与者和见证者，历经了改革开放以来江南史研究发展的各阶段，故虽简要，亦能呈现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总体风貌。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对江南社会经济史某一时段的研究做了专门的梳理。如陈长刚分“农业和手工业的研究”、“市镇方面的研究”、“市场、商业、商人研究”、“社会阶层研究”、“人口流动与社会生活研究”五个方面回顾了1991—1997年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情况，指出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问题在于农村基层组织、区域市镇的比较研究存在不足，城市研究过于集中于苏、松二府，整体研究江南社会生活和社会阶层的论著较少。^①

^① 陈长刚：《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回顾（1991—1997）》，《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7期。

郑卫荣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归类总结了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十年间江南区域经济史的主要成果。其宏观层面指理论探讨,以及考察江南与中国其他区域或海外经济联系的论述;中观视角指以江南区域为系统,江南市镇为元素,分析区域经济的层次、结构;微观视角指的是个案研究。其总结较为简略,而所涉内容以市镇研究为多。^①

日本学界向来是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镇。千里介绍了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日本学界对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概况,指出日本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乡绅研究、农村基层组织研究、抗租斗争、奴变、民间秘密结社研究等,而且主要集中在江南社会经济史方面。^②

专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相比对江南社会经济史整体的学术回顾,专题研究综述文章较多。如范金民、陈国灿、安涛对市镇史研究的综述,吴滔对市镇、市镇与乡村关系研究的综述,龙登高等对市场史、商会史研究的总结,王卫平、董强等对城市史研究的回顾,刘艳元对江南宗族史的综述等。

范金民撰文总结了自20世纪60年代至21世纪初的江南市镇史研究。认为1964年傅衣凌发表的《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是江南市镇研究的“开拓性成果”。70年代台湾学者刘石吉发表的有关江南市镇数量、专业市镇以及太平天国后江南市镇发展的文章,以及后来结集出版的《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为江南市镇研究“里程碑式的成果”。樊树志、陈学文、朱小田、包伟民、陈国灿、奚建华、马学强等都在市镇研究方面卓有成绩。日本学者川胜守的江南市镇研究为“深广之作”。此外,范金民认为学界对民国时期的江南市镇研究不足,因而对于江南市镇的兴起、发展、转型、变迁的全过程无法系统链接,其特点也难以清晰地揭示出来。且由于资料局限也始终未能涵盖整个江南,对明清时期的苏、

^① 郑卫荣:《近十年来明清江南区域经济研究综述》,《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② 千里:《滨岛敦俊谈日本的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2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松、太、杭、嘉、湖等五府一州的关注较多，而对常、镇、宁研究则较少。“这使得江南市镇研究成果与其它江南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成果一样，虽号称江南，而实际上只是对江南核心区域特别是太湖区域的研究”“而有关单个市镇的跨时段、长时段的系统研究的贯通之作，至今未曾见到。这就形成了江南市镇的整体面貌既不清晰，单个市镇的发展脉络也时断时续的缺憾。”除前述外，范金民认为江南城镇化的程度、人口规模研究在结论上差异甚大。区域城镇比较的研究相对欠缺，除与华北市镇的比较，与其他区域比较尚少。因而期望对江南市镇研究能够达到“全方位、多角度、长时段、高水准”的境界。^①

陈国灿对江南市镇研究作了相关理论探讨。他指出中国学者主要从经济史角度研究市镇，日本学者则注重从社会史角度研究市镇。而中外学者在市镇研究中的成功之作已经表明“对江南市镇的深入研究，不仅要重视跨学科的综合分析，也要注意突破农村视野，从江南区域文明和社会发展道路的角度进行多层次的立体思考”。对市镇研究多涉及的城市化问题，陈国灿指出，对明清江南市镇与农村城市化现象分析，重点在四个层面：市镇的城市化，市镇所引发的农村经济变革，市镇所引发的农村社会变革，农村城市化的模式、道路和意义。陈国灿建议拓展江南市镇研究的时空视域，以超越明清的长时段思维把握江南市镇的发展，可以将市镇的地域空间分为三层次：核心区域、附属区域和扩展区域。并将江南市镇与同期的其他区域的市镇进行比较研究，以全国的视角对江南市镇进行分析，以更好地认识江南市镇的普遍意义和地域特点。^②

安涛分“基础研究现状”、“史料来源和特点”、“江南市镇研究的不足”、“应注意的问题及发展趋势”等几个方面对20世纪60年代至21世纪初的江南市镇研究作了综述。认为江南市镇研究欲有新突破，需要在史料搜集和理论方法上有创新。史料方面除地方志外，家谱、文集、笔记、

^① 范金民：《江南市镇史研究的走向》，《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

^② 陈国灿：《关于明清江南市镇研究的几个问题》，王家范主编：《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民间契约文书、小说，以及报刊资料、口述史料、田野调查对于研究民国时期的江南市镇都非常重要。在理论方法上提倡对江南市镇研究的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还须在江南市镇的文化、社会生活、市镇治理方式等方面加强研究。^①安涛对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的江南乡村史研究状况亦有专文综述。^②

吴滔对明清江南市镇，以及市镇与乡村的关系研究概况进行了详细和全面的梳理，介绍和分析了大陆、台湾和日本、欧美学界的相关研究状况。指出以往对明清江南市镇的研究，多数偏重“传记式”的历史沿革，“以传统城乡界限模糊不清，城乡的延续性远大于市镇的独特性为出发点，把市镇置于都市的范畴或者广阔的乡村社会中进行考察，极少注意城市—市镇—农村的连续体的意义”。吴滔指出，从城乡关系的视角，探讨市镇与周边农村的互动作用，还处于起步阶段。建议在市镇与乡村关系的研究中避免“城乡一体”或“城乡二元”的简单理解模式。^③

龙登高分“市场发展的经济背景”、“消费经济与要素市场”、“商品市场与远距离贸易”、“城镇市场”、“商人资本”、“江南地区市场的总体考察”等六部分总结了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后期江南市场史研究概况。“市场发展的经济背景”部分介绍了李伯重、黄宗智等对江南农村经济的研究、洪焕椿对长江三角洲社会经济特点和优势的研究、陈学文对江南商品流通和水运的研究。“消费经济与要素市场”部分介绍了方行对江南农民消费的研究、王家范对江南消费风气和消费结构的研究、孙竟昊对江南商品经济与消费结构关系的研究、洪焕椿对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以及章有义、马学强对土地市场的研究等。“商品市场与远距离贸易”部分主要介绍了徐新吾主编的《江南土布史》、范金民的《江南丝绸史》。“城镇市场”主要介绍刘石吉、樊树志、陈学文、陈忠平等对于江南市镇的研究，以及张仲礼主编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和唐振常主编的《上海史》等著作关

① 安涛：《近 40 年来江南市镇社会经济史研究综述》，《枣庄学院学报》2007 年第 3 期。

② 安涛：《近十年来江南乡村史研究综述》，《枣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 年第 6 期。

③ 吴滔：《明清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史研究概说》，《中国农史》2005 年第 2 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于上海城市的研究。“商人资本”部分介绍范金民、陈忠平、罗仑等对江南商帮的研究，洪焕椿等对苏州会馆的研究，许涤新、吴承明、王翔、王守稼等对江南商人资本的研究。“江南地区市场的总体考察”部分介绍了陈忠平、张海英、龙登高、孙竟昊等对江南市场体系的总体研究。认为学界对江南市场研究的不足主要在于缺乏江南市场与全国各地市场互动和比较研究。^①

王卫平、董强从史料整理、研究成果、学术活动等几方面详细总结了1979—2009年江南城市史研究概况。^②熊月之、张生在1986—2006年中国城市史的研究综述中涉及对明清江南城市研究状况的总结分析。^③

徐茂明的《明清江南家族史之回顾与展望》一文详述了自20世纪40年代潘光旦开启而至21世纪初的江南家族史研究概况。并介绍了其本人对苏州文化世族的研究状况。徐茂明还特别总结了一些文学史研究者对江南文学世家的研究成果，以及一些文学研究著作中对于世家与文学流派的关系研究。指出家族研究的趋势是由宏观的通论向中观的专题性、区域性、断代性和微观的个案研究方向发展，而区域间的家族迁徙、互动，以及家族网络与家族比较、家族与国家政治、家族与地方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已是家族史研究中方兴未艾的课题。^④刘艳元分江南宗族经济、文化、社会、研究文献等多个方面对20世纪90年代的明清江南宗族史研究进行了综述。^⑤

陈江对江南社会生活研究有专文综述。总结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清社会史研究、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论著中所涉及的江南社会生活史研究。还从明清江南生活风尚研究、特定社会阶层、社会群体生活状况研

① 龙登高：《中国传统市场成熟形态的探讨——江南地区市场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第10期。

② 王卫平、董强：《江南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1979—2009）》，《苏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③ 熊月之、张生：《中国城市史研究综述（1986—2006）》，《史林》2008年第1期。

④ 徐茂明：《明清江南家族史之回顾与展望》，王家范主编：《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⑤ 刘艳元：《1990年以来明清江南宗族史研究综述》，《学海》2001年第1期。

究、社会生活具体事象研究，以及包括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综合性专题研究等几个方面介绍了相关的研究成果。并就江南社会史研究的上限和下限、研究方法与取材途径、研究对象与课题等诸方面进行了探讨。^①

与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关联较大的学术史回顾

有些综述虽非专门研究江南，但其内容主要与江南相关。如对日本学界关于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介绍，对商会史、市镇经济史的专题综述都会涉及江南社会经济史的相关研究。

常建华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学界所提出的地域社会论，以及对于该理论的反思。常建华指出地域社会论的提出是日本学界出于80年代为摆脱发展阶段论和阶级学说的理论困境，并受到共同体论、乡绅论、社会史、结构主义理论方法的启发。关于地域社会论所涉及的问题，常建华分六点介绍：乡绅及民众反乱的地域性；开发、移民与地域社会；国家与地域社会；宗族问题；聚落、社区、信仰及其他。在地域社会论提出的十年之后，日本学界对该理论也提出了反思，认为地域社会论缺乏国家论。常建华将日本的地域社会论研究分为两个时期：80年代前期，结合地域背景认识基层社会关系，研究对象集中于乡绅和民众反乱；80年代后期以来，注意使用当代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开发、移民、宗教、信仰、社会动向、善会等。常建华虽没有专门介绍江南区域社会研究，但地域社会论的提出者森正夫、提倡者岸本美绪等均是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专家，而且地域社会论也是很多日本学者研究江南社会经济史的重要理论方法，对国内学者亦有直接影响。^②此外，常建华关于社会史、宗族史的研究综述对江南区域史研究亦有关照或有所涉及。^③

^① 陈江：《江南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王家范主编：《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② 常建华：《日本八十年代以来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

^③ 常建华：《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二十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近十年晚清民国以来宗族研究综述》（《安徽史学》2009年第3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日本学者太田出总结了1999年日本学界的明清史研究成果。特别是将川胜守的《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和岸本美绪的《明清的交替与江南社会》两书的研究方法及探讨的核心问题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两位学者所受到的地域社会论的影响及对于“国家—社会”问题的关心反映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学界在明清史研究方面的基本走向。太田出还介绍了森正夫的《清代江南三角洲的乡镇志与地域社会》、稻田清一的《清末江南的“地方共事”与镇董》和太田出本人的《清代江南三角洲佐杂“分防”考》等文章。^①

高寿仙对20世纪日本学界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进行过总结。根据其理论模式和问题意识的嬗变，高寿仙将日本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四五十年代，研究围绕商品经济和地主制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学术界主要关注“乡绅论”、“国家论”、“共同体论”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的学术热点是“小经营生产方式论”、“地域社会论”。^②

冯筱才的《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反思》总结了商会史研究的起步与发展、目前研究中争论较多的几个问题、既有研究使用的理论框架、主要研究方法和不足。介绍了一些海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如小岛淑男对上海绅商的研究主要以上海总商会作为研究对象；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桑福德（James C. Sanford）的博士论文《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的商业组织和商业活动》^③和白吉尔、小科布尔对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中都涉及对上海商会的研究。冯筱才还评介了徐鼎新、马敏、朱英、邱澎生、虞和平等学者的商会研究。关于理论模式的运用，该文指出20世纪80年代初步兴起的商会研究因为从辛亥革命史研究拓展而来，所以主要局限于革命史的框架，研究商会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商会与政府的关系等。

^① [日] 太田出著、张学锋译：《1999年日本史学界关于明清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11期。

^② 高寿仙：《关于日本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回顾——以理论模式和问题意识嬗变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

^③ James C. Sanford, *Chinese Commercial Organization and Behavior in Shanghai of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76.

80年代末开始将商会研究纳入现代化的框架，特别是虞和平等在商会研究中引入“早期近代化”的概念，当今的研究者多强调现代与传统的融合。最早在商会研究中引入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框架的是美国学者萧邦齐的《中国精英与政治变化：20世纪初的浙江省》。^①国内一些学者也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会馆公所“民间团体”性质，甚至套用“公共领域”理论，却忽视了中国本土的具体情境与西方世界迥异。^②

此外，应莉雅的《近十年来国内商会史研究的突破与反思》一文从商会史研究的主题、时间与空间、理论三个方面总结了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中国商会史研究的新突破。该文认为商会史研究的主题从阶级斗争、反帝斗争转向社会发展，如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商会与商人研究、商会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研究；商会研究的时间段也由清末民初拓展至新中国建立；在研究理论方面尝试现代化理论、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网络理论等。^③

任放的《二十世纪明清市镇经济研究》一文也有部分内容是关于江南市镇研究的学术史回顾。该文将明清市镇研究的学术历程分三个阶段：开掘阶段（20世纪30—50年代），全汉升、加藤繁等开启先河；成熟阶段（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此阶段有傅衣凌、刘石吉、施坚雅等三位代表性的学者；繁盛阶段（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其繁荣体现在有一批市镇史研究的专著面世，而且偏重江南一隅的市镇经济研究有所突破。文章总结了市镇研究者们对市镇概念的界定及市镇缘起的探究，围绕“明清市镇的结构、功能、特点及其历史意义”排比观点，加以评析。提出在明清市镇研究中须恪守学术规范，减少市镇研究中的不平衡现象，拓宽市镇经济的研究范围。^④

① R.Keith Schoppa, *Chinese elite and Political Change: 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② 冯筱才：《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反思》，《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③ 应莉雅：《近十年来国内商会史研究的突破与反思》，《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④ 任放：《二十世纪明清市镇经济研究》，《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其他涉及江南社会经济史的学术史文章还有黄宗智的《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兼及明清史）的概况》（《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9期）、刘石吉的《明清市镇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综合讨论与相关著作之评介》（《社会科学家》1988年第4期）、余新忠的《1980年以来国内明清社会救济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9期）、张丽芬的《近十年来国内明清社会救济史研究综述》（《历史教学问题》2006年第5期）、史明正的《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第4期）、行龙的《人口流动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研究述评》（《清史研究》1998年第4期）、颜晓红、方志远的《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明清城镇及城乡商品经济研究的回顾》（《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4期）、常建华的《旧领域与新视野：从风俗论看明清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此不赘述。

2. 关于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理论探讨

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范式转换

夏明方的《老问题与新方法：与时俱进的明清江南经济研究》一文中对20世纪以来国内明清江南经济史研究中几次大的“范式转换”过程进行了总结和反思。认为20世纪80年代初，吴承明先生在研究中以“现代化即市场经济”假说取代了“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假说，直接影响了国内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李伯重等以生产力研究取代了意识形态色彩较浓的生产关系研究，虽然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资本主义萌芽争论的余波尚存，^①但是以市场经济理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逐渐成为研究明清中国史的主导理论，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范围内的“后现代转向”和“生态转向”，学界开始提倡引入环境史研究方法，以不断变动中的人与自然关系作为考察一切社会经济事相的视界，通过探索人口压力、环境变

^① 李伏明：《义利之辨、重农轻商与明清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兼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学术月刊》1993年第4期。

化、市场变迁、阶级分化等各因素交互作用的过程来把握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化过程。^①

在向“现代化范式”转向的过程中，国内学界开始注重对施坚雅、黄宗智、彭慕兰、李伯重等学者的理论进行引介、评述和应用。

施坚雅模式

施坚雅运用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概念分析中国的区域经济，认为不仅大区域经济具有核心—边缘结构，它的每一个层次的区域系统都呈现出和大区域结构类似的内部差别，此所谓施坚雅模式。^②施坚雅模式在国内学界引起广泛呼应，尤其对中国城镇史、市场史、人口史研究都产生较大影响。如小田的《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1997）就是依据中心地学说，从规模层次、分布密度、专业分工等方面探讨了江南市场网络的结构及其内外功能。单强的《江南区域市场研究》（1999）将江南市场分为农村集市、乡镇市场、城市市场三种贸易体系，认为江南乡村的基层市场是一个以市镇为中心，6个村为内层，12个村为外层，共约36平方公里的以道路为连接的系统。由此可见施坚雅模式对江南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影响。樊树志认为“他的可取之处，显然在于强调从整体上看问题，打破行政区域结构，而着眼于经济区域的研究，把一个经济区域的各方面看成一个活的整体”。^③

当然国内学界对施坚雅模式也有种种批评，任放总结为两个方面：“一是经验层面，即用具体事例指斥施坚雅模式与历史实际不符，或通过实证研究修正施坚雅的某些结论；二是理性层面，即对施坚雅模式的理论来源，以及该模式本身的某些研究方法提出批评。”但任放指出，尽管施坚雅模式是一个有缺陷的分析模式，但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仍是我们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可以借鉴的有效资源。^④

^① 夏明方：《老问题与新方法：与时俱进的明清江南经济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② 施坚雅著、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1年版。

^③ 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④ 任放：《施坚雅模式与中国近代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

黄宗智的《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包括三编、十六章，其中第一编为新中国成立以前，凡八章；第二编为1949年以后；第三编为“结语”。该书开宗明义提出“旨在探讨长江三角洲农民糊口农业长期延续的过程和原因，及其变化的过程和原因”。^①黄宗智将农村发展分三种方式：密集化，即产出或产值以与投入相同的速率扩展；过密化，即总产出在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条件下扩展；发展，即产出扩展快于劳动投入，带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的增加。第一编研究了长三角的生态系统，包括长三角的界定（主要指今上海和苏州地区）、长三角历史地理、水利中的政权，及士绅、农民之间的关系，并与华北比较。在“商品化与家庭生产”中论证商品化刺激了小农家庭生产。在“商品化与经营式农业”中，指出商品化没能推动雇佣式大生产的发展。“商品化与过密型增长”道出其核心观点，即明清时期长三角农村经济的增长是“无发展的增长”，也就是“过密型的增长”，是以单位工作日报酬递减为代价的增长，这种增长来自于家庭劳动力更充分的利用。所以，“新经典学派的市场经济模式显然与长江三角洲的历史真实相去甚远”。^②

对于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国内学者有许多的批评，范金民在《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1998）一书中认为黄宗智不以年收入而以单位工作日收入，不以家庭总收入而以单个农民的农业收入来讨论以年成或季节为收入周期、以整个家庭生产为特点的江南农民的经济状况显然不符合实际。该书根据人均耕地占有量和明清时期江南正常年景的平均亩产量这两项数据，计算出江南农民的田地收入并不低，再加上江南农民的桑棉丝布及其他专业化和兼业化生产，指出直到嘉道年间，江南农民的年收入或家庭总收入是稳定或增长的，其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嘉道以后江南经济萧条主要在于市场萎缩和流通不畅。而李伯重着重从理论和概念的角度批驳

^{①②}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94页。

了黄宗智的观点。^①

黄宗智的另一本著作《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是一部论文集，集中展示了黄宗智的理论观点。该书最后一篇文章《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指出“实证研究所发现的悖论现象实际上已经对以往的规范信念提出全面的挑战”。^②批驳了“封建主义”模式、“资本主义萌芽论”。指出当代青年学者不屑于引用这些模式，而去搬用西方的方法，反映出中国学界的规范认识危机。西方学术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受到近代化理论影响，形成对中国研究的“传统—近代化”模式、“冲击—反应”模式，但关于明清之际发生巨大变化的史实研究已对上述模式构成挑战。黄宗智即试图通过对明清中国，包括江南地区的实证研究，尝试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中国。

仲伟民的《学术界对前近代中国研究的分歧——以彭慕兰、黄宗智的观点为中心》一文介绍了彭慕兰和黄宗智的观点，并进行辨析。该文指出，黄宗智提出明清时期中国有着异于西方的独特发展道路，即“内卷化”的观点，江南农村经济在18世纪以前的六百年中的确发生了明显变化，但它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因而不可能引起西方式的近代增长。该文还介绍了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以下简称《大分流》）一书的观点，指出，彭慕兰的核心观点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西走到一个岔道口，并渐行渐远。造成这种背离的主要原因在于美洲大陆的开发解除了土地的制约；另外，英国煤矿的优越地理位置使蒸汽机的广泛应用成为可能。上述因素推动了西方的近代化。该文认为《大分流》一书采取的方法令人称道，以大致相当的区域单位进行比较，选取英格兰与江南、欧洲与中国作为相应的比较单位比较适中。并指

^① 李伯重：《“最低生存水准”与“人口压力”质疑——对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两个基本概念的再思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② 黄宗智：《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32页。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出黄宗智与彭慕兰的观点都是试图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尝试，对国内的近代化问题和社会经济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文中还列举了黄宗智与彭慕兰之间的争论。如黄宗智对于彭慕兰“大分流”理论依据的批评，认为彭慕兰忽视了英国18世纪的农业革命、原始工业化、城镇发展、人口行为转型以及消费变迁的五大变化，而同时期的长三角不具备其中任何一个条件。文中也列举了彭慕兰对黄宗智“内卷化”理论的批评，认为18世纪的江南与英格兰没有多大差别。李伯重则提出“内卷化”理论不适合江南农村经济史研究的三点理由：一、“内卷化”理论的依据为“近代经济成长道路是单一的”；二、“内卷化”理论的若干依据非常薄弱，如借鉴李伯重80年代有关江南农业的研究，而李伯重后来的研究认为18世纪江南农业、手工业有了实质性进步。三、“内卷化”理论的依据之一是江南农村的“人口压力”和“人口过剩”，但此论据已经遭到质疑。^①

李伯重破除“西方中心论”的理论探索

李伯重的《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2002）^②是一部理论反思之作。书分三编，上编“理论”、中编“方法”、下编“发展趋势”。在上编中讨论了两个理论专题，即“‘资本主义萌芽’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历史？”、“早期工业化与农业过密化”。作者认为“资本主义萌芽论”的情结妨碍了对历史真相的探求，并探讨了英国模式、江南模式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关系。李伯重指出，与江南模式对比，如果从再生产规律看，英国模式具有普遍意义，如果从具体的发展模式看，它只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李伯重指出，持英国模式具有普遍意义者是受到西方中心史观的支配。李伯重强调，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在80年代中期的傅衣凌、吴承明那里达到了顶峰。要想开辟新的局面，需要新的方法、视角，抑或有新材料的出现。在“早期工业化与农业过密化”的理论专题

^① 仲伟民：《学术界对前近代中国研究的分歧——以彭慕兰、黄宗智的观点为中心》，《河北学刊》2004年第3期。

^② 修订版书名改为《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在原有12篇文章的基础上增加到16篇。

中，李伯重强调早期工业化理论为摆脱英国模式提供了条件。在1993年的论文中，还赞成“过密型”增长的理论。随后，对“人口压力说”的质疑使作者破除了“过密型”增长的一个重要依据，即人口压力导致经济有增长而无发展。中编“方法”分析了“选精法”和“集粹法”在治史中的弊端。认为“‘选精法’与‘集粹法’都依靠传统的史学方法，通过从史料中收集和选取例证，以‘举例子’的方法来推导结论，因此要避免归纳法的缺陷是很困难的。”^①介绍了斯波义信和王国斌的研究方法。评析了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1999），李伯重认为该书与其他反对西方中心论者不同之处在于该书承认中西发展确实各具个性，但也有若干共性。“反对西方中心主义而又不拒绝欧洲经验，这是该书的一大‘新’之处”。^②下编“发展趋势”提出“宽视野”、“新视角”。介绍了法国学者贾永吉、魏丕信的中国人口史研究，指出他们对“人口压力说”持怀疑的态度。李伯重认为不仅仅是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了西方中心论的模式不适用于中国，即模式本身也存在问题。欧洲经济史研究表明，近代早期西欧的经济发展与工业革命不一定有联系。而东亚近代化的研究表明东亚的一些传统因素成为推进近代化的积极因素。另外，以往的国内研究有方法论的问题，研究者没有关心“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是“中国应当发生什么变化”和“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它应当发生的变化”。总之，西方中心史观或欧洲中心史观阻碍了国内的学术研究。该书是李伯重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系统反思，不遗余力地批驳了“西方中心论”，试图破除传统—近代二元思维。

李伯重的《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2003）为作者江南经济史研究的论文集。在“前言”中，作者回顾了自己的研究，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己研究中的最大转折在于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若干共识提出质疑与挑战，如“宋代经济革命论”、“明清停滞论”、“量的增

^{①②} 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194页。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加，质的停滞论”、“小农经济阻碍近代化论”、“资本主义萌芽论”、“清代人口爆炸论”、“中国城市化道路特殊论”、“农业过密化论”等。如“人口压力论”，李伯重认为明清江南人口的增长不仅相当缓慢，而且还有逐渐减缓的趋势。经济增长速度高于人口增长速度。为此，作者花了很多笔墨讨论了明清江南的人口控制手段，作者认为当时已经普遍存在有意识的人口控制行为。并尝试以新的眼光研究中国经济史，如从经济学、生态学、人口学角度研究江南经济史。

李伯重对“西方中心论”的警惕在于他认为英国模式有其特殊性，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研究陷入困境实际上是套用英国模式的结果。^①其《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2000）一书以实证研究支撑前述观点。该书论述了近代工业化出现之前的江南早期工业化，李伯重认为英国模式作为一种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并不具有普遍意义，虽然江南的早期工业化有出色表现，但即使没有西方入侵，江南走上近代工业化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主要原因在于斯密动力无法导致工业革命。^②他还研究了明清江南的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指出，为科举考试准备的精英教育之外，江南的大众教育亦很发达，而且大众教育与江南高度商业化的经济发展是相适应的。李伯重认为江南大众教育对经济的直接影响与英国大众教育与工业革命没有多少直接关联不同。李伯重试图破除“现代人对过去的傲慢与偏见”，以及“近代至上”的理念。^③

马敏的《据之于实情：建立中国史学新典范的若干启示——以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为例》一文点评了李伯重的理论构架。认为李伯重所论的江南早期工业化发展模式实际上是以“江南经验”为依据的。江南经验既不同于英国经验，也不完全等同于中国其他地区的经验，而是一种区域性独特的历史经验。该文还着重探讨了“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意义与局限，指出李伯重和黄宗智对江南近代化的解释虽

① 李伯重：《英国模式、江南道路与资本主义萌芽》，《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

②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39页。

③ 李伯重：《八股之外：明清江南的教育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清史研究》2004年第1期。

完全不同，但都对英国模式的普遍意义提出质疑，这应该得益于对“资本主义萌芽论”的反思。该文还指出李伯重的研究体现了对“近代优越论”的反思，即“转换一个视角看，今不如昔的情况可谓比比皆是”。该文还总结了美国的中国观变化：一是从“欧洲中心论”转移到“中国中心观”，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研究中国，探索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二是放弃中国停滞的观点，致力于从发展的角度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重点也从政治史、思想史转向社会经济史、明清经济史，尤其是区域社会经济史。他们的研究所要追问的命题是“中国为什么没能像欧洲国家那样进入近代社会？”^①

一些学者从“早期工业化”讨论中获得启发。樊树志认为可以早期工业化的视角研究市镇为江南传统社会带来的变革。^②余同元认为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形成于明朝中后期，在清末民初得到了发展。^③

高寿仙评论李伯重的《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2007），认为李伯重以实证研究证明明清江南农业发展走了一条与西欧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回击了“西方中心论”。但对于李伯重所使用的数据和事实陈述提出质疑，认为其结论可能是建立在不可靠的数据基础上，而且专注于生产力方面，完全撇开生产关系，“恐怕也是一部‘残缺不全的经济史’”。^④

上述对于施坚雅、黄宗智、彭慕兰、李伯重等人关于明清史、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理论的总结有利于我们认识该领域的前沿问题。李伯重当是少数能够跻身该领域的国内学者之一。而彭慕兰、弗兰克、王国斌等人的著作译介至国内的最大功用恐怕在于引发了国内学界的理论热情。

王家范认为《大分流》、《白银资本》等著作重燃了中国史研究者的“关注理论争论与整体历史评价的热情”。但还是应当提倡实证，从系统的史料入手，增强对历史复杂性的认识。王家范从江南赋役负担、商品经

① 马敏：《据之于实情：建立中国史学新典范的若干启示——以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为例》，《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② 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复旦学报》2005年第4期。

③ 余同元：《明清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史学月刊》2007年第11期。

④ 高寿仙：《用另一种眼光看清代江南农业经济》，《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1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济、市场消费等方面解说“黄宗羲定律”下受害最深与经济发展良好之间的悖论。建议江南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应“回到史实的常识层面上”。^①冯贤亮亦强调对史料正确和全面的解读，需要警惕“理论先行，实证为辅”。^②

周琳在《书写什么样的中国历史？——“加州学派”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述评》一文中介绍了加州学派的学术宗旨、代表论著、学术分野，阐述国内学界对加州学派的理解与误解。^③

二、江南经济、农业经济、赋税、土地制度研究

1. 江南经济、农业经济研究

洪焕椿是较早对江南经济进行深度研究的学者。其《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城乡经济的发展及特点》一文考察了明代至清前期长三角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总结该区域有八个方面的优势和特点：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充裕的农村劳动力和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个体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扩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兴修农田水利和水网化保障了农业生产持续不衰；以农为主，农副结合的产业结构增强了农村经济活力；密布的农村市镇沟通了农村和市镇的物资交流；城市工商业的活跃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实学思潮和市民文学的兴起。^④段本洛、单强的《近代江南农村》（1994）研究了明末至1949年江南农村的经济，是国内学界较早对江南农村经济进行全面研究之作。^⑤

日本学者川胜守的《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

① 王家范：《中国社会经济史面临的挑战——回应“大分流”的问题意识》（《史林》2004年第4期）、《明清江南研究的期待与检讨》（《学术月刊》2006年第6期）、《复杂的历史，需要复杂的头脑——从“黄宗羲定律”说开去》（《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1期）。

② 冯贤亮：《史料与史学：明清江南研究的几个面向》，《学术月刊》2008年第1期。

③ 周琳：《书写什么样的中国历史？——“加州学派”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述评》，《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④ 参见洪焕椿：《明清史偶存》，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⑤ 段本洛、单强：《近代江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992年)一书分八章,前五章主要探讨了明清江南农业生产技术发展,以及农业经济结构、农作物品种、耕作制度的演化。后三章考察了明清江南农业经营体制的演变,利用日本所藏租簿,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探讨地主制租佃关系。日本学界的同类研究还有敦岛滨俊的《明清江南农村社会的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森正夫的《明代江南土地制度的研究》(同朋舍,1988年)、《江南区域论研究》(1992年8月)。^①国内学者叶依能探讨了明清时期太湖地区农村商品经济发展情况;陈忠平研究了明清江南农业生产的多样化发展,指出由于粮食生产之外多种内容的生产活动及种植业之外多种行业生产活动的多样化发展,导致江南农村生产走向综合化、专业化、商品化,从而引起江南农村经济结构的显著变化;陈家其考察了明清时期的气候变化对太湖流域农业产生的巨大影响。^②

李伯重对江南农村经济有系统深入的研究,其《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2007)一书分十章,除第一章“导论”外,其他九章分为三编。第一编“生产要素的变化”探讨了清代前中期农业生产物质基础的发展变化,作者考察了农业生产要素中的劳动力、资源、技术、资本和生态环境;第二编“农业生产的变化”主要从农业资源利用的合理化、农业生产的集约化、外向型农业的形成等方面,考察了清代前中期江南农业发展的途径与模式;第三编“农业的发展”通过论证土地产值增加、劳动生产率提高、生态农业出现和普及等,展现清代前中期江南农业的发展。有评论者认为该书的创新观点在于:颠覆长期流行的清代前中期江南农业技术停滞的观点;清代前中期江南并不存在此前学界确信的人口压力一说;关于清代前中期江南农业生产率停滞的说法毫无根据;家庭农场面积缩减主要是由于追求经济合理化的结果而非人口压力造成。^③

① 陈学文:《川胜守新著〈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史研究〉评介》,《中国农史》1992年第3期。

② 叶依能:《明清时期太湖地区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陈忠平:《论明清江南农业生产多样化的发展》,《中国农史》1988年第3期;陈家其:《明清时期气候变化对太湖流域农业经济的影响》,《中国农史》1991年第3期。

③ 高寿仙:《用另一种眼光看清代江南农业经济》,《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1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李伯重还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江南农业经济研究的文章，如考察了明清江南水稻和蚕桑生产的集约程度；探讨明清时期江南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分析了明清江南农村妇女在家庭生产结构中的地位，认为“男耕女织”的模式应形成于清中期以后；还研究了江南家庭农业的经营规模、劳动生产率等。^①上述研究成果多体现在他的《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一书中。

农田水利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有不少，缪启愉考察了太湖地区塘浦圩田的形成、发展；马湘泳就江浙海塘的修建对太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探讨；高升荣对明清时期太湖和关中两地区的水环境与农业水资源利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②

此外，一些学者对江南农业经济进行了具体研究，桑润生考察了近代江南地区水稻的选种、育种；闵宗殿探讨了宋明清时期的水稻亩产和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水稻品种；周立群、张红星研究了明清时期江南有机农业技术的发展，认为这一时期技术虽有进步，但仍处于传统阶段，不能成为改造传统农业的动力；殷志华探讨了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稻作农业的发展史。^③

由于棉花、蚕桑生产在明清江南农业中的显著地位，因而也是江南农

① 李伯重：《明清时期江南水稻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中国农史》1984年第1期）、《“桑争稻田”与明清江南农业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二》（《中国农史》1985年第1期）、《明清江南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三》（《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从“夫妇并作”到“男耕女织”——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妇女半边天”角色的形成——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二》（《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人耕十亩”与明清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五》（《中国农史》1996年第1期）。

② 缪启愉：《太湖地区塘浦圩田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农史》1982年第1期；马湘泳：《江浙海塘与太湖地区经济发展》，《中国农史》1987年第3期；高升荣：《水环境与农业水资源利用——明清时期太湖与关中地区的比较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

③ 桑润生：《近代江南地区水稻选育工作概况》，《中国农史》1989年第3期；闵宗殿：《宋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水稻亩产量的探讨》（《中国农史》1984年第3期）、《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水稻品种》（《古今农业》1999年第2期）；周立群、张红星：《经济史上的技术变迁——以江南农业为例》，《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殷志华：《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稻作史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

村经济研究中的一个关注点。如章楷、倪金柱考察了长江三角洲棉区农作制的演变和发展；陈蕴鸾对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棉业的发展变化过程进行了系统论述，分析了棉业各环节之间的密切联系，探讨推动棉业发展变化的深层原因及棉业发展变化对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影响，力图揭示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棉业的整体特征。^①章楷分析了江浙近代养蚕的经济收益与蚕业兴衰；李伯重探讨了明清江南蚕桑的亩产量；田龄分析了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蚕桑业发展及其原因，认为在18世纪前蚕桑业仅局限于太湖以南和苏州府的部分地区，18世纪后，扩大到太湖以北地区，指出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蚕桑业生产蓬勃发展的原因主要在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巨大的经济利益、国际国内不断增长的需求及便利的地理位置；林荣琴从自然条件、经营蚕丝业的经济收益、蚕丝业发展的历史等方面探讨了明清时期太湖地区蚕丝业分布与变迁的原因和影响；胡茂胜、曹幸穗考察了民国时期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在江浙地区的蚕业改良活动及其成效。^②日本学者田尻利在《清代农业商业化的研究》（1999）一书中有很大篇幅研究了江南蚕桑生产的商业化。^③

蒋国宏的博士论文《江浙地区的蚕种改良研究（1898—1937）》（2008）考察了抗战爆发前江浙地区的蚕种改良活动。该文注重考察在蚕种改良的运动中，民间力量、政府经济政策与农村社会变迁的关系。^④范虹珏的博士论文考察了明代至抗战爆发前太湖流域的蚕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历程。^⑤

① 章楷、倪金柱：《长江三角洲棉区农作制的演变》，《南京农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陈蕴鸾：《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棉业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

② 章楷：《江浙近代养蚕的经济收益和蚕业兴衰》，《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李伯重：《明清江南蚕桑亩产考》（《农业考古》1996年第1期）、《明清江南蚕桑亩产考（续）》（《农业考古》1996年第3期）；林荣琴：《明清时期太湖地区蚕丝业的分布与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3期；田龄：《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蚕桑业发展及其原因》，《武汉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胡茂胜、曹幸穗：《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在江浙地区的蚕业改良（1918—1936）》，《中国农史》2011年第2期。

③ 范金民：《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2页。

④ 蒋国宏：《江浙地区的蚕种改良研究（1898—1937）》，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

⑤ 范虹珏：《太湖地区的蚕业生产技术的发展研究（1368—1937）》，南京农业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李伯重的《十六、十七世纪江南的生态农业》一文认为16、17世纪江南出现新的农业生产方式已有生态农业的特点，即通过改造资源，进行多样化的生产。并利用食物链原理，对废物进行循环利用，从而降低投入而增加产出，达到了较高的生产率。此种生态农业最早出现在明代中期常熟地区的大经营中，明清兴替时已经推广至嘉、湖一带，小经营者亦普遍采用。生态农业的普及推动了江南农业的发展。^①此外，李伯重还对明清时期江南肥料的需求数量进行了分析。^②

董建波、李学昌的《20世纪上半期江南农业生产效益评估》一文指出20世纪上半期的江南地区无论是稻、麦、棉等单项作物种植收益，还是稻麦轮作制、棉麦轮作制下稻麦、棉麦总收益均趋于减少，即使较清代中叶也有所下降。主要原因在于资金投入严重不足，且缺乏技术改进，并进而导致农业生产高度依赖劳动力投入。^③

马德斌的《1911—1937年长江下游的经济增长——一个定量、历史的分析》一文强调意识形态和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他认为制度是经济长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该文列举了20世纪30年代江浙人均GDP，指出江浙的人均GDP高出全国55%，比日本控制下的朝鲜、我国东北高出16%—29%，仅落后于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马德斌认为江南的经济增长不是来自于传统的经济制度，而是得益于经济制度的变革，比如上海的城市自治，使其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由殖民口岸转变成了欧洲式的城邦。^④

2. 赋税、土地制度研究

郑志章尝试计算江南的地租率和地息率；段本洛研究了近代江南的租佃关系，认为永佃制阻滞了自然经济的瓦解；林金树则考察了明代江南官

① 李伯重：《十六、十七世纪江南的生态农业（上）》（《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十六、十七世纪江南的生态农业（下）》（《中国农史》2004年第4期）。

② 李伯重：《明清江南肥料需求的数量分析——明清江南肥料问题探讨之一》，《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

③ 董建波、李学昌：《20世纪上半期江南农业生产效益评估》，徐秀丽、王先明主编：《中国近代乡村的危机与重建：革命、改良及其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④ Debin Ma, *Economic Growth in the Lower Yangzi Region of China in 1911—1937: A Quantitative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Jun.2008, Vol.68 Issue 2, pp.355—392.

田的由来、种类和科则；樊树志论述了明代江南官田与重赋问题；马学强则对近代上海道契与明清江南土地契约文书进行了比较，为近代与传统之间的关系研究提供了个案。^①

江南重赋问题是江南史研究者较早碰触的课题，赖惠敏的《明代南直隶赋役制度的研究》（1983）是研究江南赋役最早的专著，详细考察了南直隶的赋役制度、税制、税则的变化及赋役在地方经费中的地位。森正夫的《明代江南土地制度的研究》（1988）是迄今唯一一部江南土地制度史专著，其以官田为主线探讨江南土地制度的演变，考察了官田的产生、发展、种类、官民田不同的亩税额，以及赋税制度的变化等。^②

对于江南重赋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有林金树、郑克晟、唐文基、范金民等。关于江南重赋的原因，范金民的《江南重赋原因的探讨》一文对此进行过总结，认为学界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明清成说，即怒民附寇，主张此说有伍丹戈、郑克晟等；二是经济发展说，持此说的有樊树志、郭厚安等；三是官田重赋说，如林金树、杨亚非、韦庆远、唐文基等。范金民认为，从江南赋税不断增加的过程和全国其他地区重赋产生的情形来看，江南重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朱元璋接收了前朝的全部官田，并加大了打击江南富豪的力度，通过各种手段增加了大量官田，而从江南重赋形成后的历次减赋来看，否认重赋存在和所谓重赋是经济发展结果的说法都是没有说服力的。^③此外，有学者认为漕运中粮食折耗和力役逐渐转化为赋税也是江南重赋的重要原因。^④

张佩国的《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2002）包含九章

① 郑志章：《明清时期江南的地租率和地息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段本洛：《永佃制与近代江南租佃关系》，《苏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林金树：《明代江南官田的由来、种类和科则》，《郑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樊树志：《明代江南官田与重赋之面面观》，《明史研究论丛》第4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马学强：《近代上海道契与明清江南土地契约文书之比较》，《史林》2002年第1期。

② 范金民：《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9、236页。

③ 范金民：《江南重赋原因的探讨》（《中国农史》1995年第3期）、《明清江南重赋问题述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

④ 赵全鹏：《明代漕运与江南重赋》，《历史教学问题》1995年第2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内容，主要从江南农村的村落共同体与地权关系入手，通过考察分家析产，族产分配，以及由此衍生的家产纠纷、民间习俗等，“揭示了中国乡村‘差序格局’的家庭伦理关系和财产关系”。其特点在于有别于从经济学角度对农家生计进行分析，而是从农民的日常生活研究农家生计。作者认为江南的宗族组织和族田义庄“并不像人们所误解的那样发达”，认为近代乃至前近代江南宗族组织并非特别发达，也不是普遍存在。^①张佩国发表了一系列的相关文章，有文章考察了江南农民的村籍观念，认为其将村籍与宗族合二为一的村籍观念背后隐含着对于村庄土地权的资源独占观念；有从农民日常生活的逻辑研究近代江南农家生计和家庭再生产；还有专文论述近代江南乡村的族产分配与家庭伦理的密切关联。^②

郑志章曾研究明清时期江南农业雇工经营的利润，罗仑则阐述了明清之际江南雇工经营的生产力优势。^③胡成的《近代江南农村的工价及其影响——兼论小农与经营式农场衰败的关系》一文研究了近代江南农村工价的持续上涨，带来了雇工成本的提高，认为作为雇主的小农只能减少包括雇工在内的投入，导致了经营式农场的衰败。意味着历史发展到了近代转型的资源重新配置阶段。^④小田分析了近代江南农民负担，认为负担过重阻碍了农业生产力提高和工业化发展，成为社会、政治危机爆发的导火线。^⑤

① 张佩国：《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② 张佩国：《近代江南的村籍和地权》（《文史哲》2002年第3期）、《近代江南的农家生计与家庭再生产》（《中国农史》2002年第3期）、《近代江南乡村的族产分配与家庭伦理》（《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制度与话语：近代江南乡村的分家析产》（《福建论坛》2002年第2期）。

③ 郑志章：《明清时期农业雇工经营的利润问题》，罗仑：《明清之际嘉湖地区地主雇工经营的生产力优势》，洪焕椿、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④ 胡成：《近代江南农村的工价及其影响——兼论小农与经营式农场衰败的关系》，《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

⑤ 小田：《近代江南农民负担论析》，《中国农史》1997年第1期。

三、手工业发展、工业资本和劳动力转移研究

1. 丝织业、棉布业发展研究

徐新吾主编的《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1991)分七章,第一章简介了中国古代,主要是明清时期的丝织业发展情况;第二章论述太平天国至辛亥革命前的江南丝织业;第三章考察了抗战前的江南丝织业发展,包括技术变革、江浙沪地区的丝织业发展变化,人造丝对丝织业的影响等;第四章、第五章分别研究了抗战时期、新中国建立前江南丝织业发展情况;第六章探讨了丝织业与绸缎商业、印花工业的关系;第七章是丝织业企业的个案研究。^①该书系统梳理了苏浙沪地区的丝织业发展情况,其选取的丝绸厂个案亦注意苏浙沪三地的关联和涵盖。

范金民、金文的《江南丝绸史研究》(1993)除“前记”外,分十二章。“前记”回顾了江南丝绸史的主要研究成果,并提出自己的主要观点,认为前人主张中国丝绸中心有一个逐渐南移的过程有失偏颇,江南丝织业中心地位是自身发展赶超其他地方的结果。并介绍该书的研究思路,指出该书以全国丝绸的发展为背景考察江南丝绸的地位,运用载籍和实物,循着官营和民营两条线索,从历史和技术生产的角度,探讨江南丝绸的发展和演变。第一、二、三章回顾了宋代以前的江南丝绸业的发展。第四章“宋代江南丝绸业中心地位的形成——简论中国丝绸中心南移论”对丝绸中心南移论提出质疑。第五章“元代江南丝绸业由中心向重心地位的过渡”论述了江南丝绸业的过渡性特征。第六章“明清时代江南蚕桑生产的特点”考察了明清时期当全国其他地区蚕桑生产都有不同程度的衰落之时,而江南的蚕桑生产却得以继续发展,形成商业化和专业化的特色,鸦片战争后,江南蚕桑生产地域进一步扩大。第七、八章研究了明清时期江南兴盛的官营织造业。第九章探讨了明清时代江南民间丝织业的发展,论

^① 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及发展阶段和生产方式。第十、十一章围绕江南丝绸业的国内市场和对外贸易，以及丝绸贸易的性质、影响等展开论述。第十二章分析了明清江南丝绸的工艺技术和品种色彩。该书系统研究了明清的江南丝绸业，提出了一些新论断。第十二章对丝绸工艺技术和品种色彩的研究，体现了作者在研究中对手工业技术特点的把握。

徐新吾主编的《江南土布史》（1992）是一部侧重于近代的史料集。“编者按”在考察鸦片战争前上海地区棉纺织手工业和土布商业后，着重分析了棉布手纺手织的分离过程，即洋布取代土布、洋布排斥土布的过程。书中汇集了江阴、常熟、常州、无锡、苏州、慈溪、平湖、硖石等地的土布史料。“该书对鸦片战争后我国的棉花、土布的年产量推算是迄今为止最有分量的计量分析”。

陈梅龙的《近代江南社会及经济》（2005）为一部文集，其中有专文研究了江南近代棉纺织企业。^①

2. 工业资本研究

马俊亚的《规模经济与区域发展——近代江南地区企业经营现代化研究》（2000）分七章，探讨了近代中国资本集团的趋势、江南地区资本集中的必然性、经济优势，以及其市场优势、与区域发展的关系等外部的经济功能。并考察了资本集团之间的相互参股、相互协作、避让竞争等推动市场有序发展的行为。还研究了江南大资本集团与中小资本之间的市场、利益关系。最后专门论述了苏南地区的货币资本积累与工业发展的关系。^②

马俊亚有专文研究近代江南工业资本对于农村经济社会的推动作用，指出江南工业资本的发展不是以牺牲农村为代价的；考察了近代江南工业资本与土地积累的关系，认为工业资本对土地的投资，为大工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分析了近代江南的一些资本集团有超越企业微观利益之上的中观调控功能，认为这种调控功能在缺失政府宏观调控的

^① 陈梅龙：《近代江南社会及经济》，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

^② 马俊亚：《规模经济与区域发展——近代江南地区企业经营现代化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时代尤为重要。^①

刘云柏的《近代江南工业资本流向》(2003)研究了近代江南外国工业资本、国家工业资本、民族工业资本等三种工业资本的流向及其历史轨迹,以及工业资本流向对江南社会转型所发生的影响。“以认识非西方国家工业化真实自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寻求近代江南社会变迁的‘本土解释’。”^②

3. 劳动力市场及劳动力转移研究

张海英发表于1991年的《明清江南地区劳动力市场探研》一文指出手工行业中的雇佣劳动是江南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基础,并考察了农业中的劳动力流通;马学强考察了明清江南劳动力转移的类型、方式等;孙竞昊通过对明清时期江南手工业、农业、商业中劳动力使用情况的考察分析,认为即使在当时商品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也不具备近代意义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和性能;马俊亚分析了近代江南劳动力的分层与流动;方行从劳动力市场规模、劳动力配置、劳动力流动、交易形式等方面探讨了清代前期江南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和局限;王加华对近代江南农村男女劳动力基于农事周期而呈现出的季节性分工与协作模式进行了考察。^③

四、商业与市场、市镇、城市史研究

1. 商业与市场研究

日本学者滨岛敦俊发表于1988年的《明代中叶江南土地开发和地主

① 马俊亚:《近代江南地区工业资本与农村社会经济关系初探》(《中国农史》1998年第1期)、《近代江南地区工业资本与土地积累关系辨析》(《史学月刊》1999年第6期)、《近代江南资本集团的中观调控功能》(《浙江师大学报》1996年第3期)。

② 刘云柏:《近代江南工业资本流向·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③ 张海英:《明清江南地区劳动力市场探研》,《历史教学问题》1991年第1期;马学强:《试论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内变迁”与劳动力转移》,《史林》1993年第1期;孙竞昊:《明清江南劳动力市场结构与性能探析》,《江汉论坛》1997年第1期;马俊亚:《近代江南地区劳动力市场层次与劳动力循环》,《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方行:《清代前期江南的劳动力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王加华:《分工与耦合——近代江南农村男女劳动力的季节性分工与协作》,《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的客商活动》一文研究了江南地主的商业活动，认为这是对人口压力的反应。刘石吉亦有人口压力和重税是江南商业化的原因之说。^①陈忠平在《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场考察》一文中指出明清江南市场由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及加工成品的商品流通构成，已经具备相对完备的市场功能。^②

范金民的《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1998）包含五章内容，依次研究了江南的商品流通、商品市场、商人和商帮，以及商业兴盛对江南社会经济的影响。第一章“江南的商品生产”考察了商品性作物种植的发展和专业副业商品生产的兴盛。就江南商品性作物种植的原因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以往论者的“人口压力论”和“赋税压力论”并不妥当，而应该注意当地的自然条件和农民的获利动机与经营方式。第二章“江南的商品流通”研究了以江南为中心的商运线路和流通商品的种类，对流通的商品量进行了科学的计量研究。第三章“江南的商品市场”系统论述了江南各层次的商品市场和专业市场。第四章“江南的商人商帮”探讨了江南的商帮以及会馆公所。第五章“商业兴盛与江南社会经济”就商业发展与江南的商品生产、商品贸易与江南城镇化的关系、商品经济与富庶的江南经济区的形成等问题展开讨论，并从江南人均耕地占有量以及农家的实际收支水平，对“最低生存水准”与“人口压力”的说法提出异议。^③

杨勇的博士论文《近代江南典当业研究》（2005）系统考察近代江南典当业的数量与地理分布、经营状况、经济与社会功能等，并对明清以来典当业的社会地位变化、行业组织的强化、与政府的博弈等情况进行了研究，最后还考察了新中国建立后典当业的命运。杨勇还发表了有关江南典当业的论文，如探讨典当业的资金融通功能，以及对公益事业和社会秩序的影响；考察和分析了近代江南典当业的趋利化和形象恶化的过程和缘由。^④

① [日] 滨岛敦俊：《明代中叶江南土地开发和地主的客商活动》，《广东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

② 陈忠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场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

③ 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④ 杨勇：《近代江南典当业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近代江南典当业的社会转型》（《史学月刊》2005年第5期）、《近代江南典当业的经济与社会功能》（《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单强、陈学文、张海英、龙登高等学者对明清以来的江南市场都有系统研究。

单强的《江南区域市场研究》(1999)有十三章内容,涉及近代江南市场模式及演化、乡镇市场、乡村集市、城市市场、商人与商人组织、农产品市场、工业品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区域市场发展的环境、市场价格波动与对策等。此外,单强还有研究近代江南市场的系列文章,如考察近代江南丝茧市场;还探讨了民国时期江南乡镇市场的规模、结构,专业市场及其功能,透过庙会和茶馆这类独特的专业市场,以及活跃于乡镇市场的经纪人研究民国时期的江南乡镇市场;并对近代江南市场经纪人的形态、组织、网络、市场功能等进行了细致研究。^①

陈学文的《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2000)除“绪论”和“附录”外,有八章内容。该书详细探讨了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经济发展、水陆交通与商路、商品流通和商业、商品市场、结构与网络等。书中考察了农产品、手工业品商品市场,分析了制约市场发展的诸多因素,如官员、富商、豪绅投资设立的商店(牙行)、税收苛重、商人撤资、交通条件恶化等。还分析了太湖流域商品市场的多层次和多形式,并对劳动力、金融、信息、技术等要素市场进行了论述,认为其“是带有中国特色的封建时代的要素市场”。^②该书对于太湖流域商品市场的基础、基本特征和市场经济萌芽方面的阐释“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③

张海英的《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2002)包含“导言”和五章的内容,即“导言”、“商路与商品流通格局”、“明清江南内部的商品市场分析”、“明清江南市场与全国市场的经济联系”、“世界市场与江南经

^① 单强:《江南区域市场研究》(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近代江南丝茧市场研究》(《中国农史》1997年第2期)、《略论近代江南市场经纪人》(《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近代江南乡镇市场研究》(《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

^② 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56页。

^③ 陈滨、王日根:《商业史研究的重新审视与推进——读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济的发展”、“明清江南地区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的总体特点及发展趋势”。“导言”主要是相关学术史的回顾，提及施坚雅和黄宗智的理论模式，并介绍该书的基本研究思路。该书主要着眼于江南地区的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视野扩展至全国主要经济区，对全国市场与江南市场的互动关系，江南市场的经济渗透力，世界市场对江南市场的影响都进行了深入分析。该书关于江南地区的界定亦取李伯重的观点，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取布罗代尔的论述，认为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产生并非由此及彼的关系。^①

张海英在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中聚焦的特点非常显著，主要就是围绕明清江南区域内外的经济联系和市场体系进行深入研究，成果丰富。她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商品市场从原来分散的市场格局发展为网状市场体系，苏州、杭州是江南区域功能最齐全、负荷最重的高级市场，并将区域市场引向全国市场；还探讨江南区域市场与全国市场的密切关系，以及江南在全国的重要经济地位；研究了江南以市镇为基础的城乡之间、镇与镇之间的商路变迁，认为明清时期的江南商路对商品市场体系的形成和市场功能运转至关重要；并考察江南与西北、江西、闽粤、两湖等区域的经济联系与交流。^②

龙登高的《江南市场史——十一至十九世纪的变迁》（2003）第六章“商人资本：在江南的活动与经营方式的变化”阐述了商人迁移与普通移民的区别，指出商人从游走客贩到侨寓经商，再到落籍定居，可以说是在市场驱动下商人经营方式的变化。该书还考察了各商帮与江南市场的关系，认为商帮在江南的活动加强了江南区域市场内部的整合，而区域市场的形成发展也促进了地域性商人的成长。^③

① 张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 张海英：《明清江南地区商品市场功能与社会效果分析》（《学术界》1990年第3期）、《明代江南与西北地区的经济交流——兼论“官方市场”对江南经济发展的影响》（《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明清江南与江西地区的经济联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明清江南与闽粤地区的经济交流》（《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清代江南与两湖地区的经济联系》（合著，《江汉论坛》2002年第1期）、《明清江南地区与其他区域的经济交流及影响》（《社会科学》2003年第10期）、《明清江南商路的经济内涵》（《浙江学刊》2005年第1期）。

③ 龙登高：《江南市场史——十一至十九世纪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另外，刘秀生认为江南棉布市场从清中期开始衰落，其原因主要不是外国机制棉布的排挤，而在于江南棉布生产和交换，江南棉布的销售不在于社会分工，而是自然分工，销售市场的大小只是取决于国内其他地区的棉布生产量；张海英分析了明清江南地区的棉花市场，指出由于国内棉纺织业对棉花的需求尚未形成固定的供需关系，专业经济区的固定分工未能形成，加之不合理的赋税制度，导致了江南商品经济的衰落；顾希佳探讨了近代江南米市的形成和经营格局，包括米市的经营商、相关产业、经营方式等；黄敬斌研究了明清以来江南蚕桑区叶市的远期交易，明清以来江南地区湖州、嘉兴等蚕桑区叶市上的“稍叶”交易，是一种典型且成熟的远期交易，它有着一套成熟的运作机制，反映出江南地区市场已经相当成熟。^①

2. 市镇研究

国外学者较早关注中国的市镇研究，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加藤繁由唐宋社会经济研究而涉及市镇研究，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施坚雅开辟了农村市镇的专门研究领域。^②20世纪70年代以来江南市镇研究方面比较突出的学者有刘石吉、王家范、樊树志、陈忠平、陈学文等。

刘石吉的《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收录了作者于1978年发表的三篇系列论文《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太平天国运动后江南市镇的发展（1865—1911）》、《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把江南市镇发展与江南地区的区域经济联系起来，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市镇，尤其是专业镇的形成、发展与江南地区农业、手工业的专业化和商品化生产方式息息相关。《太平天国运动后江南市镇的发展（1865—1911）》一反片面强调

^① 刘秀生：《清代棉布市场的变迁与江南棉布生产的衰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张海英：《明清江南地区棉花市场分析》（《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2年第2期）、顾希佳：《近代江南米市的经营格局》（《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黄敬斌：《明清以来江南蚕桑区叶市上的远期交易》（《复旦学报》2009年第1期）。

^② 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太平天国运动破坏性的观点，肯定太平天国运动对江南商品经济的影响，梳理了太平天国运动与江南不同地区市镇兴衰的关系。《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研究了明清以来江南市镇数量、分布、人口等。指出“明清以来商业资本主义的发达，以及十九世纪中叶后海运机能的肇兴及通商口岸经济的影响，都是决定市镇的机能特征、数量变动、与区域发展的主要因素”。^①该书试图说明中国社会的“传统内变迁”，即在西方势力冲击东南沿海以前，江南的近代化（不是“西化”）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刘石吉的市镇研究对改革开放后大陆刚刚起步的市镇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带动作用。

王家范也是较早涉足江南市镇研究的学者，其《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初探》（1984）一文反对将资本主义萌芽模式运用于江南市镇经济研究。^②80年代，陈忠平在市镇研究方面比较活跃，有系列论文对江南市镇的经济结构、布号与布庄、徽商、闽粤商人的活动状况、人口及手工业发展进行了详尽的研究。^③何荣昌考察了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兴起、发展，并将江南市镇的特点归结为：“夹河为市”，在农业、手工业发达地区，出现带有行业性特点的市镇，工商业巨镇兴起。^④叶依能考察了明清太湖地区市镇及市镇经济中的资本主义萌芽。^⑤

樊树志的《明清江南市镇探微》（1990）分上、下两卷，上卷“江南市镇面面观”包括六章，即“市镇兴起与发展”、“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市镇网络”、“棉布业市镇的分布与结构”、“丝绸业市镇的分布与结构”、“粮

①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8页。

② 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③ 陈忠平的江南市镇研究论文有《明清徽商在江南市镇的活动》（《江淮论坛》1985年第5期）、《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布号与布庄》（《江淮论坛》1986年第5期）、《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牙人与牙行》（《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明清时期闽粤商人在江南市镇的活动》（《学术研究》1987年第2期）、《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手工业发展》（《南京师大学报》1987年第4期）、《明清江南市镇人口考察》（《南京师大学报》1988年第4期）、《刘河镇及其港口海运贸易的兴衰》（《南京师大学报》1991年第3期）。

④ 何荣昌：《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

⑤ 叶依能：《明清时期太湖地区市镇发展之研究》（《农业考古》1988年第1期）、《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市镇经济》（《中国农史》2000年第3期）。

食业市镇与其他专业市镇”、“江南市镇文化一瞥”。下卷包括五章，即“苏州府典型市镇概览”、“松江府典型市镇概览”、“杭州府典型市镇概览”、“嘉兴府典型市镇概览”、“湖州府典型市镇概览”。在“绪论”中重点介绍了施坚雅的区域经济理论，作者把市镇视为“城乡间的中介和过渡地带”。“绪论”还简要回顾了市镇研究的学术史，作者认为仅从经济史角度研究市镇尚不全面，可以从经济、文化等多角度探讨市镇。该书将宏观论述与微观研究结合，上卷主要论及专业市镇，下卷研究行政区划内的市镇，材料扎实。^①其“以翔实的资料展现了江南市镇的历史发展与整体面貌”^②。

樊树志的《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是对其1990年出版的《明清江南市镇探微》的修订。该书系统研究了明清至民国时期江南苏、松、杭、嘉、湖五府的典型市镇，考察了市镇的分布格局、经济结构、文化传统、社会风尚。^③由于增加了社会史研究的内容，从而使其江南市镇研究显得更加丰满和立体。

与多数市镇研究从经济史入手不同，川胜守的《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99年）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江南市镇。除涉及江南市镇的生产、流通、消费等市镇经济研究外，川胜守还研究了市镇中的无赖、棍徒、脚夫等群体，以及市镇人的信仰、文化等，并考察一些历史事件与市镇社会的互动关系。总之，该书“从社会史的角度出发，对江南市镇的生产、流通、文化、信仰等问题做了全新的考察，力图描绘出江南市镇和以市镇为核心的一定空间的历史全貌”。其研究表明“市镇不仅担负起本来应该由国家承担的公共事业，并且还通过民众们具有独立性的、具有献身精神的活动来组织地方的自治”。^④

① 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② 龙登高：《中国传统市场成熟形态的探讨——江南地区市场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第10期。

③ 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④ 太田出著、张学峰译：《1999年日本史学界关于明清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11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还有其他一些日本学者从社会史角度研究江南市镇。如森正夫的《清代江南三角洲的乡镇志与地域社会》（《东洋史研究》58—2，1999）从民众意识出发，探讨江南以市镇为中心的地域社会的形成。太田出的《清代江南三角洲佐杂“分防”考》（《待兼山论丛·史学》33，1999）探讨江南市镇的治安问题，从市镇居民的“期待”来阐述佐杂各官对市镇的分防。^①

上世纪90年代国内的江南市镇研究已经呈现出注重社会史研究的倾向。陈亚平的《近代江南城市化市镇的社会结构》（1993）一文考察了近代江南市镇居民的群体结构，以职业分类研究居民群体构成而不是传统的宗族、家庭，研究了手工业者、农民、商人等群体。考察市镇的权力构成及变迁，认为市镇权力结构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指出市镇治理体制趋于规范化、正规化，市镇的城市化是包含社会生活和社会组织在内的深刻变迁。^②陈晓燕的《近代江南市镇人口与城镇化水平变迁》（1996）一文选取20世纪30年代江南中心与边缘不同的市镇人口类型进行分析，认为江南总体城镇化中的现代因素有限，近代农村城镇化步伐相比于近代之前更显迟滞。^③

小田考察了近代江南乡镇庙会的经济功能，其《论近代江南乡镇化》（1996）一文研究了近代江南乡镇化的走势，认为外来移民是其重要动力；其《近代江南庙会经济管窥》（1997）一文考察了近代江南庙会的资金来源及在当地社会中的经济功能；其《近代江南庙会与农家经济生活》（2002）一文从消费偏好、交易行为、利益分配等方面分析近代江南庙会与农家经济生活的关系。^④

包伟民主编的《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1998）研

① 太田出著、张学峰译：《1999年日本史学界关于明清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11期。

② 陈亚平：《近代江南城市化市镇的社会结构》，《河北学刊》1993年第5期。

③ 陈晓燕：《近代江南市镇人口与城镇化水平变迁》，《浙江学刊》1996年第3期。

④ 小田：《论近代江南乡镇化》（《苏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近代江南庙会经济管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近代江南庙会与农家经济生活》（《中国农史》2002年第2期）。

究了清末民国时期的江南市镇，其主题在于探讨“江南市镇有否或在多大程度上被纳入了中国社会近代转轨过程”。该书从江南市镇镇区的形制特征、近代交通引入对江南市镇的影响、江南棉业与市镇的兴衰、江南市镇的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变迁、江南市镇人口与城镇化水平、江南市镇在近代文化传播中的地位等多方面研究了江南市镇的现代化程度。其结论是“近代百年间江南市镇所经历的社会转轨还处于早期现代化阶段”。^①该书对于研究民国时期江南市镇起到了填补空白的作用。

张海英考察了明清政府对江南市镇的管理，认为多类型、多层次的行政管理模式反映了明清政府对江南市镇行政管理的灵活性，还否定了“国权不下县”之成说，认为大多数江南市镇接受州县级政府机构的直接管理。并对盛泽镇、浒墅镇进行了个案研究。^②

安涛分析了近代江南市镇衰落的根本原因，认为主要在于其传统功能的弱化；徐峰研究了近代江南市镇的城市化模式，指出江南市镇没有向大城市发展，而是成为依附大城市的城镇。^③

游欢孙考察了明清以来江南市镇的数量增长，认为“区域商品经济与人口城镇化水平的高与低，不仅需要考虑各个地区市镇数量的多少，还要充分考虑市镇（集镇）的界定标准，以及各县的面积、人口数量和工商业人口的比例”。游欢孙还专文探讨了清末民国时期在地方自治运动的推动下，江南县以下传统市镇被逐步纳入县以下行政区划，完成了政区实体化过程。^④林涓、冯贤亮以民国时期江南城镇为考察对象，分析了地方行政

① 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26页。

② 张海英：《明清江南市镇的行政管理》（《学术月刊》2008年第7期）、《关注明清政府对江南基层社会的管理——以江南市镇为视角》（王家范主编：《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明清政府对盛泽镇的管理》（《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三期，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明清政府对浒墅关的管理与浒墅镇的发展》（《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四期，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③ 安涛：《论近代江南市镇衰落的原因》，《历史教学》2007年第7期；徐峰：《试论近代江南市镇的城市化》，《兰州学刊》2008年第2期。

④ 游欢孙：《地方志叙事“小传统”与明清以来江南市镇的数量增长——兼论1929年与1934年的“商业镇”与“自治镇”》（《学术月刊》2009年第10期）、《地方自治与近代江南县以下行政区划的演变——兼论商业市镇的政区实体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2辑）。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区划变革与国家控制。指出县级行政似乎多带有“民主”化倾向，但实际上仍是国家对地方社会控制的变换方式，那些繁复的党政机构，不过是国家对于民众进行垂直控制的一种新系统。^①

王玉茹、郭锦超将近代江南市镇与华北市镇进行比较研究，并探讨了近代华北市镇落后的原因；胡勇军、徐茂明研究认为近代吴县地区比较成熟的市镇网络体系与“施坚雅模式”比较吻合。^②

3. 城市史研究

明清以来的江南是中国的财赋之区，不仅有密布的市镇，还有上海、苏、杭、无锡、镇江等具有强大积聚和辐射效应的都市群。因而对于江南城市史研究亦是学界的一个关注点。

傅崇兰的《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1985）研究了运河沿岸的城市，其中涉及江南的有苏州、杭州。该书考察了苏州、杭州与大运河的关系、环境发展、人口数量与结构、工商经济发展、城市文化等。^③

茅家琦主编的《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1993）考察了上海、苏州、镇江、常州、无锡等城市在近代化转型中各自的发展道路，是有关近代江南城市的一部综合性论著。^④被视为“我国第一部采用区域研究的方法探讨中国城市近代化的力作”。^⑤

张仲礼、熊月之、沈祖炜主编的《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2002）涉及江南城市研究。该书所论的沿江城市是指从宜宾至上海的沿江主要城市，其中属于江南的有南京、镇江、上海。除总论外，该书有

① 林涓、冯贤亮：《地方行政区划变革与国家控制——对民国江南城镇的一个考察》，陈明明编：《复旦政治学评论》第1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② 王玉茹、郭锦超：《近代江南市镇与华北市镇的比较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胡勇军、徐茂明：《“施坚雅模式”与近代江南市镇的空间分布》，《南通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③ 傅崇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④ 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⑤ 施宣圆：《半个世纪的求索——记著名历史学家茅家琦教授》，《文汇读书周报》2008年6月14日。

15章。第一至第六章是集中研究经济方面的专题。第七至第十二章讨论社会、市政问题。第十三章至第十五章研究了文化方面的专题。第七章“沿江城市的人口发展”认为20世纪初前后上海经济的发展对腹地的吸引力是上海人口膨胀的主要原因，人口激增和失控导致工商业萎缩、城市的市政建设逐渐衰退。国民政府建都南京是南京城市人口激增的主要原因，20世纪30年代南京是一座政治性城市 and 消费型城市，据1934年调查，从事家庭仆役的有15万多人，占城市人口总数的近22%，经商的有9万多人，公务人员5万多人，全市的产业工人不足万人。这种职业结构在沿江城市中比较特殊。第八章“沿江城市民俗风习俗”介绍各城市民俗菜肴服饰等，特别涉及开埠后的变化。第九章“沿江城市居民素质及特点”、第十章“从会馆、公所到同乡会、同业公会”、第十一章“沿江城市帮会变迁”等涉及沿江城市的人口结构、居民素质、风尚习俗、同乡和同业团体等社会组织。该书力图勾勒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沿江城市社会经济变迁的整体面貌。^①

美国学者林达·约翰逊主编的《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2005)由美、意、澳和日本的学者合作而成，探讨12—19世纪苏州、杭州、上海、扬州等四个城市的地位及特点的形成。认为江南城市形态长时期保持稳定，城市的发展及地位受制于地理生态、经济特点和生产运输技术、政治因素。通过研究城市精英的籍贯来探讨江南城市与腹地的互动关系。该书还通过对苏州、杭州的社会控制基层组织研究说明“帝国晚期以前一种城市自治的革命”。该书对于国内学术界研究的启发在于其认为江南城市如上海近代的发展并不是畸形的，只是中国城市发展的一种类型。例如上海在1842年以前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已经是一个国际贸易的中转站。应该把江南的城市研究追溯到明代，甚至宋代。总之，他们在试图寻找江南城市发展的“本土之根”。^②

^① 张仲礼、熊月之、沈祖炜主编：《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② [美]林达·约翰逊主编、成一农译：《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李伯重、周生春主编的《江南城市工业与地方文化（960—1850）》（2004）包含多篇明清江南城市史、社会经济史的论文。李伯重的《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首先提出傅衣凌关于明清城市的分类，即以消费主导的开封型城市和以工商业占极大比重的苏杭型城市。李伯重认为，除上述两种类型的城市外，江南大多数市镇应属于“新型工商业市镇型城市”。该文主要研究“苏杭型城市”的典型，即明清时期的苏州城市。李伯重认为苏州城市的范围超出府城，包含周边的市镇。探讨了明清苏州城市的地域变化、人口变化，以及城市工业的发展。落脚点在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结论是清中叶苏州已经是一个工业城市，表现出若干现代城市的特征，与近代欧美城市发展有相似之处。范金民的《明清地域商人与江南文化》一文将活跃于江南的各商帮的文化活动归结为“经营文化商品”、“推进戏曲文化”、“营造地域文化”、“交结文化名士”等，总之，这些商帮的文化活动推动了江南文化的繁荣。包弼德（Peter K. Bol）的《地方传统的重建——以明代的金华府为例》研究地方精英如何通过文化活动构建地方认同。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的《太湖盆地民间宗教的社会学研究》主要以嘉兴府的濮院镇为个案论述社会认同与宗教信仰和活动的关系。^①

李正爱的博士论文《江南都市群文化研究》（2008）提出江南都市群概念，并以江南都市群为研究对象，探讨江南都市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及其文化特征，考察江南都市文化的历史源流和变迁。李正爱还专文探讨了明清江南城市文化资源的再生产及其开发利用。^②此外，何一民分析了清中期以来较为发达的工商业城市苏州、杭州、扬州在近代衰落的原因，包括交通优势的丧失、太平天国战争的破坏、上海崛起的影响，以及传统经济衰退新式经济发展缓慢，且思想观念保守；张兴龙考察了明清时期江南层

^① 李伯重、周生春主编：《江南城市工业与地方文化（960—1850）》，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② 李正爱：《江南都市群文化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明清江南城市文化资源的再生产与开发利用》（《河北学刊》2008年第2期）。

次分明的城市群。^①

陈国灿主要从江南农村城市化的角度研究江南城镇，其研究对象以江南的州县城市和农村市镇为主，城市与市镇都有涵盖。其《江南农村城市化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一书除“绪言”和“尾章”外，有上、中、下三卷，上卷“宋元时期农村城市化的起步”，中卷“明清时期农村城市化的发展”，下卷“近代农村城市化的转型”。该书主要研究伴随市镇发展而出现的农村城市化现象。认为农村城市化不仅仅表现为大量小城镇的涌现和城镇网络形成，还有农村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等方面发生重大变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出现的农村社会形态变革。该书将江南农村城市化分四个阶段：宋元时期为起步阶段，明清为发展阶段，近代为曲折转型阶段，但转型并未完成，农村社会呈现传统与近代因素并存的二元结构，改革开放后为城市化飞跃阶段。不过该书主要研究1949年前的江南农村城市化历程，分析了农村城市化的动力系统和影响因素；考察了不同历史阶段市镇的发展状况与特点；分析了江南农村城市化形态与发展水平。该书还对人口因素、政府行为、城乡关系对城市化的影响进行了总结。

梅新林、陈国灿主编的《江南城市化进程与文化转型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是2003年7月召开的“江南城市化进程与文化转型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其中陈国灿的《关于古代江南城市化的几个问题》就城市化的理论解释、城市发展与城市化、市镇与农村城市化、城市化的形态演进等问题进行了探讨。陈学文的《略论明清江南城市化》认为江南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产业结构的调整，社会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从单一稻作经济走向综合经济发展道路，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社会财富的积累，商品经济的较高发展，市场的拓展等，才是市镇经济发展的主动力”。^②张海英的《浅析明清江南商路的经济与人文内

^① 何一民：《中国传统工商业城市在近代的衰落——以苏州、杭州、扬州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张兴龙：《略论明清时期江南的城市化》，《淮海工学院学报》2012年第16期。

^② 梅新林、陈国灿主编：《江南城市化进程与文化转型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

涵》从商路研究江南商品流通格局，商路布局也凸显了苏州、杭州在江南中心城市的功能，还探讨了江南商路的社会信息和人文内涵。杨师群的《明清城镇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与西欧中世纪城市的比较研究》，将明清城镇与西欧中世纪城市在社会组织结构方面进行比较，认为“所谓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实在是一个不存在的伪命题”。^①任放、杜七红的《前近代时期传统市镇的发展状况——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考察了江南的市镇网络 and 专业化生产，此外，该文集还有吴仁安的《明清以来吴江同里镇社会经济与文化风尚探微——江南乡村城市化个案研究》、范金民的《明清江南城镇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戴鞍钢的《近代上海与江浙城镇——以航运网络为中心》、黄鸿山与王卫平的《近代苏州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以晚清长元吴丰备义仓为中心》、王明德的《试论南京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陶水木的《民国时期杭州丝绸业同业公会的近代化》、彭南生的《近代江南城镇工商业会馆、公所碑刻述论》、钟华的《20世纪30年代南浔镇的社会状况——以1932年南浔调查为讨论中心》、刘天振的《从“通俗类书”生产看明后期江南出版业的商业化》、宋清秀的《神化的江南才女——明末清初男性士人心中的理想女性》等。

由前述可见，对江南市镇史的研究起步早，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但偏重于经济史，市镇社会史的研究相对薄弱，日本学者以地域社会理论为基础，侧重对江南市镇的社会史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国内江南市镇史研究亦开始重视市镇内部的精英群体、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市镇与乡村关系的研究。城市史主要集中于上海、苏州、杭州等少数大城市，而就江南城市史研究的深度而言，苏南又胜于浙北。

五、区域社会经济综合研究

魏嵩山的《太湖流域开发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从历史

^① 梅新林、陈国灿主编：《江南城市化进程与文化转型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

地理的角度考察了太湖平原的形成和太湖水系的历史变迁、政区建置和历史沿革、太湖流域的土地和水利开发、运河和海塘的兴修，以及城市、市镇和海港的发展，并梳理了太湖流域书院的发展和分布。

熊月之、熊秉真主编的《明清以来江南社会与文化论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是一部论文集。其中周武的《太平军战事与江南社会变迁》认为战争后果是造成苏杭的衰落以及上海的崛起。冯贤亮的《明清江南的士绅阶层与地方社会》指出正是由于江南有着良好的社会结构，即官民之间、官绅之间都保持较契合的关系，所以江南地区历经变乱，仍能保持繁荣。王国平的《清末苏州地区天主教与社会及官府之间的关系——天主教苏州总铎未刊函稿介绍与探讨》认为苏州地区“民教相安”的原因在于苏州天主教民多为渔民，以船为家，不易与外界民众发生纠纷；苏州社会矛盾缓和、官府士绅社会控制力强也是一个主因，苏州士绅大多对民教矛盾抱有息事宁人的态度，地方官多能持平处置民教和政教矛盾，苏州的传教士行为也相当谨慎。马学强的《清代前期上海地区的物价与居民生活》总结影响物价变动的主要因素有：战乱及政局变动、灾害与收成的影响、银与钱之间的比价、赋税征收与供需关系变化、政策或体制问题引起的物价波动。唐力行的《近世苏州徽州的互动及其经济社会变迁的差异》通过苏州与徽州的区域比较说明两区域的社会经济结构、文化价值取向不同，导致其经济社会发展的路向也不相同。陶水木的《近代湖州商帮兴衰探析——以上海为中心》考察湖州商帮在上海的经营范围、同乡会，以及湖州商帮衰落的原因。认为湖州商帮衰微的主要原因是其保守性。香港学者郭绍棠的《企业经营网络——一群在沪港交点印犹太族群的跨文化分析》考察印度犹太移民在上海、香港的发展，以及相互间商业网络的构建，如何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城市保存和扩大其族裔的文化影响。熊月之的《江南文人与科举考试——以冯桂芬为个案》讨论了冯桂芬对科举的认识。范金民的《清代苏州城市文化繁荣的写照——〈姑苏繁华图〉》称此图为“写实的艺术瑰宝”。还有几位台湾学者的文章，如林丽月的《大雅将还：从“苏样”服饰看晚明的消费文化》讨论明中后期社会时尚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的中心转移到江南，而“苏样”风尚的形成与传播，使大多数士人成为晚明商品经济与新型消费的参与者甚至领导者；巫仁恕的《晚明的旅游风气与士大夫心态——以江南为讨论中心》描述晚明士人的旅游实态，认为旅游已经成为晚明士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并深入其心态，指出旅游有雅俗之辨、身份象征的意味；张哲嘉的《明清江南的医学集团——“吴中医派”与“新安医学”》比较两者的差异，吴中医派是医学都会，后者是以单兵的形式活跃于各地，两者都得益于同乡纽带的强化。

范金民主编的《江南社会经济研究·明清卷》（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年）由17篇论文构成，涉及了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多个领域。其中夏维中研究明初江南社会基层组织的历史基础、演进过程、里甲制度的调整；范金民分别探讨了江南重赋、宗族义田、水利建设、商人商帮、城镇经济等，并专文介绍了太湖厅档案；宋立中考察了明中叶至清代江南的婚嫁论财等婚俗变迁；谢娟研究了明代江南医生的行医活动。

范金民的《赋税甲天下：明清江南社会经济探析》（三联书店，2013年）辑录了作者22篇文章，分“社会经济篇”、“社会生活篇”、“商帮贸易篇”等三部分。“社会经济篇”涉及江南重赋、江南农村经济、丝织业、棉纺织业、南京和苏州等城市经济、苏州市镇发展特点等；“社会生活篇”涉及江南士人、宗族义田、会馆公所、群体事件等；“商帮贸易篇”涉及洞庭商帮、徽商在江南的活动等。可以从中管窥范金民在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的贡献。

范金民、胡阿祥主编的《江南地域文化的历史演进文集》（2013）分“地域文化篇”、“地域经济篇”、“地域社会篇”三部分。“地域文化篇”中胡阿祥的《中国历史研究的地域视野》探讨了基于“地域差异”的历史研究，“追寻各别地域形成的历史过程，关照其共同传统，解释地域之间的差异，研究不同地域的冲突与融合”，试图“建立起区别于‘狭义’历史学的、研究与解释中国历史的新体系。”^①“地域文化篇”的论文还有陈秀

^① 范金民、胡阿祥主编：《江南地域文化的历史演进文集》，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7页。

芬的《明代江南养生知识的生产与流传：以养生书的编写与出版为核心》、马学强的《明清以来的江南席家与扫叶山房》、吴建华的《明清江南人才与人口文化教育素质》、王振忠的《清代江南徽州典当商的经营文化——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典当秘籍四种研究》、唐力行的《从苏州到上海：评弹与江南都市文化圈的变迁》、陈蕴茜的《城市空间重构与现代知识体系的生产——以清末民国南京为中心》、《1940年代末江苏省青浦县的地籍台账和地籍公布图》。“地域经济篇”多为明清以来江南经济史的研究文章，如邱仲麟的《明代以降江浙地区的藏冰业与冰鲜业》、王鸿泰的《感官世界的开发与欲望的商品化——以明清江南为中心的观察》、张海英的《空间网络市镇经济——立足于江南地区商品市场网络的分析》、邱澎生的《18世纪苏松棉布业的管理架构和法律文化》、刘石吉的《清代长江下游水运交通与城镇兴衰大势——兼论扬州邵伯镇》、马俊亚的《工业化与土布业：江苏近代农家经济结构的地区性演变》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中等金融城市货币资本的积累及其融通功能》等。“地域社会篇”亦多为有关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的文章，如罗晓翔的《明中后期南京士绅家族的社会形态》、蒋明宏的《东林学风与明清苏南望族》、徐茂明的《明清以来江南妖术恐慌的衍变及其社会根源》、黄鸿山等的《明清江南慈善家群体研究——以余治为中心》、伍跃的《清代末年江南出身官员社会构成浅析——以〈浙江苏郡同官录〉为中心》、汪利平的《杭州景观建设与清代政治文化》。该文集汇集的研究文章由点及面，大体反映出江南区域文化、经济、社会的一些面貌和特征。

六、社会群体、社会控制研究

早在1980年6月厦门大学举办的“中国经济史学术讨论会”就有涉及徽商的商业资本和佃仆制的文章；1980年10月中国社科院与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举办的“自宋至1900年中国社会和经济史学术讨论会”有李洵发表的《论明代江南集团势力》、叶显恩的《关于徽州祁门查湾和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休宁茗州佃仆制的调查报告》；1981年中国社科院和南京大学历史系举办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学术讨论会”除讨论资本主义萌芽外，还研讨了行会、公所和会馆问题。总之，改革开放之后不久，商人、商帮、会馆、公所等已是学界研究的热点。

1. 商人、商帮研究

张海鹏、张海瀛主编的《中国十大商帮》（1993）考察了山西商帮、陕西商帮、宁波商帮、山东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徽州商帮等十大商帮。该书的十大商帮，大多活跃于江南，或即是江南当地的商帮，如宁波商帮、洞庭商帮。“宁波商帮”一章由林树建撰写，考察了宁波商帮的形成、发展，特别强调了埠际贸易和同乡观念在宁波帮形成中的作用，介绍了宁波帮鼎盛时期在北京、上海、汉口、天津、沙市、苏州等地的活动。考察了宁波商帮经营的传统行业和新兴行业，以及宁波商帮在海外的 development 情况。第七章“洞庭商帮”由罗仑、范金民撰写，论述了洞庭商帮形成的自然、社会、经济条件，考察了洞庭商帮的活动区域和经营内容，分别研究了运河沿线、长江沿线、上海的洞庭商人活动情况，尤详于上海洞庭商人的经营活动，还总结了洞庭商人的经营方式和经营观念。第九章“龙游商帮”由陈学文撰写，考察了龙游商人形成的时空条件，认为龙游商帮萌发于南宋、鼎盛于明中叶至鸦片战争前后，衰落于光绪以后，并被宁绍商人取代。研究了龙游商帮的活动区域和经营行业，认为龙游商人如同徽商是综合商，并将龙游商帮的特点总结为：投资于生产事业，融入徽、闽、江右商人，重视文化教育等。^①

吴仁安的《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2001）第三章“明清江南著名的商人、商帮”关于商帮的研究中有明清洞庭商帮述略、明清徽商在上海地区的经营活动和历史作用，还探讨了徽商衰落的原因，并有宁波商帮的个案研究。^②

^① 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版。

^② 吴仁安：《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范金民、夏爱军的《洞庭商帮》(2005)考察了洞庭商帮的摇篮太湖东、西两山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研究了洞庭商人的家族及其活动、活动地域、在近代上海的发展情况、经营方式、经营观念和经营手段、经营特点,以及他们的社会生活。^①是对洞庭商帮全面而系统的研究。

范金民还有一系列研究江南商人、商帮的文章。其《明清时期活跃于苏州的外地商人》一文认为徽商、闽粤商人、秦晋商人等地域性商帮在苏州的活动,直接促进了苏州的经济发展,沟通了苏州与各地的关系;其《“钻天洞庭”特点的探讨》论述了洞庭商帮不同于其他大商帮的主要特点:以家乡为依托,以日用必需品为经营内容,善于更新观念开拓新局面等;其《明清时期徽商在江南的活动》认为明初徽商即在江南活动,入清后,更为活跃,经营范围包括丝、棉、粮等,经营方式有独资、合伙、商伙制等,经营手段还包括一些非经济手段;其《明清地域商人与江南文化》一文论述了地域商人在江南进行的与文化相关的商业和社会活动对江南文化的推动;其《明清地域商人与江南市镇经济》研究了地域商人与江南市镇兴衰的关系。^②

陈忠平的《明清时期闽粤商人在江南市镇的活动》(1987)一文考察了闽粤商人在江南市镇的长途贩运与零购散销等传统经营活动;蔡鸿生的《清代苏州的潮州商人》(1991)一文研究了潮州商人在苏州的活动。^③关于江南地区的徽商研究成果丰富,有周志斌的《明清时期南京的徽商》(《江淮论坛》1988年第4期)、陈学文的《明清徽商在杭州的活动》(《江淮论坛》1990年第1期)、《徽商与明清时期的浙江》(《徽学》第2辑)、王廷元的《明清徽商与江南棉织业》(《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

① 范金民、夏爱军:《洞庭商帮》,黄山书社2005年版。

② 范金民:《明清时期活跃于苏州的外地商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钻天洞庭”特点的探讨》(《货殖》第1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明清时期徽商在江南的活动》(《货殖》第2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明清地域商人与江南文化》(《江海学刊》2002年第1期)、《明清地域商人与江南市镇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

③ 陈忠平:《明清时期闽粤商人在江南市镇的活动》,《学术研究》1987年第2期;蔡鸿生:《清代苏州的潮州商人》,《韩山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期)、瞿屯建的《徽商与明清时期江南经济的发展》(《东南文化》1993年第3期)。

唐力行对徽商在江南的活动有深入研究,其《徽商在上海市镇的迁徙与定居活动》一文结合《新安月潭朱氏族谱》以及由徽州人编纂的《干巷志》、《朱泾志》等资料,揭示徽商“进入”上海市镇的特征:首重结交地方精英,贾儒迭相为用,改变籍贯扩大婚姻圈,以信义立本,建立市镇间的区域网络等;其《从杭州的徽商看商人组织向血缘化的回归——以抗战前夕杭州汪王庙为例论国家、民间社团、商人的互动与社会变迁》一文探讨了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政府对民间社团中最具实力的商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控制,使得商会丧失独立性。为应对专制强权和列强的双重侵害,商人倒退回去利用血缘、地缘关系以求扩大生存空间。^①

2. 地主、富民、士绅研究

对社会群体和各阶层的研究是江南社会史中起步较早的研究领域。伍丹戈的《明代绅衿地主的发展》(《明史研究论丛》第2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3年)认为绅衿集团在享受财赋上的特权和豁免权的同时,不断通过特权攫取财富。日本学者滨岛敦俊的《明代江南农村社会的研究》(东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宫崎市定的《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6卷,中华书局,1993年)都注意到江南缙绅阶层有官府达不到的基层管控能力。郑克晟的《明初江南地主的衰落与北方地主的兴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认为由于江南地主对明王朝的冷淡,朱元璋不遗余力打击江南地主,建文帝时朝廷与江南地主关系好转,永乐迁都北京后,又大力扶植江北地主,南北地主的矛盾始终反映在朝廷的政策上,几乎与明朝相始终。冯贤亮的《明代江南的富民阶层及其社会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阐述富民阶层对管理和控制乡村社会的积极作用。黄敏、慈鸿飞的

^① 唐力行:《徽商在上海市镇的迁徙与定居活动》(《史林》2002年第1期)、《从杭州的徽商看商人组织向血缘化的回归——以抗战前夕杭州汪王庙为例论国家、民间社团、商人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学术月刊》2004年第5期)。

《城居地主与近代江南农村经济》（《中国农史》2006年第3期）研究了近代江南城居地主的发展及对江南农村经济的积极作用。

徐茂明的《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年）》（商务印书馆，2004年）是研究江南士绅的专著。是著围绕江南士绅的文化权力展开，指出文化权力表现在：一、文化本身具有规范性；二、士绅通过对文化资源的垄断获得对社会事务的解释支配权。是著梳理辨析了明清两代江南士绅与国家间的关系，探讨其文化权力在社会基层组织和社会保障中的运用，研究了近代社会变迁中江南士绅的历史命运，言及科举制的废除割断了士绅与国家之间的依存关系，造成士绅阶层的瓦解。该书有三个关键词，即“长时段”、“地域”、“文化权力”，其特色在于从文化权力切入研究江南明清的士绅阶层在江南社会中的作用及其自身沉浮变迁。

徐茂明有一系列江南士绅的研究文章。其《明清以来乡绅、绅士与士绅概念辨析》一文分析了三个概念重叠及历史发展的过程；其《士绅的坚守与权变：清代苏州潘氏家族的家风与心态研究》一文探讨了苏州潘氏家族的行为方式和伦理道德观；其《明清时期江南社会基层组织演变述论》考察了江南社会基层组织，以及士绅阶层的活动对其产生的影响。^①

吴强华的《近世江南乡居士绅的城乡流动——以分湖柳氏为例》一文考察了近世江南乡居士绅城乡流动的迁移规模、迁居取向、迁移的影响因素，认为近世城镇的扩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乡居士绅的城镇化，但从流动规模看与传统社会并无本质区别，造成乡村社会精英阶层枯竭的真正原因是废科举后乡村精英补给线的断裂；吴强华的另一篇文章《转型期江南士绅结社与权威重构——以南社为例》指出晚清南社建立起以江南士绅为主体的跨地域社交网络，并试图利用其掌握的文化权力重建其对民间社会的主导地位。通过考察南社成员在上海新闻报刊业的作为可见他们利用中心城市的丰富社会资源和结社形成的规模效应，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他

^① 徐茂明：《明清以来乡绅、绅士与士绅概念辨析》（《苏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士绅的坚守与权变：清代苏州潘氏家族的家风与心态研究》（《学术月刊》2003年第10期）、《明清时期江南社会基层组织演变述论》（《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们的目标。^①

仓桥圭子的《十九世纪江南的善举及其中间人物》（《御茶水史学》46，2002年）研究了常州府在科举中落第从事商业、农业、医术的读书人，他们作为“董事”承担起赈济和兴修水利等社会事务，到嘉庆、道光年间进一步举办乡镇的善堂。作者提出不同于乡绅概念的“乡居指导阶层”来界定上述从事善举的读书人。^②何淑宜的《香火：江南士人与元明时期祭祖传统的建构》（2009）一书考察了元明时期儒家式祭祖礼仪的衍变，研究江南士人在祭祖传统中的作用。^③

范金民、夏维中等对进士群体有系统研究。范金民的《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统计了明清时期江南进士占全国比例达到15%，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为最高。但不同时期有变化，而且在地域分布上集中于苏松杭等地的望族，显示出少数望族在科举方面非同一般的竞争力。夏维中、范金民的《明清江南进士研究之二——人数众多的原因分析》指出明清江南进士人数众多的原因主要在于经济发达、读书传家的传统和教育发达、环境优美等。范金民的《明代江南进士事功述论》一文考察了明代江南的进士在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事功，并进行了全面的评述。^④杭建伟考察了明清时期无锡的进士；陈凌则研究了明清松江府进士群体人数的阶段性变化、地域分布、姓氏、中式年龄和仕进情况。^⑤

3. 士人结社、交往研究

李洵于1987年发表的《论明代江南地区士大夫势力的兴衰》一文考

① 吴强华：《近世江南乡居士绅的城乡流动——以分湖柳氏为例》（《史林》2008年第1期）、《转型期江南士绅结社与权威重构——以南社为例》（《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二期，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② [日] 泷野正二郎撰、张玉林编译：《2000年日本史学界关于明清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0期。

③ 何淑宜：《香火：江南士人与元明时期祭祖传统的建构》，台北稻香出版社2009年版。

④ 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明代江南进士事功述论》（《史学集刊》1997年第4期）；夏维中、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研究之二——人数众多的原因分析》，《历史档案》1997年第4期。

⑤ 杭建伟：《明清无锡进士简论》，《明史研究》第8辑，黄山书社2003年版；陈凌：《明清松江府进士人群的初步研究》，《史林》2010年第2期。

察了江南士大夫的出身与家世，以及他们进入政界的途径，分析了江南士大夫在政治和经济上所受到的压制，还探讨了江南士大夫内部的分层，以及对社会生活和社会风气的影响。^①程念祺的《明朝江南士大夫的俗趣》探讨了江南士大夫群体夸富、爱财、关心社会现象及低级的性趣味，认为在经济发展和王学的冲击下，放开俗趣是对人性自觉的浪漫主义理解。^②范金民在《鼎革与变迁：明清之际江南士人行为方式的转向》一文中指出清初江南士人在清政府一系列的打击之后，气节与社会责任感较明末相去甚远。^③邹莉分析了明清江南士子心态的变迁；王文荣研究了明清江南文人结社图的特点、功能，还考察了苏、松、常、镇四府的文化家族的结社活动。^④

徐林的博士论文《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社会交往研究》（2002）通过文化视角对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群体的社会交往活动进行探讨。该文指出中晚明江南士人非常重视社会交往活动，社会交往活动空前频繁。他们还结成了各种社团，通过结社、讲学等群体交往形式，游学、宴饮、品茶等个体交往方式，广泛地活跃于社会之中。该文还从文化心理、政治文化传统等方面分析了中晚明江南士人社会交往频度加强、社会交往空间拓宽的原因。^⑤徐林的《宴饮与明中后期江南士人社会交往生活》一文考察了明中后期江南士人热衷宴饮背后的末世情怀。^⑥

王文荣的博士论文《明清江南文人结社研究》（2009）探讨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八股文社、家族结社、遗民结社、耆老结社等不同类型的文

① 李洵：《论明代江南地区士大夫势力的兴衰》，《史学集刊》1987年第4期。

② 程念祺：《明朝江南士大夫的俗趣》，《史林》2002年第3期。

③ 范金民：《鼎革与变迁：明清之际江南士人行为方式的转向》，《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④ 邹莉：《明清江南士子心态的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王文荣：《文人结社图研究——以明清江南地区为考察中心》（《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明清江南文化家族结社论略——以苏、松、常、镇四府为考察中心》（《滨州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⑤ 徐林：《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社会交往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

⑥ 徐林：《宴饮与明中后期江南士人社会交往生活》，《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2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人结社，同时还对文人结社与文学的关系、关于复社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考察。在综合研究和个案分析的基础上论述了明清江南文人结社的历史地位，揭示其对地域史、文学史、文化史的意义以及对民国初年文人结社的影响。^①

4. 望族研究

吴仁安长期从事明清江南望族的研究，资料扎实，用功深厚，著述丰富。吴仁安的《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分四部分，在对江南望族作典型分析和专题研究后，依次研究江南城镇及其经济问题、江南商人及商帮问题、江南社会风尚与风俗民情问题等，并以望族为主线将上述专题贯穿起来。第一章“明清江南科名与著姓望族”采用点面结合的写法，选择明代长洲的申时行和清代昆山徐乾学、杭州许学范、苏州潘世恩，以及常州的翁同龢等几家望族作重点研究。此外，选择明清江南的上海地区、徽州以及镇、常、苏、太三府一州的著姓望族作面上的研究，基本上理清江南望族的历史概况、群体特点和社会影响。第二章“明清江南城镇与社会经济”选择一个地区（上海）、一个县城（芜湖）、一种地区特色经济（海盐生产）和两个市镇（同里镇、绍兴陶堰镇），试图说明城镇除了贸易的功能，还是望族的产生、发展之地。第三章“明清江南著名的商人、商帮”剖析江南望族与商人、商帮的关系，说明“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的社会现象。第四章“明清江南社会风尚、社会生活和风俗民情”探讨了江南望族对江南风俗民情的影响。该书以望族为主线，考察了江南望族与科举文化、城镇经济、商人、商帮、风俗民情的关系。总之，该书揭示了江南望族与明清江南社会变迁的关系。该书的不足在于偏重于对江南望族的总体考察，对于望族的具体研究不足；注重他们的为官身份，对于他们在社区生活中的具体作用研究不足；对于家族世系考察细致，对于婚姻网络关注不够。^②

^① 王文荣：《明清江南文人结社研究》，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

^② 陈尚胜：《读吴仁安〈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9期。

吴仁安的《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除江南核心区外，将皖南与浙江全境纳入江南范畴。书分上下编，上编分别对苏南、浙江、皖南望族进行综述和个案研究。下编“明清时期江南著姓望族考录”分别对苏南、浙江、皖南地区望族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全书规模宏大，资料丰富，是一部用功深厚的著作。

5. 江南人口社会史研究

从翰香在20世纪80年代已探讨了明代江南地区的人口密度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①至90年代江南人口研究已成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关注点。关于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李伯重的《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长及其原因》一文提出，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增长速度不仅低于明代后期江南，而且也低于清代前中期中国的其他地区。原因在于该地区的人民为保持生活水准不降低，更愿意采取各种手段控制人口增长，总之，经济原因是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低速增长的主因。李伯重的另一篇文章《“最低生存标准”与“人口压力”质疑——对明清社会经济史两个基本概念的再思考》质疑一贯的“人口压力”说。^②夏维中的《对明中后期苏州地区农业发展中几个问题的反思》认为在经营方式上当时还不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萌芽，人口压力是理解租佃经营长期占优势的关键。^③

此外，研究江南移民与人口的文章主要有吴必虎的《明初苏州向苏北的移民及其影响》（《东南文化》1987年第2期）、肖也珍的《明清时期浙江历史上第二次人口增长高峰剖析》（《探索》1988年第3期）、曹树基的《明清时期移民氏族的人口增长——长江中下游地区族谱资料分析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孔潮丽的《明清江南流动人口初

① 从翰香：《论明代江南地区的人口密集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

② 李伯重：《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长及其原因》（《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最低生存标准”与“人口压力”质疑——对明清社会经济史两个基本概念的再思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③ 夏维中：《对明中后期苏州地区农业发展中几个问题的反思》，《中国农史》1996年第2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探》（《安徽史学》1997年第1期）、马俊亚的《近代江南都市中的苏北人：地缘矛盾与社会分层》（《史学月刊》2003年第1期）等。个案分析的文章，如侯杨方的《明清江南地区两个家族人口的生育控制》（《中国人口科学》1998年第4期）、余新忠的《从苏州〈彭氏宗谱〉管窥明清江南人口状况——兼论谱牒与人口史研究》（《铁道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等。另外，孔潮丽探讨了明清江南流动人口的原因及特点和对于社会的影响，以及流动人口发展的五个阶段；池子华以近代淮北流民流向江南为例，考察土客冲突背后的文化意蕴。^①

著作方面主要有葛庆华与吴建华的两部书。

葛庆华的《近代苏浙皖交界地区人口迁移研究（1853—191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主要研究了太平天国及其引发的人口迁移对苏浙皖交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影响。该书除“序论”外，分七章。“序论”讨论了研究状况、对象、方法、资料来源。第一章为背景分析，包括自然、人文环境、战前的人口状况、天灾人祸、战时的人口损失估测。第二章“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人口迁移”研究了战后的人口回迁、人口地理分布，从心理因素、经济条件讨论人口迁移特点。第三章“太平天国战后的人口迁移”论述人口的迁人与分布，外迁人口的类型与分布等。第四章“移民数量、入籍及其发展”讨论移民数量、移民入籍的问题。第五章“人口迁移与经济变迁”、第六章“移民背景下的文化景观”、第七章“人口迁移与苏浙皖交界区域社会对当地社会治安影响”分析战后人口迁移形成的五方杂处的游民阶层、帮会势力、土匪猖獗，性别比失调、社会风气败坏制约了人口增长。还考察了生态破坏及土客矛盾尖锐等问题。该书研究表明太平天国战争给本地区带来严重的人口损失，人口损失率达到90.1%。战后的移民潮持续达半个世纪，迁移过程分招垦和自行迁入两阶段，垦荒移民是移民主体。此外，葛庆华还专文研究了太平天

^① 孔潮丽：《明清江南流动人口初探》（《安徽史学》1997年第1期）、《明清江南流动人口发展的五个阶段》（《学海》2002年第4期）；池子华：《土客冲突的文化学考察——以近代江南地区为例》（《河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国运动失败后至民国初年江南的河南移民对当地经济、文化、习俗风尚产生的影响；探讨了近代江南军事移民的来源、分布及对江南经济社会的冲击。^①

吴建华的《明清江南人口社会史研究》（群言出版社，2005年）研究了1368—1911年江南的人口状况及其对江南社会的影响。绪论部分探讨了明清江南社会史研究的范围、内容、方法。意在研究江南人口与社会互动的大系统。第一章总结了学者对江南人口增速、规模的研究成果，作为研究江南地区人口密度、人口压力以及人口社会结构的基本前提。第二章考察了明清江南宗谱人口的增长和世代间隔。第三章分析了江南人口密度以及人口压力问题。第四章探讨了人口与土地、粮食、物价、住房之间的关系变化。第五章论述了江南人口的职业结构与职业人口构成、职业观念等。第六章分析了明清江南的市镇密度和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动。第七章就明清江南社会人口流移的数量、流向、原因、后果等进行了细致探究。第八章探讨了明清江南人口的文化素质。第九章研究了明清江南人口的社会管理，包括非政府性的人口社会管理和政府性的人口社会管理。第十章“明清江南人口社会系统”进行了系统的理论阐述，认为可以把江南人口社会视作一个有机的自组织系统，该系统受到内外因素或机制的制约，具有与外部环境协调发展、内部结构自我调整的功能。该书力图构建人口社会系统论来阐述人口与社会间的互动关系，以建立在人口与社会两个子系统之上的人口社会系统作为研究江南区域社会史的抓手。吴建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探讨了清代江南人口增长情况、人口性别构成，分析了清代江南人口与住房的关系，考察了清代江南人口职业观念、职业结构变动，还研究了清代江南非政府性人口社会管理等。^②

^① 葛庆华：《近代江南地区的河南移民——以苏、浙、皖交界地区为中心》（《史学月刊》2003年第1期）、《近代江南地区的军事移民——以苏浙皖交界地区为中心》（《军事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② 吴建华：《清代江南人口增长探析》（《中国人口科学》1988年第5期）、《清代江南人口性别构成问题的考察》（《中国人口科学》1991年第1期）、《清代江南人口与住房的关系探略》（《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2期）、《清代江南人口职业观念》（《安徽史学》2003年第4期）、《明清江南人口职业结构变动的思考》（《中国农史》2004年第4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6. 基层控制研究

申浩的《江南“访行”的兴起、结构及功能》考察了明中叶以后，随着江南商品经济繁荣，财产纷争、健讼风气盛行而滋生的一个特殊行业“访行”。“访行”以吏胥差役为骨干，以访拿豪蠹、寄耳目于有司为事，活跃于官府的诉讼中，从中可见中国传统社会转型的特点；冯贤亮的《从国家到地方：清代江南的府县秩序与行政控制》一文指出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果称清代国家权力下移或“地方自治”是不符合史实的，认为江南各府县差异较大，不能以一两个范例进行概括；侯欣一的《清代江南民间的健讼问题——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探讨了清代江南民间健讼的原因及其影响；刘俊珂的《富农阶层与基层控制——以明代江南为考察中心》认为明代江南地区的富农阶层是基层社会控制的主导力量。^①

日本学者岸本美绪的《明清的交替与江南社会》（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年）分析了明清交替时江南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社会统合的状况。该书对于以往“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国家与社会的对抗”的二分法表示疑义，提出“机能上的同型性”，试图对传统中国的“国家与社会”进行多角度的灵活认识。稻田清一的《清末江南的“地方共事”与镇董》（甲南大学《纪要·文学》109，1999年）通过研究上海陈行乡的镇董秦氏的活动情况，描述出不同于传统善举和辅助官治的“地方公事”。^②

邵雍的《近代江南秘密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是作者的一部文集，所选文章的研究跨度从太平天国至新中国建立初，考察晚晴、辛亥革命、北洋军阀统治、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等不同阶段江南秘密社会的发展演变、衰败及其对江南社会的影响。“研究近代社会转型与秘密社会的关系，重视区域社会文化环境与秘密社会兴

^① 申浩：《江南“访行”的兴起、结构及功能》（《史林》2001年第3期）、侯欣一：《清代江南民间的健讼问题——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法学研究》2006年第4期）、冯贤亮：《从国家到地方：清代江南的府县秩序与行政控制》（《学术月刊》2010年第5期）、刘俊珂：《富农阶层与基层控制——以明代江南为考察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1期）。

^② 太田出著、张学峰译：《1999年日本史学界关于明清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11期。

起、发展的关系”。该书重点关注秘密社会与政府间的互动关系。

7. 民间慈善事业、灾荒救济研究

王卫平有一系列论文研究江南的慈善事业，如《清代苏州的慈善事业》（《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民间慈善事业》（《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1期）、《清代江南市镇慈善事业》（《史林》1999年第1期）、《清代江南地区的育婴事业》（《苏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普济的理想与实践：清代普济堂的经营实态》（《江海学刊》2000年第1期）、《清代江南地区的育婴事业圈》（《清史研究》2000年第1期）等。《清代江南地区的育婴事业圈》一文系统考察了江南育婴事业的兴起、发展，包容城乡的育婴网络的形成、育婴事业圈的分布、对育婴事业圈形成的制约因素等。此外，王卫平、黄鸿山的《清代江南地区的乡村社会救济——以市镇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农史》2003年第4期）、王卫平的《清代江南地区的慈善家系谱——以潘曾沂为中心的考察》（《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3期）、王卫平、马丽的《袁黄劝善思想与明清江南地区的慈善事业》（卞利、胡中生编：《民间文献与地域中国研究》，黄山书社2010年版）。可见，王卫平对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慈善事业的研究既有个案，也有宏观论述，既有市镇乡村，也有苏州这样的都市，是全面而系统的研究。

日本学者夫马进亦对清代江南慈善事业有所研究，其《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同朋社，1997年）分三部十一章，其中第四章“清代前期的育婴事业”，第五章“清代松江育婴堂经营的实际状况与地方社会”，第六章“清末的保婴会”论述中国育婴事业的创始情况、育婴事业的运作情况及保婴会与育婴堂的区别等等。

余新忠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包括绪论和七章内容。绪论主要是选题缘由、概念界定及研究思路、学术史回顾和资料说明。其后几章分别为：清代江南瘟疫的生态社会背景、清代江南的疫情、清代江南对瘟疫之认识、清代江南瘟疫成因探析、清代江南瘟疫与社会之互动。结语部分归纳了江

南瘟疫的特点、分析了清代江南社会的活力与不足，从江南各界对瘟疫的反应看清代的国家与社会，评析了清代江南的社会生态体系。认为应将社会生态纳入社会转型的研究中。是著将清代疫情的发生及对社会的影响和社会应对的研究结合起来，的确是社会史研究的一项创新。

余新忠还有一系列的相关研究文章，如《清中后期乡绅的社会救济——苏州丰豫义庄研究》（《南开学报》1997年第3期）研究苏州丰豫义庄这样一个社会救济机构，揭示乡绅救济这种社会基层控制手段的有效性。其与杭黎方合作的文章《道光前期江苏的荒政积弊及其整治》（《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通过对道光时期江苏的荒政积弊和政府的整治措施进行分析，认为问题的关键是社会尚没有找到合适的机制有效制约贪图私利的本性，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封建制度的原因，应该从管理和技术上作具体分析。其《20世纪以来明清疫病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0期）一文总结了医学界对于明清疫病史的研究、史学界对明清疫病史的研究。在明清疫病史与社会史的结合点上，作者认为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家与社会各界的反应形式、内容及相互关系等问题的探讨上，对病人及病家的心态和活动的研究较少，也未能将国家、社会的反应置于社会的变迁中，对近世社会的发展进行探索。其《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将江南大疫置于社会变迁的背景下，不仅可以从中看出传统社会功能的变动，还可以明了江南地方社会所具有的活力和能动性。其《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3期）介绍了台湾学者杜正胜、梁其姿等的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概况。其《清代江南种痘事业探论》（《清史研究》2003年第2期）探讨了种痘进入江南的过程及推广情况，以及种痘对江南人口增长的作用。其《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论清代国家与社会对瘟疫的反应》（《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论述了在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中国家、官府与社会力量的相互关系及各自发挥的作用。其《清代江南瘟疫对人口影响之初探》（《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2期）认为江南瘟疫并未对江南人口产生结构性影响。

此外，吴滔还研究了清代江南社区赈济，认为社区赈济能够在江南地区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能与地方社会的各种资源相互融合；刘昶探讨了清代江南的溺婴问题；黄永昌考察了清代江南地区的地方政府、社会对阻葬问题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吴琦、黄永昌对清代江南的义葬进行了研究；朱丽霞、刘丽洁以明代松江府为研究个案考察了长三角地区的水灾及政府应对。^①

8. 环境与社会研究

冯贤亮的《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包括“绪论”及另外十一章的内容。绪论对江南的概念、环境与社会控制研究进行了界定。其他十一章研究了江南的生态环境及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江南行政区划的变迁，明清时期江南地方的基层系统的变迁、运作，还有疆界错壤问题及其影响，政府对社会矛盾的控制措施等，明末江南大灾荒与社会应变，江南的水利防护与社会调控，通过一些个案研究了明代江南城防与社会、明末清初江南的地方防护与社会，江南的行业生活与互济行为，围绕寺庙和民间信仰而产生的意识形态和政府控制。最后总结了区域社会的环境变动及其控制模式。“本书向我们揭示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长期稳定的内在机制是如何运转的，表明了稳定社会诸要素中，中央、地方和民间的力量（包括士绅、家族、民间自治力量等）在其中具有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优势。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之所以能够长期处于稳定发展的状态，正是这些力量在社会政治、经济出现不稳定情况时，在妥善处理各阶层利益前提下，相互协调、平衡，不使矛盾激化，保证了社会继续正常运行。”该书试图提供一个社会控制与区域环境互动的理论模式。

^① 吴滔：《清代江南社区赈济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刘昶：《清代江南的溺婴问题——以余治〈得一录〉为中心》（《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黄永昌：《清代江南的阻葬问题与社会调控》（《近代史学刊》第7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吴琦、黄永昌：《清代江南的义葬与地方社会——以施棺助葬类善举为中心》（《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3期）、朱丽霞、刘丽洁：《长三角地区的水灾及政府救荒——以明代松江府为中心的个案考察》（《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冯贤亮发表的相关文章，如《坟茔义冢：明清江南的民众生活与环境保护》（《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6年）探讨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义冢与民众生活环境之间的关系，从中可见观念及社会变迁。其《明清江南乡村民众的生活与地区差异》（《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4期）研究了江南区域内地理环境的差异所带来的乡村民众生活差异。

李玉偿的博士论文《环境与人：江南传染病史研究（1820—1953）》（2004）考察了1820—1953年江南地区环境的变化、病原体、人三者之间的关系。该文指出从清末开始，公共卫生机构不断由主要城市向一般城市、市镇和乡村扩张。公共卫生的主要目的是消除传染病赖以生存的环境因素、提高人体自身的抵抗力和对患者进行治疗，以使环境、病原体与人之间达到了一种新的平衡。在这一过程中，公共卫生成为国家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方面，环境、病原体与人的关系也因此达成新的平衡。^①

七、文化社会史研究

20世纪90年代有些关于江南文化的总体研究，但较少涉及社会史。如孟彭兴的《明清太湖地区文化发展刍议》一文考察了明清太湖地区的文学、艺术、戏剧、曲艺等。^②

1. 出版业与江南社会研究

出版业和教育发达是明清以来江南文化繁荣的重要表现，因而对于刻书、藏书、书院、学校的研究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

叶树声、余敏辉的《明清江南私人刻书史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研究了明清时期江南私人刻书兴起的背景、概况、主要特点及对江南文教的贡献。

刘天振的《明清江南城市商业出版与文化传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① 李玉偿：《环境与人：江南传染病史研究（1820—1953）》，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

^② 孟彭兴：《明清太湖地区文化发展刍议》，《史林》1999年第1期。

社, 2011年)分四篇: 第一篇探讨了明清江南城市商业出版发展的背景因素, 包括江南的文化、经济发展及出版从业者之间的协作和官方鼓励措施等; 第二篇选取了江南戏曲选本编刊及表达其知识传播功能; 第三篇考察了杂志型读本的编刊与新型娱乐文化的创建; 第四篇研究了江南商书出版社与商业伦理的传播。

此外, 杨军分析了明代江南民间书坊兴盛的社会背景; 姚蓉考察了明清江南文化世族的刻书活动; 田峰的《近代江南报纸的发行与大众效果考论》指出近代江南报纸的发行推动了江南社会文化的转型, 但由于民众受教育程度不高, 其大众化效果有限。^①

2. 教育与江南社会研究

张小坡的博士论文《近代江南公共教育资源筹措配置的历史地理学分析(1644—1911年)》研究了清代江南以官学学田和宾兴为主要载体的公共教育资源实况、运作以及其近代转变。张小坡还有专文考察了清代江南宾兴组织的演变及运作。徐宁的博士论文《女校与近代江南社会的变迁(1850—1931)》梳理和分析了清末至20世纪30年代江南女校的诞生、发展以及对社会日常生活、伦理道德、经济生产和政治活动等方面的影响。罗时进的《明清江南文化型社会的构成》一文认为江南在明清时代形成了一个以艺文、图书、兴学、隐读为地域特色的文化型社会。^②

3. 昆曲与江南社会研究

随着文化社会史研究的兴起, 戏曲尤其是昆曲、评弹与社会变迁研究成为江南社会史研究的新兴领域。

日本学者田仲一成的《明清戏曲——江南宗族社会的表象》(云贵彬

^① 杨军:《明代江南民间书坊兴盛的社会背景透析》(《图书与情报》2006年第5期)、姚蓉:《明清江南文化世族刻书活动研究》(《思想战线》2011年第1期)、田峰:《近代江南报纸的发行与大众效果考论》(《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7期)。

^② 张小坡:《近代江南公共教育资源筹措配置的历史地理学分析(1644—1911年)》(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2008年)、《清代江南宾兴组织的演变及运作》(《安徽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徐宁:《女校与近代江南社会的变迁(1850—1931)》(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3年); 罗时进:《明清江南文化型社会的构成》(《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等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通过考察明清戏曲与江南宗族祭祀等活动的关系，论述明清以来江南戏曲所表现出的该地区特有的宗族理念，特别是科举与妇女守节这两个主题，既是戏曲的主旋律，也是江南宗族大力弘扬的理念。

美国学者郭安瑞（Andrea S.Goldman）的《昆剧的偶然消亡》一文研究了昆曲的发展、兴盛和消亡，探讨了昆曲与政治、社会变迁的关系，认为由于清末战乱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导致昆曲表演者和受众的输送渠道遭到破坏，从而导致了昆曲的偶然消亡。^①

朱琳的博士论文《昆曲与近世江南社会生活——以昆曲受众群体为对象的考察》（2006）研究了明清时期昆曲盛行的原因，分析了其社会功能和作用以及昆曲对江南社会生活也带来了诸多影响。该文着重考察了近代昆曲活动中心循着大批江浙移民的足迹而转移到了上海所发生的变革，包括表演内容、形式、演出经营策略等。文章指出昆曲的自我调整未能从根本上扭转衰势，其衰落的原因主要在于昆曲社会生态环境遭到了破坏，昆曲的受众，包括知识分子、市民、农民等群体因社会生活的变动而冷落、疏远昆曲。近代昆曲的兴衰轨迹动态地折射出近世江南社会生活的变迁。^②

郑锦燕的博士论文《昆曲与明清江南文人生活》（2010）考察了明清时期江南文人的吃、穿、住、行等日常生活和生活方式与昆曲的关系。全文分绪论、正文、余论等三部分。正文共分六章。第一章对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进行了简要的概括和梳理；第二章到第六章分别从江南人居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出行文化、民俗文化等方面论述昆曲与江南日常生活方式的关系。并对昆曲与江南生活、江南文化的关系进一步剖析，分析了昆曲对江南社会生活的影响。^③

① [美] 郭安瑞（Andrea S.Goldman）：《昆剧的偶然消亡》，华玮主编：《昆曲·春三二月天：牡丹亭——面对世界的昆曲与〈牡丹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② 朱琳：《昆曲与近世江南社会生活——以昆曲受众群体为对象的考察》，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

③ 郑锦燕：《昆曲与明清江南文人生活》，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

4. 评弹与江南社会研究

唐力行主编的“评弹与江南社会研究丛书”是全面系统研究评弹与江南社会的学术工程。该丛书现已出版5部，有唐力行整理的《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2008）、主编的《别梦依稀：说书人唐耿良文集》（2010），周巍著《技艺与性别：晚清以来江南女弹词研究》（2010）、吴琛瑜著《晚清以来苏州评弹与苏州社会——以书场为中心的研究》（2010）、何其亮著《个体与集体之间：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评弹事业》（2013）。

唐力行整理的《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2008）是其父，著名评弹表演艺术家唐耿良先生的回忆录。唐力行着手开辟评弹与江南社会研究亦是在整理该回忆录过程中所受启发，从个人的历史、评弹艺术史透视近代中国社会、江南社会的变迁史。

唐力行主编的《别梦依稀：说书人唐耿良文集》（2010）包括对唐耿良先生的追忆文章及对其回忆录《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的述评。

此外，唐力行还有《从苏州到上海：评弹与都市文化圈的变迁》（《史林》2010年第4期）、《“跑码头”在纽约：谈评弹的域外体验及其文化意义》（《都市文化与都市生活——上海、纽约都市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8年）等相关文章对评弹与江南社会史研究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探讨。

周巍的《技艺与性别：晚清以来江南女弹词研究》（2010）采用性别史和社会文化史的理论，通过考察“技艺”与“性别”的互动关系，分析女弹词与各人群建立的性别关系，以及时人赋予女弹词的性别意义，进而将女弹词置于江南社会的历史场景，分析其对社会文化的建构和创造作用。是著研究了明末以降江南女弹词与江南社会的互动关系、晚清以来女弹词群体的形成及其职业和生活，并梳理和分析了女弹词的形象塑造和性别论述。书中穿插了一些当时杂志报纸登载的照片、图片，附录中的“晚清以来女弹词师承关系图”、“民国时期职业女弹词拼档情况表”等对于评弹史的研究都极有价值。

吴琛瑜著《晚清以来苏州评弹与苏州社会——以书场为中心的研究》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2010) 研究了晚清以来在江南社会变迁的背景下苏州书场的发展，并就书场的空间布局、经营运作进行了系统研究，对于书场空间的塑造以及围绕书场形成的各类人际关系进行了梳理，概括了书场生活的文化表现、书场的商业运作体系及政府管理。

何其亮著《个体与集体之间：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评弹事业》(2013) 围绕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政府对评弹艺人及评弹艺术的改造，阐述艺人、市场、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文艺改造的影响。指出即使是在政治控制极为严格的五六十年代，市场依旧是政府在文艺改造过程中的重要考量因素，而市场自身对于评弹事业的发展也的确在发挥重要作用。以纠正以前相关研究中过于强调政治权力在文艺改造中作用的偏向。

申浩的博士论文《从边缘到中心：晚清以来上海评弹研究》(2012) 借鉴德国城市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 (W.Christaller) 提出的“中心地理理论”，提出评弹的“中心市场”概念，考察中心市场、评弹、社会变迁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作者认为评弹在历史上的传播和发展始终存在一个“中心市场”。在 19 世纪中叶以前，评弹的传播凸显为以苏州城市为中心并向周边辐射的形态，先至次一级的中心城镇如无锡、常熟、昆山等，然后层层推衍，再至广大的江南市镇乡村。苏州城市是这一时期评弹最高层级的中心市场。随着社会变迁，中心市场转移到上海。20 世纪 20—40 年代，随着新的上海都市中心市场的确立，评弹的内涵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也对其所依存的上海都市社会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①

八、社会生活史研究

1. 社会生活研究

钱杭、承载的《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年) 偏重于文人与文化。包括绪论及五章正文，分别是“江南的文人社

^① 申浩：《从边缘到中心：晚清以来上海评弹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2 年。

团”、“江南的宗族和宗族生活”、“江南的造纸、印刷和图书收藏”、“江南的艺事文风”、“江南人的衣食住行”。绪论“十七世纪江南社会历史地位”界定了“江南”的范围，并分析了江南在全国的政治和经济、文化地位。以此作为研究江南社会生活的大背景。“江南的文人社团”考察了江南文人社团的组织、活动，尤详于明清之际江南文人的政治活动。“江南的宗族与宗族生活”分析了江南宗族的几种类型、社会功能。认为江南历经明清鼎革而能基本稳定，与宗族的社会救济功能关系极大，因宗族还有教化和辖制族人的功能。“江南的造纸、印刷和图书收藏”考察了江南的造纸业、印刷业、藏书楼、藏书家，书坊不但是商业场所，还是文化和社交场所，而对于藏书楼、藏书家的研究反映江南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江南的艺事文风”研究了江南有从政经历的诗人作家、布衣诗人、妇女诗人，以及通俗小说、民间歌谣、戏曲、戏班、书画家和画派等。“江南人的衣食住行”突出了地方特色及其影响。该书主要是记述江南文人士子的社会生活，从文人社团到图书收藏、艺事文风，再到衣食住行，多为江南文人的社会生活。该书不刻意追求构建体系，各自独立成篇，力求自然呈现，不重分析类比，以白描的手法呈现出明清之际一幅多彩的江南社会生活画卷。

陈江的《明代中后期的江南社会与社会生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从区域社会文化研究的视角，对明代中后期江南社会和社会生活中所出现的一系列变化作了比较深入而全面的考察与论述，旨在揭示产生变化的原因、具体表现及其在江南乃至全国的历史意义。该书从历史时段和地域空间两个角度，就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传统风俗、自然生态环境等方面进行了考察与分析，研究了家庭结构和家庭成员的相互关系、宗族组织的发展演变及其社会功能、民间社团的兴盛及其社会影响，探讨了江南的社会生活如物质消费、婚丧喜庆、社交礼节的变动以及两性关系、节日风俗、民间信仰、庙会社火、通俗文艺等精神文化生活中显现出的新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并考察了江南人士区域利益的认同和地方观念的增强，以探寻其中近代因素的萌发。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王加华的博士论文《近代江南地区的农事节律与乡村生活周期》（2005）将农事节奏与乡村生活节奏结合起来进行论述，描摹近代江南农村社会实态。论文从节律、经济行为、社会活动等三个层面进行探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的是一种自然节律与社会节奏间的关系，其实质在于把乡村社会节奏纳入到自然节律中去。但近代以来在各种因素的冲击之下，这种模式开始逐渐发生变化，许多活动开始逐渐偏离农事节律的影响力。^①

其他一些研究江南生活的文章，如朱小田的《近代江南茶馆与乡村社会运作》称“江南茶馆是乡村市场的结点、社区政治的焦点、闲暇生活的热点”。冯贤亮的《明清江南乡村民众的生活与地区差异》探讨了江南内部的地域差异对民众生活的影响；丁贤勇的《新式交通与生活中的时间——以近代江南为例》指出新式交通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时间观念；王加华的《社会节奏与自然节律的契合——近代江南地区的农事活动与乡村娱乐》一文认为乡村戏剧、社会交往、赌博等乡村娱乐是与农事活动相契合的；宋立中的《清代江南都市娱乐业发展探微》考察了清代江南的固定娱乐市场、季节性娱乐集市、节日娱乐集市等。^②

2. 妇女生活研究

西方学者的中国史研究往往能发挥他们理论方法上的强项，美国学者高彦颐的《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1994）否定了“‘五四’史观”影响下的“压迫—解放”的妇女史研究模式，提倡“要倾听女性自己声音”，从女性视角研究明末清初江南才女的生活。该书指出：明末清初江南才女文化是在儒家社会性别体系允许的空间中产生，她们的成长不是冲击、而是巩固了男性的优势地位。^③当然也有论者认为该书虽然为中

^① 王加华：《近代江南地区的农事节律与乡村生活周期》，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

^② 朱小田：《近代江南茶馆与乡村社会运作》（《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5期）、丁贤勇：《新式交通与生活中的时间——以近代江南为例》（《史林》2005年第4期）、王加华：《社会节奏与自然节律的契合——近代江南地区的农事活动与乡村娱乐》（《学术月刊》2006年第3期）、宋立中：《清代江南都市娱乐业发展探微》（《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③ Dorothy K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中译本：[美]高彦颐著、李志生译：《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国妇女史研究提供新视角，但也存在过于强调中国古代妇女自主性的问题。^①

王仲探讨了明清江南农业劳动中妇女的角色、地位；陈晓燕分析了近代江南妇女社会地位变迁的经济基础；张佩国认为近代江南乡村妇女基本无财产权；王瑞庆考察了杭州湾沿岸、太湖流域、桐城等地的士女结社活动；宋立中研究了明清江南妇女冶游之风及与封建伦理之间的冲突；小田探讨了江南村妇在因生计、信仰、探访、休闲等形成的生计半径和信仰半径等日常空间中的活动；张杰的博士论文《明清江南地域社会才女群体现象的社会学研究——基于“陌生人”的视角》（2012）从社会学角度研究才女群体，以及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②

3. 社会习俗研究

常建华的《旧领域与新视野：从风俗论看明清社会史研究》虽不是专门谈江南风俗史，但探讨了相关理论。提出明清风俗以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可从六个方面把握：即作为方法的明清风俗论、以奢侈问题为中心的明清消费研究、全球化与明清风俗论、风俗特性与明清地域研究、职业观与明清风俗论、移风易俗与明清社会变迁。^③

关于民俗的论著有姜彬主编的《稻作文化与江南民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该书研究江南稻作的起源与演变、稻作生产的耕作习俗与乡规民约、衣食住行等民间生活方式、经济贸易习俗、民间医药、民间礼俗、自然界崇拜、民间巫术、民间神灵信仰等。相关的文章如小田的

① 王雪萍：《〈闺塾师〉与中国妇女史研究的方法论》，《妇女研究论丛》2006年第6期。

② 王仲：《明清江南农业劳动中妇女的角色、地位》（《中国农史》1995年第4期）、陈晓燕：《近代江南农村工业化与妇女社会地位的变迁》（《浙江学刊》2001年第6期）、张佩国：《近代江南乡村妇女的“财产权”》（《史学月刊》2002年第1期）、王瑞庆：《明清江南的士女结社》（《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4期）、宋立中：《明清江南妇女游风述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明清江南妇女“冶游”与封建伦理冲突》（《妇女研究论丛》2010年第1期）、小田：《近代江南村妇的日常空间》（《清华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张杰：《明清江南地域社会才女群体现象的社会学研究——基于“陌生人”的视角》（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

③ 常建华：《旧领域与新视野：从风俗论看明清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休闲生活节律与乡土社会本色——以近世江南庙会为案例的跨学科考察》指出庙会是江南农村乃至中国农村社会的主要休闲方式，增进了乡村社会的交往。庙会的节律体现传统农业社会的特点，即根据农业节气安排庙会。林涓的《祈雨习俗及其地域差异——以传统社会后期的江南地区为中心》指出不同地区祈雨的多样化主要是受地理环境的影响。^①

宋立中的《婚嫁论财与婚娶离轨——以清代江南为中心》一文认为婚嫁论财影响下的违反礼法婚娶对清代江南社会和家庭生活都产生一定的影响；陈江的《明代江南俗语所见之社会情态》探讨俗语所反映的明代江南在人际关系、价值观念、人生追求、处世为人、两性婚姻等方面的变化；朱绍华、王翔的《“僭礼逾制”：明清江南市民生活的潜流》从明清江南市民生活中的衣、食、住、游入手，考察其中“僭礼逾制”的生活潜流及其透露的商品经济发展和市民文化的成长。^②

4. 民间信仰研究

日本学者滨岛敦俊的《明清江南城隍考——商品经济的发达与农民信仰》一文考察了明代城隍制度和镇城隍的出现。^③滨岛敦俊的《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朱海滨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一、二章通过分析江南有代表性的土神产生的过程及共同特征考察江南民间信仰。第三章指出巫师、僧、道等民间宗教从业人员与地方神的创造、普及有密切相关。他们与地方官和地方精英配合，对于维护地方秩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章还研究了官方视野中的民间信仰并非被一概冠以“淫祀”，一则，看其是否影响到官方的“正祀”，再则，看其是否形成规模，是否有广泛的社会群众基础。第四、五章探讨了经济社会变迁之下的城隍

^① 小田：《休闲生活节律与乡土社会本色——以近世江南庙会为案例的跨学科考察》（《史学月刊》2002年第10期）、林涓：《祈雨习俗及其地域差异——以传统社会后期的江南地区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1期）。

^② 宋立中：《婚嫁论财与婚娶离轨——以清代江南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6期；陈江的《明代江南俗语所见之社会情态》，《史林》2004年第5期；朱绍华、王翔：《“僭礼逾制”：明清江南市民生活的潜流》，《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③ [日]滨岛敦俊著、沈中琦译：《明清江南城隍考——商品经济的发达与农民信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神信仰。是著最大的特点在于“将民间土神与宗族联系起来，将民间信仰与地域社会经济联系起来，将田野调查与文献参证结合了起来”。^①

申浩的《〈明清江南城隍考〉补证》对日本学者滨岛敦俊的《明清江南城隍考——商品经济的发达与农民信仰》一文中有关镇城隍庙产生的根源、时间、祭神的特点、一镇多城隍现象进行了补证；法国学者高万桑的《清代江南地区的城隍庙、张天师及道教官僚体系》一文探讨了清代江南地区的城隍庙中道士的社会角色，以及他们通过道教的管理体系参与国家构建；王健的《官民共享空间的形成：明清江南的城隍庙与城市社会》考察了明清时期城隍庙作为官民共享的公共空间在城市社会中所发挥的多重作用，既被纳入官方施政体系，也在士民生活中发挥多样性的作用。^②

有关佛教寺庙与江南社会的研究，如严耀中的《江南佛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三章“寺庙及其社会功能”考察了寺庙与区域社会的互动关系。论述寺庙与地方政府、与施主的关系，认为寺庙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教化和慈善事业。该书指出僧舍作为士人隐居、旅舍、停柩、读书的场所，显现了寺庙的世俗功能。该书还探讨了佛教影响下的江南民俗等，研究了一些异化的民间佛教社团对社会秩序的冲击。冯贤亮则研究了政府对于正统寺庙和民间信仰的控制和干涉，认为政府权力对于民间信仰的介入程度与其政权的强弱变迁直接关联；严明探讨了佛道世俗化与江南民间信仰之间的关系。^③

5. 民间消费、娱乐研究

关于社会消费的文章，如王家范的《明清江南消费性质与消费效果解

① 赵永翔：《敦岛滨俊著〈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解析》，《中国社会历史评论》，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

② 申浩：《〈明清江南城隍考〉补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法]高万桑著、曹新宇、古胜红译：《清代江南地区的城隍庙、张天师及道教官僚体系》（《清史研究》2010年第1期）、王健：《官民共享空间的形成：明清江南的城隍庙与城市社会》（《史学月刊》2011年第7期）。

③ 冯贤亮：《明清江南的正统寺庙、民间信仰与政府控制》（《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严明：《佛道世俗化与江南民间信仰之关系——以明清时期江南观音、城隍习俗为中心》（《学术界》2010年第7期）。

析》（《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8年第2期）考察了明清江南最低生活消费标准，研究了江南的高消费行为的政治经济影响。其另一篇文章《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认为明清江南存在突出的高消费现象，同时也伴随大量低消费。在高消费结构中，政治性、奢侈性消费比重畸高，具有传统的病态特征，消费行为仍然保持传统的等级性与政治性色彩。王卫平的《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奢侈风气及其评价——吴地民风的嬗变研究之四》（《学术月刊》1994年第2期）一文考察了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奢侈风气。孙竟昊的《明清江南商品经济与消费结构关系探析》（《齐鲁学刊》1994年第5期）探讨了消费对商品经济的影响。方行的《清代江南农民的消费》（《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认为当时江南农民基本上是温饱型的消费，生活资料的消费支出高于生产消费支出。宋立中的《试论明清江南婚礼消费及其特点》（《苏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探讨了明清江南婚礼消费的时代特征和地缘性特点。

邱江宁的《明清江南消费文化与文体演变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从消费文化和经济生活的角度考察那些影响文学文体演变发展的各要素，如作家群体、阅读群体，以及传播市场、传播载体等如何由于受到经济生活、消费文化的影响而演变。书分四章：“明中后期的商业和出版风尚与文学文体关系”、“清代消费文化与文学文体关系”、“清末民初出版风尚与文学文体关系”、“消费文化影响下主流文体对于商业化文体的渗透”。

黄敬斌的《民生与家计：清初至民国时期江南居民的消费》（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除“导言”、“结论”外，该书还包括七章内容。“导言”探讨了江南经济史上的消费问题，以及该书的研究思路和框架。第一至六章分别研究了食物消费、服饰消费、住行及燃料灯火、婚丧等世俗礼仪活动的消费、娱乐和信仰活动中的消费、教育和卫生及嗜好品消费、奢侈消费等。在“结论”部分量化描述了江南农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分析了奢侈消费的社会影响和经济后果。该书以经济学方法研究了清初至民国时期的江南居民消费，认为这一时期的江南经济并非“糊口经济”，

而奢侈消费带动了江南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王胜鹏的博士论文《明清时期江南戏曲消费与日常生活（1465—1820）》（2013）探讨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戏曲消费，并揭示其发展变迁的原因以及对明清江南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认为戏曲消费的不断变革也对民众日常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不仅丰富了民众的娱乐生活，引导民风向善，调整社会关系，而且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提高了社会就业率，但与此同时也助推了奢靡之风。^①

宋立中的《闲雅与浮华：明清江南日常生活与消费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除绪论外，有十四章内容，分三篇。上篇“婚姻礼俗与社会变迁”含两章，考察婚姻论财风尚，及明清至民国时期婚姻礼俗的变化，探讨日常生活嬗变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中篇“消费文化与消费服务”有八章，阐述了明清江南居民节日、鲜花、时尚消费文化的表现形式、影响等，以及游船、旅馆、娱乐服务业的经营形态，并分析了明清时期政府的消费政策及成效；下篇“休闲生活与雅俗冲突”含四章，探讨新式的休闲生活方式与传统礼俗文化的冲突，进一步认识消费视域中的明清江南社会变迁及其内在动力。

宋立中还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文章，涉及明清江南节日消费、鲜花消费、旅馆业、游船业经营、江南消费时尚化现象分析等。^②

九、区域经济社会比较研究

唐力行的《从碑刻看明清以来苏州社会的变迁——兼与徽州地区比

^① 王胜鹏：《明清时期江南戏曲消费与日常生活（1465—1820）》，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

^② 宋立中：《论明清江南节日消费及其经济文化意义》（《苏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论明清江南旅馆业的经营实态及其变迁》（《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论明清江南鲜花消费及其社会经济意义》（《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论明清江南消费时尚化现象及其社会学意义》（《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论明清江南游船业的经营空间、服务方式及其变迁》（《西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较》（《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指出徽州与苏州长期同属于江南行政区，前者地处内地山区，后者为沿海平原。明清以来两地互动互补，关系密切。该文指出，徽州人在苏州的商业活动促进了苏州社会的繁荣与转型，徽商资本输回徽州却加强了那里的古旧状态。徽州、苏州地理位置、自然人文条件不同，同受商品经济的影响，其家庭、社区、大众心态的变迁却走上了不同、甚至相反的路向。

唐力行等著《苏州与徽州——16—20世纪两地互动与社会变迁的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包括“绪论”和九章内容。“绪论”从总体上考察了苏州与徽州的历史渊源、区位差异，以及两地之间的区域互动和社会变迁。九章内容分别为：“苏州与徽州的家庭——宗族结构”、“苏徽两地间的家族移徙与互动”、“苏州与徽州的妇女”、“苏州与徽州的基层社会控制方式”、“苏州与徽州的社会保障”、“苏州与徽州的市镇”、“苏州与徽州的民间信仰”、“苏州与徽州的风尚习俗”、“苏州与徽州进士的文化素质与文化互动”。是著从宗族、家庭结构入手比较，以徽商为纽带考察两地之间的互动，并分析苏、徽互动给两地社会变迁带来的影响。

此外，李长弓的《徽州山区与太湖平原经济开发的异同》（《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研究明清徽州山区和太湖平原地区的经济开发，其相同之处在于两地均有极大人口压力，而徽州山区由于交通常遭阻遏，为保证本地的民食，农业经济主要偏重玉米、稻米等粮食作物；而太湖平原则由农作物转向蚕丝业，可以比一般粮食作物吸纳更多剩余劳动力，缓解人口压力。孙海泉的《上海辐射与近代苏南地区思想观念的嬗变》（《民国档案》2002年第4期）从衣食住行、语言、重商观念等方面考究上海对近代苏南的影响。陈剑锋的《上海开埠与浙北生丝产品市场的近代转型》（《上海商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考察了上海开埠带动了区域经济架构、市场、商人群体的变化。李明的《明清苏州、徽州、扬州三地风俗的互动、互融——兼谈苏意、扬气与徽派》（《史林》2005年第2期）考察了以徽商为媒介带动下的苏州、徽州、扬州之间三地风俗的互动、互融。池子华的《近代江南淮北社会文化的差异》（《江苏行政学院学

报》2006年第5期)对近代江南淮北的社会文化差异进行了比较。

小 结

1987年在深圳举行的“国际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暨全国第四届清史学术讨论会”，总结了与会专家提出的几点研究趋向：注重多学科综合研究、注重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加强定量分析和个案研究、进行比较研究。总结了历史经济区域的划分标准，以行省或自然条件划分，或综合考量。^①从80年代以来的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实践看，确实是在按照这个路子走，比如跨学科研究，注重环境与社会的研究，定量分析，区域比较研究等。虽然江南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成果丰富，堪称显学，但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当前的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主要问题在于：虽长于材料，但理论创新不够，在理论方面追随欧美的风气流转，国内学者较少能跻身国际学术界的理论前沿。江南的各区域研究畸轻畸重，苏南的研究相对深入，南京大学、苏州大学等高校集聚了一批以苏南社会经济史研究为己任的学者，以苏南为立足点，关照整个江南研究。相对而言，浙北的研究比较薄弱，除陈学文的市镇研究、蒋兆成的浙北经济史研究、包伟民的市镇史研究、陈国灿的城镇史研究外，少有引人注目的成果。与苏南、浙北研究相比，上海史研究更着重地方史和城市史研究，区域史的色彩相对淡薄。此外，缺乏区域的比较研究，一方面江南与我国其他区域的比较研究成果不多，虽有黄宗智的华北与长三角的农村比较、叶显恩的华南与江南的比较、唐力行的苏州与徽州比较，以及不同区域市镇的比较研究等，另外江南商帮的研究也会涉及区域的比较研究，但还不够系统，未成蔚然大观的规模。这一点应借鉴西方学者的优势和特长，不但将江南与中国其他经济区域比

^① 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

较，甚至进行跨国的区域比较研究。此外，还未有综合整个江南区域的社会经济史的通史著作出版，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

针对上述情况，进一步推进江南区域史研究首先需要对区域史进行更清晰的定位，厘清区域史与地方史、通史、整体史之间的关系；其次，拓宽区域史的研究领域，如区域比较研究、江南区域社会文化史、环境史等方面的研究，既是新的研究领域，也是新的研究方法与视角；再次，搜集整理相关研究资料，如方志、笔记、谱牒、碑刻、口述资料等；最后，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利用学术会议、互访、合作研究等方式达到步趋时代潮流的目的。当然最重要的是能够培养一支继往开来的研究队伍。

第二章

明清以来苏南、浙北社会经济史研究述论

一、苏南、浙北社会经济史的综合研究

苏南、浙北的社会经济史全面系统之作尚不多，多以论文集的面貌出现，专著亦有侧重，很难称得上是整体区域的社会经济史研究。

段本洛主编的《苏南近代社会经济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除“序”和“前言”，有三章内容。第一章“明清时期苏南社会经济的发展（1522—1840）”探讨了农业、手工业、市镇、商业资本及封建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第二章“鸦片战争后苏南社会经济的变化（1840—1918）”考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苏南农村经济、工商业、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变化，以及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诞生。第三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南社会经济的蜕变（1918—1949）”论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南手工业的蜕变、农村经济破产和民族工业的衰退。该书主要研究了明清以来苏南的农业、手工业、民族工业和商业资本、金融资本等，总体上是一部苏南经济史著作。

王卫平、王国平主编的《苏南社会结构变迁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是一部论文集，分“吴文化研究”、“经济结构”、“社会管理”、“调查报告”等四部分。其中多篇文章涉及社会经济史，如黄锡之的《从〈盛世滋生图〉看乾隆时期苏州对江南社会经济的影响》探讨了图中所反映的苏州都会全景，城市格局、商贸活动等。另有徐茂明的《同光之

际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秩序的重建》指出同光之际，江南士绅力图恢复太平天国后的社会秩序，但以复古为旨趣的重建活动落后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士绅的传统权威地位受到挑战，他们的文化道德重建最终归于失败。

唐力行主编的《明清以来苏州城市社会研究》上下册（2013）为其指导的13篇硕士论文结集，涵盖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经济方面有吴志远有关清代民国时期苏州壅业的论述、周子扬对1896—1934年间苏州信访局与官办邮政之间的博弈研究、鲍正熙对20世纪上半叶苏州典当业的考察；有3篇论文研究了明清以来苏州的社会群体，申浩、王秀娟、王文娟分别对脚夫、绣娘、女教师群体进行了系统研究；另有3篇研究苏州社会的文章分别是王波的《苏州观前街区研究（1840—1940）》、陆晓雯的《留园义庄与苏州近代社会》、王庆国的《苏州地区的灾荒救济研究（1912—1935）》；与文化相关的四篇论文分别是：魏运生的《清代徽州迁苏洪氏状元家族研究》、陈加林的《吴趋汪氏家族与近代苏州社会》、金坡的《民国（1920—1937年）常熟虞山诗社研究》、王健的《民间信仰视野下的国家与社会——以明清时期的苏州地区为例》。如唐力行所言：“这13篇文章所拼起的明清以来苏州城市史的图板，或可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苏州，认识这个古老而美丽的江南城市。”^①

汪效驷的博士论文《江南乡村社会的近代转型研究——以陈翰笙的无锡调查为线索》（2008）以考察陈翰笙领导的无锡调查为主线，展现了转型中的江南乡村社会的实态。研究了近代工商业发展背景下的无锡经济与地权方面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即市场化和现代机器的侵入与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相交织构成了转型时期乡村经济的特有形态。还考察了工业化对人口流动性的影响，指出近代义庄的兴衰及其组织结构和社会职能的演变表明了宗族逐步衰落。该文还探讨了近代无锡的社会生活，认为在整个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程中，乡村远远落后于城市，工业化给乡村带来的负效应远大于正效应。作者认为以农业为主的传统型社会向以工业为

^① 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城市社会研究·导言》上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

主的现代型社会转变的过程中，解决由于乡村的边缘化和内部的急速变化而产生的各种问题是一项极其复杂而艰难的综合工程。

此外，王卫平、王建华所著《苏州史纪（古代）》、小田的《苏州史纪（近现代）》（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中也有部分内容涉及明清以来的苏州社会经济史，前书的第五部分“明清时期的工商业中心”论及苏州城市发展、会馆公所、市民斗争和社会风尚变迁，第六部分“中国文化的苏州时代”论及苏州文坛、书画、工艺、科技、人才等；后书的第三部分“经济型式”和第八部分“市井生活”分别探讨了苏州的近代工业、家庭劳动、特种产品，以及茶馆、庙会等。王国平主编的《苏州史纲》（古吴轩出版社，2010年）是一部涵盖先秦至当代苏州历史进程的苏州通史著作。该书以朝代兴替作为分期节点，分别按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朝、清朝、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等时段分为七章。该书对于明、清、民国时期的经济、社会、文化均有深入系统的研究。

周峰主编的《元明清名城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和《民国时期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是对杭州地方史的研究，前书更为细致，从建置、河流、驻防、租界、对外交往、人物到手工业、商业、教育、文化等，包罗广泛；后书体系不如前书紧凑，前半部分主要为革命史内容，后半部分包括民国时期的工商业、对外贸易、市政、交通、医疗、教育等。

蒋兆成的《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是对浙北经济史较全面系统的研究。该书包括农业经济、封建土地所有制与经营方式、赋役制度、官私手工业、商业与城镇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等六编、二十五个专题。“农业经济”考察了海塘修筑、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农具、农技和生产经验，还研究了以“桑争稻田”为标志的商品化农业的发展，认为商品化农业发展是带动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轴心和动力，它推动了该区域由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与经营方式”分析了地权同绅权、皇权、族权、神权相结合，又同货币经济相结合，指出土地所有权的分离，显示出中国封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建土地所有制具有的垄断性、多变性和弹性特征。“赋役制度”讨论了赋役货币化和差徭杂役归于土地，是这一时期赋役改革的主要内容。“官私手工业”指出官营手工业的衰落及私营手工业的不断发展是明清时期官私手工业发展的总趋势。“商业与城镇以及资本主义萌芽”指出蚕桑丝织业是带动该区域农村经济发展、市镇勃兴，以及促使建立市场经济的巨大动力。还研究了杭嘉湖的市镇，依据经济职能划分为手工业专业性市镇、商业性市镇、港口型市镇。并对市镇的二重性进行了分析，认为其一方面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发源地，另一方面又与封建的政治经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探讨了行会对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通过对于杭嘉湖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作者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迟滞与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坚韧性，以及封建政治对商品经济的压抑。

包伟民主编的《浙江区域史研究：1000—1900》（杭州出版社，2003年）包括前言、附录及七章内容。在前言中，编者强调区域史要超越地方史和通史框架，但浙江政区的划分与地理形势未必完全吻合，浙江地域分三种类型：河网平原型、丘陵小流域型、盆地型。浙北杭嘉湖属于河网平原型，与苏南在经济文化方面具有同质性。宁绍温台属于丘陵小流域型，温台地区与福建地理文化接近，金衢地区属于红壤盆地，与皖赣经济文化联系密切。该书试图超越一般地方史的写法，力图体现区域史研究的特征，其中第六、七章突破浙江的行政区划限制，将包括浙北、苏南的整个太湖流域纳入考察视野。第六章“租佃制度与理论框架之外的江南经验”梳理了江南租佃制的源流，并探讨了租佃制成为自宋元以来占据江南经营方式主流的原因。作者以黄宗智的观点解说江南经营式农业衰微，认为家庭式农业能够维持比雇佣经营更高的收益。租佃制在江南有比较优势与这一地区的地权分布特点密切相关。“江南本地异常突出的地权相对集中与土地在空间分布上的零碎分散之间的矛盾，以及对精耕细作型农业的要求，都在客观上要求采取租佃制。”^①认为永佃制兴起、田底权和田面权的

^① 包伟民主编：《浙江区域史研究：1000—1900》，杭州出版社2003年版，第417页。

分离是江南土地产权明晰化的重要特征。第七章研究了江南家庭手工业中的散工制。作者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出现的一系列制度变革主要是为了应对劳动密集化乃至过密化程度的加深。注重制度调整、社会资源整合、群体经济和区域规模经济等是明清时期江南经济发展的重要主题。^①

陈雄、桑广书的《地域经济开发与环境响应——古代浙北平原的环境变迁》(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年)以多学科的方法研究古代浙北平原的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关系,具体考察了土地开发利用、水利、城镇聚落变迁与环境的响应,并考证了与经济开发相关的人口、土地数量、种植业、牧副业等产量规模等。

有些文章力图从宏观上把握杭嘉湖的社会经济发展,余新忠的《清前期浙西杭州、湖州府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三个层次》(2001)一文根据州县官缺等第、地理条件、人口密度、绅士密度和市镇数量将清前期杭州、湖州府地区划分为中心、中间、边缘三个层次;顾宪法、方福祥的《从“金平湖、银嘉善、铁海盐”看江南社会经济变迁》(2005)一文研究明清时期平湖、嘉善、海盐三县自然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与共性。陈剑锋的《近代浙北地区接轨上海与发展经济探析》(2005)一文考察了近代浙北与上海经济接轨的情况及成效。^②

二、农村经济研究

1. 农村经济结构研究

范金民于1988年发表的《明清杭嘉湖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研究了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在农业种植、经营结构方面的变化,认为农村经济结

^① 包伟民主编:《浙江区域史研究:1000—1900》,杭州出版社2003年版,第560页。

^② 余新忠:《清前期浙西杭州、湖州府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三个层次》(《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顾宪法、方福祥:《从“金平湖、银嘉善、铁海盐”看江南社会经济变迁》(《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陈剑锋:《近代浙北地区接轨上海与发展经济探析》(《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1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构已开始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项文惠的《明清杭嘉湖地区农村经济结构之演变》一文分析了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农业集约化生产和地域专业化情况，认为通过上述发展，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杭嘉湖地区的人地矛盾，推动了蚕桑业的发展和市镇的勃兴，为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经济领域的变革奠定了基础。吴竣的《近代杭嘉湖地区的农业专业化生产》一文认为上海开埠带动了杭嘉湖地区蚕桑、棉花、茶叶、油桐等经济作物的种植推广，推动了该地区农业生产专业化水平的提高。^①

唐文权于1989年发表的《近代中外经济联系加强对苏南农村的影响》一文认为开埠之后中外贸易的加强，苏南农村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加速了苏南农村自然经济解体。潘国英的《从庙会活动看明清苏州农业经济》一文通过庙会考察了苏州农村经济和市镇发展。戴鞍钢的《近代上海与苏南浙北农村经济变迁》一文指出上海开埠后对内、对外贸易的发展，带动了周边区域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转型，反映了近代都市与周边农村经济的双向互动关系。^②

曹幸穗的《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利用满铁以村庄为单位的调查资料考察民国时期土地占有关系的演变及推动力、租佃关系和雇佣关系的消长、家庭农场的规模效应，探讨了农村工副业生产及在农家经济中的地位，并研究了农副产品和生活生产资料的商品化。该书认为苏南商品经济发达而农业雇佣经济较少的原因在于新兴工商业比农业的利润率更高，吸引地主投资工商业，因而经营地主在这一地区渐趋消失。

殷晓岚的《二十世纪苏南农业与农村变迁研究》（中国三峡出版社，2008年）涉及清末民国时期的苏南农村经济。该书考察了苏南的自然和

^① 范金民：《明清杭嘉湖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中国农史》1988年第2期）、项文惠：《明清杭嘉湖地区农村经济结构之演变》（《江苏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吴竣：《近代杭嘉湖地区的农业专业化生产》（《中国农史》1998年第1期）。

^② 唐文权：《近代中外经济联系加强对苏南农村的影响》（《史林》1989年第4期）、潘国英：《从庙会活动看明清苏州农业经济》（《中国农史》1992年第1期）、戴鞍钢：《近代上海与苏南浙北农村经济变迁》（《中国农史》1997年第2期）。

社会经济条件，探讨了农地制度、农业技术变迁，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2. 兴修水利研究

陈剑锋的《试论宋至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人地关系的调适》总结了宋至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人地关系调适的路径，主要包括市镇发展、商贸兴盛的空间化解、生产经营方式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科学合理的农田水利建设，以及“人”的自我调适。冯贤亮的《高乡与低乡：杭嘉湖的地域环境与水利变化（1368—1928）》一文认为明清至民国杭嘉湖地区的治水机制的变化，对于地域环境也产生很大的改造，传统水利社会和水文环境的许多面相在历史中消失。^①

3. 租税、赋役研究

李伯重对苏松地区的房租、地租、物价进行了细致的统计。其《清代中期苏松地区的地租与房租》一文认为清代苏松地区的地租是名义地租的80%，灾荒年景会更少。而苏松地区的房租相比于城市居民的收入来说比较高，是城市居民的主要开支之一；其《华亭——娄县地区的物价（1823—1829）》对19世纪20年代数年间松江地区的物价作了统计。^②蒋兆成的《明代杭嘉湖地区役制的演变》一文考察了明代杭嘉湖地区役制实施的具体情况。^③

邢丙彦利用租佃契约文书和收支账册等对清末民国时期松江地区的土地租佃费用、地租形态变化、政府减租政策、土地买卖价格等进行了详实的研究。他发表一系列相关研究文章：如《清末民国时期松江的土地租佃费用变化——上海市档案馆藏近代松江土地租佃契约文书研究之一》（《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一期）、《20世纪30—40年代松江“典于记”地租形

^① 陈剑锋：《试论宋至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人地关系的调适》（《东岳论丛》2008年第4期）、冯贤亮：《高乡与低乡：杭嘉湖的地域环境与水利变化（1368—1928）》（《社会科学》2009年第12期）。

^② 李伯重：《清代中期苏松地区的地租与房租》（《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1期）、《华亭——娄县地区的物价（1823—1829）》（《清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③ 蒋兆成：《明代杭嘉湖地区役制的演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3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态变化与国家政治变动——上海市档案馆藏“典于记”收支账册研究之一》（《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二期）、《1946—1948年松江县“租成”会议和国民党“减租”政策》（《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三期）、《晚清同光年间松江西部土地买卖交易价格变化——上海档案馆藏近代松江土地买卖契约文书研究》（《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四期）、《20世纪20—30年代松江地方的欠租与催租、追租——以松江“典于记”为例》（《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五期）等。邱建立的《从“典于记”认田契看近代苏南地租的变动趋势》通过以苏松地区的认田契为标本的研究认为从清末到民初苏南地区的地租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主要原因在于土地的生态恶化导致土地的生产率降低。^①

吴滔的《清代江南的一田两主制和主佃关系的新格局——以苏州地区为中心》一文探讨了清代江南的一田两主制对城乡关系产生的深远影响。莫宏伟的《近代中国农村的永佃权述析——以苏南为例》一文认为永佃权对于发展农业生产有一定作用。方兴的《从“苏松重赋”到“三饷”均摊》认为明朝的苏松重赋确实存在，但明政府主要是出于南北平衡考虑，北方农民的负担也不轻。至晚明，由于财政的决策人物多出于江南，“三饷加派”采用按照田亩平均摊派的方式，以表面的公平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公平，打破了南北平衡，加速了明朝的灭亡。王玉贵的《货币地租在近代苏南的历史命运》探讨区域经济与地租形态的关系。^②蒋兆成的《论明代杭嘉湖的官田》一文探讨了官田与重赋区形成等问题。^③

4. 劳动力问题研究

周中建的《近代苏南农业劳动力供需状况初探（1912—1937）》一文

^① 邱建立：《从“典于记”认田契看近代苏南地租的变动趋势》，《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② 吴滔：《清代江南的一田两主制和主佃关系的新格局——以苏州地区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5期）、莫宏伟的《近代中国农村的永佃权述析——以苏南为例》（《学术论坛》2005年第7期）、方兴：《从“苏松重赋”到“三饷”均摊》（《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1期）、王玉贵：《货币地租在近代苏南的历史命运》（《苏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③ 蒋兆成：《论明代杭嘉湖的官田》，《杭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

认为近代苏南农村有较高的劳动剩余率。其《近代苏南农业内部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村劳动力转移（1912—1937）》一文指出在近代苏南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虽然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农业内部产业结构的调整仍是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植棉业、蚕桑业、园艺和畜牧业的迅速发展使农业内部吸纳的农村劳动力达70%，农业收入亦占农家总收入的80%左右。其另一篇文章《近代苏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整体评价（1912—1937）》对近代苏南农村劳动力转移进行评价，积极方面为大量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提高了市镇化水平，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社会经济问题，但总体上推动了苏南农村经济发展，也是当代“苏南模式”的历史渊源。^①

池子华对近代苏南的农民工有系统研究。其《近代苏南农民工的源与流》（《苏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以无锡为龙头的苏锡常为考察地区，分析苏南农民工来源主要是本地农民，苏北亦为重要来源地，苏南农民工外流的主要目的地是上海；其《农民工与近代长江三角洲乡村的社会变迁——以苏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学术月刊》2009年第5期）指出往返于城乡的农民工成为城乡间的“桥梁”，亦为乡村的“示范”，给近代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带来了影响，从农村经济结构到城乡人口分布，再至社会阶层、思想观念都产生了巨大变化。其《农民工与近代中国“城市病”综合症——以苏南为中心的考察》（《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揭示近代苏南农民工进城务工，在为城市带来繁荣的同时，也产生了相关的社会问题，即所谓“城市病”综合症，如非法占地、环境恶化、物价腾涨、就业困难、失业问题突出、城市技术革新动力不足、流民乞丐遍地、职业结构畸形、性别比失衡等。其根源在于农民工的“城市化过度”。而“城市化过度”主要是指农民工过度向城市集中，超出

^① 周中建：《近代苏南农业劳动力供需状况初探（1912—1937）》（《中国农史》1997年第3期）、《近代苏南农业内部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村劳动力转移（1912—1937）》（《中国农史》1998年第2期）、《近代苏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整体评价（1912—1937）》（《中国农史》2001年第3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城市的吸纳能力。池子华对近代苏南打工妹亦有专门研究。^①

张丽的《人口，土地和农业生产力水平：二十世纪初无锡农村地区人口压力的测量》通过对20世纪初无锡农村地区人口、土地和农业生产力水平的考察，测量了20世纪初无锡农村地区的人口压力。认为即使是在当时全国工业和城市经济最为发达的江南，其工业和城市经济发展程度也远不足以吸收足够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也不能在资金和技术上对农业生产予以显著的支持，因而未能带动农村经济的近代转型。^②

5. 渔业及渔民

李勇深入研究了渔业、渔民生活等。李勇、池子华的《近代苏南渔民的天主教信仰》（《中国农史》2006年第4期）指出近代苏南渔民中信仰天主教较为普遍且比较虔诚，这在农民群体较为罕见，研究认为除物质、精神的贫乏之外，天主教的“保护伞”功能是其主要吸引力所在。李勇的《近代苏南渔民贫困原因探究》（《安徽史学》2010年第6期）探究近代苏南渔民在近代化进程中日趋贫困的社会根源，主要在于渔民渔业权丧失、封建势力盘剥、外来势力的掠夺等。李勇的渔业渔民研究主要参见其博士论文《近代苏南渔业发展与渔民生活》。尹玲玲的《明代杭嘉湖地区的渔业经济》（《中国农史》2002年第2期）考察了明代杭嘉湖地区渔业经济的发展变迁；其另一篇文章《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渔业生产——以苏州、松江、常州地区为例》（《古今农业》2004年第2期），从渔船种类、大型船舶的形制、生产形态，河泊所的设置分布，及渔业课税的征缴变化到渔户人口的数量变迁等各个方面探讨明清时期苏州、松江、常州地区的渔业生产发展变迁。

三、手工业、工商业、市场研究

明清以来苏南浙北的手工业、工业起步较早，商品经济、市场网络亦较

^① 池子华：《近代苏南打工妹研究的几个问题》，《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② 张丽：《人口，土地和农业生产力水平：二十世纪初无锡农村地区人口压力的测量》，《中国农史》2007年第3期。

发达。特别是因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需要，学界对于手工业、近代工业、商业、市场等方面的研究多有涉及。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推进，苏南浙北的近代工业、商业、市场等成为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热点。

1. 手工业、近代工业研究

段本洛、张圻福合著的《苏州手工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分四章：第一章“明清时期苏州手工业的发展（1522—1840年）”，第二章“鸦片战争后的苏州手工业（1840—1918年）”，第三章“苏州手工业的蜕变和逐步走向崩溃（1918—1949年）”，第四章“苏州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49—1956年）”。是著主要考察了明清至新中国成立之初苏州的丝织手工业、棉纺织手工业、其他城镇手工业、工艺美术手工业、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演变。除注重生产关系，还关注手工业发展中的生产力变革。

在20世纪80年代，段本洛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近代苏州丝织业和棉纺手工业的文章。其《近代苏州丝织手工业八十年间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4期）考察了鸦片战争后80年间，苏州丝织业由城市传统手工业过渡到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再至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三个阶段，其间，孕育于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继续存在和发展。而在这一时期先进的机器生产与落后的传统手工业并举，构成了一种多层次的经济形态，这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段本洛在苏州丝织业方面的研究文章还有：《论明清苏州丝织手工业》（《苏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苏州丝织手工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孕育》（《历史教学》1986年第1期）等。

张海英的《海外贸易与近代苏州地区的丝织业》认为海外市场的拓展对苏州丝织业的近代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生产工具、织造原料、市场机制、社会关系都产生极为关键的影响。而20世纪20年代的列强关税壁垒及世界经济危机导致丝织产品的外贸萎缩，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世界经济对中国的影响。^①马学强的《明清江南手工业品的制作、市

^① 张海英：《海外贸易与近代苏州地区的丝织业》，《江汉论坛》1999年第3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场与消费群体——以苏州织造局特供服饰与上海顾绣为例》以特供朝廷的苏州织造局和以面向市场的顾绣为例论述不同体制下的江南手工业品的不同发展趋向。^①

段本洛的《论明末清初苏松地区的棉纺织手工业》（1986）一文考察了明末清初苏松地区植棉和棉纺织生产工具的技术革新，以及商品流通和商品市场，指出苏松地区的棉纺织业在一面排斥商品生产的扩大，一面需要商品流通的矛盾状态中发展，文章认为占主体的家庭手工业没有资本主义萌芽，而与之关联的棉布加工业因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的结合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其《近代中国棉纺织业的机械化》指出近代外力侵略刺激了中国棉纺织业的机械化。^②陈映芳、王文璞的《近代苏州棉布染织工厂发展简论》将近代苏州棉布染织工厂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的新发展相联系。^③

段本洛研究了近代苏南的工业结构，其《历史上苏南多层次的工业结构》和《论历史上苏南宝塔式的工业结构》两文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苏南已经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多成分的工业结构，第一层是大型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第二层是中小资本工业，第三层是工场手工业，第四层是作坊和个体手工业。并在纺纱业、织布业、缫丝业和丝织业中明显表现出来。^④

单强的《工业化与社会变迁——近代南通与无锡发展的比较研究》（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以近代经济社会发展较好的南通、无锡两座城市进行工业化和社会变迁的比较研究。认为南通、无锡在工业化起步阶

① 马学强：《明清江南手工业品的制作、市场与消费群体——以苏州织造局特供服饰与上海顾绣为例》，《史林》2005年第4期。

② 段本洛：《论明末清初苏松地区的棉纺织手工业》（《苏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近代中国棉纺织业的机械化》（《苏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③ 陈映芳、王文璞：《近代苏州棉布染织工厂发展简论》，《苏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④ 段本洛：《历史上苏南多层次的工业结构》（《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论历史上苏南宝塔式的工业结构》（《苏州大学学报》1989年2、3期合刊）。

段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因不同的自然、人文社会条件，工业化进程亦有较大差异，南通是垄断资本居绝对优势，无锡则是寡头竞争；在区域发展模式方面，南通是以工业化推动社会进步，无锡是调动社会力量推进工业化。

蒋兆成等对杭嘉湖一带的蚕桑技术和丝织业有深入研究。蒋兆成的《论明清杭嘉湖地区蚕桑丝织业的重要地位》一文指出蚕桑丝织业不仅是当地经济的重心，还是该地区经济发展的轴心和动力，推动了当地自然经济的瓦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郑云飞的《明清时期的湖丝与杭嘉湖地区的蚕业技术》分析了湖丝的质量上乘主要在于桑叶质量及养蚕技术和缫丝水平的提高。^①

2. 商业、市场研究

亦有一些文章对苏南浙北商业、市场进行了专门研究。吴志远考察了清代民国时期苏州的壅业，包括壅商的产生、壅业性质、壅业的组织形式，及其市政管理；周子扬详细论述了1896—1934年间苏州民信局与官办邮政之间的博弈，从中思考传统与现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鲍正熙系统阐述了20世纪上半叶苏州典当业的发展情况，从中亦能体察现代社会的变迁。^②

陈学文探讨了明清时期杭州的商业经济和杭州的夜市；徐木兴通过一些市场指标观察杭州地区的市场由传统市场向近代市场的嬗变；蔡禹龙从西湖香市研究入手考察了相关行业及江南民众社会生活。^③

^① 蒋兆成：《论明清杭嘉湖地区蚕桑丝织业的重要地位》（《杭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郑云飞：《明清时期的湖丝与杭嘉湖地区的蚕业技术》（《中国农史》1991年第4期）。

^② 吴志远：《清代、民国年间苏州壅业论述——兼谈市场机制下城市环卫与基层政府机构改革》；周子扬：《官民之间：苏州民信局与苏州官办邮政的博弈（1896—1934年）》；鲍正熙：《二十世纪上半叶苏州典当业论述》；均参见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城市社会研究》上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

^③ 陈学文：《明清时期的杭州商业经济》（《浙江学刊》1988年第5期）、《明代杭州的夜市》（《浙江学刊》2007年第2期）、徐木兴：《从杭州地区看市场的近代嬗变》（《贵州文史丛刊》2003年第1期）、蔡禹龙：《清代江南香市简论——以杭州西湖香市为中心》（《历史教学》2010年第20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四、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基层社会研究

1. 商人、商帮研究

在江南商人商帮研究中已提及范金民等对洞庭商帮的研究，范金民除《洞庭商帮》（2005）的专著外，还有一些研究洞庭商帮的文章，如《洞庭商人的经营方式与经营手段》（《史学月刊》1996年第3期）、《太湖厅档案所见洞庭商人的活动》（《江苏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等。其中《太湖厅档案所见洞庭商人的活动》一文主要依据清代太湖厅档案，考察了洞庭东西山商人的活动，提供了洞庭商人的经营家族、活动地域、资本构成和大额银钱结算等方面的具体实例。马学强的《钻天洞庭》（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考察了洞庭商人的来历和近代转型，并研究了洞庭民风和洞庭商人的血缘、地缘关系。马学强还有专文研究了在上海的洞庭商帮。^①孙建国探讨了上海洞庭商帮商业资本发展的路径、特点及其影响；张良平分析洞庭商帮形成及兴起有三大因素：即地理因素、人文因素和社会因素。^②

明清时期的徽商遍布江南，苏州、杭州是徽商活动的重要区域。陈学文研究了明清时期杭州的徽商，考察了其对杭州经济社会的积极作用。^③唐力行研究了徽商在苏州、杭州、上海的经营活动及社会生活，以及徽商在区域互动中的媒介角色。如在《苏州与徽州——16—20世纪两地互动与社会变迁的比较研究》（2007）的第二章“苏徽两地间的家族移徙与互动”考察了徽州的大阜潘氏在清初因经商迁入苏州，考察了徽商土著化的过程，潘氏家风对徽州文化的继承，入苏后家风衍变，徽苏两地间潘氏家族的互动，由徽商研究而深入两个区域社会之间的互动研究。唐力行还研究了民

① 马学强：《一个传统商帮的近代变迁——苏州洞庭帮在上海》，《史林》1996年第3期。

② 孙建国：《掘金上海滩：洞庭东山商帮发迹路径》，《档案与史学》2004年第2期；张良平：《简析洞庭商帮形成及兴起的原因》，《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③ 陈学文：《明清徽商在杭州的活动》，《江淮论坛》1990年第1期。

国时期杭州的徽商利用宗族活动增强凝聚力，对抗政府专制的活动。

王振忠的《〈唐土门簿〉与〈海洋来往活套〉——佚存日本的苏州徽商资料及相关问题研究》利用《唐土门簿》和《海洋来往活套》两份徽商史料，钩稽中日贸易中的徽商活动，考察苏州、徽州与日本的经济文化关系。作者指出徽商在东南地区的文化活动，都带有强烈的商业动机。^①

黄彩霞的《从杭州商会的公益善举看社会的变迁——兼与在杭徽商会馆比较》一文将杭州商会与在杭徽商会馆进行比较，指出杭州商会的公益善举形成与慈善机构日渐剥离、慈善活动不分畛域等特点，折射出国家商业政策、商人自我认识的变迁；王日根、徐萍的《晚清杭州徽商所建新安惟善堂研究》考察了杭州新安惟善堂，惟善堂是徽商的善后互助组织，建有良好的善后制度，得到政府的支持，实现了对寓杭徽商的有序管理。^②

朱永香研究了明清小说中的杭州商人；董惠民指出早期浚商在创办民族企业的过程中完成了从商人向民族资本家的转化；乐承耀考察了近代宁波商人在杭州的商业活动。^③

2. 会馆、公所、行业组织研究

有关明清以来江南会馆、公所和行业组织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热点，而江南的会馆公所和行业组织研究多集中于对苏州、上海两地的研究。

在80年代初，章开沅、丁日初等人的论文涉及江浙、上海的资产阶级及商会。如章开沅的《辛亥革命与江浙资产阶级》、丁日初的《辛亥革命前的上海资本家阶级》^④，商会研究逐渐成为一个热点。而在地方史研

^① 王振忠：《〈唐土门簿〉与〈海洋来往活套〉——佚存日本的苏州徽商资料及相关问题研究》，《江淮论坛》1999年第2、3、4期。

^② 黄彩霞：《从杭州商会的公益善举看社会的变迁——兼与在杭徽商会馆比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王日根、徐萍：《晚清杭州徽商所建新安惟善堂研究》（《安徽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③ 朱永香：《明清小说中的杭州商人形象》（《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董惠民：《浚商对近代浙北民族企业的开创及社会影响》（《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乐承耀：《在杭州的近代宁波商人》（《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6期）。

^④ 均载于《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究中，洪焕椿也已经在关注苏州地区的会馆公所研究，其《论明清苏州地区会馆的性质及其作用》（1980）、《明清苏州地区的会馆公所在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作用》（1992）两篇文章分析了七种不同类型的苏州会馆公所及其管理制度和同行条规。吕作燮的《明清时期苏州的会馆和公所》（1984）考察了苏州会馆和公所的基本情况，对会馆和公所做了区分，总结了苏州会馆、公所的基本特点，如会馆有地域的、外来的、帮派的、松散联合的特点等，公所有行业的、商业的、联合比较严密的特点。与会馆相比，公所突破了地域界限，因而没有外来帮派的特点，它主要的任务是为同业办理善举、同业议事。^①此外，较早的研究文章还有唐文权的《清末苏州商会与捐税抗争》（《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3期）、李茂富、廖志豪的《论苏州商务总会》（《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续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等。

20世纪90年代关于江南会馆公所、商会研究如火如荼，一些著述纷纷面世。关于商会与会馆公所的关系，最初，一些研究者认为商会是具有开放性、发展性的新型商业组织，而会馆、公所属于封建性、停滞性的社会组织，阻碍了经济发展。如马敏、朱英的《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巴蜀出版社，1993年）。该书包括七章内容，研究了晚清苏州社会与商会的创设、苏州商会的组织系统、苏州商会的一般社会职能、苏州商会的性质、苏州商会与清末反帝爱国运动、苏州商会与捐税抗争、苏州商会与辛亥革命。该书认为商会与传统行会组织有“原则和本质的区别”^②，“行会属于封闭性、停滞性的社会组织，商会属于开放性、发展性的工商组织”^③。论及苏州商会的社会职能，该书概括为沟通官商、促进实业发展、受理商事纠纷、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等，并推动了

^① 洪焕椿：《论明清苏州地区会馆的性质及其作用》（《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明清苏州地区的会馆公所在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明清史偶存》，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吕作燮：《明清时期苏州的会馆和公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1期）。

^{②③} 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巴蜀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131页。

苏州城市的近代化进程。该书认为苏州商会的性质是“官督商办”。该书用了两章篇幅论述了苏州商会参与民族民主运动，分析其原因在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阻碍了苏州民族工商业发展，以及苏州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增长。朱英和马敏还有相关的文章发表，如朱英的《清末苏州商会调停商事纠纷》（《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马敏的《商事裁判与商会——论晚清苏州商事纠纷的调处》（《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等。

20世纪90年代“现代化范式”被引入了会馆公所和商会的研究，学者的研究越来越转移到会馆公所、商会性质、功能与社会经济方面。范金民在《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1998）中主张将会馆公所分为地域性和行业性两大类，即地域性会馆公所和行业性会馆公所。其《清代江南会馆公所的功能性质》一文分析了清代会馆公所中行业性和地域性所占比例是大不相同的，在会馆中地域性占了绝对高的比例，在公所中行业性占绝对高的比例，因而会馆主要是地域性团体，公所主要是行业性团体。而且会馆的产生要早于公所。并研究了地域性会馆公所与行业性会馆公所的功能和性质。^①朱英在《中国行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一文中将会馆、公所作为“前近代社团”，将商会作为“近代社团”。徐鼎新认为行会具有的某些近代性可以被商会包容。^②

马斌、陈晓明的《明清苏州会馆的兴起——明清苏州会馆研究之一》分析了明清苏州会馆的兴起和功能。^③王翔的《从云锦公所到铁机公会——近代苏州丝织业同业组织的嬗变》以云锦公所向铁机公会转化的个案来说明传统行会向近代同业公会转化过程中新旧杂陈的复杂状态。“行会还以同乡同行的地缘关系宗法关系为纽带，固结团体，排斥竞争，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概括了行会在组织上的封闭性、业务上垄断性、技术上的保守性。^④彭南生对近代江南会馆、公所等行会组织的碑刻进行考察，

① 范金民：《清代江南会馆公所的功能性质》，《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

② 冯筱才：《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反思》，《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③ 马斌、陈晓明：《明清苏州会馆的兴起——明清苏州会馆研究之一》，《学海》1997年第3期。

④ 王翔的《从云锦公所到铁机公会——近代苏州丝织业同业组织的嬗变》，《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

揭示其对会馆、公所变迁与发展所具有的功能和作用。^①魏文享研究了苏州丝绸业同业公会，认为其与传统行会相比，在组织形态及机构设置上都更为完备，具有显著的外倾性与开放性，体现了资产阶级的行业自治组织特征。^②

朱英的《从〈苏州商团档案汇编〉看近代苏州商团》将苏州商团与上海和武汉的商团相比，认为苏州商团与商会关系密切，是统一的一元化组织，虽然在政治上影响不大，但在维护地方治安和维护商人利益方面发挥重要作用。^③邱澎生的《禁止把持与保护专利：试析清末商事立法中的苏州金箔业讼案》一文揭示了清末国家与商会在商事立法中的合作、对抗与妥协。邱澎生的另一文章《市场、法律与人情——明清苏州商人团体提供“交易服务”的制度变迁》研究了明清时期苏州部分商人团体不但进行了交易服务的制度创新，还在地方司法实务中尝试以“公产”立案模式向地方政府获取更稳固的产权保障，也增加了会馆、公所获得商人捐助、持续运作的可能性。^④邱澎生的博士论文《商人团体与社会变迁：清代苏州的会馆公所与商会》是系统考察苏州会馆公所与商会衍变，管窥社会变迁之作。陈忠平亦有关于长江下游商会研究的博士论文。^⑤

除苏州商会外，学界对无锡、杭州商会亦有研究。汤可可、蒋伟新以无锡商会为考察对象，探讨了近代地方商会与政府的关系，以及商会与企业家的成长等。^⑥冯筱才的《近世商会的常态与变态：以1920年的杭州总

① 彭南生：《近代江南地区工商业会馆、公所碑刻述论》，《安徽史学》2005年第3期。

② 魏文享：《试论民国时期苏州丝绸业同业公会》，《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③ 朱英：《从〈苏州商团档案汇编〉看近代苏州商团》，《史学月刊》2006年第12期。

④ 邱澎生：《禁止把持与保护专利：试析清末商事立法中的苏州金箔业讼案》（《中外法学》2000年第3期）、《市场、法律与人情——明清苏州商人团体提供“交易服务”的制度变迁》（《开放时代》2004年第5期）。

⑤ Chen Zhongping, *Business and Politics: 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the Lower Yangtze Region, 1902—1912*,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1998.

⑥ 汤可可、蒋伟新：《无锡商会与近代工商企业家的成长》（《江海学刊》1999年第2期）、蒋伟新、汤可可：《推挽结构：近代地方商会与政府的关系——以无锡为例》（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0年）。

商会为例》一文提出“依附—离异—回归”的动态模型解释商会的政治参与的动机在于挽救秩序、保卫财产，常态是热衷经济活动，临时的政治参与则是一种“变态”。^①陶水木、郎丽华的《略论民国后期杭州商会的商事公断》探讨了民国后期杭州商会的商事公断在维持市面稳定和市场秩序方面的重要作用。^②陶水木、林素萍研究了民国时期杭州丝绸业同业公会，指出其在组织机构方面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对行业的管理具有权威性，在业务活动方面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在活动范围方面具有超地域性，对维护行业发展、促进经济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③余同元认为工业市镇行业与职业团体的兴起与发展是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形成和发展的综合标志。^④

3. 望族研究

苏南望族研究与文化教育、宗族、义田、义庄、社会救济研究都有密切关联。

江庆柏的《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认为苏南望族本身是文化型家族。这个基本特征决定了苏南望族的其他特征，如苏南望族特别重视教育，因而在科举事业上特别成功。家族有丰富的藏书，为子弟就读提供方便，往往还注重家族文献的搜集整理。在苏南望族中出现了大批文化型的人才，显示出人才密集的优势，从而形成区域文化中心。该书包括十四章，第一章“苏南望族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过程”讨论了研究的区域范围，指出该书所涉的苏南主要指今天的苏、锡、常、镇等四市，不包括南京，因为南京没有严格意义的望族，并讨论望族的标准，认为除一定的历史、人口规模，人才和道德声望是主要指标。以宋元为界分苏南望族发展的两阶段，宋元前有常熟的言氏、宜兴的

^① 冯筱才：《近世商会的常态与变态：以1920年的杭州总商会为例》，《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② 陶水木、郎丽华：《略论民国后期杭州商会的商事公断》，《商业经济与管理》2003年第11期。

^③ 陶水木、林素萍：《民国时期杭州丝绸业同业公会的近代化》，《民国档案》2007年第4期。

^④ 余同元：《江南市镇早期工业化中工业行业与职业团体之发展》，《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蒋氏、常州的丁氏。宋代是苏南望族发展史的转折，北方大量人口南迁至苏南，许多家族经过经商、科举成为望族。第二章“苏南望族发展的社会环境”考察了苏南稳定的社会环境、农业生产、繁荣的市镇、良好的自然环境。第三章“苏南望族的文化特征”认为苏南望族的文化建设中“重文轻武”是杜绝家族械斗、维护地方安定的重要原因。第四至第十二章主要研究了苏南望族的科举、教育、人才的优势、文化学术活动、藏书，苏南望族的女性教育、家庭生活等，对望族间的联姻，望族对地方的影响，如调节乡邻关系、推动公益事业、带动地方经济、扩大与外界交流等亦有细致探讨。该书从文化入手，亦多落脚于文化。

江庆柏还有专文研究明清苏南的望族。其《明清苏南望族与地方关系初探》一文指出明清时期苏南望族注意调节与地方关系，积极参与地方公益活动，为望族发展提供宽松环境。而地方亦借助望族的影响扩展了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另一文《明清苏南望族中的女性》考察了明清望族中的女性人才辈出的群体现象，并分析了其原因及影响。日本学者佐藤仁史的《清朝中期江南的一宗族与区域社会——以上海曹氏为例的个案研究》通过上海曹氏案例研究了明清之际社会行政权由地方望族与士绅控制。蒋宏明的《东林学风与明清苏南望族》从东林代表人物与苏南望族的关系探讨东林学风对于苏南望族家训的影响、学术的传承，以及书院中东林学风的继承等。蒋宏明的另一篇文章《晚清苏南家族书院的分化与多元类型——近代苏南家族书院研究之一》研究了晚清苏南的家族书院在社会变迁和教育转型过程中的分化和转型，部分家族书院逐步融入近代教育体系，尤其是工商企业家的家族书院突破家族的局限，对外招生，有“大学化”的倾向。^①

李嘉球的《苏州状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介绍了历

^① 江庆柏：《明清苏南望族与地方关系初探》（《常熟高专学报》1999年第1期）、《明清苏南望族中的女性》（《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9年第3期）；[日]佐藤仁史：《清朝中期江南的一宗族与区域社会——以上海曹氏为例的个案研究》，《学术月刊》1996年第4期；蒋宏明：《东林学风与明清苏南望族》（《西北师大学报》2006年第1期）、《晚清苏南家族书院的分化与多元类型——近代苏南家族书院研究之一》（《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代苏州状元，并附有历代苏州的榜眼、探花小传。魏运生和陈加林分别考察了由徽州迁苏州的洪氏和汪氏两家望族。魏运生的《清代徽州迁苏洪氏状元家族研究》一文考察了洪氏状元家族的内外成因，以及状元家族与地域文化的互动，从中管窥区域文化互动中的批判和继承；陈加林的《吴趋汪氏家族与近代苏州社会》则是考察了一支由徽州迁苏的汪氏家族，阐述了其家族概况，分析了太平天国战争对汪氏家族的影响，以及汪氏家族与战后苏州社会秩序的重建和汪氏家族的近代转型。作者指出，依靠一套有较强自我修复能力的宗族制度，吴趋汪氏得以从“商业家族”向“科举家族”，再向“教育家族”转变，维持其吴门望族的地位。^①

马学强的《江南望族——洞庭席氏家族人物传》（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涵盖洞庭席氏家族的历史及近现代、当代习氏家族重要成员的人物小传。徐茂明的《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与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包括“绪论”和八章内容。绪论对明清江南家族史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展望。然后考察了徽州世族的宗族观念及世族类型、世族的科举道路及其家学、家族迁徙与区域文化互动、世家的社会网络与文化遗产、国家与地方关系中的文化世族、文化世族与地方社会、世族家风与苏州世风、近代社会变迁与苏州文化世族的教育转向等。全面研究了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与地域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对文氏、王氏、叶氏、彭氏、潘氏等家族的深入研究，系统分析了家族迁徙与区域社会之间的文化互动，以及家族通过婚姻、科场、仕途、结社等途径累积的社会文化资本是如何影响着苏州社会风尚的走向。探讨国家与地方的利益博弈中文化世族的角色。考察近代西学东渐背景下苏州文化世族如何顺利地完成了由科举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向，由科举世家蜕变为现代的科学世家。该书指出，苏州文化世族之价值，不仅在于其取得的各项文化成就，更重要的是其内含的维持家族长盛不衰的各具特色的家族精神。

^① 魏运生：《清代徽州迁苏洪氏状元家族研究》；陈加林：《吴趋汪氏家族与近代苏州社会》；均参见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城市社会研究》下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有许多学者颇为关注苏南文化世家的人物研究，如就翁同龢研究而言，有谢俊美的《翁同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和《翁同龢传》（中华书局，1994年）等，以及王振羽的《江南彩衣堂：翁同龢家族文化史》（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王忠良、沈潜的《翁同龢》（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等。沈潜有多篇文章研究了常熟的翁氏家族。解军、沈潜有专文考察了常熟的庞氏家族与区域社会的互动。^①

杭嘉湖地区的望族研究有周膺的《钱塘望族：杭州洪氏家族文化史》（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该书考证了杭州洪氏家族的源流，探讨了其政治理念、政治作为和文化建树，并分析了洪氏家族与西溪湿地地域文化形成的关系，总结了洪氏家族的家族传统。

4. 社会群体

关于苏南的社会群体研究，在本书第一章中范金民、夏维中对江南进士的研究、徐茂明等对江南士绅的研究可以说已经囊括了苏南两个非常重要的群体。此外，申浩专文考察了明清以来苏南市镇中的脚夫、访行、打行三个下层群体，探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特点；王秀娟研究了苏州绣娘，考察了绣娘类型和苏绣名家及她们的社会交往，并以绣娘的生活实例探讨社会生活变迁及苏州绣娘的命运，探究绣娘群体与苏州社会的互动关系；王文娟对近代苏州女教师群体有细致研究，她考察了近代苏州女教师的出现、女教师的家庭和职业生活，以及女教师的社会活动。金坡考察了民国时期常熟文人结社，对虞山诗社的组织机构及其活动进行了探讨，分析了其对文化传承和地方社会的影响。^②

而有关杭嘉湖一带的社会群体研究相对较少。陶水木的《浙江金融财

^① 沈潜：《晚清社会转型与翁同龢思想的演变》（《苏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江南文化的精神坐标：以常熟翁氏家族为例》（《东吴学术》2012年第6期）；沈潜、陆玉芹：《“纪念翁同龢逝世一百周年学术座谈会”综述》，《学术月刊》2004年第12期；解军、沈潜：《从常熟庞氏看文化家族与区域社会互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② 申浩：《明清以来江南市镇下层群体探微：以脚夫、访行及打行为例》；王秀娟：《苏州绣娘与苏州社会》；王文娟：《近代苏州女教师群体研究》；金坡：《民国（1920—1937年）常熟虞山诗社研究》；均参见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城市社会研究》上、下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

团的形成及地位》指出浙江金融财团是在辛亥革命后华资金融业迅速发展而逐步形成的。其形成的标志是：浙系金融资本在上海居主导地位，经营趋于集团化；浙籍金融资本家掌握上海金融业同业组织钱业公会和银行公会；浙籍金融资本家步入要求独立发展的成熟阶段；涌现出浙籍金融财团的优秀代表和代言人。^①余新忠的《清代前期浙西北基层社会精英的晋身途径与社会流动》一文考察清代前期浙西北地区基层士人的身份变化情况，认为一个平民色彩较浓的社会在开埠前的江南已经出现。^②

5. 义庄义田研究

冯尔康于1980年发表的《论清朝苏南义庄的性质与族权的关系》探讨了苏南义庄的分布、性质和作用，认为义庄的田产来源、经营方式及分配方式决定了它的地主性质，指出义庄在赈贫的同时宣扬宗法伦理，设义塾培养士人巩固和提高了宗族的社会地位。^③日本学者山名弘史亦有专文研究了苏南的义仓和义庄，考察了清末苏州潘氏、彭氏所设义庄的社会功能。^④井上彻的《中国的宗族与国家礼制》一书的第五章“宗族形成的重新启动——以明代中期以后的苏州地区为对象”、第七章“清代的苏州社会与宗族”、第八章“宗族普及的一个实例——以江苏洞庭东山为对象”是对苏州宗族、义庄的专门论述，深入分析了苏州宗族的形成、原因及表现形式，对义庄也进行了详细考察。^⑤刘铮云的《义庄与城镇——清代苏州府义庄之设立与分布》以清代苏州府为考察中心，探讨了义庄设立的社会经济条件，认为义庄是在乱世之中地方家族力行自恤的一种现象，而非地主土地所有的一种形态。^⑥

① 陶水木：《浙江金融财团的形成及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② 余新忠：《清代前期浙西北基层社会精英的晋身途径与社会流动》，《南开学报》2000年第4期。

③ 冯尔康：《论清朝苏南义庄的性质与族权的关系》，《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3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④ [日]山名弘史：《清末江蘇省の義倉——蘇州の豊備義倉の場合》（《东洋学报》59卷，1977年）、《清末江南の義莊について》（《东洋学报》62卷1、2号，1980年）。

⑤ [日]井上彻著、钱杭译：《中国的宗族与国家礼制》，上海书店2008年版。

⑥ 刘铮云：《义庄与城镇——清代苏州府义庄之设立与分布》，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8本，1987年9月。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李文治于1983年发表的《论明清时代的宗族制》涉及江南族田的研究。^①范金民的《清代苏州宗族义田的发展》一文以数量统计和列表考察了清代苏州义庄发展的几个阶段，分析了义田捐置人、义田规模的变化、义庄坐落分布等，并详述了太平天国战争对义庄义田的影响。^②王日根将福建与江南的义田进行了比较，认为江南义田多为官僚阶层设立，福建义田则主要由商人阶层设立；另外江南义田即族田，福建的义田不仅是族田或族田一部分，还是其他基层社会组织的基础。^③余新忠的《清中后期乡绅的社会救济——苏州丰豫义庄研究》以苏州丰豫义庄为研究个案，考察乡绅在社会救济中的作用，认为乡绅的社会救济行为不仅是一种慈善行为，更是社会控制的手段。^④

李学如、陈勇的《近代的义庄及其租佃制度——以苏南义庄为中心的考察》一文考察了近代苏南义庄采取的租佃经营模式，认为庄、佃之间存在典型的经济契约关系，近代后期义庄多由个体收租转向联合租栈的形式，反映了社会动荡加剧和主佃矛盾激化。^⑤孙健的《明清苏南地区庙田的来源》一文指出庙田的来源是多渠道的，除寺庙原有土地外，还通过皇室赐予，信徒捐献施舍，僧置产业，侵夺沙洲滩地等方式获取。^⑥

张翔凤的《近代苏州碑刻中的乡绅自治与宗族保障》利用碑刻资料论述近代苏州乡绅、官宦通过捐资设立义庄，为宗族保障提供基金，并利用政府力量和宗族的血缘纽带加强义庄的管理，以此管窥传统社会结构的强大生命力。张少筠的《近代苏南宗族族田保护措施研究》指出近代苏南宗族往往利用自身及官府力量在族田建置、存续，及受侵害和战乱等非常时

① 李文治：《论明清时代的宗族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4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② 范金民：《清代苏州宗族义田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

③ 王日根：《明清福建与江南义田的比较》，《学术月刊》1996年第1期。

④ 余新忠：《清中后期乡绅的社会救济——苏州丰豫义庄研究》，《南开学报》1997年第3期。

⑤ 李学如、陈勇：《近代的义庄及其租佃制度——以苏南义庄为中心的考察》，《理论学刊》2013年第6期。

⑥ 孙健：《明清苏南地区庙田的来源》，《茂名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期采取相应保护措施，措施较为完备。王志龙的《近代苏南族田分布研究——以上海县、吴县和高淳县为核心》认为以祠田为主的高淳县等苏南的西部地区是苏南族田的高峰区，改变了以前认为以义庄义田为主的苏南中部地区为族田高峰区的认识。以前的苏南族田研究偏重义田而忽略祠田，认为加强两者的研究及两者之间的比较研究是今后苏南族田研究的趋向。陆晓雯的《留园义庄与苏州近代社会》考察了留园义庄的设立、组织和运作，探讨了其与近代苏州公益事业和工商业的互动关系。^①

陈勇、李学如的《近代苏南义庄的家族教育》认为苏南义庄普遍重视家族教育，并随时代发展而变化，有鲜明地域和时代特色，为苏南教育近代化及近代初等教育打下了基础。李学如、曹化芝的《近代苏南义庄家族的习业教育》指出习业教育实际上即是谋职的技能教育，义庄的家族教育中重视习业教育反映了义庄家族积极入世的心态和近代苏南的社会变迁。^②

6. 社会救助和慈善事业

第一章所提及的王卫平等关于江南区域慈善事业的研究多是以苏州为中心的考察，此不赘述。

吴滔的《明清时期苏松地区的乡村救济事业》指出明清时期苏松农村地区的救济主要依靠以仓储积累为基础，并以官府、民间的地缘、血缘纽带为基础的救济网络而达成救助目的。^③李传斌、王国平的《近代苏州的教会医疗事业》研究了近代苏州教会医疗事业发展情况及对苏州社会的影响。^④王庆国的《苏州地区的灾荒救济研究（1912—1935年）》探讨了民

^① 张翔凤：《近代苏州碑刻中的乡绅自治与宗族保障》（《史林》2003年第4期）、张少筠：《近代苏南宗族族田保护措施研究》（《中国农史》2009年第3期）、王志龙：《近代苏南族田分布研究——以上海县、吴县和高淳县为核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2期）、陆晓雯：《留园义庄与苏州近代社会》（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城市社会研究》上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

^② 陈勇、李学如：《近代苏南义庄的家族教育》（《历史研究》2011年第5期）、李学如、曹化芝：《近代苏南义庄家族的习业教育》（《黑龙江史志》2013年第15期）。

^③ 吴滔：《明清时期苏松地区的乡村救济事业》，《中国农史》1998年第4期。

^④ 李传斌、王国平：《近代苏州的教会医疗事业》，《苏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国时期苏州灾荒的成因影响及政府和社会的救济措施。^①

方福祥的《明清杭嘉湖慈善组织的特征分析——兼论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研究了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的慈善组织，认为其具有功能拓展、主体多元、地域延伸、兼具传统与近代两重性的多重特征。以慈善组织为代表的社会团体大量涌现，说明社会民间力量在公共领域的地位与扩张。^②周东华的《公共领域中的慈善、福音与民族主义——以近代杭州麻风病救治为例》探讨了在杭州麻风病救治运动中福音医学与近代中国文化社会的互动关系。^③

陈超的《集会与地域：明清湖州怡老会的地域文化阐释》一文认为明清湖州大量的怡老会雅集文会成为地域文化形塑的重要助推力量。^④

7. 社会危机与基层控制

陈学文的《明代一次市民意识的新觉醒——万历十年杭州兵变和民变研究》（1992）一文探讨了明代万历十年的杭州兵变和民变与市民意识的觉醒；刘文华的《清代嘉兴府争田述论》考察了自明万历年间至清代的嘉兴府中的嘉兴与嘉善、秀水县的争田事件，从中探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董强的博士论文《近代江南公共危机与社会应对》（2012）主要以上海、南汇县为个案研究近代江南应对公共危机的机制变迁。^⑤

赵思渊的《从“包漕”到“告漕”——道光初年“漕弊”整顿进程中苏松士绅力量的演化》考察了从嘉庆到同治年间，苏松地区生员在漕运利益分配中的地位下降了，导致了其社会地位下降，其缘起可能是道光初年

① 王庆国：《苏州地区的灾荒救济研究（1912—1935年）》，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城市社会研究》上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

② 方福祥：《明清杭嘉湖慈善组织的特征分析——兼论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③ 周东华：《公共领域中的慈善、福音与民族主义——以近代杭州麻风病救治为例》，《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3期。

④ 陈超：《集会与地域：明清湖州怡老会的地域文化阐释》，《江汉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⑤ 陈学文：《明代一次市民意识的新觉醒——万历十年杭州兵变和民变研究》（《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刘文华：《清代嘉兴府争田述论》（《古今农业》2009年第4期）、董强：《近代江南公共危机与社会应对》（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

陶澍严厉处理生员的“告漕”案所致。赵思渊还专文研究了明清时期县以下的地方治安管理机构巡检司的分布、运作及功能。范金民、罗晓翔的《乾隆十三年苏松聚众阻巢案述论》一文以乾隆十三年苏松民众因米价持续上涨，阻止出巢和抢夺米铺，清廷及地方官员虽及时处置此事，却也促使清廷修订了相关法律条令，改革了地方仓储制度，以平抑粮价，减少群体抗争事件的发生。^①

清末民国时期的地方自治管理和自治组织也受到学界关注。日本学者森田明的《清代道光时期的西湖管理与杭州绅商》分析了道光时期西湖管理和疏浚事业的管理组织形态，原本置于行政管理之下的西湖疏浚与治理，在道光年间开始委托给地域社会进行自治式的管理。^②丰箫的博士论文《1945—1949年浙江省嘉兴乡镇自治研究》（2006）以浙江嘉兴地区为中心研究抗战后乡镇自治制度。认为只有在和平的社会环境中，在国家的监督而非干预下，才可能建立起以乡镇民为主体的富有活力的自治组织。^③

苏州市民公社是清末民初的苏州地方自治组织。屠雪华的《试论苏州市民公社的性质》一文考察了苏州市民公社的建立、运作、功能和性质；其另一篇文章《关于苏州市民公社几个问题的探讨》对苏州市民公社的命名、苏州市民公社与商会的关系，以及苏州市民公社的消亡问题作了进一步说明。^④李明有多篇研究苏州市民公社的文章。其《苏州市民公社解体的缘由——清末民初苏州民间社团组织个案研究》认为苏州市民公社解体

① 赵思渊：《从“包漕”到“告漕”——道光初年“漕弊”整顿进程中苏松士绅力量的演化》（《清史研究》2011年第3期）、《明清苏州地区巡检司的分布与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3期）、《屏盗之迹、拯民之恫：明清苏州地区的巡检司》（《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1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范金民、罗晓翔：《乾隆十三年苏松聚众阻巢案述论》，《苏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② [日]沈野正二郎撰、张玉林编译：《2000年日本史学界关于明清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0期。

③ 丰箫：《1945—1949年浙江省嘉兴乡镇自治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

④ 屠雪华：《试论苏州市民公社的性质》（《江海学刊》1995年第3期）、《关于苏州市民公社几个问题的探讨》（《民国档案》1995年第4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的原因在于社会环境、市民公社与地方行政关系都发生了变化，而且市民公社自身组织、经费等问题亦使其陷入困境；李明的《苏州市民公社的衍变及现代意义》一文指出苏州市民公社在20年街区社会自治过程中完成了对城厢街区社会的整合，并在主体价值系统更新、组织与利益的整合之内、外两个层面上凸显出鲜明的现代意义；其另一文《社会结构变迁视野下的苏州市民公社考论》探讨了清末民初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市民公社在拓宽公共领域方面的意义。^①

五、社会生活史研究

1. 信仰习俗研究

潘国英考察了苏州民间的人鬼信仰与祭亡习俗；吴滔对清代苏州地区镇庙与村庙的关系进行了多层次的探讨，认为民间信仰中呈现的上下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与城乡的等级差别基本吻合；唐力行、王健研究了明清以来苏州、徽州两地互动对民间信仰的影响，以及苏州、徽州两地民间信仰的特点。^②

王健有论著和系列文章研究苏南、浙北地区的民间信仰。其《利害相关：明清以来江南苏松地区民间信仰研究》（2010）一书从民间信仰的对象、主体和行为等层面考察苏松地区民间信仰的开展和影响，探讨民间信仰的空间展开及相关群体的因应，研究地方士绅、家族在正统祭祀观念、国家礼制与自身信仰实践之间的调适，还就地方政府对民间信仰的处理方式展开论述，并以个案研究松江地区民间信仰的变迁。该书一方面关注社会机构与民间信仰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注重信仰主体在民间信仰的存在

^① 李明：《苏州市民公社解体的缘由——清末民初苏州民间社团组织个案研究》（《学术月刊》2001年第12期）、《苏州市民公社的衍变及现代意义》（《史林》2003年第1期）、《社会结构变迁视野下的苏州市民公社考论》（与汤可可合著，《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② 潘国英：《苏州民间的人鬼信仰及其祭亡习俗》（《东南文化》1993年第6期）、吴滔：《清代苏州地区的村庙和镇庙：从民间信仰透视城乡关系》（《中国农史》2004年第2期）、唐力行、王健：《多元与差异：苏州与徽州民间信仰比较》（《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与发展中的作用。^①王健的《明清江南毁淫祠研究——以苏松地区为例》一文研究了明清苏松地区官方毁淫祠的频率和规律，认为此类活动并不具有普遍性和连续性。且该活动主要依赖地方官员的热情，无制度保障，不具有可持续性，地方士绅在其中亦有利益纠葛，所扮演的角色日趋显著。其《明清以来苏松地区民间祠庙的收入、产权与僧俗关系》通过研究祠庙收入、庙产管理及僧俗关系等，认为功利性渗透于中国民间信仰体系中，是中国民间信仰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其《明清以来杭州进香史初探——以上天竺为中心》考察了明清时期持续数百年的杭州进香活动，认为其与江南民众日常生活和杭州城市经济繁荣都有重要关联。^②

佐藤仁史的《民国时期江南的庙会组织与村落社会——以吴江市的口述调查为中心》一文根据吴江市大长浜村的口述调查成果，从以村庙营运为中心的民间信仰角度，对民国时期江南低乡地带的村落结构及基层社会的重叠性进行初步的分析。该文使用“社村”概念，即各散村因土地庙、村庙的祭祀、信仰而形成的区域，认为江南低乡地带的“社村”终究是文化性的统合体。^③

小田考察了近代苏南民俗的变迁；尤士洁研究了佛教、道教与苏州民俗的关系；郑凤鸣分析了《点石斋画报》中所见的苏州民俗。^④沈建东的《苏南民俗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详细考察了苏南民俗的方方面面，包括蚕桑生产习俗、人生礼仪习俗、饮食风尚、居住习俗、行业习俗、语言民俗、节日民俗，以及江南民间信仰对民俗的影响等。

① 王健：《利害相关：明清以来江南苏松地区民间信仰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3页。

② 王健：《明清江南毁淫祠研究——以苏松地区为例》（《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明清以来苏松地区民间祠庙的收入、产权与僧俗关系》（《史林》2009年第5期）、《明清以来杭州进香史初探——以上天竺为中心》（《史林》2012年第4期）。

③ [日]佐藤仁史：《民国时期江南的庙会组织与村落社会——以吴江市的口述调查为中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3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④ 小田：《近代苏南的民俗变迁》（《历史教学问题》1991年第4期）、尤士洁：《佛教与苏州民俗初探》（《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道教对苏州民俗的影响》（《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郑凤鸣：《古代画报里的苏州民俗》（《江苏地方志》2008年第6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陈学文考察了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的文化生活和民俗；余连祥探讨了杭嘉湖地区的蚕神崇拜。^①叶大兵主编的《浙江民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考察了浙江地区有关生产、民间组织、服饰、饮食和医药卫生、居住和交通、人生礼仪、岁时节日、民间信仰等多方面的民俗。陈华文等著有《浙江民俗史》（杭州出版社，2008年）一书，该书按时序探讨了从史前到民国时期的浙江民俗。其中第八章论及明代浙江民俗，包括恢复岁时民俗的传统、方言对民俗的影响、信仰神灵独特等；第九章研究了清初满汉民俗的冲突与融合、杭嘉湖平原的岁时民俗和人生民俗，考察了浙江的地方神信仰、宗教民俗和庙会等；第十章论述了民国时期的传统民俗、西方文化影响之下的新民俗，以及钟敬文与浙江的中国民俗学会活动。

2. 社会生活研究

陈剩勇的《明代浙江：乡村社会、农家生活和社会教化》一文从乡村与里甲、四时农事、农家生活、岁时节日和娱乐、乡村自治和社会教化、乡村社会的贫困化方面，论述14—17世纪的浙江农村社会特征。^②

何王芳的博士论文《民国时期杭州城市社会生活研究》（2006）除“导言”和“结语”外，另有五章。第一章介绍了辛亥革命后杭州政治生态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样态。第二至第四章以杭城居民的消费为中心，分别从衣食住行与日常生活、多元情趣与城市休闲，以及现代娱乐等三个方面勾勒出一个休闲城市的兴起。第五章主要阐述了民国时期杭州风俗仪礼的演进与变异、民间信仰的传承与变动。“结语”探讨了民国时期杭州社会生活变迁的特征、动因、态势和社会效应，并得出如下观点：杭州社会生活变迁呈现为传统与现代的双重变奏的特色，中西新旧思想交汇碰撞是杭州社会生活变迁的动因；而杭州正是经过民国时期的社会经济变迁，以消费与休闲为特征的城市品位日益凸显。^③

^① 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的文化生活和民俗》（《东南文化》1989年第6期）、余连祥：《杭嘉湖地区的蚕神崇拜》（《湖州师专学报》1993年第3期）。

^② 陈剩勇：《明代浙江：乡村社会、农家生活和社会教化》，《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③ 何王芳：《民国时期杭州城市社会生活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

宋莉媛研究了明清时期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背景下苏州妇女日常生活的多元化；陈永华探讨了近代杭州茶馆功能，考察了其作为市民公共空间的存在与发展；徐永斌分析了明清时期杭州文人治生的原因、手段和特征。^①

六、市镇、城市史研究

1. 苏南市镇研究

游欢孙的博士论文《近代苏州地区市镇经济研究——以吴江县为中心》（2005）以近代苏州地区为研究对象，从市镇与清末民国以来江南县以下行政区划的演变关系入手，讨论了传统市镇志的叙事空间范围，论证了确定市镇地域范围与乡村的大致边界对于江南市镇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性。还探讨了1929—1934年前后吴江县市镇的贸易圈问题，对各个时期地方志中的市镇人口数字进行辨析，并在此基础上详细地探讨了吴江、常熟市镇人口的数量以及近代上海城市发展对周边地区市镇经济、市镇人口的影响。该文还以民国时期吴江境内的十个市镇为例，利用民国时期及20世纪50年代初期该县丰富的档案与调查资料，对盛泽、震泽等中小市镇的工商业结构进行了详细分析，并讨论了民国时期吴江县市镇的工商业税收在县级地方财政收支中的比重以及市镇税收与市镇财政收支的关系。^②

吴滔的《清代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空间透视——以苏州地区为中心》（2010）除“绪论”外，分上下两编，上编“制度与历史”包括“‘专业市镇’兴起的机制”、“‘镇管村’体制的形成”、“分厂传统与市镇区域之塑造：以嘉定宝山为例”；下篇“空间与人群”包括“村庙与镇庙：从

^① 宋莉媛：《明清苏州妇女日常生活变化探析》（《巢湖师院学报》2006年第1期）、陈永华：《作为市民公共空间的存在与发展——近代杭州茶馆功能研究》（《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徐永斌：《明清时期杭州的文人治生》（《安徽史学》2010年第3期）。

^② 游欢孙：《近代苏州地区市镇经济研究——以吴江县为中心》，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民间信仰透视城乡关系”、“‘一田两主’制和主佃关系新格局”、“在城与在乡：士绅的生活空间及对乡村的影响”、“结语”等。

在绪论中作者提到了科大卫（David Faure）和刘陶陶主编的论文集《中国的城镇和乡村：认同与感知》，^①认为该书“标志着西方学者突破了以往研究或过于注意城镇或只关心农村聚落的‘偏科’现象，在城市史和乡村史研究之间架起了一座理论桥梁”。科大卫选取了乌青、濮院和南浔三个市镇为案例，将家族在市镇的支配地位追溯到元明时期。16世纪随着移民到市镇的人口增多，士绅阶层逐步取代家族介入市镇管理。但市镇还没有足够的空间制造一个城乡分离的观念。作者认为科大卫的创新在于“他给我们讲述了三个江南市镇几百年的管理运作过程，而对于具体市镇权力格局形成过程的探讨，在科大卫之前，几乎没人关注过”。^②而吴滔自己对于江南市镇研究的特点主要在于他在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利用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和视野，将市镇置于与农村互动关联的区域社会中去考察。其《明清江南基层区划的传统与市镇变迁——以苏州地区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以苏州地区为中心考察了明清以来江南市镇区划的变迁，认为20世纪初江南地区围绕“市镇”标准问题所产生出的诸多争端是各种基层区划在较长的历史过程中不断“累积”的结果。^③

罗婧的《江南市镇网络与交往力——以盛泽经济、社会变迁为中心（1368—1950）》（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在江南市镇研究中引入“交往力”概念，认为在区域社会的横向运动中有不断突破地域空间界限的“扩张力”和富于黏性的“经济—社会”结合力，它们之间的互动促进了区域内部各因素的整合，构建和扩大了对外联络和沟通，促进了市镇聚落的兴起和发展。该书包括“绪论”“结语”和五章内容。第一章“盛泽

^① David Faure and Tao Tao Liu, *Town and Country in China: Identity and Perception*,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and New York: Palgrave 2002.

^② 吴滔：《清代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空间透视——以苏州地区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③ 吴滔：《明清江南基层区划的传统与市镇变迁——以苏州地区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

镇的地域空间”研究了盛泽所处的苏嘉湖区域的自然环境、人文传统、交通、通讯的变迁，发掘盛泽发展的结构性基因；第二章“蚕桑丝织区域性交往圈中的盛泽”和第三章“沟通世界市场的盛泽绸”分别考察了明清以来处于苏嘉湖区域市镇网络中的盛泽镇，以及其与世界市场衔接的交易体系，力图揭示交往扩张力在其间发挥的重要作用；第四章“盛泽市镇社会的成长与变迁”则探讨了交往结合力推动盛泽镇的镇区形制、辐射范围、人口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第五章“盛泽经济社会的互动特质”分析了盛泽市镇社会在经济社会互动中形成的三个特质即有限的商业活力、多维的社会交往圈、蚕桑丝织习俗与传统等。该书最大的特点是注重研究盛泽与苏嘉湖、世界市场的区域互动，既突出盛泽镇的个性，也注意从个案研究中提炼江南市镇的共性。

朱小田的《江南乡镇近代化的发展道路——盛泽镇经济生活近代化的历史考察》一文探讨了盛泽镇丝织业的近代化，认为资本主义萌芽至20世纪20年代借助历史契机过渡到近代化阶段。^①李伯重的《19世纪初期华亭——娄县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一文认为19世纪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高达40%，而至20世纪中期城市化水平降至20%，说明历史并非直线进化，不应有近代对传统的“傲慢与偏见”。^②

2. 浙北市镇研究

陈学文、蒋兆成、陈国灿等对浙北市镇进行了深入研究。

陈学文擅长对市镇进行微观研究，曾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浙北市镇个案研究的文章。其著作《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1993）是在发表了关于双林、南浔、新市、硖石、长安、乌镇、濮院的一系列个案研究文章后结集而成。陈学文认为杭嘉湖一带的市镇代表了江南城市化演进的轨迹，对明清杭嘉湖市镇的研究表明在城市化进程中市镇担负着沟通城乡经济交流的功能，是区域经济文化的中心。^③

① 朱小田：《江南乡镇近代化的发展道路——盛泽镇经济生活近代化的历史考察》，《铁道师院学报》1990年第3期。

② 李伯重：《19世纪初期华亭——娄县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2期。

③ 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蒋兆成的《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乡镇经济试探》（1986）一文认为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的乡镇已经发展为颇有规模的农村工商业中心，对于分解自然经济，孕育资本主义萌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乡镇亦是封建国家和宗法势力在农村的据点，其发展又是不稳定的，带有明显的局限性。^①任道斌的《试论明代杭嘉湖平原市镇的发展》一文研究了明代杭嘉湖地区市镇发展的原因、条件和情况，认为市镇相比于残存农奴制的乡村和主权中心的郡县城市，资本主义萌芽更易于得到发展。^②

陈国灿、奚建华的《浙江古代城镇史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是一部研究浙江城镇发展史的著作，但多以杭嘉湖的市镇为研究对象。该书包括绪论、上编“浙江古代城市史通论”、中编“浙江古代市镇史通论”、附编“浙江古代城镇史散论”。上编的第一章“产生和发展：宋代以前的浙江城市”、第二章“走向繁荣：两宋时期的浙江城市”、第三章“停滞和衰落：元明清时期的浙江城市”，认为元代浙江城市相对停滞，明至清中期浙江城市逐步衰落。“下编”第四章“兴起和发展：宋元时期的浙江市镇”、第五章“持续兴盛：明清时期的浙江市镇”。“附编”包括“一、秦汉至五代十国杭州城的发展与演变”，“二、宋代两浙路城乡市场等级结构分析”，“三、明代金华府市镇探析”，“四、浙江古代城镇名录”。该书分析了明清时期浙江州县城市衰落而农村市镇持续兴盛的原因，认为主要是由于封建城市固有的局限和农村社会经济的变化所致，以停滞称元代浙江城市，以缓慢发展称元代浙江的市镇，其间差异体现了城市与市镇发展有明显不同步的特征。陈国灿的另一著作《浙江城镇发展史》（杭州出版社，2008年）是有关浙江城镇发展的一部通史，对晚清以前的浙江城市和市镇分别论述，晚清以降，将城镇综合论述。

陈国灿的《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社会的城市化特征》一文指出随着明

^① 蒋兆成：《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乡镇经济试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

^② 任道斌：《试论明代杭嘉湖平原市镇的发展》，《明史研究论丛》1991年第1期。

清时期杭嘉湖市镇的工商业繁荣，社会形态也发生很大变化，在居民结构、社区布局、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方面呈现出城市化特征。^①姚培峰、陈国灿的《简析明清浙北地区市镇城市化现象》指出明清时期浙北市镇发展有明显城市化趋向，主要是因为农村蚕丝业发展，镇的增加及规模扩大，工商经济繁荣等，市镇城市化带来了阶级关系及生产方式的变化。研究江南农村城市化及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城镇发展是陈国灿在江南城市史和市镇史研究中的显著特点。

浙北市镇的个案研究成果不少。汪波的博士论文《南浔社会的近代变迁（1840—1937）》（2006）以近代以来蚕桑业的盛衰变迁为线索，考察南浔近一个世纪的社会变迁过程。文章分鸦片战争前、鸦片战争后至19世纪末、19世纪末至1937年等三个阶段加以探讨，对南浔的蚕桑业发展及市镇经济分别予以论述，认为以市镇为代表的农村经济在面对近代工业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时，主要表现为“被动”适应的过程。^②

李学功的《南浔现象——晚清民国江南市镇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包含六章内容。第一章“南浔：中国早期资本主义市场化缩影”指出南浔的变迁“见证、实践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并对江南市镇研究进行了学术史回顾。第二章“南浔市镇社会结构的变革”研究了商人地位提高和士绅阶层的分化、新职业和新的社会力量出现，并考察了南浔家庭结构、市镇行政组织机构变迁，以及会馆、公所、商会等市镇政治参与力量的演变。第三章“南浔市镇社会生活的演进”考察了婚姻生活方面传统与新式婚俗并存，以及社会风俗、藏书事业等；探讨了南浔的社会问题，社会治安、社会救助。第四章“南浔市镇社会心理的嬗变”分析了农民、商人、市民的社会心理变迁。第五章“浔商集团的崛起与变迁”探讨了浔商兴衰的过程，归纳了浔商的特点，详细考察了浔商重要代表家族的变迁。第六章“南浔现象的历史课题讨论”以南

① 陈国灿：《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社会的城市化特征》，《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② 汪波：《南浔社会的近代变迁（1840—1937）》，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得为研究个案探讨近代中国发展与不发展的动力问题。该书是一部紧扣近代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进而全面系统研究南浔市镇社会经济发展之作。

陈友益考察了明清湖州丝绸专业市镇群的形成及其历史作用；孙冰通过考察湖州双林镇的镇志编纂者身份变动透视双林镇的社会变迁。^①

总体来看，苏南浙北市镇研究是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领域，起步较早。20世纪80年代时学界主要注重对其进行个案研究和经济史方面的研究，至90年代转向社会史研究，注意考察市镇内部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生活变迁，并有区域比较研究，关注乡村与市镇的关系研究，曾经较为薄弱的民国时期江南市镇研究亦有起色。

3. 苏南、浙北城市史研究

王卫平的《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人民出版社，1999年）凡六章，包括绪论、江南地区城市发达的背景、明清时期江南城市的繁荣与市场体系、江南城市社会诸象、社会风习的变化与思想观念的更新、江南地区的城市化及其局限。该书选择以苏州为中心的研究视角主要是因为苏州在明清时期江南的中心城市地位，还以上海与苏州对比，关注两者在江南城市中的地位变化。在第三章，作者注重城市功能的动态研究，如苏州城市空间拓展和经济功能的增强，以及苏州职业人口的区域分工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并探讨苏州与周边市镇、农村的互动关系。第四章不仅研究经济活动、社会管理，还考察了民间的慈善活动。第五章从下层社会着眼，考察江南社会的奢侈之风。作者还对以往有关江南士人经商的观点提出补充，认为明朝的高额赋税政策，以及科举名额有限使得不少士人在屡试不第的情况下转而从贾，从而推动了士人经商的热潮。

此外，王卫平的《明清江南的城市化及其局限》一文探讨了明清江南的城市化，但因其经济基础的脆弱，长期徘徊于近代社会的门槛，直至西

^① 陈友益：《明清湖州丝绸专业市镇群的形成及其历史作用》（《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孙冰：《镇志的编纂和明清江南市镇变迁——以浙江湖州双林镇为例》（《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4期）。

方资本主义侵入，大机器工业传入，近代城市产生，江南的城市化才进入新的历史阶段。^①王波的《苏州观前街区研究（1840—1940年）》一文梳理了苏州观前街区的发展概况，分析了其内涵特征，从中管窥苏州的城市近代化历程。^②

张海林的《苏州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包含十章内容，考察了近代苏州的内外环境与资源、近代工商业和金融业、市政建设、现代社团、地方自治运动、绅商和官员的地位角色变迁、教育、军国民体育实践，以及近代意识与市民生活。并探讨了近代苏州现代化陷入困顿的原因，认为近代苏州呈现“半截子的现代化”的原因主要在于经济环境恶劣和政治环境动荡不宁。

汤洪庆的博士论文《杭州城市早期现代化研究（1896—1927）》（2009）主要从政治体制、经济、文化、市政等四个方面分析杭州早期的现代化。并将杭州城市的早期现代化特点归纳为：一、杭州城市的现代化不是内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在内外力的共同作用下发生；二、与欧美等原生型城市现代化是工业主导型不同，杭州城市现代化由商业主导；三、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与上海等城市相比，其发展程度还相当有限。^③

蔡禹龙的博士论文《清代杭州的城市街区与社会变迁》（2012）以清代杭城的街区变迁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了街区空间布局的变迁、街区管理与规划、街区的文化记忆与传播、街区市肆与经济变迁等四个方面的内容，试图通过街区这一视角来审视清代杭州城的社会变迁。清代杭州城街区布局的变迁是军事、政治、文化、经济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街区的衍变亦可呈现杭州城社会变迁的轨迹。^④

① 王卫平：《明清江南的城市化及其局限》，《学术月刊》1999年第12期。

② 王波：《苏州观前街区研究（1840—1940年）》，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城市社会研究》上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

③ 汤洪庆：《杭州城市早期现代化研究（1896—1927）》，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

④ 蔡禹龙：《清代杭州的城市街区与社会变迁》，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孙忠焕主编的《杭州运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主要考察了大运河与杭州城市发展的关系，其中第七、八、九章分别探讨了明清两代以及民国时期的大运河与杭州城市发展。研究了明清民国时期水系变化、通航情况，对运河的疏浚、管理及运河经济、运河建筑和运河风俗等。

陈自芳从近代城市发展的条件与动力的角度分析了杭州的城市近代化；汪利平等探讨了1911—1927年杭州城市空间的变化与其城市定位和旅游业开发之间的关系；金向华对1911—1927年的杭州市政建设进行了研究；王月昫、邵雍考察了辛亥革命后杭州的政治、经济、文教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变迁。^①

相对于上海崛起，近代以来苏杭在江南的地位都相对下降。因而江南城市史研究主要是集中于明清时期的苏杭、近代时期的上海。成果及研究深度亦与其历史地位、现实需要，以及学界的关注度直接相关。

小 结

苏南浙北虽同属江南，但在江南区域史研究中畸轻畸重的状况确实存在，如前所言，这可能与其历史地位有直接关联，明清以至近代苏州是整个江南的经济文化中心，即使开埠之后，苏州地位衰落，但其承接上海辐射，其经济、文化、人口与上海之间互动的密切程度可能也要超过杭州乃至宁波。此外，苏南的望族、文化世家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为苏南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得诸如区域比较、宗族、望族、义庄义田、灾荒救

^① 陈自芳：《略论近代城市发展的条件与动力——对杭州城市近代化的剖析》（《城市史研究》，2000年）、汪利平、朱余刚、侯勤梅：《杭州旅游业和城市空间变迁（1911—1927）》（《史林》2005年第5期）、金向华：《民国时期杭州市政建设研究——以1911—1937年为时段的考察》（《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王月昫、邵雍：《辛亥革命后杭州的社会变迁》（《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济、社会组织、士绅群体、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研究，以及昆曲、评弹相关文化社会史研究得以深入。而苏南在相关史料搜集亦有优势，如洪焕椿、王国平、唐力行等编订的苏州社会经济史方面的碑刻资料集等为苏南相关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我们也应看到，近年来有关浙北城镇研究和杭州城市史研究出现了一批重要成果，但除此之外是否还可以开辟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呢？如杭嘉湖地区与江南内部区域、外部区域的比较，再如近年京剧、昆曲、评弹与江南社会研究方兴未艾，但主要论及苏南、上海，而杭州本地的评话亦是古老的曲艺形式，其与杭州的社会变迁应有直接关系，或许可以进行初步的研究。评话与杭州周边区域社会有什么关联？是否可以深入研究？这些都可以进行论证。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应会带动新史料的发现，也可能会刺激理论思考的兴趣，重要成果也许会从此中得来。

第三章

明清以来上海社会经济史研究述论

一、上海史的史学研究概况

唐振常的《上海史研究四十年（1949—1989）》和熊月之的《20世纪上海史研究》等两篇文章已将20世纪的上上海史研究做了概观式的回顾。前文简洁，且主要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回顾新中国成立后四十年的上海史研究，追溯上海史研究的源头，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不是上海的上上海史”研究，即上海地方史被纳入中国近代史的框架，失去个性和特色，自然更谈不上独立的学科体系了，但改革开放之前的史料整理还是为人称道的。改革开放后，终于进入“全面的上上海史”研究阶段，从出版事业到学科研究者的群体，以及相关史学理论的讨论都有长足的进展。最后，指出上海城市史的研究是当代研究的新趋向。后文则将上海史研究分两个时期、四个阶段，两个时期以新中国成立为界，上半时期以1937年为界，下半时期以1978年为界，20世纪的上上海史研究整体呈现两头相对繁荣的局面，即1937年前和1978年后出现大量的上海史研究成果。该文指出上海史研究的热潮是与上海的发展亦步亦趋的。熊文主要介绍了不同时期上海史研究的相关论著，该文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将海外上海史研究的代表作一一列举。

在《上海史通史·导论》卷中，熊月之花了很多笔墨详细介绍了从晚清到当代的上上海史研究概况。该部分还附录了截至1998年的地方志目录、

1950—1997年的上海史中文著作录要。加之在“海外上海学”中所录海外上海学著作目录、海外上海学论文目录、海外上海学英文博士论文目录。熊月之的研究工作已经为上海史的史学史开辟了通畅的路径。

上述“上海学”的提法始自20世纪80年代，其后在学界还会偶发争议。首倡者江闻道在1980年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上海学”（Shang-hailogy）概念，1986年上海大学成立上海学研究所，并召开“上海学研讨会”，群贤毕集，汪道涵、罗竹风、陆志仁、陈从周、陈旭麓、庄锡昌等参与讨论，认为应将“上海学”建成跨学科、跨地域、多方法的综合学科。由于“上海学”有明确的现实服务目标，与会专家多持赞成态度，并有系列文章发出倡议，多从学理上加以论证。有汪道涵的《关于上海学研究的几点意见》，胡道静的《祝愿上海学兴旺发达》，陆志仁的《建立上海学资料中心很有必要》，陈旭麓的《上海学刍议》，庄锡昌的《上海学发展的三个决定因素》，唐培吉、孙仪、刘克宗的《上海学研究的若干问题》，孙仪、刘克宗的《略论上海学的研究对象》，袁俊卿、陈树德的《试论建立上海学的必要性》，顾晓鸣的《上海学研究的若干总体方法论问题》，张志孚的《上海学与上海史》等。这些文章刊载于《上海大学学报》1986年第3—4期，在上海学界掀起一股“上海学”讨论的热潮。

1987年《上海文化年鉴》对“上海学”的界定是：“以‘上海’为研究对象，以探讨振兴上海的理论方法为该学科建立的目的，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它并不以分门别类地研究上海的去、现在、未来为其终端成果，而是在研究上海诸方面（从历时性到共时性）所形成的各个分支学科的基础上，在‘动态’中探寻上海与外部（包括国际和国内其他省市）的联系，以及上海自身各子系统间相互联系，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视野，为上海和上海经济区的发展提供研究成果。‘上海学’研究涉及的范围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化、经济、生态环境、工艺技术以及城市管理建设等方面”。其服务现实的指向非常明确。

但学界对于“上海学”能否成为一个学科门类，或者有没有必要提出“上海学”颇有争议。有学者指出，论断一门学科是否形成，要有一些基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本标志，如明确的研究对象、独立的研究体系、完整的学术理论、成熟的经典著作、足够的专门学者、公认的学科导师、合理的科研布局、基本的教学机构。^①就上述指标而言，“上海学”作为宣传和倡议有其合理之处，但“上海学”在当时能否成立应是存疑的。需要指出的是，“上海学”是作为一门综合学科提出来，但真正投身其中，呼吁最力的主要是一些历史学者，虽说上海史研究成绩卓著，史学涵盖亦宽泛，可以包罗万象，但局限于历史学者的知识结构和囿于历史学科前瞻性缺失的特点，仅靠历史学者投身“上海学”建设恐怕还远远不够。

1999年，《史林》杂志的第2期刊登了一组“上海学研究笔谈”，包括陈旭麓的《上海学刍议》、唐振常的《关于上海学》、沈渭滨的《也谈“上海学”》、熊月之的《是建立上海学的时候了》、姜义华的《深化与拓展上海研究的十条建议》等。《上海学刍议》是陈旭麓1986年参加“上海学研讨会”时的旧文。陈先生称：“上海学应该是从对上海的分门别类及其历史和现状的研究中，找出它们的联系和内核，由此构成为研究和发​​展上海这样一种都市型的学理，富有上海的特殊性，又含有都市学的共性。”沈渭滨承接了陈旭麓的观点，认为“上海学”是一门特殊的都市学，指出上海学是城市科学的一个分支，是一门关于都市建设与发展的基本学理与实际运作的整合型科学，是基础理论与应用的有机综合。“上海学”由历史学、管理学、规划学三个板块构成，而在历史学中社会史和城市史又更为重要。并指出随着上海发展，以及海内外有关上海研究的机构纷纷设立和科研力量的日益壮大，且熊月之主编的15卷本《上海通史》亦为上海研究奠定了基础，建立上海学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熊月之与沈渭滨观点一致，颇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呼吁“是建立上海学的时候了”。

唐振常和姜义华对“上海学”的提法持谨慎态度，唐先生认为从研究成果及国内外对上海研究的关注度而言，从上海的特殊性及其自成规格与

^① 朱弘：《兴盛·挑战·反思——上海研究杂记》，黄美真主编：《论上海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系统看，称“上海学”似乎不成问题。但目前的上海研究，“距离认识历史上海的本貌还很不足，贸然冠以上海学这个专列名目，势将予人以立异以为高的想法”。“过早为之定一名目，未必有助于学术的发展”。在唐先生看来，目前提出“上海学”时机不成熟。姜先生认为打出“上海学”旗帜的意义不大，“因为要将一个城市的专门研究确立为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独立学科，远不如多花一些精力深化与拓展上海的研究更加实在”。

后来，熊月之对“上海学”争论有专文总结，其《上海学平议》（《史林》2004年第5期）一文就“上海学”的现状、兴盛原因及“上海学”的讨论过程进行了论述。文章认为“上海学”具备了一门学科成立的条件：拥有一门独立学问所需的研究内涵；积聚了一支颇有规模的研究力量。文章的大部分篇幅是回顾“上海学”的提出与围绕“上海学”的相关争论。熊先生的结论是：“如果从学理上看，则上海学之建立，不但有充分的理由，而且事实已经存在。”

除熊月之外，还偶有学者回顾“上海学”的争论，并对建立“上海学”进行了一些理论思考。如张祖健指出“上海学”更需要一个具有前瞻性的理论模型，认为完整意义上的上海学应包含回顾式的历史学和前瞻性的都市发展学。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的年度城市发展蓝皮书，张祖健认为上海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框架，即由城市经济、城市文化、城市生活质量、城市资源环境等四个维度构成的新都市学。这个新都市学以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为核心，研究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支持体系。“前瞻性的上海研究仍然处于实践积聚中，离成熟的上海学建立尚有距离。”^①

随着“上海学”进入了国内学术界的视野，熊月之等也在关注海外上海学研究。熊月之、周武主编的《海外上海学》（2004）详细介绍了海外上海学研究情况。本书分上、中、下三编，上编为“海外上海学的现状和趋势”，中编为“名著解读”，下编为“名家剪影”。上编有熊月之撰写的

^① 张祖健：《对“上海学”研究的新思考》，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编：《北京学研究文集2008（上）》，同心出版社2009年版。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海外上海学历程》、熊月之等撰写的《世界各地的上海学研究》、朱政惠撰写的《海外英文博士论文中的上海学研究》。中编介绍了海外上海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25 部。下编介绍上海史研究的海外专家 14 位。该书为国内的上海史研究打开一扇通向海外的窗户。上编“海外上海学的现状和趋势”中的《海外上海学历程》以时间为经，分别介绍了晚清、民国、1949年后等三个时期海外上海史的研究状况，主要是文本的研究；《世界各地的上海学研究》围绕空间做文章，介绍美国、欧洲、港台地区、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从事上海史研究的学者、群体、著作，并分析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学者的研究特点，如港台地区在中国的文化版图上处于中西之间，一方面与欧美学者互通声气，一方面与中国传统文化较少隔膜，其研究成果足为大陆学者和欧美学者的借鉴。上编中朱政惠的《海外英文博士论文中的上海学研究》列出一系列的“看点”和“亮点”，“看点”有对当代上海问题的研究、关于上海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领域和具体问题的研究，以及上海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史的研究。“亮点”主要指有关上海的博士论文的学术特点和创新之处。首先，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海外关于上海研究的快速增长期。其次海外上海学研究者研究方法上从小处着手，在大处落脚，往往从一些个案的研究，最后归结到上海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现代化特点和中国人的现代性问题及历史走向等宏观的理论问题。再有就是视野开阔，擅用比较的方法，对基层社会、妇女问题等方面的研究亦是“亮点”。

上海研究中心编、黄美真主编的《论上海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 年）是一本专题论文集，主要是对改革开放至 1990 年上海史研究成果的总结和相关理论问题的思考，所以从这本论文集中既可以了解到改革开放后的十几年里上海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和发展轨迹，也可以明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上海史研究热点。该书包括上海研究学术史回顾及发展趋势的预测，关于开展上海史研究的意见及研究规划，关于上海研究若干专题的论述，关于上海研究与上海地方志之间的关系。学术史回顾有唐振常、许敏的《上海史研究四十年（1949—1989）》以及王志平的《上海·

上海研究·上海学——1990年的上海研究》。其中王文认为1990年的上海研究由偏重政治、经济转向全方位，由微观转向宏观，由对历史反思转向沟通现实。该文指出1990年4月中央关于开发、开放浦东的决定为上海研究注入很多现实意义，当年《文汇报》即辟出专栏讨论“海派文化”，如《海派文化散论》、《近代绅商与海派文化》、《海派文化之我见》、《石库门与海派文化》等文章。另外，上海研究受近代史研究模式束缚的状况正在被打破，将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城市学的方法引入，出现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趋势。文章认为，许多学者力图把上海研究同整个上海城市的发展联系起来，以此来认识上海近代化中出现的各种矛盾。美国芝加哥学派关于“城市是一个有机体，它是生态、经济、文化三种基本过程的综合产物，是文明人类的自然生息地”的观点被引入。如张仲礼主编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一书就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三大篇。上海研究的范围已经包括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化、经济、生态环境以及城市管理。1990年关于上海近代化、上海人、海派文化探讨较多。文中还提及张忠民的《上海：从开发走向开放（1368—1842）》，认为是著强调上海的内在条件是上海近代化的决定因素。

关于学术发展趋势的文章有林克的《关于上海宏观研究的前景》，文章指出“在上海研究中，历史与现实，正在融合中”，上海史的研究最深层的动因在于社会现实的需要。朱弘的《兴盛·挑战·反思——上海研究杂记》认为1979年前的上海研究经历三个重要时期：1840年前后；19世纪中叶到太平洋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新中国成立至1979年上海研究没有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主要依附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就是前文提及的唐振常所说的“不是上海的上海史”研究。但在有些专题如人民革命史、上海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海历史地理研究等方面取得大量成果，此外还有一些资料整理方面的贡献，如《上海钱庄史料》、《荣家企业史料》、《辛亥革命在上海》等。六十年代在《文汇报》上展开的关于上海成陆史的论争则是这一时期学术争鸣的典范。文章认为近百年上海城市发展规律的总结，乃是当今上海城市研究的核心问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题。林克的文章还就外国学者的上海研究做了总结，认为他们研究的主要关注点是上海在近代世界中的地位，包括上海与西方、上海与西方市场、东西文化冲突等；关注一些社会现象，如工人社团、市民意识、帮会娼妓；致力于若干区域研究，如青龙镇的研究即是一个典型；运用一些新方法，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等。

黄美真的《上海研究的任务与前景》一文指出，以前未能深入研究的课题如租界史有了开拓性的进展，曾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帮会、烟赌娼、同乡会问题也相继有专著出版，海派文化研究与社会史研究交汇前进；某些传统课题，如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党派之争等，不仅仅是政治事件的铺陈，而是从人口学、社会学中汲取新方法，过去忽视的苏北人、小市民群体也被纳入研究视野。黄美真另外一篇文章《近代上海社会研究的若干构想》认为政治史框架内的事件人物因缺乏社会分析而孤立、单调并趋于结论政治化，内涵丰富的近代上海社会因得不到历史再现而抽象为几条简单的线索。熊月之、潘君祥、宋一雷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导论》一文将近代上海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1843—1911年、1912—1927年、1927—1949年，其用意在于突破近代史以“五四”运动为界限的划分方法，突出上海地方史的特点。将近代上海城市特点总结为：典型的近代崛起的城市、受西方影响最大的城市、中国近代化起步最早、程度最高的城市、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中国最大的多功能经济中心城市、全国文化中心、移民城市、富有反帝反封建的传统、畸形发展的城市。并梳理了上海史研究中的几对关系：1.传统与近代化的关系，文化传统中有基本适应的、有经过改造可以适应的、基本不适应的、需要具体分析等几类因素。2.租界与华界的关系，早期租界依傍华界，繁荣以后的租界侵蚀华界，也刺激带动了华界的近代化。3.上海与外国的关系，殖民主义动机与效果间的关系，殖民主义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4.上海与内地的关系，双向、互利。

该书中张济顺的《近代上海社会研究界说》认为此前国内学术界关于上海近代史研究的一套规范或样本是：以政治史（包括革命史、中共党

史)为基本框架,以两大阶段(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三次高潮(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和四个时期(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基本线索,旁及一点经济文化内容。作者认为以政治事件作为上海城市发展的段限有其局限,如以1911年上海的辛亥起义为界限,是否在此前后上海近代化有阶段性差异呢?作者认为上海近代社会意义最为深远的结构性变动莫过于鸦片战争后近代城市化运动,而上海作为中心城市崛起约在18世纪70年代,尔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民族资本的上升,20世纪30年代前期国家资本的急剧发展。程洪在《上海研究的方法论》一文中将上海研究方法论的现代特征归纳为综合(多学科研究)、整体、基层、动态、辨证等五方面。

《论上海研究》一书对上海史研究进行了总结,重新思考了上海史研究的对象、理论、方法,并对20世纪80年代史学研究转型期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反思,如上海史与中国近代史的关系、“上海学”的提法能否成立、上海史研究领域的扩展和转向、史学研究手段和方法的丰富和发展等。是著洋溢着蓬勃向上的学术研讨气氛,应是20世纪80年代上海史研究界的真实写照。

21世纪伊始,各领域都不免要做些顾后瞻前的工作。一些学者就上海史研究进行了相关理论探讨。王家范认为上海史与江南区域史研究的隔膜阻碍了上海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从而得出一些可能似是而非的结论,如是否过于强调太平天国运动在上海发展中的作用,外贸中心由广州转移至上海的说法也值得推敲等,希望通过加强江南区域整体史的研究,特别是上海史与江南史的联动来推进上海史的研究。^①苏智良主张利用好上海史的相关档案。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内外上海史研究的快速发展与档案利用密不可分。^②李宏图介绍了西方史学界的研究趋向,认为可以为上海史研究提供借鉴。^③承载指出城市社区史是城市社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① 王家范:《从苏州到江南:区域整体研究的视界》,《史林》2000年第5期。

② 苏智良:《上海史研究与档案利用》,《史林》2000年第5期。

③ 李宏图:《关于拓展上海史研究的一点思考》,《史林》2000年第5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分，亟需加强城市社区史的研究。^①邵雍鉴于上海黑社会史与帮会史、租界史关系密切，而黑社会史与上海近现代史几乎相始终，所以上海黑社会史研究与上海史研究关系极大。马学强提出应将制度研究作为上海史研究的一个新视角。^②上述多为上海史学者的经验之谈，宏大的理论阐述不多。

方志也是上海史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一批关于方志理论研究的著作问世，如《上海郊县修志十年》（1992）、《上海区志编纂十年》（1999）、《上海专志编纂十五年》（2002）等三部论文集总结了新方志研究理论、经验、成果。相比而言梅森的《上海方志研究概要》（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更加系统，是著考察了上海地区1193—2003年共计800多年中的方志编纂。主要论及传统方志的功能、性质、凡例、史料、纲目、志种、编纂组织，还专门研究了钱大昕的方志思想，并论及新方志的指导思想、性质、功能、组织管理、体例、资料、编纂方法、分志、志种、地情特色，还介绍了一些上海的区县方志。书后附录1980—2003年有关上海方志的论著简表。是著是对上海方志研究的系统总结。

总的来看，学术界对于上海史的史学史研究，从著作的介绍、论著的整理到理论总结，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熊月之的《上海通史·导论》非常翔实、全面地介绍了上海史的研究著作。但前述的研究多为基础性的，对于上海史研究的理论探讨相对薄弱一些，多是学者们的经验之谈，不过海外上海学的译介多少弥补了国内学术界史学理论研究方面的不足。

二、通论性的上海史研究

在对于上海史的史学史研究中，熊月之等都注意到综合性的上海史研究，因为这类上海史研究可以融合最新研究成果，能够比较全面反映一个

^① 承载：《城市社区史和上海史研究》，《史林》2000年第6期。

^② 马学强：《关注制度：上海史研究的一个视角》，《史林》2001年第6期。

时期上海史的研究水平，特别是上海的通史研究更是如此。而通史撰述往往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需要集结相当规模的学术团队方能胜任。本书虽然主要考察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上海社会经济史研究状况，但为呈现更加开阔的研究背景，对通论性的上海史亦作简要回顾，为体现其连续性，1980 年以前的通论性的上海史也会稍有涉及。

以现代学科体系分类中的历史学方法研究上海史始于 19 世纪末，外侨与外国学者首先涉足其间，如 1889 年《北华捷报》馆出版的麦克莱伦 (J.W.McClellan) 所著《上海史话》，裘昔司 (C.A.Montalto de Jesus) 的《历史上的上海》 (*Historical Shanghai*) 由程灏节译为《上海通商史》，卜舂济 (F.P.Hawks Pott) 的《上海简史》 (*A Short History of Shanghai*) 由岑德彰译为《上海租界略史》，1908 年赖特主编的《二十世纪香港、上海及中国其他商埠志》出版。^①兰宁 (George Lanning)、库寿龄 (Samuel Couling) 的《上海史》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上下卷分别于 1921 年、1923 年出版。上卷止于 1857 年，较多篇幅花在中西、中英比较等历史背景；下卷论述了 1857—1900 年的上海历史。此书是第一部以英文撰写，并详细记述 19 世纪上海租界的著作。因此书受到工部局资助，所以详于公共租界，略于法租界，华界也仅涉及一些洋务企业。这一时期的上海史研究主要由外国人特别是在沪外侨学者唱主角，他们研究的兴趣点多在租界、通商及上海的风物指南之类，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常为后来的学者征引。

20 世纪 30 年代柳亚子主持的上海通志馆为上海史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对于其贡献，熊月之总结了三点：1. 整理资料，发表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草成《上海史通志稿》，分历史、地文、政治、教育、财政、金融、社会事业、学艺、公共租界、法租界等编，1 000 多万字。并出版《上海史通志馆期刊》，所录文章涉及沿革、气象、公共租界、法租界、政治、外交、实业、文化、人物等各方面。2. 编写、出版了 1935—1937 年三期

^① 唐振常：《上海史研究四十年（1949—1989）》，《近代上海探索录》，上海书店 1994 年版。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上海市年鉴》。3.影印出版了一批关于上海史的珍贵古籍，为上海史研究提供了便利。^①

前曾述及，1949年后的三十年，大陆的上海史研究基本被纳入中国近代史、特别是革命史的体系中，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创建，本期的成绩主要在于史料整理。冷战时期中西阻隔，学术交流困难，至1986年大陆始翻译出版美国学者罗兹·墨菲的《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此书引起极大反响，至今依然被认为是国外上海史研究的经典之作，该书的导论点明题意，“上海，连同它在近百年来成长发展的格局，一直是现代中国的缩影。就在这个城市，中国第一次接受和吸取了十九世纪欧洲的治外法权、炮舰外交、外国租界和侵略精神的经验教训。就在这个城市，胜于任何其他地方，理性的、重视法规的、科学的、工业发达的、效率高的、扩张主义的西方和因袭传统的、全凭直觉的、人文主义的、以农业为主的、效率低的、闭关自守的中国——两种文明走到一起来了。两者接触的结果和中国的反响，首先在上海开始出现，现代中国就在这里诞生”。该书特别强调地理因素在上海城市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作者说：“上海之所以是大城市，主要因为它位于世界上幅员可以比得上无论什么地方、土地最肥沃、人口最众多的地区的顶点，即长江流域下游地区的顶点。”该书很多论断、数据为国内上海史研究引用，据褚晓琦统计，在张仲礼主编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的经济篇就有13处直接引用墨菲书中的统计数据和结论。^②该书还将上海与其他城市做比较，清晰勾勒出上海的城市特色。

国内通论性的上海史研究始自20世纪80年代，首先是吴贵芳的《古代上海述略》（1980），该书分量不大，七万多字，叙述上海地区从原始社会至开埠的历史，涵盖原始文化、疆域沿革、建县筑城、水系变迁、港口兴替、经济特点、政治冲突、岁时风俗等，是1949年之后第一部比较系

^① 熊月之：《20世纪上海史研究》，《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② 熊月之、周武主编：《海外上海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页。

统论述上海古代史的著作。其后，刘惠吾主编、朱华、苏智良等撰写的《上海近现代史》（上、下册）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85年、1987年出版。该书论述开埠至1949年的上海史。上册叙述了开埠前的上海的成陆及历史沿革、外国租界的开端，详细叙述太平军在上海地区的战事。该书论及租界的章节主要围绕租界的扩张叙述，凸显了民族矛盾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第六章“殖民者的文化侵略”介绍教会及其活动，以及洋学堂的创办等。第七章“民族民主运动在上海的兴起”论及拒俄运动及《苏报》案、抵制美货运动等。《上海近现代史》下册跨度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上海解放，虽以政治史为主线，但兼及经济、社会、文化，体现了编写者试图突破革命史范式的努力：如第五章为“近代企业的产生及其初步发展”，第六章为“殖民者的文化侵略”，其中有关于教育、新闻出版等论述。社会方面如第八章专门论述上海城墙的拆除和闸北的兴起，第五节探讨了上海从开埠到辛亥革命间上海城市面貌的变化，第十五章第四节为“洋场黑幕与社会风气”。此外如左翼文化、孤岛文化等也都有专节论述。另外该书也吸收了新的研究成果，如开始反思租界在上海发展中作用，将列强的主观目的与租界的客观作用一分为二地进行评价，从而使这部上海近代史显得比较系统、全面。但该书的某些观点还有明显的时代印记。

唐振常、沈恒春主编的《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的主要撰稿人有谯枢铭、卢汉超、熊月之、陈正书、郑祖安、李天纲、吴德铎、沈恒春等，都是八十年代上海史研究领域训练有素的专家，基本上代表了当时国内上海史研究水平。全书上起于上海陆地的形成，人文历史起于吴越之交，下迄1949年上海解放，以1842年6月中英吴淞之战为界分古代和近代两部分，并以近代为主，侧重开埠至抗战时期。近代部分具体分为三个阶段，即1842年6月吴淞之战至1911年11月上海辛亥起义，1911年11月至1927年7月上海特别市成立，1927年7月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这样的划分突出上海史的地方特点，更符合上海发展的实际情况。该书力图贯穿地方性、综合性、整体性。地方性如前述上海史阶段性的划分体现上海史的实际，综合性即体现上海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人口的综合发展，所谓整体性即以三家（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二方（华、洋）为整体研究对象。尤其对租界在上海乃至中国近现代史中的作用力求以辩证、分析的态度客观评价。有学者认为该书最大缺憾在于全书在研究方法、学术思想、写作风格和内容力度、厚度方面不太统一。^①近代史部分以第19章“从军阀混战到‘四·一二政变’”为界，前半部分着眼于多角度、多层次地展开城市发展史的各个侧面，后半部分却线条单一，没有摆脱政治斗争史的研究模式，距离综合性的通史要求尚远。在历史延续性上，古代部分所叙述的上海农业及植棉业、上海资本主义萌芽、上海文化的形成，未能在近代史部分展开，使得上海经济的崛起和文化性格特征等问题的论析缺乏与传统相联系相呼应的深入考察。沈渭滨等认为主要是两个原因造成上述问题：一是众手修史造成的差异；二是旧的研究体系在转型时期留下的痕迹。有学者指出《上海史》有颇多创新，力图营建有机的、立体的上海史，突破以“事件—人物”单线条贯穿的政治史范式。^②总之，刘惠吾主编的《上海近代史》和唐振常主编的《上海史》“奠定了近期上海史研究的基本格局，使得此前外国学者的一些同类著作黯然失色”。^③

1991年，尽管有许多争议，还是被政府和学界作为上海建城700周年来纪念，出版了一批上海史著作，如施宣圆主编的《上海7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1版、1999年2版）第一版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篇，第二版增加人物一篇。每篇汇集一些小专题，既为上海建城700年史，当然也述及当代一些史事。此外还有于醒民的《上海，186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该书写法比较新颖，以1862年在严寒中太平军进攻上海为枢纽，发散式展开。重点论述华尔、吴煦、李鸿章、王韬

^① 沈渭滨、许敏的《承前启后的上海史研究——评〈上海史〉》，黄美真主编：《论上海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② 黄美真：《近代上海社会研究的若干构想》，黄美真主编：《论上海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③ 朱弘：《兴盛·挑战·反思——上海研究杂记》，黄美真主编：《论上海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等不同阶层的代表人物，为读者呈现出立体的上海历史场景，不似一般学术著作面目冷峻。史料丰富，但不拘泥，挥洒自如，对李鸿章、王韬等人物研究亦很深透。于醒民与唐继无合著的《从闭锁到开放》（学林出版社，1991年）秉承《上海，1862年》的风格，以上海现代化为主线，从产业、教育、人才、思想等方面论述上海的现代化动因及过程。

朱华等著的《上海一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主要以政治史为中心研究20世纪上海史。是著选取一些重大历史关节点加以铺陈，显示上海的百年巨变，以明了上海的巨大发展潜力及有利的资源。

郑祖安的《百年上海城》（学林出版社，1999年）没有采用通史式的直线条写法，而是根据上海城三界四方、浦东浦西分割发展的状态，从每个区域入手研究上海城市史。如上海城市的起源、老城风貌、虹口闸北的兴起、浦东的变化、吴淞两次自开商埠的始末、租界的兴衰，以及上海建市后“大上海”的最终形成等。除这条主线外，该书还涉及市政建设和管理、人口迁移及上海与其他城市的比较等。

从吴贵芳的《古代上海述略》至张仲礼主编的《上海近代城市研究》基本代表了1980—1990年这十年间国内上海史的研究水平。从古代史研究至近代史研究，而又至通史和城市史研究，从主要是政治史研究至包罗经济、社会、文化的全方位的上海史研究。终至1999年15卷本的《上海通史》出版，一部真正意义的上海通史诞生，从而对改革开放以来20年的上海史研究成果进行了一次大检阅，此为上海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上海通史》由熊月之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全书为15卷，其中古代1卷，叙述史前至开埠的上海历史；晚清、民国、当代（下限为1997年）各四卷，分别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卷；另外，导论、附录各一卷。

熊月之的《上海通史·第1卷（导论）》分自然环境、上海在中国与世界的地位、租界及其影响、吴越文化江南文化上海文化、海派文化、上海人形成、认同与特质、近代上海城市形象解析、区县特色、上海历史研究概况、本书框架结构及附录。综合讨论上海城市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介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绍中外学术界的上海史研究动态，解释全书框架。附录包括大事揽要、职官表、建制沿革表、新旧路名对照表。是著将“租界及其影响”归结为：缝隙效应，即在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政府的统治系统中成为反政府力量可以利用的政治空间；示范效应，即推动上海学习西方；孤岛效应，即造成上海的畸形发展。该书总结前人研究，认为海派文化的特点是创新、开放、灵活、多样、宽容。

马学强著《上海通史·第2卷（古代）》除引言、附录外，分“远古时代”、“禹贡三江考”、“早期历史：文献中的上海地区”、“政区设置：华亭·上海”、“生计：盐、谷、棉、船”、“世家大族”、“民风习俗”、“明清学术文风”、“走向近代”等九章。考察上海的文明源头、地理变迁、文献记载，以及古代上海的政区沿革、经济社会，研究了明清的学风、清初上海社会、市镇经济等。

熊月之、袁燮铭著《上海通史·第3卷（晚清政治）》考察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政治变动，分四个阶段：1842—1852年、1853—1863年、1864—1894年、1895—1911年。该书主要关注三个方面：中西制度在上海城市发展中的矛盾运动及对中国政治的影响；租界的发生、发展；上海与中国、上海与世界的政治互动关系。该书特辟一章“晚清上海政权运作机制”，论述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的政权机构的组成及运作。凸显晚清上海政治的特点是该书的特色。

熊月之、张敏所著《上海通史·第6卷（晚清文化）》包括引言，开埠以后：欧风东渐、新型文化传播媒介、西学输入、公众文化设施、新型教育系统、学术文化演变、海派艺术、新型知识分子群、大众文化云蒸霞蔚、都市宗教生活、娱乐文化等十一章，以及结语、附录等。在“引言”中作者概括上海文化的特点为：边缘性、后起性、宽容性、开放性。该书第八、九、十、十一章主要是社会史的内容。其中第八章“新型知识分子群”将新型知识分子与传统士人相区分，将其特点归结为：有较好的西学素养，知识结构新；比较接近的价值观，传统的重义轻利不再是不可动摇的准则；比较接近的人生观，不再把读书做官视为正途，往往凭借新知识

服务于新式的文化机构。对于上海近代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的研究也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社会史研究的热点之一。

张培德等著的《上海通史·第7卷（民国政治）》分引言、附录、后记及“国基未固，百制抢攘”（辛亥前后）、中国共产党诞生和中国国民党的再造、国民革命和上海民众运动、国民政府统治十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与上海沦陷、国民党统治在上海的覆亡等六章。“引言”中说：“民国时期的上海也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它在政治方面的变迁是中国政治变化的缩影。”就民国时期上海的政权更替看，上海政治分四个时期：沪军都督府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1—1927年）；国民政府统治时期（1927—1937年），此间国民政府设上海特别市，上海实施市乡分治，把上海市政建设推向新阶段，随着抗战爆发，租界特权受到削弱和制约；日伪统治时期（1938—1945年），先后设置上海大道市政府、上海特别市政府；最后是国民党统治的重建和覆亡时期（1945—1949年）。该书着力凸显民国时期上海在全国的政治地位。

许敏所著《上海通史·第10卷（民国文化）》考察了民国初年新文化氛围中归来的海外留学者，以及文学、戏剧、电影、杂志、出版、新闻、教育、体育、宗教等上海文化的方方面面，并探讨了外侨文化对上海社会的影响。

此外，还有陈祖恩、叶斌、李天纲著《上海通史·第11卷（当代政治）》、朱金海、甘慧杰等著《上海通史·第12卷（当代经济）》、承载著《上海通史·第13卷（当代社会）》、陈同、宋钻友、马军著《上海通史·第14卷（当代文化）》、吴健熙等编的《上海通史·第15卷（附录）》及后面还要提到的《上海通史》中涉及晚清、民国社会经济的第4、5、8、9卷，在此就不一一赘述。

除工程浩大的《上海通史》外，也有国外学者另辟蹊径，尝试以一己之力从某一角度撰写上海通史。法国学者白吉尔的《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王菊、赵念国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分四部分：开埠（1842—1911）、大都会（1912—1937）、一个时代的结束（1937—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1952)、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白吉尔在该书的“前言”中指出，第一部分主要研究上海成为中国近代化活动中心的过程；第二部分分析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上海。第三部分论述日军的侵占使得上海失去其国际地位。第四部分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上海摒弃了以市场经济和个体精神为基础的现代性，而改革开放以后上海重获振兴。张仲礼评价该书有三个特点：一、强调上海开埠后发展的原因在于上海具有现代性。二、在肯定租界具有殖民地性质的同时，强调并区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上海城市发展中的不同作用。如果说公共租界给上海带来了市场观念、资本运作、现代科技和企业管理等全新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法租界则提供了市政管理、城市建设、保护宗教等官僚主义管理样本，创造了优越的思想环境和海纳百川的文化性格。三、以租界史切入上海史研究。

上述国内通论性的上海史著作除吴贵芳的《古代上海述略》外，都是学术团队的集体智慧，从一个侧面反映上海史研究特点，即团体协作、各展所长、涵盖面广、效率也高。但另一方面，众手写史，个人研究总有偏好，即使某一时期、某一方面的历史亦难以面面俱到。不过，像《上海通史》这样浩大的工程，确有继往开来之功。国外学者早如墨菲、近如白吉尔尝试上海史的写作，为上海史研究平添了许多色彩，正如白吉尔在《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中文版的序言中所说：“对于部分熟知上海的中国读者来说，有些章节可能显得平淡无奇。但是，不寻常的视角还是可以充实或改变他们的观点，使他们看到一些没有提出过质疑的部分。”应该说这也是许多海外学者对上海史研究的主要贡献。此外，因为历史文化的渊源，以及国外丰富的租界档案史料，如前述张仲礼所言，海外学者从租界研究切入上海史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尤其是区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上海近代化过程中的不同作用，对国内的上海史研究确有启发。

由上海通志编纂委员会编的《上海通志》（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虽非通史研究，但值得一提的是以其十巨册的恢弘巨著为上海史研究留下极为系统和丰富的史料。

三、综论性的上海社会经济史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海社会经济史研究是上海史研究的一个重头戏，因为上海在近代中国的特殊地位，对上海社会经济史的研究除了一般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意义之外，还被认为是解开中国近代化之谜的一把钥匙。由于处于西风东渐的前沿，上海社会经济有其独特性，有其吸引力，自然引起一大批海内外学者的瞩目，并投身上海社会经济史研究。熊月之在《海外上海学》中将一些海外学者热衷上海学的原因归纳为四点：一、与上海在中国的地位密切相关；二、与上海多元化的特质有关；三、与史学发展的走向有关；四、与上海史资料比较能满足西方学者的量化分析研究有关。上述四点不仅仅是海外上海史研究热的原因，也可以说是国内外上海史研究繁荣的主要原因。

熊月之将“上海在中国的地位”作为上海史研究热的首要原因提出来，亦指明了现实需要是推动上海史研究的重要动因，如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现实往往会激发人们的历史兴趣，并作出与现实相关的解读。林克在《关于上海宏观研究的前景》一文中谈到，上海史研究最深层的原因在于社会现实的需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史研究的重点在于政治、法律，原因在于人们对帝国主义入侵有着切肤之痛；五六十年代，上海被视为近代中国的缩影，当时的上海史研究基本沿用近代史的框架、思维方式；而从八十年代开始，社会的关注点在于上海如何才能重振雄风，历史研究倾向于城市史、经济史、社会史的研究。总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在于现实的刺激，如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发展使得学界关注上海近代经济史和城市史研究，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的泛滥使得一些历史学者开始注意到旧上海的赌、毒、娼、帮会的研究；随着行业协会、民间社团的兴起，一些学者开始致力于行会、公所、同乡会的研究。凡此种种，不能不说是现实的推动。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1. 通史中所涉社会经济史研究

就上海社会经济史研究来看，尚没有单独出版的上海社会经济史的通史著作。在前述 80 年代通论性的上海史中已经注意纳入一些社会经济史的内容。

如刘惠吾主编的《上海近代史》第十五章第四节：洋场黑幕与社会风气，介绍上海烟赌娼的泛滥及黑社会的猖獗。论及社会风气中一些消极面如趋炎附势和欺软凌弱、投机取巧等。

唐振常、沈恒春主编的《上海史》（1989）虽非社会经济专史，但经济现代化和社会转型为上海史的重要内容，故社会经济史占据了《上海史》相当大的篇幅。第二章“上海的崛起”论及华亭经济、青龙镇、上海镇的变迁，及古代上海地区的市舶、漕运和上海的植棉业、盐业发展等；第三章“海隅名城 南吴壮县”考察了明代上海地区的重赋、人口外流、棉纺织手工业的发展、海外贸易、名人名园、蓄奴和奴变等；第四章“江海通津 江南都会”研究了清初田赋的变动及设海关后的内外贸易、沙船业发展和行会组织建立等；第七章“进入稳定发展时期”论述了开埠初期外资和民族资本在外贸、商业、航运和金融等领域的发展情况；第八章专门探讨了在上海兴办的洋务企业；第十一章涉及上海租界拓展；第十二章“成为全国经济中心”从工业、金融业、航运、市内交通通讯等方面分析了上海经济发展状况及在全国的经济中心地位；第十七章“近代经济的初步繁荣”重点探讨了列强在沪经济实力的消长和民族工商业的迅速发展；第二十章“国民政府十年统治”论及抗战爆发前十年上海的官僚资本膨胀和民族资本的衰落；第二十一章“一种过渡形态的社会生活”围绕市民群体的构成、劳资两大阶级的关系和上海的帮会组织，考察了知识阶层、市民阶层、帮会等社会群体的生活形态。其后数章亦有涉及抗战全面爆发后的工厂内迁、“孤岛”时期上海经济的畸形发展、国共内战时期的币制改革等。

马学强所著《上海通史·第2卷（古代）》的五、六、七、九章多涉及古代上海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第五章“生计：盐、谷、棉、船”考察了

古代上海地区的土产、盐业、赋税、人口、棉织业、航运等；第六章“世家大族”简要论述了南渡大族如陆、瞿、董、邵、张等，考察“云间望族”徐、张、潘、王等。认为家族荣衰不定，变迁频繁，是明清社会结构的一个显著特征，而科举制度是制约家族兴衰的最重要因素。本章还研究了乡绅与明清上海社会，从乡绅与地方官、朝廷的关系入手，考察乡绅在上海社会中的角色变化，认为乡绅在与地方官府和朝廷的博弈中很大程度上是地方利益的代言人、维护者，但明清鼎革以后，乡绅威势不再，渐成官府的依附。第七章“民风习俗”叙述了古代上海的滨海民风和节令习俗。第九章“走向近代”探讨了清初上海社会的地方职官及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并考察了开埠前上海地区的市镇经济，以及上海地区的客商和行会组织。

陈正书著《上海通史·第4卷（晚清经济）》包括“引言”和“结束语”及九章内容。该书将晚清上海经济史划分为三个阶段：1843—1864年为中西经济体系的初步整合阶段。在这一时期，近代航运业和房地产业创立并获得发展，贸易中心由广州转移到上海，近代金融业、工业以及城市零售业兴起，经济制度、法规及城市建设和管理制度发生突变。另外，还研究了上海商人群体结构的变化，如外商在上海经济生活中占据垄断地位，买办成为上海各种商务活动中的活跃因素等。1865—1894年间上海近代城市经济进入相对稳定发展和初步繁荣阶段。上海与长江流域沿岸城市之间的航运与贸易的直接贯通，将长江流域经济与海外贸易联为一体，巩固了上海作为中国贸易、交通中心的地位。这一时期太古轮船公司的创建和汇丰银行的进驻，意味着上海金融中心地位得以确立。这一时期兴起的洋务企业已成为上海经济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1895—1911年间上海经济跨入大工业时代，上海由商务性的金融中心向介入国家财政金融的方向转化。经历上述三个阶段的转化，上海城市经济已经被纳入到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上海则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国际化城市。

周武、吴桂龙所著《上海通史·第5卷（晚清社会）》叙述上海开埠到辛亥革命近70年上海的社会变迁。前二章为纵向研究，意在揭示晚清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社会演变的特殊轨迹。认为以港兴市、五方杂处、商业性，构成开埠前上海社会的三大特征，造就上海社会开放、兼容的内在属性。19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上海社会变迁的关键时期，小刀会起义、太平天国战事所引起的社会变迁，直接推动上海由一个中国传统的小县城转变为国际大都市。其影响表现为：由华洋分居到华洋杂处、城市发展重心由旧城厢北移租界、客籍移民由闽广商民转为江浙人居多的局面、城市空间大幅度拓展，以及城厢和租界边缘出现众多新市镇。后面六章为横向研究，选取上海社会几个具有全局性的问题加以研究，如市政建设、外侨生活、市民生态、市民心态、自治运动、都市习俗等。市政建设方面介绍了工部局的市政建设与管理成功在于“以法治路”，还探讨了法租界公董局和华界的市政建设，论述了“一市三政”给上海市政造成局部有序、全局无序等负面影响。关于外侨生活，论述了外侨中领事、海关外籍关员、外商、传教士等几类外侨在上海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地位，分析上海外侨的社会心理，认为其表现在于文化上的优越感，进行所谓“炫耀式的消费”，形成封闭的外来小社会。还考察了外侨的娱乐生活，认为外侨的娱乐生活使得上海租界率先形成了现代都市生活形态。

关于市民生态，该书认为买办、资本家、工人、苦力构成晚清上海四大市民群体，并还原了他们的休闲生活。考察了行会、帮会等传统社会组织系统结构与功能所产生的适应性变化，介绍上海的茶馆、戏院、公园，指出烟馆、赌场、妓院的畸形繁荣是上海超常规快速商业化的代价。关于“市民心态”，是著指出城市经济转型、密集的信息辐射网络和租界示范效应共同促成了上海市民意识的萌发和滋长。上海以近代商业精神、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塑造着来自各地的移民。最终晚清上海人在这种高度商业化的社会环境中告别传统，完成了向近代市民的转变。

是著着重指出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是从租界社区开始的，而后逐渐推及整个华界社区。伴随社会经济的结构性变迁，上海社会阶层结构产生了空前的裂变与改组，传统的士农工商逐渐被新的社会阶层结构取代，买办、资本家、工人、苦力、游民构成晚清上海社会的基本社群。新式商人

在社群中处于核心地位，这也是晚清上海社会最显著的特征。该特征使晚清上海社会迥异于中国传统城市的发展模式。商业化是晚清上海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社会发展机制围绕商业设置，社会系统的结构配置在商业化进程中重新组合，市政建设、娱乐设施都有明显的商业化印记。传统“重义轻利”的价值观被近代功利价值观取代。上海的崛起是“速成”的，因而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如华洋关系、人口压力、苦力与游民阶层急剧膨胀、三界（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社会的不平衡发展等。是著概括晚清上海社会独特性：高度商业化、移民社会、市民社会（自治意识、法制意识、公共秩序意识）、病态社会（鸦片之都、中国第一赌城、东方花都）等。

潘君祥、王仰清等著《上海通史·第8卷（民国经济）》包括“引言”、“附录”和十章内容，第一章“‘大上海’经济地位的确立”论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多功能经济中心，以及上海近代经济的主要特点；第二至七章考察了民国时期上海的对外贸易、工业、金融、交通、邮电和城市基础设施、周边农村经济、房地产业等。第八至十章探讨了抗战全面爆发对上海经济的影响，及上海沦陷后实施的统制经济和抗战胜利后上海经济状况。

罗苏文、宋钻友所著《上海通史·第9卷（民国社会）》包括“引言”、“结束语”、“附录”和八章内容。考察了民国时期上海的都市化管理机制、社会财富的增长与分配、社会结构的变动、都市问题、人口结构、职业群体、都市生活、民间社团、婚姻家庭和都市女性、都市上海人身份认同、上海外侨等。涵盖了民国上海都市社会的多面向。以下就该书的部分观点稍作介绍。

该书论及民国时期上海三大新生社会群体：即中产阶层、工厂无产阶级、都市贫民。该书指出中产阶层的主体是资本家和中、高级职员，这是个不断变动的多层次组合群体，在经济组织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海都相应有个吐故纳新的资本家集团。上海的工厂无产阶级由于技能低，加之有庞大的都市贫民为后备军，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劳资矛盾尖锐，直至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20世纪20年代后期有一定缓解，逐渐从对抗走向对话。民国时期，上海的都市消费文化迅速生成，有商业性、多元性、大众性和社区差别的特点。都市小家庭结构的主体地位确立，使原有的经营功能淡化，女性从单一的主妇角色转向兼有职业妇女的双重身份。都市民间社团呈现新旧交织、共存的局面。同乡会、帮会被不同程度地时代化，新社团的出现意味着张扬个性、崇尚自治成为居民社交生活的基调。是著将民国时期上海社团的主要特点归纳为：1.涉及面广，规模可观，以同乡会、同业公会、文化社团为三大类别；2.社团组织形式新盛旧衰，表现为自治、自养、民主管理的特点；3.社团在推进行业的职业化发展、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民国时期是上海人自我认同的重要阶段，上海话是移民参与创造的杰作。在沪外侨引入了追随世界一流都市的发展框架，使上海成为中国融入世界潮流的先行区。

综观《上海通史》中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比较系统成熟，从中也可看出经过改革开放后二十年学界在上海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进展，尤其是租界社会、市民生活、社团组织、市民运动、市民心态、社会分层、市民群体、上海外侨等上海社会多层面、多侧面都有了系统和深入的研究。

2. 经济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有关近代上海经济史的著作相继出版。

张忠民所著《上海：从开发走向开放（1368—1842）》（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翔实地研究了鸦片战争前的上海史。特别提出了在鸦片战争前夕，上海不仅“是江南地区最重要的贸易海口，而且业已成为整个长江流域广大腹地的门户，南北洋沿海贸易以及沿海、腹地贸易的唯一枢纽和汇聚中心”。张忠民的另一部著作《经济历史成长（1842—1978）》（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是专题研究上海经济史的力作，在上海的区位优势与上海经济发展的关系、内外贸易对上海近代经济的推动以及上海近代经济中心地位的确立方面都有较为系统的阐述。

丁日初主编的两卷《上海近代经济史》（第1卷1994年版，第2卷1997年版），第一卷研究了上海开埠至1894年的上海经济发展情况，编者注意到对外贸易在上海近代经济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前言”指出“以往历史著作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大都从民族资本现代工业的出现算起，往往无视后发展国家的对外贸易、商业在由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西方的先发展国家经过产业革命形成世界市场以后，东方的后发展国家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总是先经过对外贸易同世界市场联系起来，进而导致外贸行业以及为对外贸易融通资金的钱庄业逐步资本主义化，或者商业促使某些手工业小商品生产终于发展为剩余价值生产”。^①基于这样的认识，该书考察了开埠初期的上海对外贸易、与外贸直接相关的买办、洋行，以及为外贸服务的金融、航运、保险、船舶修造、商业等行业。第二卷考察了1895—1927年外国资本工业的扩展、对外贸易和外贸机构的变化，还研究了外资银行、华资银行、钱庄业等金融业方面的情况，在港口、交通、市政建设、农业、手工业等方面也有翔实论述。此外，还就上海经济发展的社会影响及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等社会阶层的组织和社会政治参与进行了评析。该书系统而扎实，是近代上海经济史研究的一部力作。

戴鞍钢的《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1843—1913）》（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深入剖析了上海港与城市发展和长江流域腹地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著包括“导言”、“结束语”、“附录”和五章内容。第一章考察开埠前上海与内地的经济关系；第二章分析了开埠后上海的区位优势和上海港的开发及内外贸易情况；第三章围绕“以港兴市”、“因港促工”、“依港扩城”论述上海港与上海作为经济中心城市崛起之间的关系；第四章从“城镇格局”、“产业布局”、“社会生活”等方面梳理上海与长三角之间经济社会的互动关系；第五章着重研

^① 丁日初主编、沈祖炜副主编：《上海经济史：第一卷（1843—1894）〈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究上海与长江流域的市场网络。是著从一个全新的视角研究近代上海的崛起，系统考察近代上海发展的动因和路径，凸显了近代上海在长三角和长江流域市场网络中的枢纽和中心地位。

吴景平等著《抗战时期的上海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研究了抗战初期上海工业的内迁、抗战时期上海的工业、商业、交通、公用事业，重点考察了抗战时期上海的银行、钱庄、外汇、证券、保险，以及国民政府与日伪的金融战。该书关注国民政府和日伪在上海力量消长对于上海经济的影响，并且以专题的形式进行研究，论述较为系统深入。

樊卫国的《激活与生长：上海现代经济兴起之若干分析（1870—194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以其“激活—生长”学说考察上海早期现代市场经济发生、运作形态和发展过程。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中有“市场经济”的存在，在近代西方外力的作用下“激活”，并被赋予新的属性。是著研究了明清经济内向化倾向、上海口岸经济“半边缘”形态、过度商业化对工业化的制约、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等问题，并探讨了“海派社会”与上海经济社会变迁的关系。是著是一部将经济学与历史学结合较好的经济史著作。

此外有关上海航运、金融、保险、贸易、工业、商业等专门经济史亦有大量资料集、译著、论著和博士论文，在此不一一列举。

3. 综合性的社会史研究

1988年至2012年，上海地方志办公室连续编辑第1—21辑《上海研究论丛》，社会经济史在其中占了相当的分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时期上海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动态和研究水平。

如第一辑（1988）中陈扬的《美国的“上海通”》介绍美国学者研究上海的一些论著；卢汉超的《大洋彼岸论上海》介绍美国学者魏菲德、高家龙、裴宜理、韩起澜的上海史研究。第二辑（1989）有丁日初、唐振常、陈绛、夏东元等关于上海近代化的文章。苏智良、陈蒙的《近代上海帮会繁盛原因初探》从城市发展和人口结构、上海社会状况、近代政治斗争、帮会自身演变等角度考察近代上海帮会，认为上海帮会繁盛的原因主

要在于中国自然经济体系和社会系统的分解过程中社会失序，各阶层将帮会作为生存发展的依赖，加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况下，中外反动势力共同利用和抬举帮会，使得帮会能在上海得以立足和发展。该书有“上海租界研究”专栏，其中熊月之的《上海租界与上海社会思想变迁》考察了近代租界的文化效应及对上海社会思想变迁的影响。

第三辑（1989）名为《上海：通往世界之桥》，分“上海与西方”、“市政警察帮会”、“近代工业的演变”、“资产阶级的活动”、“金融市场的拓展”等五个专题。每个专题有一位专家对本专题的文章进行点评。文章选录有中、美、法、日、澳等国学者的文章，有国际化的特点，从中可以了解到同一研究领域不同风格的研究特点，颇与书名相应和。“上海与西方”有三篇文章，熊月之的《1843—1898：上海与西学传播》系统考察了上海的译书机构、译书的种类、数量及对中国学者的影响，并分析上海成为西学传播中心的原因，积极评价了传教士在西学传播中的作用。美国学者孔如轲所著《西方列强与二十年代上海民族革命时期的“上海问题”》主要评论20世纪20年代五卅运动与国民革命所激发的民族主义对上海列强政治特权和商业利益的影响。文章以论述见长，精辟地道出在民族主义风起云涌的20年代，在上海列强的力量及其在华特权的消长。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学的弱项往往在于跨文化理解方面容易产生歧义或史实不清，如唐振常在评论中所说，孔如轲将教会学校说成传道机构不妥，以上海的外侨居留地不似广州从郊外发展起来的说法也不确切。譙枢铭的《进入上海租界的日本人》考证开埠后最早到达上海的日本人及近代日本人在上海的经营和生活状况，资料相当翔实。苏智良的《试论上海帮会的发展及其特点》简要叙述上海帮会的源流，总结了上海帮会的特点。澳大利亚学者马丁的《“同魔鬼签订的合同”：1925—1935年的青帮同法租界当局之间的关系》论述了十年间法租界当局与青帮之间互相利用与制约的关系。郑祖安的《1927—1930年上海市政府的市政新措施》主要论述上海特别市的设置、市政府的组织、结构、官员选用，以及各项建设的开展推动了上海城市近代化的进程。“近代工业的演化”有黄汉民、陈正书和美国学者高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家龙等人的文章。“资产阶级的活动”部分有潘君祥、徐雪筠、徐鼎新研究上海资产阶级的文章，还有美国学者李达文的《上海资本家的啦啦队（上海总商会月刊塑造的中国资本家形象）》。李达文的文章指出《上海总商会月报》在20年代与30年代的论调明显不同，20年代为资本家和自由资本主义辩护，到30年代则默认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支配地位，并从国际、国内背景及社会思潮入手分析其原因，文章对于《月报》内容的复杂性及主要倾向有细致的评论。“金融市场的拓展”中白吉尔的《上海银行公会（1915—1927）——现代化与地方团体的组织制度》一文通过对于上海银行公会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传统的社会组织会为新的社会团体建立提供方便而不是设置障碍；很难认定新社团是传统组织的扩展，因为新组织需要其领导具有新观念和与传统教育不同的新式教育；新社团不能代替旧的社团，两者可以共存合作；国家政权仍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决定因素。白吉尔的这一观点目前已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

第四辑（1989）有一些海外学者的上海社会史文章，如韩起澜的《论对上海的苏北人的偏见》、顾德曼的《新文化，旧习俗：同乡组织与五四运动》、叶文心的《从〈生活周刊〉看三十年代的上海小市民》等。叶文心的文章透过对《生活周刊》的研究，得出30年代上海中下层市民开始对民族问题的思考达到某种程度的政治自觉。本辑的“关于上海研究”关注上海史研究的一些理论问题，有探讨方志与城市史的研究、上海研究与区域史研究。其中张仲礼等的《上海史研究的首次国际学术盛会——近代上海城市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对1988年9月上海社会科学院与美国相关学术机构举办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做了概要介绍。

第5—11辑也有大量关于上海社会经济史的文章，第八辑中张济顺、朱弘的《纪念上海建城七百周年城市研究与上海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概述了1991年10月召开的“城市研究与上海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主要成果，分析了上海城市史、社会史研究的趋向，对上海的基层社会组织 and 市民生活形态、近代上海的黑社会与病态社会、上海的移民和外侨

等几个社会史研究热点作了研究综述。第九辑涉及社会史研究的有两个专栏，“社会史研究”、“公共团体与公共社会”。主要集中于社会阶层、社会群体的研究，反映了当时上海社会史研究热点。第十辑（1995年）有吴义的望族研究、苏智良的慰安妇制度研究、谯枢铭等人的外侨研究，可见慰安妇制度、外侨研究开始成为国内学者关注的重要社会史课题。第十一辑（1997年）有陈三井研究上海商人的经营理念、张化考察宗教与上海社会近代化的互动关系、忻平探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人的社会人格等文章。

至21世纪，上海史研究成果的展示平台增多，《上海研究论丛》的功能似乎有所下降。在内容上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人物、社会、回忆录、资料等部分，其中研究综述和资料整理是最近几年《上海研究论丛》的亮点。

总体来看，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研究论丛》确实起到为上海研究开辟一块园地的功能，正符合创办者的初衷。特别是将国外的上海社会经济史研究成果介绍过来，推动了中外上海史研究的交流。如韩起澜的上海苏北人研究、顾德曼的上海同乡会研究、马丁的上海青帮研究、贺萧的上海娼妓研究、魏菲德的上海警察研究，通过这一平台渐渐为国内学界所了解。而他们的著作直到数年之后才开始被翻译过来。此外，国内上海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汇聚于《上海研究论丛》，成为观察上海史学术动态的重要窗口，从中可以感触到当时上海史研究的热点，了解上海史研究的发展趋向。

有些著作，虽非社会经济史专著，但包含很多社会经济史内容。如吴贵芳的《淞故漫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涉及上海历史上的一些人物、掌故，多属社会史、文化史的范畴。书分上下两编，上编是古代上海史的内容，下编主要涉及上海近现代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如“上海外交史话第一页”、“文存物在看初期租界”、“美国租界的分界碑”、“会审公廨”等租界史的内容；“开埠前后的黄浦港”、“清季上海的饮食物价”、“上海服饰变迁”、“《海上花列传》的写实妓家”、“十里洋场的初现”、“百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年烟毒遍乡里”、“十里洋场烟赌娼的历史考察”等社会生活史；“最早的白话新闻报”、“上海旧校场年画”、“为近代弹词理绪”等文化史内容。还有一些上海的中外人物研究，如“白菜尼蒙·马浪与法租界”、“工部局乐团的第一位华人演奏员”等。该书所录虽然是些散文笔调的短文，由于体例的关系，不够系统，但注重史料的排比，内容严谨，能够突出近代上海社会的一些点。如“《海上花列传》的写实妓家”一文注意到《海上花列传》的史料价值，依照这本小说的记述重构了租界卖淫业的规制，以及与之相伴生的各业关系，对相关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李天纲的《文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是一部论文集，分“市民社会”、“华界洋场”、“文化寻根”、“重建自信”四部分。在“市民社会”部分，“‘海派’——近代市民文化之滥觞”考察了海派文化的源流、海派内涵，将海派文化定义为“中国形态的近代城市大众俗文化”；^①“近代上海文化与‘市民意识’”探讨海派文化中的市民意识，以及舆论发达、信息集中的市民社会特点；“1927：市民自治运动终结”指出1927年是上海社会生活的一个大转折，市民自治运动走到终点。第二部分“华界洋场”考察了华洋分居到华洋杂居的过程，认为商业原则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考察了早期西侨的娱乐机构，如跑马厅、上海总会等；回顾了上海犹太难民的生活；“帮会与上海社会”论述了上海帮会势力的发展特点及组织形式的变迁。“文化寻根”部分有“路名掌故”介绍南京东路、外滩、广东路、南昌路的由来。“市民风俗”介绍上海的俚语、旧上海的服饰穿着。李天纲的另一著作《人文上海——市民的空间》（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从“市民文化”和“社区生活”的角度探讨上海市民生活的空间和性质，力图说明“上海曾经有过一个不错的市民社会和公共空间”。^②

此外，还有一些论文集收录了大量上海社会史方面的文章，如熊月

^① 李天纲：《文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9页。

^② 李欧梵：《人文上海〈序〉》，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之、高纲博文主编的《透视老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高纲博文在序中介绍了日本上海史研究会的上海史研究成果及日本学者研究上海史的主要关注点，即都市的结构、行政、领导阶层，都市社会多样的网络以及他们与国家权力的关系。该书是2002年上海社会科学院与日本上海史研究会共同发起主办的“上海史青年学者国际研讨会”的论文集，包括社会解析、文化视点、生活场景等三部分。

在“社会解析”部分，马学强的《论上海成长中的“江南因素”》论述了在上海的成长中，江南区域中心由苏杭转移到上海，江南的劳动力、资金、物产被组合到上海，推动了上海的发展，江南文化中的讲技巧、重知识、重商传统被近代上海文化吸收，成为上海成长中“江南因素”。方平的《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中的预备立宪公会》以预备立宪公会为例探讨清末国家与社会关系失范导致了长期的社会动荡。陶水木的《北洋政府时期上海的慈善组织与慈善事业》考察了北洋政府时期上海慈善组织的概况、经费来源、发展的原因，资料翔实。高红霞的《城市化中的上海闽商——整体的衰弱与泉漳会馆的活力》揭示泉漳会馆一枝独秀的原因在于其直接涉足商业活动，适应商业城市发展的需要，认为其兼有同业公会和同乡会的某些功能。张秀莉的《近代上海钱庄信用特点探析（1843—1936）》考察了钱庄的信用特征及其长期存在的原因。赵兰亮的《近代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述略——以结构和功能为中心》考察了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的组织体系演变、公会与政府在税率问题上的博弈、公会的公共服务功能，以及与外商上海火险公会在业务方面的磋商和代位管理等。日本学者佐佐木清美的《近代上海人力车行业结构——以20世纪20—30年代公共租界为例》、廖大伟的《华界陆上公交的发展与城市现代化（1927—1937）》探讨了二三十年代上海华界陆上公交的发展、市民观念和行政管理的转变。马军的《从“舞潮案”看战后上海市社会局的处境和职能》揭示了“舞潮案”爆发的深层原因。

“文化视点”部分，周武的《文化市场与上海出版业（1912—1921）》以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的竞争为中心探讨了出版业与文化市场的关系。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日本学者铃木将久的《上海都市大众文化与民族形式》论述了上海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在不同时期的理解，考察其在不同时期语境中的变迁。张剑的《学术与工商的聚合疏离——中国数学会在上海》以中国数学会在上海的创建与活动，而最终在学术上一无所获为例，揭示学术与工商疏离的深层根源。

“生活场景”部分，石磊的《近代上海服饰变迁及其动因分析》介绍了近代上海服饰变迁的轨迹，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分析其原因，总结服饰变迁背后的观念进步。郭奇正的《上海里弄住宅的社会生产——城市菁英及中产阶级之城郊宅地的形成》为上海租界时期的城郊花园住宅、里弄等建筑赋予社会意义，考察了城郊空间商品化与中产阶级的关系。日本学者岩间一弘的《1940年前后上海职员阶层的生活——近代中国都市的新中间层初探》和石川照子的《中日两国的YWCA及其相互交流——城市中层妇女的社会活动与基督教》分别研究了旧上海的职员生活、信仰状况。

还有一些记录轶闻掌故的著作涉及上海社会史内容，如《上海掌故》（上海文化出版社，1982年）收录有关上海地方轶事的文章16篇，侧重于上海名胜遗迹的介绍，如杨宽的《博物馆琐忆》、刘兆荣的《黄楚九办大世界》、陈从周的《松江县清真寺》、吴贵芳的《文惠廉与美租界》、郑逸梅的《新舞台和潘月樵》等。也有关于戏剧的回顾，如周柏春的《独脚戏在上海的由来和发展》、汤伟康的《新剧·文明戏·话剧》等，亦有个人经历，如胡道静的《我读书在上海的图书馆里》，胡所说的是当时上海最大的图书馆——东方图书馆，后毁于日军的炮火。该书主要为个人见闻、口述史料。

薛理勇的《上海滩地名掌故》（同济大学出版社，1994年）以历史上或今天还在沿用的上海地名、路名为主线，介绍与之相关的会馆公所、寺庙道观、宗祠家庙、氏族迁移、衙署兵防、河道变迁、商业活动、公益设施、轶闻趣事等，从中可以窥见上海的社会变迁。书后还附录了《上海旧新路名对照表》、《上海市区俗地名表》。该书资料扎实，可作为参考书和

工具书用。薛理勇还曾出版《上海地名路名拾趣》(上海书店,1990年)。

薛理勇的《闲话上海》(上海书店,1996年)分“掌故篇”、“经济篇”、“文化篇”、“语言篇”、“建筑篇”、“地名篇”、“风俗篇”、“物产篇”等。涉及上海社会的方方面面。其另一著作《上海老城厢史话》(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主要考察了上海旧城区的一些遗迹,涉及城墙、寺庙、衙门、学堂、楼宇、牌坊、饭店、公所会馆、车站、码头、塑像等。

老照片中的社会史研究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关注。罗苏文的《沪滨闲影》(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以图文并茂的形式重建了旧上海的娱乐业场景,总会、俱乐部、公园、电影院、运动场、报纸杂志、小说、戏曲舞台,以及其中的人事都在展示、叙述之列。郑祖安编的《老上海:十字街头》(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和秦风编著的《梦回沪江》(文汇出版社,2005年)都是上海老照片的集子,是图片中的上海社会史。

上述为综论性的上海社会史。由于近代上海社会包罗甚广,且其变动转型较为剧烈,上海社会史学者更善于就其中某一方面进行深入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社会史研究主要的关注点是城市近代化、租界社会、帮会及赌毒娼等社会问题;以及会馆公所、同乡会、商会等社会组织、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社会运动、社会生活、外侨、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等,随着文化社会史方兴未艾,报纸、杂志、戏曲、电影等与社会的互动研究也成研究热点。以下分别概述。

四、城市史和市镇史研究

张仲礼主编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分四部分:总论、经济篇、政治社会篇、文化篇。“总论”探讨了研究对象、上海自然地理与古代历史沿革、近代上海城市发展的阶段与关节点、城市发展规律初探、近代上海城市特点、若干理论问题。“总论”部分将上海城市发展规律总结为:由商而兴的城市发展道路;保持城市内部的安定环境;坚持走开放的路。并将上海城市特点归纳为:典型的近代崛起城市,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受西方影响最大的城市，中国近代化起步最早、程度最高的城市，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最大的多功能经济中心城市，全国文化中心，移民城市，富有反帝反封建传统，畸形发展城市等。“若干理论问题”部分探讨了传统与近代化关系、租界与华界关系、上海与外国关系、殖民主义者动机与效果关系、上海与内地关系等。上述理论问题是上海史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对其进行探讨有利于上海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关于传统与近代化的关系，该书认为传统包含多元性、时代性，其与近代化的关系可以分为四种情况：基本适应、经过改造可以适应、基本不适应、需要具体分析。关于租界与华界关系，该书认为两者互相联系、互相影响，早期租界依傍华界，繁荣以后的租界侵蚀华界也带动和刺激华界。关于上海与外国的关系，该书指出西方资本主义促进了上海的近代化，但上海也同样为西方与各国的繁荣作出了贡献。就殖民主义动机与效果来说，该书认为殖民主义带动上海的发展，充当了历史进步不自觉的工具。从上海与内地的关系看，双方是双向的、互利的。

该书编订一方面线索清楚，分四篇，每一篇均有提纲挈领的简论概括本篇的要旨。另一方面，每篇之间也有交叉渗透，如经济篇的会馆、公所、商会、劳资关系的研究，体现出社会经济史相依存的特点，政治社会篇既论社会阶层的形成，也论及各阶层的政治趋向，文化篇则包含近代上海知识分子群体和市民意识的论述。在城市史的框架中体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有机联系。是著大体上反映了改革开放后十余年间上海史的研究成果和所达到的水平，亦是上海城市史的开创性研究。

随着对上海城市史研究的深入，更为具体的上海城区史研究方兴未艾，苏智良主编的两册《上海城区史》（学林出版社，2011年）是一部对城区史进行理论阐释和对上海城区史进行系统研究的力作。该书认为上海城区可划分为如下类型：外滩办公区、高级住宅区、商业娱乐区、工业区、棚户区、传统城区、其他类型区等。编者选取了城隍庙、十六铺、外滩、江湾、闸北、淮海路、静安寺、徐家汇、提篮桥、小沙渡、八仙桥、曹家渡、高昌庙、浦东、杨树浦、吴淞等16个城市空间，考察各空间的

变迁、功能、特点和历史细节，重构上海城市的历史演变。如梳理了自明代城隍庙城区的出现、扩大及至清代成为县城经济中心的历程，还分析了城隍庙作为公共空间的多重功能，是具有信仰空间、岁时活动空间、商业空间、文人雅集空间、休闲娱乐空间等多样性的公共空间。是著对于上海城区史研究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

“作为农村之首，城市之尾”，市镇社会经济研究是区域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吴仁安的《明清上海地区城镇的勃兴及其盛衰存废变迁》（1992）一文总结了明清时期上海地区城镇的几种来历，并认为明清时期上海的勃兴说明了这样一个论断：“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①安涛的《中心与边缘：明清以来江南市镇经济社会转型研究——以金山县市镇为中心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对一个长时段的县域市镇进行研究，考察不同层面区域中心与边缘的变迁过程，如较大的江南区域中心、中观的上海区域中心和微观的金山县在16—20世纪这样长时段中都存在区域中心与边缘的变动。从中可以管窥区域中心的影响和辐射是有选择性和层次性的。而就金山县的朱泾镇而言，近代以来，其传统的区域中心地位逐步边缘化、转型滞后，是传统市镇近代转型的一种类型，也可见上海作为经济中心扩张力的局限性。是著除“绪论”外，有五章内容。第一章考察了从成陆到明清时期金山的发展概况，金山为上海早期的发展中心，明清时期形成以朱泾镇为中心的市镇网络；第二章研究明清时期朱泾与苏州、松江等区域经济中心建立起多元互动的运行机制，这一时期朱泾完成市镇经济转型，成为金山县域的中心市镇；第三章论述了近代以来朱泾未能适应江南区域经济中心由苏州转移至上海的变化，未能与上海建立“互动互进的经济关系”，从而导致了朱泾的衰落；第四章探讨了朱泾镇在近代转型方面的尝试，但由于其市镇功能的弱化和新的经济增长极的局限，导致转型滞后；第五章结合朱泾镇的

^① 吴仁安：《明清上海地区城镇的勃兴及其盛衰存废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3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发展变迁，指出市镇社会转型存在着多重内外制约因素，其关键因素在于能否与区域中心建立有效顺畅的经济社会互动机制。

五、租界社会与社会治理研究

关于上海租界的研究，早期有蒯世勋的《上海公共租界史稿》，梅朋、傅立德的《上海法租界史》，熊月之主编的《上海通史》中的《晚清政治》卷（熊月之、袁燮铭著）、《晚清社会》卷（周武、吴桂龙著）也有相当的篇幅论及上海租界。较早的租界社会史研究专著有台湾学者吴圳义所著《清末的上海租界社会》（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8年），书分四章：“上海租界的人口、政治、司法、经济”、“洋人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华人社会结构”、“华人的社会生活”。该书论及租界的华人生活时，指出租界华人家庭小型化，除买办华商外，其他的华人生活比较贫困，租界华人的消遣活动主要是茶楼、赌场、烟馆、妓院，华人的社团主要是会馆公所，虽同在租界，但与洋人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迥然有别。

20世纪80年代上海的一些学者开始尝试重新评价租界的性质和历史作用，如陈旭麓、姜义华、朱华等学者撰文讨论租界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近代史研究等问题之间的关系问题，认为研究租界问题可以加深对半殖民地问题的认识，推动和深化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①这一时期对于上海租界的具体研究表现出初步研究的特征，主要是对于租界的形成、兴衰过程进行较为宏观的论述，^②80年代的租界研究延续了长期以来对政治史、革命史的关注，如对于上海租界与太平天国运动、小刀会起义等晚

^① 朱华：《简论上海租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解放日报》1986年7月2日）、陈旭麓：《近代中国和上海租界解析》（《社会科学报》1988年8月18日）、姜义华：《租界与近代史研究的总体架构》（《社会科学》1988年第9期）。

^② 季维龙：《上海租界的始末》（《历史教学问题》1987年第5期）、郑祖安：《上海租界兴亡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8年第4期）、张铨：《上海租界浅析》（《史林》1988年第4期）、加藤佑三：《上海租界的形成》（《史林》1989年第1期）、季平子：《租界的起源和上海公共租界的形成》（《史林》1991年第2期）。

清革命的关系，租界当局对“五四”运动的态度，以及五卅运动对上海租界的影响等。^①

对于上海租界与晚清革命的关系，熊月之认为租界充当了历史进步不自觉的工具，对于晚清革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②熊月之还深入分析了上海租界的双重作用，将其概括为：耻辱标志与文明窗口，“国中之国”与进步活动中心，经济掠夺基地与全国经济中心，文化渗透与西学传播，风气的腐败与清新。并分析了长期以来学界避谈租界积极影响的原因。^③应该说熊月之的上述概括基本反映了80年代学界对于上海租界性质和作用的认识。此外，马长林对租界征税的交涉中清政府争夺租界管辖权的努力进行了考察，指出在批判清政府出卖主权的同时，不要忽视其对列强抗争的一面。^④十多年后马长林还发表了有关国民政府与租界当局争夺租界内工厂检查权的文章。^⑤上述研究表明无论晚清还是民国，中国政府并非一味地对列强妥协，它们也在试图抗争，挽回利权。这与80年代对租界双重作用的认识是一脉相承的。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上海租界研究有一个逐步从宏观向中观、微观，从政治史研究向社会史研究的转变。熊月之的租界文化效应研究，^⑥ 谯枢铭的上海租界日侨研究等，^⑦对于后来的上海租界研究应有一定的引领作用。

① 熊月之：《论上海租界与晚清革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5年第3期）、郭豫明：《上海租界与小刀会起义》（《学术月刊》1988年第3期）、郑祖安：《五卅运动和上海租界统治的动摇》（《史林》1986年第1期）、邵雍：《上海租界当局与五四运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② 熊月之：《论上海租界与晚清革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5年第3期。

③ 熊月之：《论上海租界的双重影响》，《史林》1987年第3期。

④ 马长林：《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上海租界征税之争》，《学术月刊》1987年第5期。

⑤ 马长林：《上海租界内工厂检查权的争夺——20世纪30年代一场旷日持久的交涉》，《学术月刊》2002年第5期。

⑥ 熊月之：《论上海租界的文化效应》（《江海学刊》1988年第6期）、《上海租界与文化融合》（《学术月刊》2002年第5期）；关于租界文化研究的文章还有张元隆：《上海租界与晚清西学输入》（《上海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梁伟峰：《论上海租界与租界文化》（《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⑦ 谯枢铭：《早期进入上海租界的日本人》，《史林》1989年第1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1988年在上海召开的“租界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会进一步推动了对上海租界的研究。特别是对于租界性质、作用两分法的评价，并且开始关注上海外侨的研究、租界与上海城市近代化的关系研究等，为后来的上海租界研究确立了基调，直接影响了后来租界研究的学术方向。2001年上海档案馆主办的“租界与近代上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结集为《租界里的上海》分“租界与经济”、“租界与文化”、“租界与社会”、“租界对外关系”、“租界机构与管理”等五个部分，涵盖了对上海租界的多面向研究。^①从中也可以了解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上海租界研究的一些特点，学界开始大量运用档案资料进行文化社会史、社会生活史、制度史研究。

租界的人口及移民研究是租界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点。谯枢铭考察了日本人进入租界并发展出日本人社区。^②高纲博文的《“我的故乡·上海”的诞生——有关上海日本人归国者怀乡情结的考察》一文分析了日本人居留上海的三个时期及其组成结构，从一些曾经居留上海的日本人的回忆、小说探讨他们的怀乡情结。^③外侨研究，后面会有专节论述，此不赘述。

在租界人口和国内移民研究方面，张景岳探讨了1845—1941年间，近代上海经济发展与租界人口的变动关系，认为经济因素是租界人口变迁最主要的制约因素。^④王标考察了民国初年上海租界中的逊清移民们所构筑的地理空间和心理认知空间。^⑤郑祖安肯定了在淞沪抗战期间租界大量收容中国难民，使得70万中国难民的生命得以保全。^⑥周鹤论及避居租界的华商、士人，以及中西文化的交融等。^⑦章银杰、李峰分析了上海租界的“孤岛”、“蓄水池”等移民效应对上海的影响。^⑧

① 马长林主编：《租界里的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② 谯枢铭：《早期进入上海租界的日本人》，《史林》1989年第1期。

③ 参见马长林主编：《租界里的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④ 张景岳：《上海租界的人口与经济变迁》，《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⑤ 王标：《空间的想象和经验——民初上海租界的逊清移民》，《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⑥ 郑祖安：《八一三事变中的租界与中国难民》，《史林》2002年第4期。

⑦ 周鹤：《上海租界华洋杂居形成的社会背景分析》，《东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⑧ 章银杰、李峰：《上海租界移民功能略析》，《安阳工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租界社会的风尚、伦理、娱乐等社会生活也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学界长期关注的一个研究重心。李长莉认为 19 世纪中叶上海租界下层社会的民间伦理与近代化的关系应置于社会综合变动的视野中考察，既不能仅从儒家正统的伦理入手，亦不能仅局限于从经济伦理角度去分析其与近代化相悖的因素，因为在中国的民间伦理中一向含有重商、趋商的因素。^①罗苏文探讨了晚清上海公共租界公共娱乐区的形成及其对城市生活的影响，认为其已成为上海城市化的一个重要动力。^②韩公民考察了上海租界的纪念碑、雕像等，指出这些公共设施在殖民者的共同体认同和殖民主义政治象征方面体现出其公共功能和公共性。^③

有些中外学者关注租界的社会问题研究，如苏智良通过解析黄金荣现象，分析上海的黑社会势力与租界当局的结合，既是上海畸形社会的反映，也可视为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社会秩序的一个缩影。^④法国学者安克强考察了上海租界的公共卫生政策与租界的性病、卖淫，以及基督教团体的废娼运动。^⑤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学界对于越界筑路、租界扩张、建设，以及公共管理都有详实的研究。^⑥章银杰、金雪妹从租界开发、越界筑路、华界自治等方面考察租界与上海城市崛起的关系。^⑦牟振宇运用历史地理学

① 李长莉：《十九世纪中叶上海租界社会风尚与民间社会伦理》，《学术月刊》1995 年第 3 期。

② 罗苏文：《晚清上海租界的公共娱乐区（1860—1872）》，《档案与史学》2002 年第 1 期。

③ 韩公民：《纪念与象征中的公共性——解读上海租界纪念碑、雕像的公共功能与意涵》，《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2 年第 5 期。

④ 苏智良：《黄金荣与法租界——租界与中国黑社会关系的典型事例》，马长林主编：《租界里的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年版。

⑤ [法]安克强：《公共卫生政策与殖民主义放任政策的对立——上海租界的性病与卖淫》（马长林主编：《租界里的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年版）、《权力与道德：1920—1925 年上海的废娼运动》（天津市城市研究会、天津市社会科学院编：《城市史研究》第 19—20 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0 年版）。

⑥ 张伟：《简论上海租界的越界筑路》（《学术月刊》2000 年第 8 期）、《近代上海租界房地产开发略述》（《文史杂志》2004 年第 2 期）；曹发军、赵媛媛：《晚清上海租界扩界的历史考察》，《中州大学学报》2008 年第 1 期。

⑦ 章银杰、金雪妹：《略论上海租界的城市化效应》，《邢台学院学报》2006 年第 1 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和地理信息系统 GIS 的空间分析方法，复原了上海法租界地区从圩田农业形态向城区转变的具体形成过程和空间扩展过程，剖析了这一过程的实现路径和驱动机制。比如租界扩张和建设过程中的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水环境的治理等。^①租界的公共管理也是一个研究热点。如马长林、马陵合、佐佐木清美等探讨了租界当局对人力车的管理，以及人力车夫的生存状况。马长林考察了租界内小车夫的抗捐活动；马陵合揭示在城市化过程中下层民众的边缘特性，人力车即是低水平城市化的一个标尺；日本学者佐佐木清美认为公共租界限发人力车执照造成了人力车行业各阶层的形成。^②樊果研究了公共租界工部局对于水费监管的方式和手段，认为工部局在保障社会福利等方面有所作为，但在促进市场竞争方面还显薄弱。^③陈文彬研究了租界的公共交通专营制度。^④石磊的《工部局鸦片管理政策转变及其背景分析》一文从舆论压力的道德层面、鸦片在英国对华贸易中地位下降等经济层面揭示 1908 年工部局的禁烟议案分时间段禁烟，以及没有采取相关措施惩罚吸食鸦片者的原因。^⑤法国学者安克强探讨了租界公墓的建立、管理情况，从一个比较独特的视角探究殖民主义管理体制在上海的运作，以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等级。^⑥

租界的法律制度和警察制度是近年上海租界研究的一个重心。仇雪

① 牟振宇：《近代上海法租界城市化空间过程研究（1849—1930）》（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开埠初期上海租界的水环境治理》（《安徽史学》2010年第2期）、《近代上海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方式转变过程研究——基于GIS的近代上海法租界个案研究（1898—1914）》（《复旦学报》2010年第4期）。

② 马陵合：《人力车：近代城市化的一个标尺——以上海公共租界为考察点》（《学术月刊》2003年第11期）、[日]佐佐木清美：《近代上海人力车行业结构——以20世纪20—30年代公共租界为例》（熊月之、高纲博文主编《透视老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马长林：《上海租界内的小车夫抗捐》（《中国档案》2008年第12期）。

③ 樊果：《近代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水费监管及特征分析》，《史林》2009年第5期。

④ 陈文彬：《近代上海租界公共交通专营制度述评》，《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⑤ 参见马长林主编：《租界里的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⑥ [法]安克强：《上海租界公墓研究（1844—1949）》，《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莲、梁玉国考察了上海租界的法律、教育制度等制度文化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示范作用。^①王立民分析了上海租界法制瑕疵与租界社会病态之间的关系。^②朱晓明对上海法租界警察的源起、组织机构、人事构成、社会管理和政治镇压的职能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论述。认为法租界的警察兼具政治镇压和社会管理的双重功能，不仅对中国现代政治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且对塑造上海城市空间和都市文化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③

除上述对于上海租界的专题研究之外，还有些关于上海租界的综合著述。如章红的《十里洋场：被出卖的上海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概述了租界的发展史。薛理勇的《旧上海租界史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介绍了旧上海租界的机构、建筑、遗迹等。中共上海市卢湾区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老话上海法租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介绍了法租界的领事、行政机构、金融、产业、公用事业、宗教、文化教育、娱乐、出版、闻人等历史掌故。

综观30多年的租界社会研究，一方面对租界的作用有了一分为二的评价，比较客观看待租界在上海城市近代化中的作用和影响，另一方面对于租界社会做了一些细部的研究，如租界人口、移民、娱乐、社会问题、社会管理、制度建设等，充实了上海社会经济史研究。另外，由于租界是上海许多城市特点形成的重要动因，在上海的近代化进程中具有示范和推动作用，租界社会研究在揭示晚清以来上海社会的特质和特点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从而引起国内外学者聚焦上海租界研究，成绩斐然，像熊月之、马长林等都是自80年代以来就从事上海租界研究的知名学者，熊月之对于租界文化的研究，马长林对于中国政府在租界声张利权的研究历久弥新。

① 仇雪莲、梁玉国：《十九世纪上海租界的法律、教育制度及其影响》，《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② 王立民：《上海租界的现代法制与现代社会》，《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③ 朱晓明：《上海法租界的警察（1910—1937）》，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六、社会阶层与社会运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社会群体研究

1. 社会阶层与社会运动

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内也有一些研究社会阶层和社会运动的论著，但多是放在政治史的框架里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阐释。海外学者受这方面的束缚较少，视角也相对新颖。

法国学者白吉尔的《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1994）虽以中国资产阶级为名，实际上主要以上海的企业家为例，该书关注的重点是上海资产阶级及其活动。其绪论追溯了中国资产阶级产生的历史背景，包括鸦片战争前的商人社团、打开国门后的现代经济部门、现代城市精英阶层的形成。第二部分叙述资产阶级的崛起。第三部分分析资产阶级作为独立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行为，进而分析其与国家、革命和西方的关系。尾篇的结论是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官僚体制的确立，资产阶级黄金时代随之结束。白吉尔认为在辛亥革命前中国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辛亥革命是城市精英与清政府博弈的结果，由于辛亥革命的主要力量不是资产阶级，所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努力自然归于失败。白吉尔特别指出资产阶级的崛起得益于传统的社会关系网，如同乡关系、家族纽带等。她说：“作为一种制度，家族制度并不一定会是企业衰败的原因；而且正是这样一种管理方式，为中国企业家提供了可以不必打破社会传统就能够真正地适应现代经济环境的可能性”。^①高家龙、顾德曼等西方学者对待传统资源在社会转型中的作用有与白吉尔相似的看法，认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不是绝对的对立，也不是断裂的，而是可以接续并能够发生创造性的转化。按照白吉尔的观点，资产阶级的兴起除前述因素外，军阀混战，中央对地方控制力薄弱也是重要原因。但当国民政府建立后就开始控

^① [法] 白吉尔著，张富强、许世芬译：《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页。

制资产阶级的的发展，剥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和一部分社会自治权力。

美国学者小科布尔在《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杨希孟、武莲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一书中所论述的资本家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与白吉尔的观点基本一致，但在论证方面更为细致和充分。该书以1927—1937年国民政府与上海资本家的关系为考察对象，论述了十年间国民政府对上海资本家既利用又压制，边利用边压制，利用为辅压制为主的策略。该书将两者的关系嬗变以1934年为界分前后两个阶段，此前上海资本家政治热情高，而且态度强硬，利用自身的经济实力向国民党五中全会游说，希望能得到发展民族资本的政策支持，但国民政府依靠独裁体制削弱上海资本家的政治力量，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侵蚀资本家的经济力量。1934年后上海资本家基本上依附于国民政府，已经丧失了作为一个独立社会阶层的能力。该书与国内学者多从阶级学说分析入手不同，而是关注利益因素在历史活动的重要作用。该书认为原因在于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特性和政府利益至上、军事财政优先的既定政策。就国民政府的政权基础而言，该书也有新见解，认为资本家并非国民政府的政治和社会基础力量，只是国民党政权的财政来源和压榨对象，从而使国民党政权丧失了一个重要的同盟者。该书反映了海外上海学的一个趋向，就是不仅仅有新观点，海外学者也很注重史料的占有。该书中译本中可以见到764条注释，涉及中、美、日等国的报纸、档案、论著等史料。正如熊月之、周武在《海外上海学》的“序言”中提及上海学成为国际显学的一个重要原因时说到的，上海有能够满足西方学者所需量化分析的档案资料，上海是中国近代最大的出版中心，档案收藏最完整的城市，许多海外学者从事上海学研究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上海资料之易于搜集。

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也尝试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和社会生活。在1989年出版的《上海研究论丛》（第三辑）中的“资产阶级的活动”栏目有多篇文章研究了上海的资产阶级，潘君祥考察了国货维持会的活动及其对民族资本的积极支持，指出上海资产阶级在全国的领袖地位是通过1905年的抵货运动奠定的。徐学筠将上海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民族资本家的企业家精神概括为民族精神、竞争精神和开拓精神。徐鼎新则比较了上海新旧两代资本家的知识结构、价值观念、企业精神。^①至 90 年代，则更加有意识地从社会史研究的角度解读政治运动，如熊月之的《五四运动与上海》一文研究了上海在五四运动的思想酝酿、人才准备、抗议方式方面所起到的作用。^②苏智良、江文君的《中共建党与近代上海社会》一文从上海社会的综合因素考量其对中共建党的影响。该文指出 20 世纪初的上海是正经历早期工业化的国际化都市，新的社会阶级重整了传统社群，工人阶级、现代知识分子兴起，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准备了相应条件，而上海发达的媒介网络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以陈独秀为核心的《新青年》编辑部与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则为中共上海发起组提供了基本成员，担当组建中共的“临时中央”。中共在上海成立是上海近代化的结果。^③

美国学者孔如轲著《1925 年的上海》由美国密西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作为“密西根中国研究集刊”之一出版。全书分序言、导论、第一章“1925 年的上海”、第二章“运动的组织和上海的谈判”、第三章“伦敦和公使团”、第四章“在上海的运动”、第五章“结论”。由于孔如轲长期从事英国史和英中关系史的研究，因而该书能够从外交史的角度探讨五卅运动的发生、发展和影响。孔氏认为五卅运动是中外关系的转折点，五卅运动以前，自 1842 年以来依靠不平等条约构建的中外关系体系似乎牢不可破，五卅运动之后，列强何时交出特权开始被作为一个问题提了出来。五卅运动是“中国从外交猎物争取成为外交主体的漫长而痛苦的道路迈出的重要一步”。^④

① 潘君祥：《国货运动中的上海资产阶级（中华国货维持会前期活动剖析）》、徐雪筠：《近代上海民族资本家的企业家精神》、徐鼎新：《近代上海新旧两代资本家深层结构透视——从二十世纪初上海总商会改组谈起》，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研究论丛》（第三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9 年版。

② 熊月之：《五四运动与上海》，《社会科学》1999 年第 5 期。

③ 苏智良、江文君：《中共建党与近代上海社会》，《历史研究》2011 年第 3 期。

④ 转引自熊月之、周武主编：《海外上海学》，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95 页。

美国学者裴宜理的《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采用西方盛行的“新工人史”写法，扩大工人政治定义的外延，关注工人的经历、生活、文化背景。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地缘政治，1939—1919”追溯上海工人力量在地理文化上的源流。第二部分“党派政治，1919—1949”叙述上海工人运动基本状况。第三部分“产业政治”对烟草、纺织和运输行业做了细致的个案研究，揭示不同行业工人在不同时期对政治形势的不同反应。该书认为政治因素可以促成罢工集会，但工人所拥有的技术程度，以及他们的来源地、性别、受教育程度、文化修养等对其心理和反抗斗争都有影响。该书认为就上海而言，来自江南的技术工人易受激进学生的影响。而上海的无技术工人多来自北方，他们对知识分子的理论缺乏兴趣，保留了许多农民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处于两者之间还有一个半技术工人的阶层，他们也主要来自北方，他们注意适应城市生活，但由于没有好的机遇，只能靠秘密结社发展壮大自己。该书注意劳工运动的文化背景以及工作场所与工人运动的关系。该书认为考察以行会为基础的江南技术工人与共产党的密切联系和以追溯以帮会为基础的北方半技术工人与国民党的关系，可以揭示两个党派的力量背景及其局限。

美国学者韩起澜《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1919—1949》（韩慈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注意到另外一个社会群体“纱厂女工”。该书分八章，分别是“上海史的经与纬”、“纱厂内部”、“工人来源”、“靠关系”、“契约劳动”、“工作日”、“工作生活”、“转换视界”。与以前的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相比，该书“转换视界”，对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的理论构架提出质疑。通过对1919—1949年上海纱厂女工的考察，认为女工群体并没有因为农村贫穷进入工厂而成为有革命意识的阶级，在以女工为主的纱厂里，工人的利益、文化因地域、技能而极度分化，青帮势力的介入是纱厂中劳资双方都要共同面对的敌人，中国的劳工意识和斗争并非单纯是两大阶级对立那么简单。20世纪20年代女工的罢工几乎没有阶级意识和革命使命，她们很少有人参加工人阶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级的组织。韩起澜将 20 年代女工不团结的原因归结为：1.地域差异；2.帮会对劳资双方的控制；3.外国资本的不同管理模式和分化策略。而在 40 年代国共内战时期，女工原有的社会组织如姊妹会、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再加上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发动，将女工对传统组织的忠诚与新的阶级意识结合起来，使得女工能够参与大规模的罢工和工人运动。

丁勇华、吕佳航探讨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童工问题，指出上海童工群体的特点是：人数多、比例大、工作时间长、生存状况差等。并从童工家庭、企业、社会环境、政府等多方面分析了童工问题存在的原因及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的影响。^①

还有国外学者探讨 1905—1917 年的圣彼得堡与 1895—1927 年上海两座城市中工人与下层管理者之间的阶级关系差异，认为文化差异和组织者的策略使得工人与下层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在两个城市中有不同的表现。^②瞿骏考察了辛亥革命给上海带来的商机，揭示生意与革命之间的互动关系。^③张忠民以 20 世纪 20 年代末及 30 年代前半期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的调查资料为主要依据，对上海工厂工人的工资率、工人的实际收入、工人家庭的生活程度及生活费指数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认为 20 世纪 30 年代前半期的上海工人及其家庭，尽管其工资水平及生活程度是低水准的，但生活状况总体上还是基本稳定的。^④黎霞研究了近代上海的码头工人，指出近代以来大量本地乡村与外省劳动力涌入上海码头，在发展壮大码头工人队伍的同时，改变了城市人口、家庭、阶级及组织结构，影响了城市文化，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⑤

① 丁勇华、吕佳航：《试论 1920、1930 年代上海童工问题》，《上海大学学报》2008 年第 2 期。

② S.A.Smith, *Workers and Supervisors: St Petersburg 1905—1917 and Shanghai 1895—1927, Past & Present*, No.139 (May, 1993), pp.131—177.

③ 瞿骏：《革命与生意——以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为例》，《史林》2008 年第 3 期。

④ 张忠民：《近代上海工人阶层的工资与生活——以 20 世纪 30 年代调查为中心的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 年第 2 期。

⑤ 黎霞：《近代上海的码头工人》，《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0 年第 6 期。

忻平研究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社会整合机制的变化,反映出这一时期各种社会阶层地位、力量、关系与要求的变动,呈现出社会转型期多元剧变的特征。^①韩国学者李丙仁研究了北伐与上海社会整合的变化,指出北伐之前上海主要依赖社会组织进行社会整合,北伐后上海社会主要是在国民党政权的强制力之下得以整合。^②

2. 社会群体研究

学界对于宗教群体亦有研究,葛壮考察了近代上海清真寺、穆斯林人数、相关社会组织,指出其与上海城市同步发展。林勇、苏金子则从一百多年间在上海回民的移民数量、移民类型、空间分布、近代社会转型中的适应性措施等方面考察了上海的回民群体。^③

海外学者的上海社会群体研究,就理论方法和研究视角而言对国内社会史研究有一定启发。

韩起澜的《人为的部族——上海苏北人,1850—1980》(卢明华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从上海苏北人的生活、工作、习惯以及本地人、江南人、外国人对他们的看法,论述了上海苏北人所遭遇的不公正待遇,同时研究了上海苏北人成为一个部族的原因和过程。

魏斐德的《上海警察,1927—1937》(章红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主要是说明上海警察系统在上海这个特殊城市中是如何一步步地腐蚀垮掉。第一部分“来龙去脉”分析了1927年上海建立政权、设立公安局之前的社会政治历史环境。第二部分“新警政的概念化”论述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现代警察系统的努力,其对于警员的体制、来源、训练、装备进行了改进,但由于将司法警察与行政警察混为一体使得上海警察系统运作处于尴尬的状态。第三部分“有组织的犯罪”指出租界、黑帮、国民政府互相勾结,上海的所有司法机关都从事各种非法的营生。反共的任

① 忻平:《试论20—30年代上海社会整合机制》,《学术月刊》1996年第5期。

② [韩]李丙仁:《北伐与上海社会》,《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5期。

③ 葛壮:《近代上海社会中的伊斯兰教》,《复旦学报》1993年第4期;林勇、苏金子:《移民与近代上海回民社会(1849—1859)》,《回族研究》2012年第4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务又妨碍了警察维持社会秩序的主要职责，而且由于积极反共的需要使得警察系统不得不与租界合作，导致警察的民族主义热情受挫。另外因需要更多熟悉上海情况的警察，使得黑帮分子趁机渗透到警察机关。第四部分“警政抉择的政治牵连”研究了面对日本侵略，上海警政的转变。既要面对公众要求降低犯罪率的要求，还要承担惩处汉奸，控制反日活动等任务。第五部分“新城市秩序的有限性”讨论了20世纪30年代警察国家化，军统与中统等秘密警察渗透到上海的警察、军队系统，以及上海犯罪分子体面化，使得警察管制与犯罪行为、爱国主义与恐怖主义界限模糊等情况。在此情形下，上海警政最终归于失败。该书从警政的角度揭示了上海城市的复杂性。周武称该书为“上海警察研究的开创性著作，也是一部有关城市社会控制的范式性作品”。^①

魏斐德的警察研究主要是制度研究，但也与近代上海的社会管理和会控制转型相关。与其相近的研究还有法国学者安克强（Henriot, Christian）对于1927—1937年间上海市政府的研究。其《上海，1927—1937：市政权、地方性和现代化》（张培德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一书以上海为案例研究国家、党派和精英之间关系的复杂性。指出1927—1937年间对上海市政府产生制约的主要有两股力量，即上海市党部和地方精英即上层资产阶级。1931—1932年日军侵华所引起的抗议风潮削弱了上海市党部的影响力，而精英小团体恢复了在市政机构里的地位。该书还从市政府职员、官员等人物入手，深入探究中国政治生活，有助于明了市政府领导层与中央政府、地方精英和市党部的关系。从市政府的财政考察市政府与市民的关系，并对于市政府在十年间提升城市功能和改善居民生活水平方面的努力进行了研究。

知识分子是近代上海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群体，且与近代上海的社会转型和公共空间有密切的互动关系，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较为关注

^① 熊月之、周武主编：《海外上海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页。

的研究领域。

美国学者叶凯蒂在一篇 1997 年发表的文章中分析了王韬、陈季同、曾朴、金松岑等四位上海文人的社会生活。认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取决于他们来上海的原因以及谋生的方式，他们成长的背景与在上海所遭遇的价值观冲突是他们都要面临的问题，上海虽不能让他们的生活与价值观完全和谐一致，但她能够包容不同文化层次、不同生活方式的文人在这里生活。作为出生于 19 世纪中后期的人物，他们带有过渡时期的特征，利用媒体和出版物，测试和拓展上海的公共空间。^①叶凯蒂的另一本著作《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1850—1910）》（杨可译，北京三联书店，2012 年）将晚清的上海文人、妓女、娱乐业置于同一“场域”中进行考察，见证文人与妓女的“相互定义”。

王立群以进入墨海书馆的王韬、李善兰等人为例探讨了上海口岸知识分子的兴起。^②张敏、叶中强、瞿骏、王少清等研究了晚清上海知识分子由传统士人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型。张敏考察了王韬的晚年生活及经济状况，分析了这类由传统士绅向新型文人转变的过渡性人物的生活状态和心态。^③叶中强以王韬、包天笑为例考察了近代上海文人由传统士人转变为城市职业者的历程。还研究晚清、民初上海文人以结社的方式在多元的城市中聚合同类，重构文人社群网络，并借助开放的私家园林等公共空间，推动文学生产和市民话语空间的拓展。^④瞿骏分析了清末上海文人的私谊网络，指出士人人上海与居上海形成的私谊网络虽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传统乡土社会的士人网络，但他们更多地利用学会、报刊等新制度媒介和开放的私园、会馆、戏院等公共空间构建他们在城市的文化权力结构。士人的

① Catherine Vance Yeh, *The Life-Style of Four Wenren in Late Qing Shanghai*,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57, No.2 (Dec., 1997), pp.419—470.

② 王立群：《近代上海口岸知识分子的兴起——以墨海书馆的中国文人为例》，《清史研究》2003 年第 3 期。

③ 张敏：《晚清新型文化人生活研究——以王韬为例》，《史林》2000 年第 2 期。

④ 叶中强：《游走于城市空间：晚清民初上海文人的公共交往》（《史林》2006 年第 4 期）、《晚清民初上海文人的经济生活与身份转型——以王韬、包天笑为例》（《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7 年第 6 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私谊网络也在士人们的去留中被重新形塑。^①王少清从新知识群体在晚清上海的近代体验入手，分析了近代物质文明对中国近代思想的启蒙意义，从而为洋务思想家群体在晚清上海出现提供发生学的解释。^②

有关职业群体的研究，如有学者探讨了近代上海西医群体的经济、社会地位及社会生活；有研究者分析了近代上海女书画家的多重身份，包括艺术家、艺术教育者、社会活动家、附属角色、家庭妇女等。^③

许纪霖研究了1900—1937年上海的文化精英联合资产阶级所建构起来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指出近代上海的文化精英与资产阶级的战略同盟不仅坚守着城市的地方自主性，而且以市民社会为后盾，积极地过问国家公共事务，并试图影响和改变国家政策。^④

叶辉研究了创作于辛亥革命爆发前夕的小说《新上海》，探究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超越时代的边缘化心态。^⑤田一平研究了民国时期活跃于上海的几类书画家的生活状况，如晚清官吏兼书画家、晚清已成名民国仍然活跃的职业书画家以及民国时期的后起之秀。他们公开标明润例，不讳言利，收入丰厚，个人生活丰富多彩，且多热心公益，捐助慈善。^⑥

买办阶层与上海开埠相伴生，与近代上海相始终，既是近代上海面貌的一部分，也是形塑近代上海的重要群体，因而受到学界的长期关注。改革开放前学界主要是将买办视为帝国主义侵华的帮凶和爪牙加以批判，改革开放后随着学术本位的回归，特别是一些西方著作译介过来，丰富了国

① 瞿骏：《入上海与居上海——论清末士人在城市的私谊网络（1895—1911）》，《史林》2007年第3期。

② 王少清：《晚清上海：西方物质文明与新知识群体的近代体验（1843—1894年）》，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

③ 何晓莲：《略论近代上海西医的社会地位》（《社会科学》2009年第8期）、包铭新等：《近代上海女书画家的社会角色》（《东华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④ 许纪霖：《近代上海城市“权力的文化网络”中的文化精英（1900—1937年）》，《复旦学报》2012年第6期。

⑤ 叶辉：《从〈新上海〉窥探近代上海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心态》，《上海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⑥ 田一平：《民国时期上海书画家社会生活（1912—1937）》，《史林》2009年第5期。

内学界对于近代买办的认识。郝延平的《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李荣昌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就是这样一本著作。如书名所见，郝延平将买办的角色定位于近代中国与西方交流沟通的媒介和桥梁。“探讨买办在影响中国社会变革、经济发展（尤其是早期工业化）和思想文化转变等方面的作用”。^①

梁元生的《上海道台研究：转变中社会之联系人物，1843—1890》（陈同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将道台作为一个群体和角色来研究分析。此前关于上海道台的专门论著很少，该书把道台置于晚清急剧变革的社会的连接点上。外交方面连接中央与地方，文化方面连接东西方、传统与现代、精神与物质，职业方面连接商业与文化，社会方面连接精英与大众，行政体制方面连接高层与低层。总之，道台的职分便是把不同世界、不同价值观的人连接起来。熊月之认为该书最出彩的地方在于对道台的双重身份的分析。^②该书试图通过研究上海道台凸显两种文化、制度交汇时的历史场景，梁元生的道台研究为晚清上海史研究提供一个新颖的观察视角。

七、文化社会史研究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国内学者提出“社会文化史”概念，倡导将文化史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③同一时期西方学界亦有新文化史兴起，提倡在法律、文学、科学、艺术中挖掘人们借以表达真理、价值的密码、线索。^④“可见，这种关注社会与观念的互动、民众生活与观念的互动，是各国史学家在致力于史学深入发展中不约而同选择的一个重要取径。”^⑤

① [美] 郝延平著、李荣昌等译：《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序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② 熊月之、周武主编：《海外上海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页。

③ 刘志琴：《复兴社会史三议》（《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荣》（《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社会文化史：历史研究的新角度》（赵清主编：《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

④ 周兵：《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河北学刊》2004年第6期。

⑤ 李长莉：《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自90年代以来，从报刊、戏曲、电影等文化、观念载体入手探究社会变迁的研究方兴未艾。

1. 报刊与近代上海社会

《申报》是近代上海影响力最大的报纸，自然备受学者关注。胡俊修认为20世纪30年代《申报》广告反映了上海社会生活由传统向准现代的变迁，其中西方的异质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传入起到了主要作用。他还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申报》广告的分析，研究了旧上海舞厅的社会功能。^①许纪霖、王儒年研究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申报》广告在近代上海消费主义意识建构过程中的作用，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上海市民意识形态的世俗化转型。王儒年则通过分析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申报》广告，指出广告为读者构建了一个虚拟的上等社会，鼓动市民通过消费追求时尚、品位，塑造和体认自己梦寐以求的身份和地位。^②有学者通过19世纪70年代的《申报》考察晚清上海社会生活，亦有学者从1933年《申报》上的广告研究30年代的上海社会生活和市民心态。^③

20世纪90年代初期，对于上海报纸的研究主要还是从政治史角度切入。如何平立研究了上海报刊与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关系。^④此后，随着社会生活史和公共空间研究的展开，报纸研究与社会生活、市民心态、价值观变迁、社会转型等论题开始结合起来。陈彤旭研究了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报纸广告，认为广告丰富的诉求方式折射出当时上海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也表明广告主在争取不同类型顾客的过程中努

^① 胡俊修：《由传统到准现代——从20世纪30年代〈申报〉广告看近代上海社会生活变迁》（《历史教学问题》2003年第3期）、《近代上海舞厅的社会功能——以20世纪30年代〈申报〉广告为主体的分析》（《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② 许纪霖、王儒年：《近代上海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之建构——20世纪20—30年代〈申报〉广告研究》（《学术月刊》2005年第4期）、王儒年：《20世纪初期上海报纸广告对市民的身份塑造——以二三十年代的〈申报〉为例》（《郑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③ 丁琦：《从19世纪70年代〈申报〉透视晚清上海社会生活》（《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池丽君：《20世纪30年代上海社会生活的缩影——析1933年〈申报〉副刊〈申报自由谈〉上的广告》（《莆田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④ 何平立：《论近代上海报刊之社会历史作用》，《上海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力迎合不同的价值观。^①杨朕宇通过研究《新闻报》的广告来考察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休闲生活的整体文化特征以及广告与休闲文化的互动。特别探讨了《新闻报》广告对女性休闲生活图景的建构。^②而即使是就报纸研究政治史，在方法和旨趣上已与 80 年代从报纸的政治立场及宣传效果研究其与政治的关系大异其趣，如王敏探讨晚清上海报纸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参与度，认为清政府对于报纸政治影响力的认识有一个由忽视到试图引导、渗透、控制的过程。^③

美国学者季家珍 (Joan Judge) 的《印刷与政治：〈时报〉与清末改革文化》(1996) 探讨了报纸在社会各阶层中如何发挥观念传导的功能。该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中间地带理论，认为印刷品是反映社会的一个重要载体，各种观念通过印刷品到达社会各阶层，从而修正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传统的社会关系。第二部分讨论“报人”如何将传统的“子民”塑造成现代的“公民”和“国民”。第三部分分析了报人与下层民众和上层政府之间的关系。该书认为报人知识分子是晚清宪政的协商者、政府与民间的沟通者、中西文化的整合者。该书所阐述的“中间地带”不仅是国家与社会、官府与民众的中间地带，还是传统与现代、激进与保守、中国与西方的中间地带。^④

近年来，学者开始关注更贴近下层民众的小报。李楠的《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 一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对“小报”、“小报文人”、“小报文学”等概念进行界定；中篇研究了小报与上海的关系，指出小报是上海的一个“平民公共领域”，是上

① 陈彤旭：《论 30 年代上海报纸广告的多元价值观》，《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2 年第 2 期。

② 杨朕宇：《〈新闻报〉广告与近代上海休闲生活的建构 (1927—1937)》(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9 年)、《〈新闻报〉广告与近代上海休闲生活 (1927—1937)》(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③ 王敏：《政府与媒体——晚清上海报纸的政治空间》，《史林》2007 年第 1 期。

④ Joan Judge, *Print and Politics: 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海中下层市民世俗化的都市空间；下篇研究了小报中的文学。

如果说李楠的《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还主要是从文学史的角度研究近代上海小报的话，那么洪煜的《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则有意识地从社会史角度研究上海小报。该书考察了近代上海小报的生成和发展，将1897—1952年的小报发展史分为初创、鼎盛、转型、衍变等四个时期，分析了其生存状况和文化定位，并探讨了小报文人群体网络的建构，及小报与市民生活、公共空间的关系。洪煜还作了一些有关近代上海小报的拓展研究，如撰文分析上海的文艺小报与评弹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小报对政府的批判模式，指出小报刊登的尽管多为低级趣味、消遣、娱乐文字，却反映了市民大众文化对于政治权威和社会主流文化的反抗和消解，为构建市民文化的公共空间开辟了新领域；研究了上海报贩来源、组织，社会地位及生活，指出报贩的活动对于报业近代化和市民文化的近代转型客观上发挥了作用。^①洪煜还以近代上海小报为例阐述了近代报刊不仅是城市文化研究的重要史料，还是近代上海市民文化及海派文化研究一个重要的视角和切入口。^②

美国普渡大学历史系的王娟对近代上海小报研究亦有创见。其《官场现形记：1897—1911年上海小报》一文考察了清末上海小报文人及读者群，分析了小报文人的角色，或主办人、或编辑、或作者，或集三者于一身。王娟指出跻身小报行业是出生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上海文人的重要出路。他们摆脱了传统文人走科举求功名的路而成为职业写手。该文还研究了小报在一般的娱乐功能之外对于官场的批评和讽刺，探讨了在辛亥革命发生后一般民众之所以对于清王朝的垮台并没有多少同情和震惊，一

^① 洪煜：《近代上海小报视野下的苏州评弹》（《史林》2010年第1期）、《从小报看近代上海的新闻舆论公共批评》（《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近代上海报贩职业群体研究》（《史学月刊》2008年第12期）。

^② 洪煜：《近代报刊和城市文化研究——以近代上海小报为例》，《都市文化研究》2012年第1期。

一个重要原因是晚清上海小报充斥着政治批评和讽刺小说，瓦解了清政府在江南民众心目中的统治合法性。^①王娟的另一篇文章《描画公民：1897—1911年的上海小报》探讨了1897—1911年上海小报中有关公民的观点，认为小报的编辑、作者及读者挑战了梁启超对于公民的论述，他们对于国体、人民等论述更加多元，理论来源更加广泛。^②此外，前文提及的美国学者叶凯蒂对于小报与上海市民休闲、娱乐之间的关系亦有研究。^③

画报也是上海社会史研究的一个切入点，日本学者坂元弘子以近代日本“摩登女郎”的产生作为参照，探讨了上海“摩登女郎”与妇女解放运动的关系，通过对《上海漫画》的研究分析，认为“摩登女郎”并没有完全为社会所承认，她们还没有立足社会的坚实基础。^④

邱培成的《描述近代上海都市的一种方法——〈小说月报〉（1910—1920）与清末民初上海都市文化研究》（凤凰出版社，2011年）研究了清末民初《小说月报》的编辑理念、编辑、作家群，以及《小说月报》的思想倾向和文化影响，并探讨了其作品与上海都市大众文化和文化现代化的关系。

2. 电影、影院与上海社会

汪朝光探讨了上海的电影引进、消费、电影制作，以及电影业与上海现代化的关系，认为无论从社会教育功能还是商品形态来说，电影都与上海的现代化紧密相关。^⑤萧知纬通过民国时期因电影引发的抗议事件考察了晚清以来成长的民间社会在民国建立后尤其是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建立和

① Wang Juan, *Officialdom Unmasked: Shanghai Tabloid Press, 1897—1911, Late Imperial China*, Dec.2007, Vol.28, Issue 2, pp.81—128.

② Wang Juan, *Imagining Citizenship: The Shanghai Tabloid Press, 1897—1911, Twentieth-Century China*, Nov.2009, pp.29—53.

③ Catherine Vance Yeh, *Shanghai Leisure, Print, Entertainment, and the Tabloids, xiaobao*, Rudolf Wagner (ed.) *Joining the Global Public: Word, Image and City in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1870—1910*,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 pp.201—234.

④ [日]坂元弘子：《试论近代上海“摩登女郎”的形成过程——社会史、思想文化史的多元比较分析》，李长莉、左玉河编：《近代中国社会与民间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⑤ 汪朝光：《早期上海电影业与上海的现代化进程》，《档案与史学》2003年第3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巩固而逐渐式微，公共空间逐渐萎缩的总体趋势。^①董天艺梳理了上海早期纪录片的发展脉络，分析纪录片所反映的近代上海城市变化与社会生活的变迁，考察上海纪录片的发展与上海城市、上海电影业发展的互动关系。^②姜玠研究了20世纪30年代电影院的区位、分级的社会阶级倾向。作为不同于茶楼、戏院的现代新型文化公共空间，电影院对上海市民心理产生了巨大冲击和影响，有利于解构中国文化中的传统意识。而好莱坞电影在电影院中的优势地位也体现了美国的文化霸权，但也势必会引起反弹。李微探讨了20世纪初至抗战爆发前上海电影院作为新兴的城市公共空间对市民文化生活和城市文化特征所产生的巨大影响。^③姚霏、苏智良、卢荣艳通过大光明电影院的个案研究，分析近代上海的电影院与社会生活的摩登化、好莱坞文化透过电影和影院在上海的消费和生产，以及社会生态与影院之间的互动关系。^④

美国学者叶文心的《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冯夏根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研究了1919—1937年中国一些大学的不同文化风格和政治取向。其中包括近代上海的一些知名大学，如圣约翰大学、交通大学、复旦公学、中国公学、上海大学等。是著指出圣约翰大学主要向来自富裕的工商金融业和自由职业者家庭的青年提供西式教育。复旦公学、中国公学等私立学校依赖于上海的商业社会生存，逐步由晚清的进步绅士的学院发展成为中产阶级的大学。革命色彩浓厚的上海大学主要吸引来自内地的激进青年。与20年代大学校园的活力和行动力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的是30年代弥漫在大学生中的普遍的政治幻灭感，大学面临着理想与现实的背离，在社会和政治力量的挤压下边缘化。

① [美] 萧知纬：《电影史外史——从民国时期对电影的抗议看民间社会与公共空间的消长》，《当代电影》2008年第2期。

② 董天艺：《1843—1927：上海早期纪录片与上海社会》，《都市文化研究》2013年第2期。

③ 姜玠：《20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院与社会文化》，《学术月刊》2002年第11期；李微：《近代上海电影院与城市公共空间（1908—1937）》，《档案与史学》2004年第3期。

④ 姚霏、苏智良、卢荣艳：《大光明电影院与近代上海社会文化》，《历史研究》2013年第1期。

郑文祥研究了 20 世纪 20 年代上海不同类型大学的运作机制、学生文化，分析了不同大学各自的学生文化特点及在上海都市文化、时代环境等因素影响之下异中有同的趋向。^①王薇佳研究了法、美两国教会组织在上海分别创立的圣约翰大学和震旦大学在语言教学方面的情况，探讨这两所大学语言教学背后所体现出的美国与法国、新教与天主教、英美租界和法租界在近代上海的文化竞争。^②李恩堂考察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应对中国“五四”运动的一些举措，进而分析教会学校在近代中国的社会地位以及中西教育理念互动交融的状况。^③

3. 有关评弹、昆曲、京剧等戏曲与近代上海社会研究

唐力行启动了苏州评弹与江南社会的研究，组建了以博士生为主体的研究团队，主编了“评弹与江南社会研究丛书”。唐力行曾专文考察了评弹由苏州向上海的传播，探讨了评弹的空间传播与时代变迁的关系。提及太平天国战争是苏州评弹由苏州向上海扩散的契机。唐力行的文章指出从太平天国战争至 20 世纪 20 年代，评弹的中心已经由苏州转移到了上海，借助上海大都市的位势和广播电台的现代科技，评弹进一步扩大了它的传播范围。30 年代其影响范围南至宁波，北抵南京，但这是点状分布，其核心区是“南抵嘉兴，北达武进”的吴语核心区。新中国成立后，评弹艺人组织化，评弹传播超出吴语区的范围，呈点状分布，或是因受众需要而改苏白为国语，或是外乡乃至海外来自吴语区的移民成为评弹扩散的主要动因。唐力行开创的评弹与江南社会变迁研究为明清以来特别是近现代中国文化社会史研究开辟了一个新领域。^④

朱琳考察了江浙移民与上海成为昆曲中心的关系。认为 1860 年太平军攻克苏州后昆曲活动的中心逐渐转移到上海，昆曲能在上海立足，一方

① [韩] 郑文祥：《1920 年代上海的大学与学生文化》，《史林》2004 年第 4 期。

② 王薇佳：《法美在近代上海的文化竞争——以圣约翰大学和震旦大学为例》，《近代史学刊》第 4 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③ 李恩堂：《教会大学应对近代中国社会运动之举措研究——以五四时期的上海圣约翰大学为例》，《天中学刊》2011 年第 6 期。

④ 唐力行：《从苏州到上海：评弹与都市文化圈的变迁》，《史林》2010 年第 4 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面得益于江浙移民的乡土情结，另一方面在于其自身特性。从中亦可看出上海既以“洋”为风尚，也能为传统文化的传承载留一定空间。^①张雯考察了女子越剧在上海“孤岛”时期兴盛的原因，认为其兴起主要在于战争带来的社会环境和时势的变化。^②徐剑雄考察了辛亥革命至新中国建立前上海京剧的票友和票房，认为中产阶级是京剧票友的主要来源，票房则成为中产阶级的娱乐场所，也是他们交流信息、研讨剧艺的空间。徐剑雄等还从捧角、玩票等城市大众娱乐、京剧女伶与女性解放、京剧与城市变革等角度研究了京剧与晚清上海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③

朱静对近代上海戏曲由传统向近代的嬗变过程进行了考察，并分析其中折射出的社会观念变迁。^④魏兵兵考察了淫戏与晚清的公共娱乐，认为商人群体的地位提升及其追求“风流”体验的娱乐诉求，是推动晚清上海“淫戏”风行的主要原因。此现象也反映了晚清上海公共娱乐生活中权力关系的变化，即传统政治权威和道德权威的双重弱化。金坡指出晚清上海地方政府采取劝淫改善、禁演淫戏等措施对流行的淫戏进行管控。然而，由于晚清政府的社会控制力量不断削弱，其对淫戏的蔓延力不从心，导致愈禁愈演、愈演愈盛的状况。^⑤江凌考察了西方戏剧的传入及与中国传统戏剧冲突、融合的过程，总结了上海戏剧文化的基本特征，并分析了其社会作用，认为近代上海的戏剧文化推动了上海都市文化的现代化和大众化，并从近代上海戏剧文化的嬗变透视海派文化精神。^⑥

① 朱琳：《江浙移民与近代上海昆曲活动中心的形成》，《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② 张雯：《从乡村到都市——近代上海女子越剧的流行与社会文化变迁》，《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③ 徐剑雄：《近代上海的京剧票友、票房（1911—1949）》（《史林》2006年第4期）、《京剧与晚清上海社会》（《史学月刊》2008年第6期）、徐剑雄、徐家林：《都市里的疯狂：近代上海京剧捧角现象》（《贵州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④ 朱静：《从晚清上海戏曲的嬗变看社会观念的变迁》，《华中人文论丛》2013年第2期。

⑤ 魏兵兵：《“风化”与“风流”：淫戏与晚清上海公共娱乐》（《史林》2010年第5期）、金坡：《愈禁愈演：清末上海禁戏与地方社会控制》（《都市文化研究》2013年第2期）。

⑥ 江凌：《冲突与融合：近代上海戏剧文化的基本特质及其社会作用》，《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

4. 公共空间研究

瞿骏对辛亥革命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的关系有系统研究。他详细探讨了辛亥革命与开放的私园、街头、店铺、茶馆、报馆、戏院、车站、码头、会馆等城市公共空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城市公共空间形塑了辛亥革命，为革命构建、填充了“革命记忆资源库”，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革命的神圣性和合法性。瞿骏还有专文考察了举办追悼会的城市公共空间与辛亥革命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与辛亥革命相关的追悼会加深了城市公共空间的政治化，并初步形成了革命记忆的资源库。他还以学生和城市民众为例，探讨个体遭遇革命时的不同处境和多种感受，为揭示革命本相提供新的观察点。^①

近代上海公园作为市民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为学界所关注。熊月之对近代上海公园与上海社会有系统深入的研究。熊月之研究了作为晚清重要公共活动场所的张园，他指出张园是上海各界集会、演说的重要场所，对上海移民社会的整合、上海人意识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认为近代上海的公园和公用私园是上海居民的重要休闲娱乐场所、社交场所，能够展示上海城市的异国情调，还承担着城市广场功能。^②有学者研究了清末民国时期上海公园的限权功能，由于近代上海公园的独立性，其能够对政府专断权力进行质疑和约束，还分析了公园限权的有效性和有限性。^③张敏考察了晚清上海图书馆的产生、发展、职能，及其与都市社会的关系。^④方平探讨了戏园与清末上海公共空间的拓展，认为在20世纪初戏曲改良运动的推动下，戏曲在娱乐功能之外被赋予开启民智、改良社会的重任，

^① 瞿骏：《辛亥革命与城市公共空间——以上海为中心的研究（1911—1913）》（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辛亥革命时期的集会与城市公共空间——以追悼会为中心（1911—1912）》（《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辛亥革命与日常生活——以学堂学生与城市民众为例》（《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

^② 熊月之：《张园：晚清上海一个公共空间研究》（《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6期）、《近代上海公园与社会生活》（《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③ 郑琼现、刘鸯凌：《公园的限权功能——以近代上海公园与国家的权力博弈为例》，《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11期。

^④ 张敏：《图书馆与晚清上海公共文化述论》，《学术月刊》1999年第6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愈加凸显其社会批判性。上海新式戏曲舞台也从一般意义上的休闲娱乐场所转变为批判性的公共空间。^①

方平还研究了清末上海公共领域与新兴社会阶层的互动关系。他指出晚清行将终结的最后十多年间，在官方政治权力架构之外崛起的公共领域催生了一些新兴的社会群体，构建了所谓的“中等社会”。在社会政治参与的过程中，“中等社会”逐渐形成两种相互关联但又有某种程度“错位”的身份认同，即城市地域身份认同和“国民”身份认同。但随着民族国家的重建和地方自治运动的推进，这两种身份认同又渐趋合辙，共同构成城市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重要精神动力。^②

八、望族、社会组织、社会控制、社会保障研究

1. 望族、商帮、同乡团体研究

望族研究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关于上海望族研究早期著作主要是潘光旦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1940），而且主要关注于优生学，对于望族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未能深入研究。此后，国内学界对此再未关注，而日本的明清士绅研究、欧美的地方精英研究都不断有新的成果。80年代国内学界开始注意到这一领域。吴仁安即是在当代上海望族研究方面成就最显著的一位学者。

吴仁安的《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分十章，主要考察了明清两代上海地区望族名流，如潘恩、徐阶、董其昌、徐光启、王鸿绪、张照、钱大昕等人的生平，以及300多家著姓望族的门祚，详细阐述了这些望族形成的历史条件、发展变化及社会影响。该书事实上也是以名门望族为主线的一部上海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史。它在繁富的史料之上有很多观点的提炼，如将上海望族分官宦世家、豪门右

^① 方平：《戏园与清末上海公共空间的拓展》，《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② 方平：《公共领域与清末上海社会阶层结构变动》，《近代史学刊》第4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族、文化世家等几种类型，并得出结论，三类望族中文化世族更具稳定性，次则官宦世家，再次为豪门右族。最后一节为“明清以来上海地区部分著姓望族的后裔在今天现实生活之剪影”颇有时代气息。刘学照在“序一”中指出该书在上海望族史研究中有“开山性的学术价值和前沿性的学术地位”。继《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吴仁安又出版了《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2001），将望族研究由上海扩大到了江南区域。

上海作为近现代中国的商业中心，是各商帮及同乡组织展示各自风采的大舞台，宁波帮是其中的佼佼者。李斌的《上海的宁波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是系统研究上海宁波商帮的第一部专著。

该书以1843—1937年为限，分八章。第一章“上海的宁波人：导论”阐述移民与社会互动的理论、宁波人在上海的研究综述以及该书所应用的理论构想和研究方法。该书第三至七章论述旅沪宁波人在上海金融业、近代工商航运业、新式教育等方面的作用，同时还考察了宁波人在上海建立的同乡组织——上海四明公所和宁波旅沪同乡会的结构特点、会务活动和社会功能。通过对四明公所和宁波旅沪同乡会的考察得出结论：“乡土观念、同乡组织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为有利于社会集聚的现代文化资源。”^①第二、八章解析宁波人迁沪的动因，分析旅沪宁波人的社会构成，剖析宁波人的心态结构。认为宁波人辉煌沪上的重要原因在于宁波人襟江带海的地理环境、浙东学术、经商传统的熏陶。余论阐述了“移民是上海崛起的内在动力”这一论断，揭示宁波移民集团在上海经济发展、文化变迁、社会进步等方面的外显和内在的功能。最后一章的“余论”部分总结了宁波移民的流入与近代上海城市经济的发展大体同步伸展。宁波移民为上海提供了劳动力、资本，推动上海文化的多元化，上述为移民的外显功能。其潜在功能是改变上海人的价值观念和上海的社会结构。刘学照在“序”中评价该书是“揭示近代上海的优势移民群体——旅沪宁波人的迁沪动因、社会构成、心态结构以及其参与发展上海和融入上海的一幅‘全

^① 李斌：《上海的宁波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1页。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息图景’”。

广东商帮及其同乡组织也是学界的一个关注点。上海潮汕联谊会编的《潮人先辈在上海》（艺苑出版社，2001年）是第一部研究上海潮州移民的论文集，主要记述在沪潮州人及其事业以及潮州会馆和潮州旅沪同乡会等。郭绪印也出版过一本关于上海潮汕同乡团体的书，主要内容体现在其主编的另一部巨著《老上海的同乡团体》（文汇出版社，2003年）中，书分十二章，研究了较有影响的潮州、洞庭、徽州、广肇、宁波、绍兴、湖州、山东、无锡、苏州、吴江、苏北、福建、浦东等同乡团体，并对其发生、发展、章程、制度、结构、功能、性质作了系统的梳理。此外，又将50多所会馆、100余所同乡会列入了一览表，全面系统地再现了老上海同乡团体的风貌。该书认为，从总体上说，这些同乡团体在社会上起到了协调社会矛盾、安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具有地缘、物缘、业缘、神缘、亲缘这五缘文化的特色以及互动、公益、中介、法制的功能，而且其中某些特殊作用是官方权力机构所难以取代的，类似西方各国城市近代化的“市民自治”。书中还认为同乡会的崛起是同乡团体现代化的表现，老上海同乡团体适应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传统文化心态，也因迎合上海的商贸需要而长期存在，有其历史合理性。苏智良在“序言”中称该书的特点是内容丰富、结构宏大、资料翔实，为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上海同乡团体的专著。邵雍评价该书“相对于大量的详实的史料史实而言，本书的理论分析稍有欠缺。另外，对于同乡团体的局限性或负面作用虽有提及，但寥寥数语，似有偏爱之嫌”。^①

对上海同乡团体研究用力最多的海外学者是美国学者顾德曼，她曾在《上海研究论丛》第四辑发表过《新文化，旧习俗：同乡组织与五四运动》一文。其著作《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1853—1937》（宋钻友译、周育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则全面展示了

^① 邵雍：《关于老同乡团体研究的最新成果——简评郭绪印主编的〈老上海的同乡团体〉》，《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她在此领域的研究成果。该书认为移民在中西城市的发展史上都曾起到极大的作用，但在城市中有众多的同乡团体却是中国城市的一大特色。是著考察了同乡认同的现代转化，移民们传统的家国意识逐步转向上海的大都市意识和对国家民族的深深关切。都市认同并没有取代同乡认同，而是放大了同乡认同。顾德曼认为在上海，之所以会馆与公所的名称可以混用是因为行业公所与同乡关系重叠，大多数会馆与公所既是同乡组织，也代表着行业利益。

虽然占有材料并非外国学者研究上海史乃至中国史的强项，像该书所举案例如杨月楼案、四明公所案都是学界比较熟悉的材料，但其能为上海社会史研究提供新颖的研究视角足资借鉴。如在杨月楼案中同乡群体取代了家族网络的功能，广东同乡团体对案件的审理施加了关键的影响。该书分析重点放在会馆、公所在上海城市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作者认为由于上海认同不如同乡认同和民族认同那样在移民的上海生活中发挥强大作用，且同乡网络遍及全国，结果培养了同乡团体的领袖们超越家乡和上海的普世主义。该书以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为例探讨同乡团结与民族认同、民族利益之间的关系。认为早期民族主义渗透着同乡情感，并且是在同乡情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1905年上海的抵制美货运动为例，评析同乡团体在抵货运动中的作用，考察同乡网络卷入早期革命的动员，论述了同乡团体在“五四”运动、工商学联合战线中的关键作用。该书通过考察同乡团体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团组织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作用，力图说明以“现代性”等西方经验来衡量中国，或观察中西差异是没有意义的。

刘石吉较早涉及上海徽帮研究，他著文考察了1924年上海徽帮墨匠的罢工风潮。指出此次罢工既“不涉及党派斗争与对外关系”、又对政治局势无“重大冲击”，而罢工的最终调解是由官方与业缘性的工会、而非乡谊组织完成。^①唐力行在《徽州旅沪同乡会的社会保障功能（1923—

^① 刘石吉：《一九二四年上海徽帮墨匠罢工风潮——近代中国城市手艺人集体行动之分析》，《江淮论坛》1989年第1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1949)》一文中考察了民国时期徽州旅沪同乡会的组织、活动及功能。同乡会自筹资金,开展各项社会保障活动,如有关旅沪同乡的教育事业、增进公众幸福事项、关于失业会员救济事项、援助乡人免除不正当损害事项、调解劳资纠纷,等等。徽州旅沪同乡会实行的社会保障虽然有地域的限制,但是在上海这样一个移民社会里,各地的同乡会以及商会等自治组织所形成的一个个保障圈却也覆盖了上海市民社会相当大的空间,并与上海特别市政府渐次实施的一系列颇具现代意义的包括社会救济、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内容的社会保障相互补充。同乡会的社会保障功能,展现了独立、自治的市民公共空间。^①此外,林辉锋探讨了旅沪广帮在沪粤之间文化交流中所起到的媒介作用及其在上海近代文化多元化中的推动作用。^②

由于近代上海是中国的工商业中心,同业组织异常发达,留下了大量可供研究的档案资料,因而对于同业公会的研究亦是上海社会史研究的一大热点。

2. 会馆、公所、同业组织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外学界开始涉足上海商会研究,如丁日初的《辛亥革命前的上海资本家阶级》(《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李升辉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上海总商会的政治性格》(《东洋史学研究》20辑,1984年)、美国学者博士卓(Joseph Fewsmith)的专著《民国商会组织中的政党、国家和地方精英与上海政治》(1985)^③和李子文的《简论上海总商会“民治委员会”》(《史学集刊》1986年第2期)等。

20世纪90年代关于上海商会研究渐成规模,如徐鼎新、钱小明的

^① 唐力行:《徽州旅沪同乡会的社会保障功能(1923—1949)》,《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② 林辉锋:《旅沪广帮与近代上海社会文化的多元化》,《中山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③ Joseph Fewsmith, *Party, State, 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 China 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 1890—1930*,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5.

《上海总商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台湾学者张桓忠的《上海总商会研究（1902—1929）》（台北知书坊，1996年）、李达嘉的《商人与政治：以上海为中心的探讨（1895—1914）》（台湾大学博士论文，1994年）。

上海商会的政治参与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研究的重点，特别是上海商会在国内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如何毅亭的《五卅运动中的上海总商会》（《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朱英的《上海总商会与五四运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郑成林的《“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市商会的民主抗日动向——兼谈商会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等。

此外，学界对商会研究转向商会制度及上海商会的社会政治经济功能。徐鼎新、宋钻友考察了近代上海会馆、公所与同业公会的历史渊源及相互关系。^①徐鼎新的《关于近代上海商会兴衰的几点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9年第1期）力图说明上海商会兴衰的内部和外部原因。彭南生的《行会制度的近代命运》（人民出版社，2003年）考察了行会制度的近代转型及在政治、经济、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彭南生还以上海工商同业公会为个案，分析了民国时期同业公会的政治参与行为。认为民初的同业公会在政治活动中表现出高度的积极性和参与性，并在政治活动中起到一定的组织与领导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并超越了晚清以来商会的政治保守性，其自主性、独立性进一步增强。^②魏文享研究了上海同业公会的社会功能。^③陆兴龙研究了同业公会、商会等近代上海社团组织的概况、性质、功能等，分析了社团组织的发展沿革。^④

① 徐鼎新：《旧上海工商会馆、公所、同业公会的历史考察》（《上海研究论丛》第5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宋钻友：《从会馆、公所到同业公会的制度变迁——兼论政府与同业组织现代化的关系》（《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3期）。

② 彭南生：《民国时期工商同业公会政治参与行为的实证分析——以民初上海工商同业公会为考察重点》，《近代史学刊》第1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③ 魏文享：《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社会功能分析（1918—1937）——以上海、苏州为例》，《近代史学刊》第1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④ 陆兴龙：《近代上海社团组织及其社会功能的变化》，《上海经济研究》2005年第1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姚会元的《上海近代商会在稳定金融中的作用》（2000）一文对上海商会在近代金融危机中的作用予以充分肯定。^①乔兆红探讨了上海商会在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中的积极作用，文章指出上海商会积极组织并鼓励商界踊跃参与商品展会、赛会是培育华商竞争意识的一个有力举措。^②樊卫国研究了近代上海同业公会、总商会等经济性社会功能组织，认为近代中国真正自主性的社会群体组织不能真正发育起来，难以形成实质性的“市民社会”；还论述了近代会馆公所、同业公会和上海总商会等的经济社会协调职能和运作机制；专门研究了近代上海行业组织的发展阶段，认为1870—1949年，行业组织属性的演化经历了“共同体化”、“社会化”与“国家化”的三个阶段。各阶段不是此起彼落，各类组织属性演变有所差异，时间上有重叠。就上海的行业组织变迁看，1870—1918年为“共同体化”时代，1904—1938年为“社会化”时代，1929—1949年为“国家化”时代。^③

90年代以虞和平的《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为主要标志，国内商会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向就是关注其现代性。黄汉民分析了近代上海行业管理组织在企业 and 城市发展中的作用。^④朱榕以震巽木商公所为例考察了上海木业同业公会近代化。^⑤张玮以上海绸缎业同业组织为切入点，从流通领域、生产领域入手研究考察同业组织与产业发展的关系。通过对1900—1930年上海绸缎业公会的考察，认为原先以私人关系网络为特征的同业组织在产品质量的改进和控制方面的

① 姚会元：《上海近代商会在稳定金融中的作用》，《学术月刊》2000年第5期。

② 乔兆红：《上海商会与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史林》2010年第2期。

③ 樊卫国：《近代上海经济社会功能群体与社会控制》（《上海经济研究》2001年第10期）、《近代上海非政府组织的社会经济协调作用——以近代经济群体为中心》（《上海经济研究》2007年第11期）、《“共同体化”、“社会化”与“国家化”：论近代中国行业组织变迁之阶段性特征——以近代上海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2期）。

④ 黄汉民：《近代上海行业管理组织在企业发展与城市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张仲礼主编：《中国近代城市——企业·社会·空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

⑤ 朱榕：《上海木业同业公会近代化——以震巽木商公所为例》，《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3期。

优势在 1930 年之后随着国民党中央集权的加强而逐步丧失，“既无法使组织关系网络起到控制改进产品质量的作用，又抑制了基于私人关系网络的市场个体的竞争，而使得构成绸缎业运行的基本关系系统处于无效率的境地”。^①此外，学界对于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和书业同业公会亦有系统研究。^②

3. 社会组织研究

研究上海社会组织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著作有日本学者小浜正子的《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葛涛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该书探讨了慈善组织、救火会等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在承担公共职能方面的关系。除序言和结语外，本书分四章：一、都市社会形成；二、慈善事业；三、救火会；四、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社团组织的改造与再编。第一章介绍了上海社团发展的背景，并将上海社团发展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9 世纪的后半期，各类旧式社团，如公所、善堂等增多；第二阶段为 20 世纪初，即清末民初地方自治运动兴起，出现新式社团，有代表性的如新式慈善团体和救火会；第三阶段是辛亥革命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本阶段南京政府对上海社团实施整合，将由社团承担的公共功能改由政府实行，强化了政府权力。第二、三、四章围绕慈善组织和救火会以及南京政府对社团的整顿再编分析社会组织与国家的关系。

郭彦军系统研究了近代上海社团发生、发展的过程，分析了其在社会管理方面的意义。认为社团组织是近代上海社会的重要整合力量。在政府权威弱化、社会环境复杂多变的近代上海社会中，社团发挥了重要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管理作用。大量社团的存在和发展及其维护社会利益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黑帮的破坏活动。通过对近代上海社团的历史考察，

^① 张玮：《市场·商人组织·产业发展：以上海绸缎业为例：1900—1930》，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31 页。

^② 郑成林：《从双向桥梁到多边网络：上海银行公会与银行业（1918—1936）》，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王晶：《上海银行公会研究（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汪耀华：《上海书业同业公会史料与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可以检视到：社团是民主自治、民主自律的社会管理力量。今天的社会管理创新，有必要充分吸取近代上海社团组织的合理成分，开发社团的社会管理潜力，进一步发挥社团组织参与行业管理、提供社会服务的基础性作用。^①潘君祥考察了辛亥革命时期上海新组建的一系列参加革命和共和活动的社团。^②

4. 社会保障救助

汪华考察了1927—1937年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以后开展的各项社会保障事业。自1927年上海市政府成立后，渐次实施了一系列颇具现代意义的社会保障措施，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逐渐形成了一套包括社会救济、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内容的初具雏形的社会保障网络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与慈善组织、企业雇主围绕社会救济、劳动保障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博弈互动。汪华认为，与西方社会保障发端于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一背景不同，近代上海社会保障在实践层面上，并非完全体现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更多的是出于国家为维护其政权合法性而对社会进行控制与安抚的主观建构，社会保障被深深地烙上了泛政治化的印迹。^③翟旭丹探讨了近代上海社会福利制度产生、发展的过程以及该制度的积极作用和不足。^④彭善民考察了民间社团参与公共卫生的宣传，认为其活动推动了近代上海公共卫生治理的社会化，弥补了政府公共卫生管理方面的不足；还对慈善团体、工商社团等民间组织在近代上海时疫救治方面发挥的作用进行了细致研究；考察了近代上海公

^① 郭彦军：《近代上海社团发展及其社会管理意义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博士论文，2013年。

^② 潘君祥：《辛亥革命时期上海民众新建的社团及其活动倾向》，唐力行主编：《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③ 汪华：《近代上海社会保障事业初探（1927—1937）》（《史林》2003年第6期）、《近代上海社会保障研究（1927—1937）》（上海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劳资冲突视野下社会保障有效性与合理性的反思——基于民国时期上海社会保障的一项实证分析》（《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④ 翟旭丹：《近代上海社会福利制度研究（1927—1937）》，华东政法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

共卫生管理的缘起、发展、市场化运作及与都市社会的互动关系。^①

胡勇系统考察了 1910—1949 年传染病对上海民众心理的冲击，以及上海各界对传染病的态度和应对等。胡勇指出一方面传染病造成劳动力、经济的损失并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另一方面推动了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在应对频发的瘟疫中形成了城市救难机制的“上海模式”，并促进了城区一体化进程和城市环境的改善。^②日本学者菊池智子考察了晚清英国人在上海开办自来水事业的情况，从自来水管建设和自来水价格等问题入手研究上海自来水质量及管理水平的提高过程。^③

5. 帮会、黑社会及妓女、乞丐等社会群体、社会问题研究

关于上海帮会、黑社会研究，学界已有大量相关口述史料集，如薛耕莘的《近代上海流氓》、《我接触过的上海帮会人物》、《近代上海黑社会见闻》，郁咏馥的《我所知道的杜月笙》，俞云九的《我所知道的张啸林》，以及黄振世对黄金荣的回忆文章等。

《旧上海的烟赌娼》（上海文史馆编，百家出版社，1988 年）是一部有关旧上海烟赌娼的论文集。该书分四部分：开首有吴贵芳的《十里洋场烟赌娼的历史考察》，对旧上海烟赌娼的泛滥情况作了简介，认为旧上海的烟赌娼是社会恶势力和丑恶现象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下产生的变异，有了“新的性状和特征”。该书第一部分文章主要涉及烟毒，平襟亚的《旧上海的烟毒》评析了鸦片流入上海，以及鸦片经营和各方势力的介入情况；黄苇、戴鞍钢的《鸦片贸易与鸦片流毒在上海》和洪荆山的《鸦片流入中国和上海受害情况》简要探讨了开埠至上海解放 100 余年上海的鸦片贸易及其带来的经济、社会影响；高洪兴的《抗战前上海的鸦片

① 彭善民：《近代上海民间公共卫生宣传》（孙逊主编：《都市文化研究》第 1 辑，上海三联书店 2005 年版）、《近代上海民间时疫救治》（《广西社会科学》2006 年第 9 期）、《公共卫生与上海都市文明（1898—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② 胡勇：《传染病与近代上海社会（1910—1949）——以和平时期的鼠疫、霍乱、麻风病为例》，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5 年。

③ [日] 菊池智子：《从晚清上海自来水建设看城市社会的形成》，《城市史研究》第 25 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9 年版。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业概述》分清末、法租界时代、九亩地时代等三个阶段叙述了上海鸦片业的发展情况；刘光清的《抗战后的上海禁烟》历数国民党政权在上海的一系列禁烟措施，并分析其成效不大的原因主要在于对烟民措施不力；因鸦片等毒品的厚利，各种势力介入；相关职能部门权责不清互相推诿，效率低下。杨展成的文章考察了专为毒品生意保险的三鑫公司，还有文章介绍广东帮贩卖鸦片的情况，大鸦片贩子叶清和的贩毒生涯等。第二部分的文章如平襟亚的《旧上海的赌博》介绍了彩票、跑马、跑狗、回力球、吃角子老虎、赌台总会、花会、公馆赌博等赌博方式；另有专文介绍旧上海的赌博场所如跑马厅、跑狗场、回力球场、西园赌场、181号大赌窟等旧上海著名的赌博场所。第三部分的文章主要涉及旧上海的娼妓，如薛理勇的《明清时期的上海娼妓》、平襟亚的《旧上海的娼妓》详细考察了上海的娼妓来源、等级、制度、分类、生活，以及旧上海时期关于娼妓的著作和旧上海的废娼运动和解放后对娼妓的改造。谢吾义的《民初上海娼妓一瞥》梳理了民初上海娼妓的人数、分布、来源、拯救娼妓的慈善机关及工部局对妓院管理章程等史料。第四部分收录的文章主要是关于上海帮会，如薛耕莘的《近代上海黑社会见闻》介绍了旧上海的黑帮首领、流氓集团。姜豪的《漫谈旧上海的帮会》考察了帮会的起源、青红帮组织、上海帮会组织概况及主要代表人物，论述青红帮对国家社会的影响。还有一些回忆青帮成员的文章，如张志鱼的《袁克文与青帮》、邓汉宗的《我所知道的一些青帮中人》、王亚陆的《青帮“大”字辈张仁奎和赵成楼》等。该书的重大意义在于它的史料价值，文章大半为亲历亲闻，是难得的口述史料，常被后来的上海社会史研究所征引。

闻湜主编的《帮会势力珍闻》、《人在江湖》（两书均为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收录的大多是关于上海帮会、上海闻人的回忆文章。前书中，崔锡麟的《我所知道的青红帮》讲述上海的“仁社”及其他青帮社团组织；范绍曾的《关于杜月笙》、黄振世的《我所知道的黄金荣》、朱剑良等的《张啸林的一生》等都是难得的口述史料。后一本书有许念晖的《虞洽卿的一生》、《上海股市话旧》、平襟亚的《黄楚九传奇》、毛啸曾的《上

海滩的大赌窟——回力球场》等是有关近代上海的人物、经济、社会的文章。

苏智良、郭绪印、邵雍等对于上海帮会、黑社会都有细致深入的研究。

苏智良、陈丽菲的《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于2004年商务印书馆再版，略有修改，主要是增加了一些新史料，结构未变。该书主要论述了近代上海黑社会的成因，提出过分都市化论、多轨异质社会论、社会控制机制异化论等。认为都市膨胀，游民激增以及社会下层组织成为黑社会滋生的土壤；上海华洋分治，社会控制机构失范异化，刺激了黑社会的产生。以大量篇幅论述近代上海黑社会的发展史，分四个阶段：1843—1891年为积聚成型期、1892—1927年为繁衍扩张期、1927—1945年为鼎盛时期、1945—1952年为衰弱消亡时期。第三章对黑社会集团的概况、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做了解析。第四章对黑社会的烟、赌、娼、骗、偷、绑票等犯罪行为进行了翔实的揭露。该书是一部系统的上海黑社会史，其最大特点在于强烈的现实指向，1991年版的结束语题为《黑社会会卷土重来吗？》对90年代中国进入犯罪高发期，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死灰复燃，作者提出一些历史的镜鉴。在2004年的再版后记中作者重申研究该问题的初衷出于对当时全国犯罪报道的敏感。作者认为“根据历史经验，中国大陆区域性的黑社会的形成，已经不可避免”，当时有关部门“没有注意到一些执法部门的失范甚至黑社会化问题”。

苏智良、陈丽菲的另一本研究上海黑社会的著作《海上枭雄——黄金荣与上海社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为蔡少卿主编的《中国秘密社会丛书》中的一部。第一部分《关于目前的黄金荣研究（代序）》，以正本清源为己任，认为许多关于黄金荣的著作史实不清，谬种流传，作者尽可能全面地占有史料，通过为黄金荣作传，“折射清末民初社会的实态与变化”，并有警世的意义。行文通达朴实，尤其注意史料的考订，如黄金荣是怎样进入法租界巡捕房任职的，列出黄金荣的管家及原法租界督察长两种不同说法；黄金荣何时成为巡捕亦有两种说法，作者都做出了自己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的论断，说明作者在精心考订史料方面下了一番功夫。该书按时间顺序叙述黄金荣一生，穿插了与其有关的人、事，论断平实，可读性较强。

郭绪印的《旧上海黑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分六个部分：“毒品与黑帮”、“帮会流氓”、“赌博黑风”、“娼妓盈市”、“绑票奇案”、“强盗横行”等。揭示了近代上海的帮会势力与租界当局、国民政府相互渗透、互相利用，操控赌毒娼，影响上海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全面反映了近代上海社会的阴暗面。该书分类归置，如第二部分“帮会流氓”，论及流氓大亨的崛起、依附蒋家王朝、涉足经济文化界、汉奸帮会等；亦以个案串连其间，如第五、六部分“绑票奇案”、“强盗横行”列举了一系列当时轰动坊间的大案或新闻。该书的文字平易可读。

邵雍的《中国近代帮会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收录了作者有关帮会研究的论文31篇，其中《辛亥革命与上海帮会》、《杜月笙与上海抗日救亡运动》、《五四运动与青红帮会》、《五卅运动中的工人帮会问题》、《常玉清和黄道会》、《汉奸帮会组织——中华洪门联合会》、《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中和党”》、《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探略》、《益社始末》等文都是有关近代上海帮会史的研究文章。邵雍注重帮会史研究与革命史研究相衔接，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言，其帮会史研究“注意研究帮会在特殊历史发展节点上的政治表现”，注意“革命政党、领袖与帮会的关系”，这也是其帮会史研究的主要特点。

澳大利亚学者布赖恩·马丁的《上海青帮》（周育民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是西方第一本系统研究上海帮会组织的专著，考察了上海青帮的源流，并将其与意大利、美国、日本等国的黑社会组织进行了比较研究。该书注意到上海帮会与民国时期国家体制的关系，指出上海青帮与传统帮会的最大不同在于它能适应近代城市经济和政治秩序。是著认为华洋杂居及上海的多元的政治格局为帮会成长提供了庇护，而鸦片贸易对帮会的发展则至关重要。该书还考察了青帮与产业工人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分析其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是著在考察青帮源流之后得出结论：与其说青帮是传统帮会的转型，不如说它是一个全新的组织。该书还指出上

海约在 19 世纪八九十年代成为近代青帮的中心，认为青帮在上海迅速发展原因在于：租界人口膨胀，上海的移民城市环境以及“一市三治”互不统属的政治格局。该书所研究的下限止于 1937 年，还算不得上海帮会的全史。

有关上海帮会人物的研究著作较多。如王辉强的《青帮大亨——黄金荣》（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 年）、黄建远的《青·红·黑（中国青红帮与西方黑手党）》（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年）、沈寂的《上海大亨》（学林出版社，2001 年）等。梅蓁、韶菩著《海上闻人杜月笙》（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年）是大陆比较早的一部杜月笙传记。该书力图避免纯粹的政治批判，多侧面叙述杜月笙的一生，用笔传神生动。刘才赋的《通天教主——杜月笙与国民党政权》（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年）从杜月笙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入手考察杜月笙的一生。该书试图说明杜月笙其人的产生与上海社会的关系、近代化过程中秘密社会的演变以及杜月笙的中介角色，分析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特殊的政治状况及其同杜月笙的关系。从多角度研究杜月笙其人，使得这部传记有一定的研究深度。

上海帮会与黑社会的研究文章较多，苏智良、郭绪印、马丁等在《上海研究论丛》中都有此类研究的文章。苏智良、陈蒙的《近代上海帮会繁盛原因初探》（《上海研究论丛》二辑）从城市发展和人口结构、上海社会状况、近代政治斗争、帮会自身演变等角度考察了近代上海帮会繁盛的原因，认为主要是在于中国自然经济体系和社会系统的分解过程中，社会失序，各阶层将帮会作为生存发展的依赖，加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况，在中外反动势力共同抬举下，帮会能得以迅速发展。郭绪印的《评旧上海帮会势力的演变》（《上海研究论丛》九辑）认为租界的公共治安体系不仅未能抑制帮会，反而成为帮会发展的温床。马丁的《青帮和国民党政权：杜月笙对上海政治的作用（1927—1937）》（《上海研究论丛》九辑）认为这十年间青帮的转折点是 1932 年的国民党政治危机，自 1932 年青帮首领尤其是杜月笙，在国民党政权与上海劳资双方的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与上海地方当局签订经营鸦片的协议，有组织介入劳工控制，使得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杜月笙为代表的青帮势力成为 30 年代中期国民党统治上海的政治机制中一个重要环节。^①邵雍简要梳理了上海黑社会研究的学术史，并分析了上海黑社会研究与帮会、租界史研究的关系。^②

胡训珉总结了旧上海帮会的特点：帮会人员数量扩大并向社会扩散、帮会的封建宗法观念融合于近代资本主义价值观、帮会由传统的犯罪领域转入经济领域、从事社会公益活动改善帮会形象。分析帮会恶性膨胀的原因包括：两种社会经济制度冲撞对接时发生严重错位；当局的纵容政策；租界的存在及其分裂状况；帮会拥有遍布全国的组织网络和巨额资财，有强烈的渗透性和扩张性。^③夏斯云考察了恒社的组建、组织、经费来源、成员及主要活动，认为恒社已成为具有近代特征的新型帮会。^④高钟、董林亭认为近代上海的帮会随着中国民族国家权威的重建与社会的发展，也因应时势，开始由秘密社会向近代社团蜕变与转型，杜月笙及其属下的上海帮会正是这种蜕变的典型。^⑤

忻平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帮会发展的原因归纳为：上海新旧并存的社会环境、人口失控与社会失调、帮会与政权互相需求等因素。“适时而变”为帮会创造了生存空间，但帮会的某些资本主义色彩并未改变其反社会、反现代理性与法则的破坏性本质，依然是社会发展的阻力和包袱。^⑥邵雍指出辛亥革命时期上海的光复曾得到帮会的帮助，光复的革命党人对帮会认识不清，措施失当，导致帮会站到敌对势力的一方。^⑦庄民生将上海青帮流氓大亨集团形成的条件归纳为：大批移民涌入上海；传统帮会迁

① 该文应是前述马丁的著作《上海青帮》的部分内容，亦可参见其英文版 Brian G. Martin, *The Green Gang and the Guomindang State: Du Yuesheng and the Politics of Shanghai, 1927—37*.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54, No.1 (Feb., 1995), pp.64—92.

② 邵雍：《上海黑社会研究与上海史研究》，《史林》2001 年第 1 期。

③ 胡训珉：《旧上海帮会的恶性膨胀及其原因》，《探索与争鸣》1994 年第 10 期。

④ 夏斯云：《民国时期的新型帮会——恒社》，《档案与史学》1997 年第 1 期。

⑤ 高钟、董林亭：《“蚰蜒修成龙”——从杜月笙看上海帮会的近代蜕变》，《近代史学刊》第 3 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⑥ 忻平：《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边缘化现象——透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帮会》，《史学月刊》2002 年第 10 期。

⑦ 邵雍：《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帮会》，《史林》2002 年增刊。

入申城；近代上海的“三界四方”城区环境和反动当局的政策导向；“三大亨”的自身素质等。^①周崇亚总结了民国时期上海黑社会经营关系网的六种手段：走热门、烧冷灶、安插线人、义气笼络、投桃报李、临时抱佛脚等。^②

就近代上海帮会史和黑社会研究而言，成果丰富，搜集整理了一批口述史料，对其研究主要集中于揭示帮会势力在近代上海兴盛的原因，其性质、特点及对上海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考察其与各方势力尤其是租界当局、国民党政权的关系等。黄金荣、杜月笙等重要帮会人物也是研究的重点。

在上海的社会生活史和黑社会研究中往往也会涉及娼妓研究，但关于上海娼妓研究的专著不多。

孙国群的《旧上海娼妓秘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分六部分：“近代上海的繁荣与娼妓业的发达”、“近代上海妓院概况”、“卖笑业的一种特殊广告——花榜”、“人间地狱的妓女生涯”、“青楼女子的觉醒”、“娼妓制度的消亡”。附录有“清末上海几个名妓的心酸史”、“娼妓制度的历史轨迹”。比较全面考察了近代上海娼妓业的概况。

法国学者安克强的《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袁燮铭、夏俊霞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③对近代上海100年的娼妓史进行了全面考察，分四部分：一、高级妓女：精英的妓女和妓女的精英；二、卖淫市场和面向大众的性行为；三、卖淫业的场所和经济；四、管理娼妓的失败。安克强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上海高级妓女地位遭到削弱，各类妓女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该书还研究了性病与暴力给妓女带来的苦难，探讨了上海的卖淫场所和组织结构以及性经济的运作情况，最后，考察了上海娼妓业管理的政策方式，认为管理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行政管

① 庄民生：《论旧上海青帮流氓大亨集团的形成》，《上海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② 周崇亚：《民国时期上海帮会流氓笼络社会各界之六大手段》，《社会》2003年第6期。

③ 安克强发表的相关文章还有：*Through a Throne of Glory to a Seat of Ignominy: Shanghai Prostitution Revisited, 1849—1949, Modern China, vol.22, Issue2, Apr.1996, pp.132—163.*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理不统一以及当时的中国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接纳娼妓的传统。是著还将对近代上海妓女的考察与城市变迁相联系，将妓女史作为城市社会变迁的一部分。如在对高级妓女“情欲化”、“商品化”的研究中，考察了上流人士中新兴商人地位逐渐上升，取代了原先文人雅士的地位；论及卖淫场所，考察了城市总体布局的变化。在研究中，还注意中西对比，探讨中西文化差异在卖淫业及政府管理中的表现。

美国学者贺萧（Gail B.Hershter）的《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①（韩敏中、盛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历史记载与等级制度”阐述该书的理论取向，探讨重构历史真实的相对性，并对娼妓业与现代性的关系做了论述，还考察了上海娼妓业的等级和娼妓类型。第二部分“愉悦”介绍男人笔下的高级妓女。第三部分“危险”主要涉及人口买卖、法律、性病三个论题。第四部分“干预”论及20世纪的改革者、革命者、管理者为解决娼妓问题而付出的努力。第五部分“当代的对话”主要讨论了改革开放后大陆的娼妓问题，探讨了娼妓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通观全书，表露出对重构历史真实的谨慎态度。作者受女性主义的影响，强调妓女在城市史中的地位，认为“妓女在20世纪的城市舞台上并不处于边缘位置。相反，她们是由男人讲述的关于愉悦、危险、社会性别与国家的故事中的要件……妓女以‘嵌入’的方式被带进历史记载：他们嵌入了塑造她们的故事的人的历史”。^②正如评论者指出的那样：贺萧试图通过妓女这个媒介探索有关性、社会性别、政治权力、文化转型、民族主义、殖民主义、消费主义等论题。^③

此外，忻平探讨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娼妓兴盛的特点和原因。^④

^① 贺萧发表的相关文章有：*The Hierarchy of Shanghai Prostitution, 1870—1949, Modern China, vol.15, issue 4, 1989, pp.463—498.*

^② 贺萧著，韩敏中、盛宁译：《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③ 陈晓兰：《身体与政治——关于〈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妇女研究论丛》2006年第1期。

^④ 忻平：《20~30年代上海青楼业兴盛的特点与原因》，《史学月刊》1998年第1期。

杨阳、万妮娜以上海舞女为例探讨了民国时期舞女的性质，认为民国时期的舞女是传统的高级妓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角色转换。^①包树芳考察了近代上海茶馆的禁妓问题。在租界、华界共同展开茶馆禁妓的过程中，双方因理念的差异、利益的冲突和权力的争夺不时发生摩擦。进入民国以后，妓女逐渐离开茶馆，至20世纪30年代最终消失。^②《海上花列传》是研究清末娼妓史的重要文学史料。有学者通过《海上花列传》研究清末上海的旅居者如何在妓院构建社交网络和身份认同。^③

除娼妓史外，亦有学者关注近代上海乞丐游民研究。卢汉超将近代上海城市中的乞丐作为了一个群体和行当加以研究，揭示这一群体的内部运作及公众形象，探讨其与社会、政府的关系。卢汉超认为乞丐群体的长期存在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国社会的弹性和适应性。^④阮清华考察了近代上海对于游民问题的认识和对游民收容改造的过程，指出社会公众对游民问题的认识是不断变化的，游民问题从道德、伦理问题渐渐变为社会、经济问题，再变至政治问题，其后又成为一个集政治、道德伦理与司法问题于一身的复杂难题。而处理游民问题的主体则经历了一个以官方为主向以民间力量为主再至完全依靠官方力量的发展过程。而从人们对游民问题认识的变化亦可以管窥社会转型的发生。^⑤邵雍研究了晚清的上海乞丐群体；而罗国辉则探讨了民国时期政府与民间关于乞丐救济与防范的措施与思路。^⑥

① 杨阳、万妮娜：《民国时期舞女性质探析——以上海舞女为中心》，《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4期。

② 包树芳：《娱乐、风化、政治：近代上海茶馆禁妓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③ Samuel Y.Liang, *Ephemeral Households, Marvelous Things: Business, Gender,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Flowers of Shanghai"*, *Modern China*, Vol.33, No.3 (Jul., 2007), pp.377—418.

④ Hanchao Lu, *Becoming Urban: Mendicancy and Vagrants in Modern Shanghai*,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ol.33, No.1 (Autumn, 1999), pp.7—36.

⑤ 阮清华：《游者无疆——近代上海的游民问题处理》，《近代史学刊》第5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⑥ 邵雍：《晚清上海乞丐初探》，《都市文化研究》2007年第2期；罗国辉：《略论民国时期上海乞丐问题》，《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关于近代上海城市犯罪问题的专著有美国学者魏斐德的《上海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1937—1941）》（芮传明译，人民出版社，2011年）。是著考察了1937—1941年“孤岛时期”所谓沪西“歹土”的社会秩序。对于“孤岛时期”上海政治恐怖活动多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魏斐德认为应深入理解，具体分析。有些是汉奸内部的权力斗争，有些“爱国”的恐怖活动的实施者是否出于爱国动机，也应该仔细斟酌。是著列举了一些案例，说明有些出于爱国心的恐怖活动可能也是消极意义大于积极意义。魏斐德还指出，由于中日双方的暗杀绑架活动多集中于较富裕的社会中上层或文化精英，使他们备受煎熬，对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全面占领上海麻木不仁，竟至默许。对于孤岛时期沪西作为“歹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从中探究社会现象与政治体制和政治大背景的关系。

6. 移民、外侨研究

众所周知，近代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既有国内移民，也有外侨长期居于上海。事实上，前面所提及宁波商人、徽商等方面的研究亦可视为城市移民的研究。对于将上海人口、移民与社会变迁综合研究的首推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该书是研究近现代上海社会经济史难得的基础资料。它主要考察了自鸦片战争至新中国建立前上海人口的变动情况，认为鸦片战争后上海人口有三次突增，即太平天国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而且人口在战争结束后又有所回落。这些观点都被后来的学者沿用。还研究了旧上海的人口分布和人口密度、旧上海人口的职业构成，认为从人口的职业构成看，上海是一个消费性的城市，而且上海各区的人口职业构成差异很大主要在于各区的功能差异。在“旧上海人口的籍贯构成和迁移资料”中，分析外地籍贯的人口差异的原因，如迁出地离上海的距离、迁出地的人口在上海的发展情况、迁出地的灾荒及与上海的交通是否便捷等。此外，还探讨了旧上海人口的性别比、年龄构成、婚姻状况、出生率、死亡率，认为上海人口的畸形发展完全建立在战争动乱及广大内地农村、城镇破产的基础上。最后，分析

了外国人在沪的人口变动原因、职业构成、地区分布、国籍构成等。该书附录了 58 份旧上海人口变迁的表格资料，为上海社会经济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该书的一些资料和论断也被反复征引。

此外还有一些相关的研究文章。如陈文斌研究了太平天国战争为上海带来的移民潮，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及移民身份结构等。^①张笑川的研究指出苏州人在近代上海工商金融业和文教行业具有一定优势地位，苏州评弹、昆曲等文化形式亦在上海娱乐市场上居统治地位。伴随大量苏州人迁沪，苏州文化也大规模传入上海，为近代上海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底色。^②

上海外侨研究是上海社会史研究中成果较为集中的领域。邹振环将外侨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分析了清末国际移民对上海的文化景观、报刊和出版事业、交通设施、娱乐方式、知识结构、市民意识等方面的积极影响。^③

学界对犹太人、俄侨的研究成果较多。在《上海研究论丛》第八辑有“外侨社会”专栏，其中有唐培吉的《犹太人在上海》、魏白蒂的《上海犹太人社区述要》。唐培吉考察了上海犹太商人的发展史，认为 1845—1918 年是上海犹太商人的发迹阶段；1918—1937 年是上海犹太商人的鼎盛年代；1937—1949 年是上海犹太商人的衰退时期。探讨了上海的俄罗斯犹太人社团及上海接纳犹太难民的原因，唐培吉认为原因在于：上海是自由港，是各种难民的庇护所，还有就是日本当局的亲犹政策，以及中国和犹太人之间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魏白蒂的文章介绍了上海的犹太人社区，如塞夫拉迪犹太人，阿兹肯那齐犹太人，德国、中欧、东欧犹太人，并介绍若干在上海的犹太家族和犹太人中的著名人物。

戴维·兰克茨著、许步曾译的《上海犹太人难民社区》（上海三联书

① 陈文斌：《太平天国运动与近代上海第一次移民潮》，《学术月刊》1998 年第 8 期。

② 张笑川：《试论近代上海文化的底色——旅沪苏州人与近代上海》，《社会科学》2013 年第 11 期。

③ 邹振环：《清末的国际移民及其在近代上海文化建构中的作用》，《复旦学报》1997 年第 3 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店，1991年）是一部较早译介到国内的上海犹太人研究专著，译者在《中译本序》中说：“本书既是犹太民族现代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叙述了本世纪30年代末期至40年代中期的上海生活。”是著叙述了逃亡上海的犹太人的来源、过程，并揭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对犹太人采取宽容政策的根源，指出在日俄战争期间，美国的犹太人银行家雅各布·希夫愤于沙皇在1903年屠杀在俄国的犹太同胞，贷巨款帮助日本海军，使得日本人认为犹太人资本雄厚，在美国势力强大，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犹太人实施宽容政策。该书还专门考察了从波兰迁到上海的密尔经学院，研究了犹太人在上海的社区建立、文化生活、教育、宗教活动，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日本占领当局设置“隔离区”处置犹太人的情况，并考察了上海犹太人的结局。书后附录上海犹太人不同时期人数、人口结构、经营的产业等。

唐培吉是国内研究上海犹太人的代表性学者。曾在《同济大学学报（哲社版）》连续发表多篇关于上海犹太人研究的系列文章。他与其他学者合著的《上海犹太人》（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是研究上海犹太人的集大成之作，在“序篇：历史之谜——犹太人何时来到上海”中追述古代犹太人来沪的种种迹象。上篇主要考察上海犹太人的行踪，以及近代上海犹太人的发展史略，个案研究了沙逊家族、哈同、安诺德兄弟、卡道里父子，以及俄罗斯犹太人、欧洲犹太人迁沪、犹太难民的生活状况和人口变迁。下篇考察了上海犹太人的文化，包括宗教设施、社团及其活动、文化活动、复国主义活动和上海犹太人的遗迹、遗址等。

潘光、王健的《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上海犹太人——犹太民族史上的东方一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在“导言”中总结了上海犹太社团的特色：由于上海基本不存在当地的反犹主义，上海犹太人处于友好、安全的氛围中，并开展了活跃的政治活动；上海犹太人与中国居民总体保持友好的关系；上海的开放地位，使上海的犹太社团与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团密切相连；上海犹太社团经济实力雄厚；上海犹太社团有很高的文化素养。

除上述的研究专著外，还有极具史料价值的《犹太人忆上海》（潘光、李培栋主编，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5年）收集了12篇上海犹太人饱含感情的回忆文章，包括旧上海极具影响力的嘉道里家族的第二代劳伦斯·嘉道里勋爵的回忆文章，再现了上海犹太人的生活实态。

俄侨是上海外侨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为学界重视。汪之成的《上海俄侨史》（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是一部上海俄侨史研究的代表作。书分三卷：上海俄侨发展简史、上海俄侨社会问题剖析、上海俄侨各界概况。该书第一卷“上海俄侨发展简史”叙述了俄侨在上海的经历，俄侨的来源、人口演变、30年代俄侨经济、文化在上海的极盛时期，以及俄侨离开上海。第二、三卷为上海俄侨的横断面研究，第二卷“上海俄侨社会问题剖析”探讨上海俄侨的法律地位，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俄侨内部政治态度的分化，俄侨与中国政府、社会的关系，俄侨与租界当局、其他外侨、日伪当局的关系，俄侨在上海的就业生活状况，俄侨的风俗等。第三卷“上海俄侨各界概况”考察了上海的东正教会、俄侨的各类社团、教育、报刊、艺术、工商业经营，以及租界中的俄籍雇员等。第二、三卷详细展示了上海俄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多面向。全书80万字，容纳了丰富的上海俄侨史料。

汪之成的另一研究俄侨的专著《近代上海俄国侨民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梳理了上海俄侨的发展简史，探讨了俄侨在上海的物质生活及俄侨引发的社会问题，细致考察了上海俄侨的生活习俗、宗教生活，以及俄侨的社团和慈善组织，论述了俄侨在上海的从业情况，尤其是在工商业界的地位、作用。该书是一部全面考察上海俄侨的社会生活之作。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上海日侨的研究成果堪称丰富，如《上海研究论丛》（第十辑）中，谯枢铭的《开埠前到过上海的日本人》，追溯日本人来沪的源头；许杰的《虹口日本人居住区述论》考察了虹口日本人居住区的形成、发展、完善与终结，研究了不同时期居住在虹口的日侨。美国学者傅佛果（Joshua A. Fogel）探讨了侵华日军与上海日侨组织“上海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日本居留民团”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不同背景的日本侨民对于日本侵华的态度，探讨了在上海的日本侨民与其他城市日侨的不同体验。^①

刘建辉的《魔都上海：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甘慧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通过追踪上海日本人的精神史，把握近代日本人的精神变迁轨迹。作者在序章中指出上海之所以被称为“魔都”，是因为租界设立而形成的“两个不同性质的空间”共存于上海。该书的第一、二、三章主要考察了幕末时期日本与上海的关系；第四、五、六章探讨了明治以后日本人对上海的体验，如第一章“武士的上海”，由于上海给予武士们的刺激，使得他们在观念上由地方主义转变为民族主义，对明治维新与日本近代国家的形成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第二章“东亚信息网络的诞生”旨在说明19世纪后半期，上海取代广州、乍浦成为对日信息传播的中心地。第三章“日本开国与上海”认为上海的大量汉译西书和杂志影响了日本。第四章“被‘浪漫’挑逗的明治人”、第五章“沉溺于魔都的大正作家们”和第六章“‘摩登都市’与昭和”考察了上海的日本人及其精神史。末章“从上海看日本”试图通过分析上海对日本的影响，以期更全面地了解近代日本。

陈祖恩的《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1868—1945）》（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系统梳理了在沪日侨从移居、发展到离去的全过程，再现日侨在沪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多侧面。该书从1862年日本“千岁丸”初航上海，开通近代中日贸易开始，至日本战败后日本侨民的遣返，选取其间日侨的社群、社团、职业、习俗、文化、教育、出版、建筑等切入点，全面展示日侨在沪的生活面貌。陈祖恩的另一本著作《上海日侨社会生活史（1868—1945）》（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考察早期上海日侨的“弱势移民”形象和上海日本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及日侨的社会基层组织和生活服务体系。探讨了日侨不同阶层的职业及

^① Joshua A. Fogel, “Shanghai-Japan”: *The Japanese Residents’ Association of Shanghai*,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59, No.4 (Nov., 2000), pp.927—950.

他们的宗教、文化、学习生活和社会活动。

忻平、吕佳航对抗战胜利后上海待遣日侨的管理进行了详细考察，认为第三方面军上海日侨管理处对于日侨生活的集中管理与改造体现出科学化、人性化、时效性和有效性等特征。^①

英国学者毕可思考察了开埠至抗战爆发前上海的英国人社区及英国人的身份认同，禁忌、习俗变迁。^②孙科志梳理了上海韩人学生群体参与韩国独立运动的情况。^③周武研究了外侨中的主力，即洋商与传教士在晚清上海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④

熊月之、马学强、宴可佳选编的《上海的外国人（1842—194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汇集了一批研究上海外侨的重要成果。熊月之在“序言”中概要回顾了外侨在上海的历史，特别提及两个特殊的外侨群体，即犹太人和无国籍俄国人，以及“外侨影响了上海，上海也影响了外侨”的基本情况。该书所选编的都是外国学者研究上海外侨的论文，涉及在沪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日本人、葡萄牙人、犹太人、德国人、俄国人、印度人等外侨群体、社区、社团等。如英国学者哈丽雅特·萨金特（Harriet Sergeant）的《上海的英国人》考察了英国侨民在上海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况。另一英国学者毕可思（Robert Bickers）的《上海工部局乐队与公共乐队的历史与政治（1881—1946）》指出工部局乐队和上海公共乐队传播西方音乐，起到了社群整合的作用，而且西方音乐在上海的传播会因为公共租界的基本政策和外国列强在华地位的变动而随之变化。当五卅运动和国民革命撼动列强在上海的统治之后，租界当局试图让公共租界的中国居民进入租界管理层，将社群整合扩大到中国人，音乐在此过程

① 忻平、吕佳航：《“身有所寄，心有所托”——战后上海待遣日侨的集中管理》，《社会科学家》2010年第10期。

② Robert Bickers, *Shanghaiers: The Formation and Identity of the British Settler Community in Shanghai 1843—1937*, Past & Present, No.159 (May, 1998), pp.161—211.

③ 孙科志：《上海韩人学生与韩国独立运动》，《韩国研究论丛》第八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④ 周武：《晚清上海的洋商与传教士》，《史林》1999年第2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中扮演了独特的角色。以此阐明音乐与上海历史、政治的关系，视角独特。毕可思的另一篇文章《谁是上海的巡捕，为什么他们会在那里？——1919年的新募英国巡捕》通过分析1919年上海公共租界从英国本土招募的74名英国巡捕的出身、应聘的动因、结局来重构这一在沪英人的特殊社团在上海的工作和生活。美国学者马克·威尔金森（Mark F. Wilkinson）的《上海的美人社团（1937—1949）》主要考察了上海的美人社团与上海的关系，分析了在沪美国人的中国观，以及他们未能融入上海的原因。法国学者居伊·布罗索莱（Guy Brossollet）的《上海的法国人（1849—1949）》考察了在沪法国人中的建筑师、音乐家、播音员，法国在沪的戏剧、报纸、电影，以及在沪法国人的休闲、社交活动等。白吉尔的《1945—1946年上海的肃奸：萨尔礼案与法租界的终结》通过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审判法租界的高级警官萨尔礼通敌案件，将此案件与法租界的终结联系起来考察。日本学者高纲博文的《上海的日本人居留民》探讨了上海日本人居留民社会的形成和状态，包括不同时期日本人来沪的情况及日本人在上海的区域分布。对日本人在上海的社团、利益，以及日本军国主义者对日本在沪居留民权益的歪曲与“一二·八事变”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安克强的《上海的“小”日本：一个与外界隔离的社团（1875—1945）》探讨日本社团的性质特点、主要机构、社团生活，及其与日本政府的关系、对中国的态度。认为日本社团极强的自给自足能力使其与中国社会隔绝，由于受到日本政府的整合控制，日本人社团极有组织、纪律，每一个社团组织的形成都是日本人感到中国人的现实或想象的威胁而产生的反应。傅佛果的《一个另类的日本人社团——战时上海日本左翼的活动》考察了内山完造的上海书店、东亚同文书院中日本左翼人士的活动情况，意在说明在沪的日本社团并非铁板一块，从而构建比较全面的日侨在沪史。汪之成的《葡萄牙人在上海（1845—1949）》考察了葡萄牙人迁居上海的过程、葡萄牙在沪领事馆的建立、万国商团中的葡萄牙队、上海的葡侨报刊、葡侨的宗教生活、社团、教育，以及葡侨的社会问题。《上海的外国人（1842—1949）》一书从总体上呈现了近代上海外侨

的生活，也可见对于上海外侨的研究已经由犹太难民、俄侨、英侨、日侨扩展到几乎所有在沪外侨群体。

九、社会生活史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学界开始关注社会心理、社会生活研究。乐正、忻平和李长莉的著作尝试以新的理论模式来引导上海社会生活史的研究。罗苏文和卢汉超的著作主要从上海社会生活的实物和细部入手，呈现上海生活的历史画卷。而熊月之主编的“上海城市社会生活丛书”对近代以来上海社会生活进行了多层面、多侧面的系统研究。

1. 社会心理研究

乐正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包括三章。第一章“双重投影下的一个膨胀体——两种历史运动的整合与晚清上海的发展模式”试图从社会发展动力论的角度解说上海人心态变迁的背景。所谓两种历史运动指的是“时间递进型”的农业社会发展模式和“空间传动型”的近代工业社会的发展模式，乐正认为这两种历史发展模式在上海的交融是上海人心态变迁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第二章“近代重商思潮的一个东方标本——晚清上海人心态研究之一”研究了晚清以商人为主体的商业化环境使社会心态熏染了浓厚的重商主义色彩，从而带来行为方式的商业化，导致上海人的谋生方式、应酬交际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作者详细考察了晚清上海人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革命性变化，认为上海人的消费观念渗入了功利第一、体面第一、享乐第一的近代精神，指出商业社会：“已使上海人的社会性格具有近代人的某些鲜明特征：较强的求变欲望与应变能力，富有弹性的思维机制，坚强健全的神经系统和高强度的心理承受能力。”^①第三章“跨文化传通的一座立交桥——晚清上海人社会心态研究之二”考察了上海这个移民社会在容纳国内外移

^① 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页。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民中文化的沟通与融合对移民心态的影响和近代上海人心态的塑造。该书的结论是“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的重构，使晚清时期的上海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人格，这就是精明求实的商人观念，宽容趋新的文化观念，独立自主的国民人格和热情自觉的参与意识。新的社会人格的形成使我们从晚清上海人身上看到了近代人的一种东方模式”。^①读者可以明显感受到该书所传递的20世纪80年代“理论热”的余风。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有一些有关近代上海市民意识和社会心理方面的成果发表。如唐振常探讨近代上海市民意识的萌发及对近代上海社会近代化的推动作用；李天纲的研究指出近代上海的市民意识有来自江南和全国的小市民意识、士大夫意识、农民意识及来自租界的西方市民意识；马学强考察了明清上海地区的民风；朱李敏分析了洋务运动与上海城市社会心理之间的互动关系；叶辉通过对创作于辛亥革命爆发前夕的小说《新上海》进行分析，探究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超越时代的边缘化心态；洪煜总结了近代上海小报中所体现的上海市民人格特征；刘丰祥通过分析民国时期上海娱乐明星身体商品化现象探讨城市现代性及市民身体审美观的变迁；闻羽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近代上海苏北人污名化的原因、机制、过程进行分析。^②

2. 社会生活研究

忻平的《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上海大学出版社，2009年）研究的时限是1927—1937年。在书中，作者试图构建一种新的研究体系，即“全息社会史观”，将社会历史发展视为一种全息有机的运动，认为社会全息元与

^① 章开沅：《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序言〉》。

^② 唐振常：《市民意识与上海社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1期；李天纲：《近代上海文化与市民意识》，《上海文学》1995年第10期；马学强：《明清上海人文民风》，《学术月刊》1997年第10期；朱李敏：《洋务运动与上海城市社会心理》，《江苏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叶辉：《从〈新上海〉窥探近代上海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心态》，《上海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洪煜：《近代上海小报中上海市民的人格特征分析》，《史学月刊》2006年第9期；刘丰祥：《民国时期上海娱乐明星身体商品化现象浅析》，《历史教学》2008年第24期；闻羽：《从社会心理探析近代上海苏北人的污名化》，《盐城工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全息体之间有广泛的对应关系，因而应用此理论可以对社会生活各层面、各侧面加以研究。认为社会史的研究内容应是一定历史时空中的人（个体、群体、整体）、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及其相互关系，一定历史时空中的人的各个侧面与各个层面的社会生活，将这种人与生活置于时空中作具体实证考察与宏观的整体研究。导论中除阐述相关的全息理论外，还考察了上海移民史，将二三十年代上海移民特点归纳为：移民实同难民、两种积累的不平衡（一极积累贫困，而另一极未能积累资本）、移民动因多元化、移民来源的多元等。作者认为二三十年代上海移民特点制约和影响了上海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作者从移民的年龄构成、性别比、职业构成等多方面探讨移民对上海现代化的影响。该书还研究了社会分层、社会人格、日常生活，并揭示了现代化趋向中的一些社会病态。该书有较多理论阐述，并辅以大量的数据分析，可谓史论结合。

李长莉的《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以社会文化史的视角，从生活方式与社会伦理的互动入手，以上海近代社会生活与伦理的变迁为研究对象，探究中国传统伦理向近代伦理演化的机制和特性。书分六章“晚清上海：近代社会生活与伦理变迁的一个舞台”、“西器洋货流行与近代工商观念”、“尊卑失序之风与社会平等观念”、“享乐崇奢之风与消闲消费观念的商业化”、“妇女走上社会之风与男女平等观念”、“台基、姘居之风与自主择偶观念”。论述了上海社会生活变化所带来的社会伦理的近代化。引言和结语主要阐明该书的社会生活方式与社会伦理变迁的互动理论，认为近代伦理的变迁在于生活方式的近代化，民间生活伦理是近代伦理的内在源流，西方文明是中国近代伦理的参照。该书反复致意的是“观念源于生活”，即“社会伦理的变迁首先是从民众生活世界开始的”。^①

李长莉还发表了一些上海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文章，如对于晚清上海新

^① 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45页。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知识空间的研究，她探讨了晚清上海以西语、西学为中心的新知识系统，考察与之相关的新知识结构、社会基础、传播途径、使用方式、应用主体、社会效应等。文章指出在晚清传统知识在中国占有绝对强势的大环境下，在上海形成了一个西学强势的小环境，成为新文化的发展基地和传播中心。^①

罗苏文的《石库门：寻常人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讲述石库门的缘起、石库门在上海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角色。以石库门人家的身份、生活变化折射上海的社会变迁。所用史料除专门的研究著作、《申报》等报刊，还有当时的影视作品、戏剧、小说、诗歌等。罗苏文的另一本著作《沪滨闲影》（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以图文并重的形式重现了旧上海的娱乐业场景，包含总会、俱乐部、公园、电影院、运动场、报刊杂志、小说、戏曲舞台，以及在其中的人事。

卢汉超著、段炼等译的《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寻求都市梦”包括“到上海去”、“人力车世界”两章；第二部分“立锥之地”包括“逃离棚户区”“小市民之家”两章；第三部分“上海屋檐下”包括“石库门后”、“石库门外”两章；最后一部分是“结论”。在该书中他研究了人力车夫、棚户居民等底层民众，以及他们生活的棚户区和里弄房子，从城市的细部和社会底层入手研究上海城市生活的演变，勾画出近代上海市井生活的长卷。因而该书的译者称之为“一幅近现代上海市井生活的‘清明上河图’”。^②

卢汉超还有一些研究近代上海里弄生活的专文，如《远离南京路：近代上海的小店铺和里弄生活》一文探讨上海西化标志的南京路一带的街坊小店和里弄的市井生活，揭示在最西化的中国城市中多数市井小民依旧保持了传统的生活样法，说明西风东渐之下传统的延续性，或者说他描述了

① 李长莉：《晚清上海的新知识空间》，《学术月刊》2006年第10期。

② 熊月之主编：《海外上海学》，第308页。

现代都市中的传统生活景象。卢汉超试图从底层社会和市井生活的角度揭示近代上海社会生活的部分特征。^①

卢汉超在近代上海都市化的城市生活中找寻她传统的延续性，熊月之则称近代上海是“农村中的都市，都市中的农村”，从整体上研究近代上海人社会生活的特征。熊月之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中国的都市，但在上海，由于居民移居上海的短暂性，及同乡相对集中居住，交往密切，活动范围狭小，近代上海人其实多数生活在都市的乡村。^②马学强研究传统上海城镇社会生活，认为在前近代上海城镇生活城乡一体，但一体中有差异，城镇社会生活成为地方上层社会的追求。^③

熊月之主编的“上海城市社会生活丛书”至2011年共出版25种，全方位研究了近代上海城市生活，是上海生活史研究的集大成。包括熊月之的《异质文化交织下的上海都市生活》、叶中强的《上海社会与文人生活（1843—1945）》、王敏的《上海报人社会生活（1872—1949）》、陈同的《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上海律师》、江文君的《近代上海职员生活史》、马学强、张秀莉的《出入于中西之间：近代上海买办社会生活》、施扣柱的《青春飞扬——近代上海学生生活》、宋钻友等的《上海工人生活研究（1843—1949）》、侯艳兴的《上海女性自杀问题研究（1927—1937）》、阮清华的《上海游民改造研究（1949—1958）》、宋钻友的《同乡组织与上海都市生活的适应》、白华山的《上海政商互动研究（1927—1937）》、陈祖恩的《上海日侨社会生活史（1868—1945）》、王健的《上海犹太人社会生活史》、汪之成的《近代上海俄国侨民生活》、葛涛的《具像的历史——照相与近代上海社会生活》、葛涛的《唱片与近代上海社会生活》、汤水清的《上海粮食计划供应与市民生活（1953—1956）》、王敏等的

① Hanchao Lu, *Away from Nanking Road: Small Stores and Neighborhood Life in Modern Shanghai*,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54, No.1 (Feb., 1995), pp.93—123.

② 熊月之：《乡村里的都市与都市里的乡村——论近代上海民众文化特点》，《史林》2006年第2期。

③ 马学强：《传统上海城镇社会生活刍议》，《史林》2002年第4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近代上海城市公共空间（1843—1949）》、瞿骏的《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张生的《上海居，大不易——近代上海房荒研究》、唐艳香、褚晓琦的《近代上海饭店与菜场》、马军的《舞厅·市政——上海百年娱乐生活的一页》、张笑川的《近代上海闸北居民社会生活》、金大陆的《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上海城市社会生活丛书”不仅对各类人群进行了研究，还涉及衣、食、住、娱乐等社会生活多侧面，是对上海社会生活史研究的一次重要总结。

其中，唐艳香、褚晓琦的《近代上海饭店与菜场》（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分上、下篇，上篇“饭店与上海城市生活（1843—1949）”考察各帮菜系与近代城市发展、城市空间拓展的关系，西餐与中西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以及饭店与城市生活的关系，认为饭店不仅是饮食空间，还是社会活动、娱乐空间，展示风情世味的窗口。下篇“上海菜场与市民生活（1843—1949）”考察了近代上海菜场的来历、选址、布局，以及菜场的管理机构、规范制度和菜场内部的利益冲突，论述菜场与市民日常生活的关系，探讨了处于城市底层的菜场摊贩经营活动。

马学强、张秀莉的《出入于中西之间：近代上海买办社会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罗列了近代上海买办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面相，详细论述了近代上海买办阶层的兴起、买办的教育背景和职业关系、收入和财富状况、消费和日常生活、婚姻家庭和宗教信仰等，全面呈现了近代上海买办的社会生活。

施扣柱的《青春飞扬——近代上海学生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考察自上海开埠至20世纪50年代全国院系调整，上海学生群体，尤其是高、中等学生的学业生活、体育生活、日常生活，以及非富家子弟、外来学生群体的生存状况。将近代学生形象从政治史回归教育生活常态。

张生的《上海居，大不易——近代上海房荒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对近代上海房荒的来龙去脉和官方的应对措施进行了梳理，并分析了与房荒相关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着重研究了房客运动。

还有些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近代上海社会生活，唐振常考察了近代上

海市民意识的萌发、发展，认为市民意识是为了与近代城市生活相适应而发展出的一套关于公共领域、公共事务的权利与义务。^①熊月之研究了上海人的形成、认同及共同文化特征。^②邵雍探讨近代上海的茶馆变迁中所反映的上海市民休闲、娱乐生活方式的变化。^③赖毓芝分析任伯年的边塞画在上海广受欢迎的现象及其反映出的社会心态。认为任伯年身处上海而以遥远边塞为题材作画，拉开了时空距离。以此切入分析上海人面对“新”与“旧”，“华”与“洋”交错的文化环境中复杂的社会心态。^④许敏考察了士、娼、优在晚清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由于这个群体广泛的社会联系，相互联系密切，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社会风尚的示范者，对晚清上海的闲暇文娱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⑤张敏从晚清服饰风尚的变化中找寻社会变迁的轨迹。^⑥葛涛就照相对清末民初的上海社会生活的影响进行了考察；葛涛还深入分析了唱片与近代上海社会生活的关系。^⑦徐涛则探讨了自行车与上海社会生活节奏、社会管理之间的关系，从中管窥近代上海社会生活的变迁。^⑧贾伟认为近代上海都市娱乐是在传统娱乐现代化和西洋娱乐本土化的基础上，相互融合而成的一种多元化娱乐形式。上海都市娱乐文化对上海市民阶层文化心理的现代性转化起到了重大作用，并成为现代市民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⑨

进入 21 世纪，上海生活史研究成为博士论文的重要选题。如楼嘉军

① 唐振常：《市民意识与上海社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3 年第 1 期。

② 熊月之：《略论上海人形成及其认同》，《学术月刊》1997 年第 10 期。

③ 邵雍：《近代上海的茶馆》，孙逊主编：《都市文化研究》第 6 辑，上海三联书店 2010 年版。

④ Yu-chih Lai, *Remapping Borders: Ren Bonian's Frontier Paintings and Urban Life in 1880s Shanghai*, *The Art Bulletin*, Vol.86, No.3 (Sep., 2004), pp.550—572.

⑤ 许敏：《士·娼·优——晚清上海社会生活一瞥》，《上海研究论丛》第九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3 年版。

⑥ 张敏：《论晚清上海服饰风尚与社会变迁》，《史林》1999 年第 1 期。

⑦ 葛涛：《照相与清末民初上海社会生活》（《史林》2003 年第 4 期）、《唱片与近代上海社会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9 年版）。

⑧ 徐涛：《自行车普及与近代上海社会》，《史林》2007 年第 1 期。

⑨ 贾伟：《冲突与融合：近代上海娱乐文化的现代性思考》，孙逊主编：《都市文化研究》第 7 辑，上海三联书店 2012 年版。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系统研究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城市娱乐鼎盛阶段的基本情况，以及娱乐与市民生活方式、外部环境、城市发展等方面的互动关系，从而揭示城市娱乐在30年代上海社会发展和变化中的作用和影响。^①刘媛考察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儿童的日常生活，通过再现上海城市为儿童构建的物质精神生活环境，传达社会转型期上海城市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之间的互动关系。^②袁蓉探讨了缝纫机对近代上海社会、近代上海人群的服饰习惯、观念转变的影响，结合科技与上海城市近代化、上海城市时尚的推进、各阶层的消费方式变迁、城市男女平等意识等问题进行深入探析，揭示缝纫机对于上海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所产生的效应及由此带来的意义。^③唐艳香通过饭店来考察近代上海城市的发展、探讨城市生活的演变。^④王英研究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播与上海社会生活的互动机制。^⑤

马学强探讨了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上海地区物价的基本走势及其与居民日常生活的关联。^⑥叶中强考察了上海市民文化消费空间的形成和发展，指出文化消费空间是商品经济和城市社会发展的伴生物。^⑦韩国学者李丙仁研究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区域商业圈和市民的消费生活。^⑧

由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社会生活史研究方兴未艾，一些学者就此尝试进行理论探索。在《史林》2002年第4期中有一组有关上海社会生活史研究的理论探讨文章。熊月之认为近代上海城市生活史有三个

① 楼嘉军：《上海城市娱乐研究（1930—1939）》，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

② 刘媛：《上海儿童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27—1937）》，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

③ 袁蓉：《缝纫机与近代上海社会变迁（1858—1949）》（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缝纫机与近代上海社会变迁》（《史林》2011年第2期）。

④ 唐艳香：《饭店与上海城市生活（1843—1949）》，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

⑤ 王英：《上海广播与社会生活互动机制研究（1927—1937）》，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

⑥ 马学强：《清代江南物价与居民生活：对上海地区的考察》，《社会科学》2003年第11期。

⑦ 叶中强：《近代上海市民文化消费空间的形成及其社会功能》，《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⑧ [韩]李丙仁：《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区域商业圈和消费生活》，《档案与史学》2003年第6期。

特点：杂、和、原生态，由于上海是一个没有文化霸权的城市，有利于异质文化的交汇、共处、融合。李长莉指出由于近代上海优越的地理位置，并且人文荟萃，成为早期中国近代化的“实验室”，记述和解析近代上海社会生活变迁史，对于理解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有典型意义。并将近代上海社会生活史的线索归纳为：经济生活的商业化、社会生活的城市化、文化生活的开放化。钱杭认为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历史（演变或变迁）是上海社会生活史的三个关键词，应在研究中体现上海特色、城市特色。^①

3. 社会风俗研究

上海民俗资料很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一些相关著作出版，如蔡丰明主编的《上海近现代社会风俗论集》（中国三峡出版社，1998年）、蔡丰明著《上海都市民俗》（学林出版社，2001年）。

在《上海近现代社会风俗论集》的“代序”中，蔡丰明将上海民俗特征概括为：兼容并蓄、趋时务新、洋派情调。该书收集文章包括饮食、居住等生活习俗，经营、叫卖等商业习俗，财神、行业神、西方宗教等信仰习俗，跳舞、茶馆等娱乐习俗。《上海都市民俗》比较全面研究了旧上海的民俗，包括上海民俗形成发展的生态、表现、特征，以及饮食服饰、居住行乘、岁时节令、社会礼仪、语言、商业贸易、宗教信仰、文艺娱乐、狎邪鄙陋等方面的民俗。

还有一些研究上海风俗的文章，顾炳权的《关于上海风俗的研究》^②考察了上海风俗的沿革，论及衣冠服饰、饮食、居住、交通、婚丧、娱乐等。并对上海若干习俗列出专题进行考察，如明季奴变与上海民风、西学的影响、上海为近代社会活动的中心、上海为物质文明的先进、租界是一面反映治乱兴衰的镜子、旧上海的陋习和腐朽风气、旧上海的特殊职业、旧上海的妇女等。

^① 熊月之：《稀世富矿：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研究的价值》，李长莉：《上海社会生活史的典型意义》，钱杭：《“上海社会生活史”的三个关键词》，《史林》2002年第4期。

^② 上海研究中心、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研究论丛》第十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龚若栋分析了上海民俗文化特征中的包容性和变异性；贺圣迪探讨了明清间上海民俗的西化；范荧考察了上海祠祭形式的民间信仰，分析了民俗传承滞后性的特征；艾萍的博士论文考察国民政府时期上海市政府以俗变政，构建和维系政府权威的历程，兼论中央、地方、民众三者的关系，力图说明政府将民俗变革纳入国家权力视野，不仅是维护政治统治的传统手段，亦是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规定性的产物；潘倩菲的博士论文通过考察20世纪30年代前后上海民俗戏曲在上海都市民俗生态中的生成、发展和繁荣，来探讨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邓大情研究了近代小说中的上海民俗；陈云霞研究了近代上海城市中的鲁班庙分布及其功能，指出民间信仰作为地缘纽带的重要环节已经参与到近代上海社会空间的塑造中。^①

小 结

改革开放后上海社会经济史研究体现了“天时、地利、人和”的特点。首先，上海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天时”。改革开放不仅打开了禁锢的思想，而且为有关上海社会经济史研究增添了现实的推动力，我国的历史研究从来都有经世致用的传统，而在上海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经世的意图尤为明显，比如上海社会科学院关于城市史、经济史、上海史的研究课题，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的黑社会、帮会、同乡会研究，都有很强的现实指向。

“地利”的特点体现在近代上海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她是上海，而不是中国别的什么城市。近代上海处于中西文化的交汇

^① 龚若栋：《论上海民俗文化个性特征的形成》，《历史教学问题》1992年第4期；贺圣迪：《明清间上海民俗的西化》，《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1期；范荧：《沪上民间信仰刍议》，《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艾萍：《变俗与变政——上海市政府民俗变革研究（1927—1937）》，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潘倩菲：《都市民俗生态和民俗戏曲——都市民俗学视野下的上海民俗戏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邓大情：《近代小说中的上海民俗》，《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8期；陈云霞：《近代上海城市鲁班庙分布及功能研究》，《历史地理》（第二十七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点，既有中国近现代社会共性之处，即所谓了解现代中国的一把钥匙，也有其独特的地方，即“三界四方”带来的种种城市特点。所有这些都为近代上海社会经济史研究提供了取之不竭的素材和动力。

在上述“天时”、“地利”的关照下，中外学者共同关注上海社会经济史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特点，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外国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都有足够的理由关注近代上海社会经济史研究。上海租界的历史使西方学者有了一份亲切感，也增添了探究上海历史的一个视角。现实上海的崛起也会引发外国学者对其历史的关注。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上海史研究方面频繁的国际学术会议，以及80年代就可以在国内的杂志上看到系列的海外学者的上海史研究文章，可以看出中外学术界在上海史研究方面交流畅通、联系紧密。

“人和”体现在上海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团队。上海社会科学院无疑是上海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中流砥柱，从《上海史》到《近代上海城市研究》，再至《上海通史》，成就了一条上海史研究的道路。这无疑是团队合作的结晶，唐振常、张仲礼、熊月之都起到了带头人的作用。他们凝聚了一批在上海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卓有成绩的学者，如罗苏文对上海娱乐业和社会生活的研究、李天纲对于社会文化的研究等。其他如上海师范大学唐力行对于上海徽商、评弹与江南社会的研究，苏智良、邵雍、郭绪印等对于上海帮会、黑社会的研究，郭绪印等对上海同乡会的研究，吴仁安对上海望族的研究也形成了团队的规模。另外，复旦大学对于上海史研究理论的探索、戴鞍钢对于区域经济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王家范等对于江南区域社会经济史和上海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宏观理论探讨都推动了上海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上海学”的讨论，还是90年代初上海城市史、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以及本世纪对上海社会生活史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上海开发和开放的现实要求。诚如历史哲学家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另一方面，上海史的研究也呈现出从专门史研究向专门史、通史研究齐头并进的发展路径，说明史学研究的自身规律也在发挥作用。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第四章

明清以来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述论

一、学术史及相关理论问题研究

1. 学界对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总体回顾

80年代初的明清史研究的综述中已经把徽州社会经济研究作为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加以总结概括。而且主要集中于租佃关系、赋役等方面，倾向于经济史研究。当然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长期对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和农民战争问题研究的积累和延续。叶显恩在《徽州学在海外》一文中介绍了日本学者藤井宏、斯波义信、夫马进等人的徽学成就，还简要介绍了美国学者居密对徽州佃仆制的研究、美国学者赵冈和加拿大学者魏安国对徽州土地制度的研究、荷兰学者宋汉理（H.T. Zurndorfer）对徽州经济、宗族的研究。^①该文所涉及的主要是1984年以前日本和西方学者的徽学研究成果。

对徽州社会经济史的学术史回顾是在徽学研究历经十余年的繁荣发展之后兴起的。90年代是徽学学术史研究的重要时段，出现了一系列徽学研究的总结文章，周绍泉、赵亚光的《徽州研究系年》介绍了1907—1992年的徽学研究成果。^②伍跃译、松漳浦所作的《徽学在中国史研究中

^① 叶显恩：《徽州学在海外》，《江淮论坛》1985年第1期。

^② 周绍泉、赵亚光：《徽州研究系年》，黄山社会科学联合会、《徽州社会科学》编辑部：《徽学研究论文集（一）》，内部发行，1994年。

的崛起——明清史研究的新动向》简要回顾了1997年以前中国学者的徽学研究，特别注意到徽州文书在其中的重要作用。^①阿风、许文继等关于徽学研究的系列综述比较详细地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徽学研究成果。阿风的《八十年代以来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回顾》、《徽州文书研究十年回顾》从徽州文书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与徽商研究、与宗法宗族制度研究、与明清农村社会制度研究、与中国法制史研究等五个方面回顾自80年代至90年代后期的徽州文书研究，试图说明徽学研究的意义超出地方史，推动了中国明清史的研究。阿风在《1998、1999年徽学研究的最新进展》一文中总结了徽学研究的一些新气象，主要是徽学研究机构的相继成立，大规模研究计划启动，国内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等因素推动了徽学研究的深入开展。该文从“徽州文书的整理研究”、“徽州的宗族研究和商人研究”、“徽州地方史和徽州文化研究”等方面总结了1998年和1999年徽学研究的进展情况。许文继的《2000、2001年徽学研究综述》一文从“徽学”的理论探讨、徽州文书的收集与整理、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徽商研究、徽州的教育、文化、人物研究等几个方面总结回顾了2000年和2001年的徽学研究概况。阿风、许文继的《2002—2004年徽学研究综述》介绍了2002—2004年间重要的徽学研究著作、徽州文书以及“徽学”概念的探讨、徽商研究、地方社会、徽州的思想文化研究等。^②此外，日本学者铃木博之在2000年发文对徽学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展望。^③

卞利的《20世纪徽学研究回顾》将20世纪的徽学研究分三个阶段：1907—1949年为第一阶段，此阶段有数部县乡镇志和乡土地理志编成，

① 伍跃：《徽学在中国史研究中的崛起——明清史研究的新动向》，《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第5期。

② 阿风：《八十年代以来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回顾》（[日]《中国史学》第8卷，1998年12月）、《徽州文书研究十年回顾》（《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第2期）、《1998、1999年徽学研究的最新进展》（《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7期）、《2000、2001年徽学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2期）、《2002—2004年徽学研究综述》（合著，《中国史研究动态》2005年第12期）；许文继：《2000、2001年徽学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2期）。

③ [日]铃木博之：《学界展望“徽学”研究の現状と課題》，《集刊東洋学》第83号，2000年5月。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并有数篇论文提及徽商，是徽学研究的萌芽发端阶段；1949—1976年是徽学研究的第二阶段，此阶段中有数十万件原始契约文书被发现，并流传于世，本阶段还有一些徽商和徽州人物和徽派建筑的研究；1977—2000年的徽学研究为第三阶段，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纷纷建立，学术活动频繁开展，徽学研究资料整理出版，徽学研究向纵深发展。该文还评析了各阶段的主要研究成果，比较简要和全面地回顾了20世纪的徽学研究，尤其是徽州的社会经济史研究。还分析了20世纪徽学研究的主要不足，如有相当数量与徽学研究有关的相关契约文书散于民间和私人收藏家之手；从整体而言，徽学研究的领域还不够丰富；徽学研究的队伍还不够稳定等。^①

刘伯山的《徽学研究的历史轨迹》将徽学研究划分为五个阶段，认为20世纪的头30年并非以徽州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但以徽州作为相关研究的范例或论据，使得徽州问题得以突出；20世纪30至70年代是徽学专题研究阶段，如傅衣凌、藤井宏等对徽商的研究；80年代随着国际交流开展和专门徽学研究机构设立和徽州资料、文书的整理公布，进入了徽学综合研究的阶段；90年代为学科化建设阶段；21世纪则正迈向国际显学。^②

王振忠的《徽学研究入门》（2011）一书对徽学研究进行了详细的回顾，将20世纪以来的徽学研究分为四个阶段：以1958年徽州文书的第一次大发现为界，此前的徽学研究主要属地方史范畴；1958—1976年为第二阶段，傅衣凌等开始利用徽州文书研究徽州佃仆制等，在“文革”前大陆亦有关于徽商、商业资本形成及特色、徽州土地关系、明末清初的奴变等方面的研究，海外何炳棣、杨联陞等人的研究也有涉及徽州方面的成果，日本学界有关于徽商、庄仆、商业书、商人书的研究；1977—2000年为徽学研究发展的第三阶段，本期徽学作为独立学科逐步形成并得到学界认可；21世纪以来的徽学研究为第四阶段，安徽当地学者、学术机构

^① 卞利：《20世纪徽学研究回顾》，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编：《论徽学》第2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 刘伯山：《徽学研究的历史轨迹》，《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5期。

和国内外学者积极推动了徽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介绍了学界对于徽商及相关问题研究、宗族与徽州区域研究、社会文化史研究、法制史研究、艺术史研究的概况，评介了徽学研究的一些代表作。还从新史料、新理论、新领域等方面对徽学研究作了前瞻性思考。参考书目部分包括一部分著作的简介和以编年的形式罗列论著。王振忠作为当代徽学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其对徽学研究自然如数家珍，能够以简要篇幅将徽学研究的总体面貌和主要学者的研究特点呈现出来，其对徽学研究的前瞻也是深透和准确的。

邹怡在《明清以来的徽州茶业与地方社会（1368—1949）》（2012）一书中指出此前的徽学学术史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顾及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因而此类综述和论著目录均存在“机构型缺失”。^①该书对海外徽学研究的学术脉络进行了梳理，分“前区域史时期”、“区域史角度的切入”、“宏大论题关照下的探讨”、“日常生活史的展开”、“韩国和港台地区的徽州研究”等几个部分对海外徽学研究成果进行了分类综述，并对不同时期的研究热点和不同国家、地区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对海外徽学研究中的学术脉络走向进行了解读。

2. 方志、佃仆制研究综述

浦霞的《近20年来徽州旧志研究综述》总结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徽州旧志研究范围的扩大以及理论方法的更新。邹怡的《徽州佃仆制研究综述》回顾了至2004年学术界对徽州佃仆制的研究成果，并将学术界对徽州佃仆制的研究分“研究框架构建期（1960、1977—1981）”、“学术分歧讨论期（1981—1990）”、“新式思路进入期（1993年至今）”等三个时期。围绕学界关于徽州佃仆制研究中争论较多的三个问题，即“佃仆的阶层归属问题”、“佃仆地位形成的主因问题”、“佃仆与其他相似称呼间的差异问题”罗列观点，并进行评述。^②

^① 邹怡：《明清以来的徽州茶业与地方社会（1368—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

^② 浦霞：《近20年来徽州旧志研究综述》，《黄山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邹怡：《徽州佃仆制研究综述》，《安徽史学》2006年第1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3. 徽商、宗族研究综述

曹天生在1995年发表的《本世纪以来国内徽商研究述论》一文阐述了徽商研究在徽学中的核心地位，简要总结了徽商的研究初起与发展。将徽商研究归结为七个问题：徽商的起源问题、徽商的特色问题、徽商经营的行业问题、徽商活动的区域问题、徽商的性质问题、徽商的历史作用问题、徽商衰落的原因问题等。并围绕上述七个方面问题总结各家观点，进行评述。^①王世华的《徽商研究：回眸与前瞻》和上一篇综述的思路相近，全面总结了近六十年徽商研究的概况，将其特征总结为：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研究视野不断扩大；总结了徽商研究中的16个问题，涉及徽商的起源、兴起原因、徽商特色、性质、经营行业、经营范围、经营之道、商业道德、经营文化、徽商精神、徽商与文化、徽商与教育、徽商与公益事业、徽商衰落的原因、徽商的历史作用等。文章最后提出徽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需要发掘新的材料、开展多学科研究、多做原创的研究、组织重大课题攻关、主动服务经济建设。^②此外，畅民的《建国以来徽商研究综述与前瞻》（《安徽史学》1986年第5期）和张健的《徽商研究评介》（《中国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7期）也对一定时期的徽商研究进行了回顾和评析。

近年有些学者对徽商某一方面的研究进行综述。李少玉从徽商的经营艺术、经营特征、商业道德等三个方面对徽商的经营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总结；李莉莉就徽商衰落原因的研究进行了综述。^③

唐力行的《徽州宗族研究概述》梳理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徽州宗族研究概况。介绍了叶显恩、唐力行、王振忠、赵华富、周绍泉、栾成显、陈柯云、郑振满等国内学者，牧野巽、多贺秋五郎、仁井田升、斯波义信、臼井佐知子、宋汉理、贺杰、居密、朴元煊等国外学者在徽州宗族

① 曹天生：《本世纪以来国内徽商研究述论》，《史学月刊》1995年第2期。

② 王世华：《徽商研究：回眸与展望》，《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③ 李少玉：《徽商经营文化研究综述》（《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4期）、李莉莉：《徽商衰落原因的研究综述》（《学理论》2010年第2期）。

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强调要将“宗族放到徽州社会大系统中加以考察，在社会要素的互动中透析徽州宗族的特质”。^①任志强从徽州宗族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宗族社会、宗族制度、商人与宗族、家谱与名族志等几个方面对 20 世纪的徽州宗族研究进行了概括。^②

4. 徽学的学术会议综述和论著索引

除上述关于徽学研究或徽州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某一方面的综述外，还有一些徽学研究的学术讨论会的综述。有余年的《徽州社会经济史学术讨论会述要》（《学术界》1990 年第 6 期）、李琳琦的《徽州社会经济史学术讨论会综述》（《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1 年第 1 期）、陈柯云的《中国徽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 年第 3 期）、毛新红等的《“二十一世纪徽学研究”研讨会综述》（《理论建设》2007 年第 6 期）等。大体能够反映 20 世纪 80 年代至 21 世纪初的徽学研究界学术交流的盛况。

此外，一些徽学研究者还整理了徽学研究的论著索引。如《徽商研究论文集》的附录“徽商研究参考资料索引”和《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的附录“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文献目录”，上述目录索引主要涵盖了民国至 80 年代中期的徽学研究成果。^③周绍泉、赵亚光编的《徽学研究系年》收录了 1907 年至 1992 年的徽学研究文献。^④冯雪的《徽学研究论著资料索引》（《大学图书情报学刊》1994 年第 3 期）、薛贞芳的《徽学研究论著资料索引（1995—1997）》（《大学图书情报学刊》1999 年第 1 期）、胡中生、王颖的《2003 年徽学研究论文索引》（《徽学研究通讯》第 13 期，2004 年 12 月）都为徽学研究提供了便利。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网站也有徽学研究的索引资料可作借鉴。王振忠的《徽学研究入门》以编年的形

① 唐力行：《徽州宗族研究概述》，《安徽史学》2003 年第 2 期。

② 任志强：《徽州宗族研究综述》，《徽学》第 2 卷，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③ 《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刘淼辑译：《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黄山书社 1988 年版。

④ 周绍泉、赵亚光：《徽学研究系年》，张脉贤主编：《徽学研究论文集（一）》，《徽州社会科学》编辑部 1994 年版。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式罗列了20世纪初至2009年包括大陆、台湾和韩、日学者在内的徽学研究论著索引。邹怡则在《明清以来的徽州茶业与地方社会（1368—1949）》一书中附录了海外徽学的论著目录，主要包括英、日、韩文论著和港台地区有关徽学研究索引，其中还包括会议论文和学位论文，殊为难得。

5. 对徽学研究者的品评

许多论著都提及大陆的徽学研究机构，而对徽学研究的学术群体进行评述的却难得一见。著名史学史专家瞿林东以品评著作、怀念故人的方式对张海鹏创立的安徽师范大学徽商研究的学术群体进行评论。指出该群体以多人合作的方式出版了《明清徽商资料选编》（1985）、《中国十大商帮》（1993）、《徽商研究》（1995）、《徽商》（2005）等著作。该群体的王廷元、唐力行、王世华、李琳琦等已经成为当今徽商研究的中坚。^①

方利山的《资料，徽州学的基石——汪世清先生的徽州学研究》论述了汪世清对徽州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考辨和探究。^②

6. 徽学体系的讨论

在徽州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理论探讨方面，大多围绕“徽学”体系的构建。自20世纪80年代，就有许多这方面的争论。关于这个问题，有两部总结性的论著。一为姚邦藻主编的《徽州学概论》（2000），一为朱万曙主编的《论徽学》（2004）。

叶显恩在《徽州学概论》的“序”中指出“徽商是徽州历史全面高度发展的支点”，这一观点与张海鹏在80年代提出徽商是徽州社会文化发展“酵母”的说法相得益彰。该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徽州学通论”探讨徽学的相关理论问题，摘录了张海鹏、张立文、陈学文、周绍泉等对于徽学的阐述。并从时间、空间、对象等方面讨论了徽学的概念、对象、研究

^① 瞿林东：《二十年的功力——评一个徽商研究的学术群体》，《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② 方利山：《资料，徽州学的基石——汪世清先生的徽州学研究》，《黄山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方法等。关于徽学研究的对象、范围，该书指出，以空间论，最主要指徽州六县，以至徽商活动的有关地域。以时间论，从远古以至民国。以对象而言，指徽州人和徽州文化，徽州文化包括徽州经济史、技艺文化艺术史，以及徽州宗法、徽州风俗、徽州方言、徽州名胜等。至于徽学研究的意义和方法，该书指出徽学研究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农村社会实态提供了一个范本，徽学还有地理文化单元的人类文化学研究价值。下编“徽州学分论”研究了徽州人、徽州人文、徽州技艺等。“徽州人”一章包括徽州的宗族和土地制度、徽州人概说、徽商，以及朱熹、戴震等人物个案；“徽州人文”一章包括新安理学、徽州朴学、徽州教育、方言、版画、篆刻、画派、戏剧、民俗等；“徽州技艺”一章介绍了徽州的科技、徽派建筑、工艺、徽菜、徽州的刻书、藏书、文房四宝、新安医学。该书反映出徽学体系的构建基本成型。

《论徽学》一书汇编了自80年代以来探讨“徽学”的主要文章。宫为之考察了“徽学”一词的由来，认为“徽学”的概念形成于元朝中后期。栾成显认为“徽学，乃是以徽州文书及徽州的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以揭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各方面的社会实态和发展规律为研究目的的一门历史学科”，“徽学与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一样，在中国史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地位”。^①朱万曙认为徽学是以大量徽州文献和徽州文书以及物质文化遗存为基础的，以历史上徽州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并进而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综合性学科。^②周绍泉认为“徽学之所以成为一门新学科，其根本原因还是大量徽州文书的发现”。^③张海鹏认为“徽学即徽州学，或曰徽州文化。它是在原徽州（府）下属六县（歙、黟、休宁、祁门、绩溪、婺源）所出现的既有普遍性又有典型性并且具有一定学术含量的各种文化现象的整合。它根植于本土，伸展于各地，即是由‘小徽州’

① 栾成显：《元末明初祁门谢氏家族及其遗存文书》，载于周绍泉、赵华富主编：《'95 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② 宫为之：《“徽学”之由来》（发表于 1987 年），《论徽学》，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③ 周绍泉：《徽州文书与徽学》（发表于 2000 年），《论徽学》。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和‘大徽州’文化融合形成的内容丰富、品位较高的一座文化宝藏”。他对徽学的界定强调“小徽州”、“大徽州”和地域文化的概念，以及徽商在徽州发展中的“催化剂”作用。^①唐力行将徽学研究的范围分三个层次，徽州本土为核心层，江南为中心区，中国及海外为外围层次。如以核心为小徽州的话，中间层及外围即是“大徽州”。借用胡适“大绩溪”、“小绩溪”的概念，指出“徽学若无大徽州，徽学也难成局面”。^②张立文认为徽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指出“所谓徽学，是指以徽州社会、经济、文化、思想、艺术、科技工艺等为研究对象的、具有徽州特色的一种理念和学说的总和”。^③黄德宽将徽学研究空间界定于徽州一府六县，时间是从宋代徽州之名确立至清末。^④刘伯山认为南宋至清末的徽州文化是徽学研究的重点内容而不是唯一内容。^⑤赵华富认为徽学属于历史学科，徽学研究的主体是徽州的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以及历史上徽州人在异地他乡的活动和徽州文化在周围地区的发展。^⑥

刘淼讨论了徽学的学科地位问题，认为要考虑徽学的门类和学科级别问题，便于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管理，有利于本学科的长远发展。刘淼认为徽学应列入综合学科，研究主体是徽州的历史文化，但又不同于历史学。^⑦张子侠阐述了徽学学科体系的构想，赞同徽学历史文化说，认为唐力行、张海鹏先后提出的“小徽州”、“大徽州”的提法“很有启发意义和学术价值”。对于徽学的性质和特点，张子侠认为“综合性学科”说法不妥，就学科性质来说，应该归属于史学。^⑧曹天生讨论了徽学与敦煌学和藏学相比存在的差距，主要在资料整理、理论研究方面，在具体研究中有“徽人说徽”的倾向，拔高了徽商的形象。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丢弃了

① 张海鹏：《徽学漫议》（发表于2000年），《论徽学》。

② 唐力行：《徽学研究的对象、价值、内容与方法》（发表于1999年），《论徽学》。

③ 张立文：《徽学的界定及其研究方法》（发表于2000年），《论徽学》。

④ 黄德宽：《徽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发表于2001年），《论徽学》。

⑤ 刘伯山：《徽州文化的基本概念及其研究方法》（发表于1999年），《论徽学》。

⑥ 赵华富：《论当代徽学》，《论徽学》。

⑦ 刘淼：《关于徽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论徽学》。

⑧ 张子侠：《徽学学科体系刍议》，《论徽学》。

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另一方面，借用其他学科的方法不够。^①韩秀桃总结了“徽学”的定义及内涵，指出徽学界一般认为徽学是以徽州历史文化为主要研究内容的学术领域。从时间看，主要是对明清两代徽州历史文化的研究，可以上溯宋代、下及于民初。从空间看，是“小徽州”和“大徽州”的结合，“小徽州”指徽州府所留存的文献、文物和各类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大徽州”以徽商和徽籍历史人物在其他地域的活动和影响为主要研究对象。^②

在研究方法方面，唐力行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总结为：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如计量史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运用系统论的方法，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以宏观的视野考察研究对象。唐力行还提出区域史研究要从三个层面上拓展视野：要注意区域与周边地区的关系；要进行区域比较研究；区域史研究要与整体史相结合。^③

至于徽学研究的意义，朱万曙的观点较有代表性。他认为徽州文化之于明清文化的标本价值在于：一、徽州文书与文献反映了明清历史文化的具体面貌；二、大量的徽州文化遗存是明清文化的物态反映；三、徽州文化的若干特征反映了明清文化的特征。^④

综上所述，对徽学的概念界定以徽州历史文化说得到广泛认同；徽学性质主要还是史学范畴；徽学研究时限主要在于宋至清末；地域范围不但在于徽州本土，更兼及徽商、徽人活动地域；徽学的研究资料来源主要是徽州文献、文书及物化遗存等；徽学的研究方法是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徽学的研究价值在于其鲜明的地域特色和由小见大的标本价值。徽学与敦煌学、藏学并列为中国的三大地方学基本为学界认同，虽然关于三者的区别还有很多讨论，比如很多学者认为徽学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意义已经超出地

① 曹天生：《从藏学和敦煌学的研究现状瞻望徽学学科建构和徽学研究的现代化》，《论徽学》。

② 韩秀桃：《明清徽州的民间纠纷及其解决·导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③ 唐力行：《从徽学研究看区域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月刊》2006年第3期。

④ 朱万曙：《徽州文化：明清文化的标本》，《徽学研究通讯》2000年第1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方学的范畴。总之，不像很多自封的地方学，徽学作为学科的独立存在已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

二、研究的兴起：佃仆制、徽商、宗族等领域的研究

1. 改革开放前的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

尽管本书主要考察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但对于研究的源头总要有所交代。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有学者关注徽州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吴景贤在 1937 年发表了《明清之际徽州奴变考》研究了顺治年间徽州黟县等地宋乞领导的佃仆起义。^①傅衣凌在研究徽州伴当、世仆中，开始注意到徽商的材料，并于 1947 年撰成《明代徽商考》一文，对徽人从事商业的时间、徽商的富名、徽商经营的领域、活动的地点、徽商资本的出路和徽商在中国商业史上的地位作用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在对徽商资本深入分析之后，傅衣凌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凡是商业资本愈发达的地区，乡族势力也愈为浓厚。”徽商资本在分解封建社会的过程中起到一定作用，“且产生不少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然终被这旧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紧紧的限制着，于是遂使得徽商资本的发展，一方面，受着古旧的老朽的生产方式的残存所压迫；另一方面，又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发展所苦，死者捉住生者，形成了徽商资本的一个基本特点。”^②1956 年出版的《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二部分“明代徽州商人”是对前文的修订，傅衣凌说：“所谓徽商，盖指以新安江流域为中心的安徽徽州府的商人。”^③徽人经商，傅衣凌认为除因“人多地少”外，还在于赋税的沉重，而且徽州处于江浙经济区的中心，交通便利。上述徽州多商贾的原因多被后来学者采用。

① 吴景贤：《明清之际徽州奴变考》，《学风》7 卷 5 期，1937 年。

② 傅衣凌：《明代徽商考——中国商业资本集团史初稿之一》，《福建省研究院研究汇报》2 期，1947 年。

③ 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49 页。

傅衣凌还指出徽商的资本来源于宗族合伙或乞贷于大户，由此可见中国商业资本是以乡族为结合纽带的，也是中国商业帮会之所以成立的要件。^①另外，提出徽商资本与官僚政治的密切关系，所获利润的出路在于奢侈消费和乡族的消耗。结论是徽商资本推动了封建制度的解体，但旧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又限制了徽商资本的进一步发展。傅衣凌的徽商研究展现了其过人的史识，为后来的徽商研究开辟了路径，其主要观点也多被后来的学者所继承和发扬。特别是前述辩证看待徽商资本的观点成为后来徽商研究的指针。在当代研究有成的徽学研究者的研究中，我们都能或多或少看到傅衣凌的影响。傅衣凌也因此成为学界公认的徽州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开山。

因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和阶级斗争研究的带动，80年代以前的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主要集中于徽商研究和徽州佃仆制研究。除前述傅衣凌在徽商方面的研究文章外，在50年代中后期和60年代初，傅衣凌、刘序功、程梦余、吴雨苍、苏诚鉴等发表了一批佃仆制方面的研究文章。^②为80年代兴起的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此一时期，日本学者也开始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如牧野巽的《明代同族的社祭记录之一例——关于〈休宁茗洲吴氏家记·社会记〉》（《东方学报》，东京第11册之一，1940）考察了茗洲吴氏从明代至清代的“社祭”，认为社逐渐演化为宗祠。并得出结论：越是产业、文化发达的地方，宗族越有强化的趋向。多贺秋五郎所著《关于〈新安名族志〉》（《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1956年第6期）介绍了徽州历史上的世家望族的公共家谱，认为类似体例似乎只存徽州一地。日本学者对于徽商研究也开始较早，藤井宏于1953—1954年以明人汪道昆的《太函集》为资料撰写了

① 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4—75页。

② 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的佃仆制研究文章有：刘序功：《略谈清初徽州的所谓“奴变”》（《史学工作通讯》1957年第1期）、吴雨苍：《从两块碑刻看历史上佃农的命运》（《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9期）、程梦余：《宋七与徽州奴变》（《安徽日报》1958年5月25日）、傅衣凌：《明代徽州庄仆文约辑存——明代徽州庄仆制度之侧面研究》（《文物》1960年第2期）、苏诚鉴：《从一批租佃契约看鸦片战争前徽州地区封建地租剥削》（《安徽日报》1963年2月9日）。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新安商人研究》（《东洋学报》第36卷1—4期），开创了海外徽商研究。傅衣凌称之为“有关徽商研究中最系统的著作”。^①傅衣凌还将该文翻译发表于《安徽历史学报》1958年第2期和《安徽史学通讯》1959年第1期。日本学者重德田亦于1967年撰写了《清代徽州商人的一个侧面》一文，考察了清代后期徽商的活动。^②徽学作为国际显学此时已经露出了端倪。

2. 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初兴：徽州佃仆制和土地问题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徽州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主要是从徽州的佃仆制和土地关系开始的。徽州佃仆制研究的先声是20世纪30年代谢国桢、吴景贤、傅衣凌等进行的“奴变”研究。20世纪60—80年代傅衣凌、章有义等逐步构建了佃仆制的研究框架，即从契约文本、庄仆条规、谱牒的分析进行实证研究。^③

叶显恩是80年代徽州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代表人物，他从60年代开始关注徽州佃仆制的研究，1978—1981年连续发表《从祁门善和里程氏家乘谱牒所见的徽州佃仆制度》（《学术研究》1978年第4期）、《明清徽州佃仆制试探》（《中山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关于徽州的佃仆制》（《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等。《从祁门善和里程氏家乘谱牒所见的徽州佃仆制度》第一次将家谱资料引入佃仆制研究，由此探讨佃仆制的起源、佃仆承受的地租和劳役。《明清徽州佃仆制试探》对佃仆的名目、数量，佃仆制的衰落及其残余进行考察。《关于徽州的佃仆制》是叶显恩实地考察徽州的报告。通过文献与实地考察的二重证据，全面地研究了徽州佃仆制的发展过程、租佃、劳役活动等基本情况。

1983年叶显恩的《明清农村徽州社会与佃仆制》出版，全书分六章，分别研究了徽州的历史地理、土地关系、乡绅阶层、商业资本、宗法制度以及佃仆制。作者指出“佃仆制在明清时期是盛行徽州地区的租佃制度”，^④

① 转引自王振忠著：《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页。

② 参看刘焱辑译：《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黄山书社1988年版。

③ 邹怡：《徽州佃仆制研究综述》，《安徽史学》2006年第1期。

④ 《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第204页。

认为佃仆的身份属于农奴，隶属于整个宗族。该书的结论是“带有奴隶制残余的徽州缙绅地主势力的强大及其久而不衰，徽州商业资本的发达，宗法势力的强固，封建理学的猖獗，以及地理环境和人口的特点等种种原因，交相作用，互相影响”。^①

有很多中外学者为该书撰写书评。傅衣凌、杨国桢认为“庄仆”可能比“佃仆”更确切，此外就叶显恩对田皮权与永佃权的关系、佃仆劳动与徽州商业资本之间关系的提法进行了商榷。^②居密认为佃仆的世袭性质，使他们的生活比佃农有了更多的保障。^③该书的研究角度、所用史料类别及田野、文献的二重证据法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徽学研究，为徽州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系统研究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章有义的《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收录了研究徽州地区土地关系和租佃关系的论文16篇，按所研究内容的时间顺序，关于明代的两篇，明清的一篇，清代的十三篇。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作者试图推出一些论断，如土地的私有、土地兼并加剧、没有确凿的资本主义租佃关系的依据等。其另一本著作《近代徽州租佃关系案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为前书的续集，该书除研究近代徽州的租佃关系案例，最后还归纳了近代徽州租佃关系的一些特点，如族产在地权形式中所占比重大、田骨和田皮由分而合、人身依附关系松弛、佃户更动频繁和租佃关系不稳定、谷物定额租占统治地位、清末地租量随着农业生产衰落相应下降、佃农抗租加剧，等等。

杨国桢也在1983—1984年间作过徽州佃仆制的研究，收录于后来出版的《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人民出版社，1988年）。在该书的第三章有“皖南祁门县的营山和棚民”一节、第四章有“从民间文约看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的几个问题”一节，探讨了庄仆和一般佃农的区别，认为明清

① 《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第301—302页。

② 傅衣凌、杨国桢：《喜读叶显恩新著〈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3期。

③ [美]居密著、黄启臣译：《明清时期徽州的宗法制度与土地所有制——兼评〈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江淮论坛》1984年第6期、1985年第1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时期存在庄仆向完全佃户转化的现象。^①

刘和惠于1984—1985年发表《明代徽州佃仆制考察》（《安徽史学》1984年第1期）、《明代徽州胡氏佃仆文约》（《安徽史学》1984年第2期）、《明代徽州佃仆制补论》（《安徽史学》1985年第6期）。认为佃仆的主要成因是佃耕主家的土地，还对佃仆与佃农、佃仆与奴仆的区别作了辨析，并探讨佃仆的劳役量占其总劳动量的比例。刘和惠、汪庆元的《徽州土地关系》（2004）一书系统考察了徽州的政区沿革、生态环境、人地关系，以及土地所有制形态、土地使用关系、土地权属的转移、土地管理、赋役等，其中第三章“土地使用关系”详细探讨了佃农、佃仆和棚民的经济社会生活，是有关徽州土地关系集大成之作。^②

江太新的《论清代土地关系的新变化》（2011）一书论及清代徽州土地买卖中宗法关系的松弛。通过对清代徽州地区土地买卖双方亲疏关系的统计发现，宗法关系在土地买卖中的作用不断削弱，土地买卖越来越向自由买卖发展。^③

自90年代，随着社会经济史研究视野的开阔，佃仆制研究在历经数年的沉寂之后开始复苏，突破了80年代单一的土地关系的视角，研究者从多角度考察徽州的佃仆制。^④

经君健的《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中第八章“特定地区的贱民”专辟一节研究佃仆，着力分析佃仆的身份问题，主要从时序上考察清代“开豁世仆”法令的变迁，分析法律意义上世仆的身份变化。陈柯云的《雍正五年开豁世仆谕旨在徽州实施的个案分析》认为“宗族势力的强大，宗族与地方官府的勾结，使雍正乾隆年代开豁世仆的‘地震’，没有发挥更大的摧毁力。而佃仆制的根基仍然是较为牢固的”。^⑤卞利的《清

①④ 邹怡：《徽州佃仆制研究综述》，《安徽史学》2006年第1期。

② 刘和惠、汪庆元：《徽州土地关系》，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③ 江太新：《论清代土地关系的新变化》，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70页。

⑤ 载于周绍泉、赵华富主编：《95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世宗开豁世仆令在安徽的实施》论述了明清时期徽州、宁国地区世仆的构成、社会地位及主仆斗争。^①韩秀桃的《清代例的制定与实施——雍正五年开豁世仆谕旨在徽州、宁国实施情况的个案分析》一文揭示政府借助律例合编，在实践中逐渐适应基层运作的调整。^②

周绍泉的《明后期祁门胡姓农民家庭生活状况剖析》（《东方学报》第67册，1995年）认为农民是否沦为佃仆主要取决于地主势力的强弱。臼井佐知子的《徽州文书所见有关“承继”问题》（《东洋史研究》55卷3号，1996年）指出地主主要是以佃仆世代相承来确保劳动力数量的稳定，所以当佃仆有多个儿子的时候，只要其中有能够继承佃仆劳役者，其余诸子就有一定的自由行动的机会，如出外经商。这就为佃仆发展独立的经济力量和摆脱佃仆的身份提供了机会。中岛乐章的《明末徽州的佃仆制及其纷争》（《东洋研究》58卷3号，1999年）收集了徽州族谱中主仆相争的事例，对佃仆制进行考察，认为16世纪以来的商品经济发展提高了佃仆的经济独立性，为佃仆提高社会地位带来机遇，但并不一定与佃仆身份、主仆关系的改变直接相关。^③

魏金玉将佃仆制放到明清时期土地租佃关系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去考察，就佃仆制与族产、祠产联系密切的原因提出新观点，认为佃仆会随同房屋、土地的买卖转让和分家继承而改换主人，随着一代代的分家继承，佃仆的主人越来越多，而每个主人占有的份额却越来越小，以至严格的主佃关系难以维持，只有把有关土地房产作为全族财产，不再继承分割，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因此，佃仆制与宗族集体所有制有密切联系。^④魏金玉从一个新的角度说明了徽州佃仆制与宗族的关系。吴秉坤、陈正通过分析

① 载于欧阳发等主编的《安徽重要历史事件丛书·经济史踪》，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 韩秀桃：《清代例的制定与实施——雍正五年开豁世仆谕旨在徽州、宁国实施情况的个案分析》，《法制与社会发展》2000年第4期。

③ 太田出著、张学峰译《1999年日本史学界关于明清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11期。

④ 魏金玉：《明清时代皖南火佃考——为祝贺李文治先生九十寿辰而作》，《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增刊。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最新发现的清代徽州佃仆文书，认为部分佃仆不再住屋佃田后，就无需为地主服役，并取消主仆名分。研究表明部分清代徽州佃仆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世仆”，而是具有自由选择权的“佃农”，清代徽州佃仆制已由以严格隶属关系为主向自由租佃关系发展。^①

关于“义男”的争论，彭超认为义男是变相奴仆；^②叶显恩在《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一书中认为义男即是奴仆；许文继则指出义男兼有养子和奴仆的双重身份。^③汪庆元认为类似奴仆的义男只是义男的属性之一，一些佃农、自耕农家庭收养义男并立为户主，义男和义父家庭的结合具有社会互助性质。在徽州这样宗族势力强大的地方，义男作为异姓继承者存在其间，表明宗族统治势力的松解。明中叶以后，在国家修正的法律条文中，承认农民家庭中义男的财产继承权和人身自由，是明代社会变迁在法律层面的反映。^④

总之，90年代以来对于佃仆制的研究呈现多角度、多视角的特点。学者从各自熟悉的研究领域展开对佃仆制的研究，有一些别开生面的议论。而对土地制度的研究在台湾地区还有延续，如张纯宁的博士论文通过明代散件买契探讨了明代徽州土地所有权的变化。^⑤但总体而言，佃仆制和土地制度研究趋于沉寂，学界对徽商和徽州宗族的研究则长盛不衰。

3. 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突破：徽商研究

虽然在徽学理论探讨方面，很多学者主张徽学是一门综合学科，但就徽学研究成果看，大多还是社会经济史的内容，也就是说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是徽学研究的核心。而在徽州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无疑，徽商研究又是其重心所在。张海鹏提出的徽商是“酵母”的观点，得到学界的广泛

① 吴秉坤、陈正：《清代徽州佃仆制的变异——以新发现的佃仆文书为线索》，《黄山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② 彭超：《谈“义男”——安徽省博物馆藏明清徽州地区契约介绍之一》，《安徽文博》试刊号，1980年。

③ 许文继：《“义男”小论》，《文史知识》2001年第11期。

④ 汪庆元：《明代徽州“义男”考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⑤ 张纯宁：《明代徽州散件卖契之研究——兼论土地所有权的变化》，成功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

认同。即使从徽州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实践看，20世纪四五十年代前辈学者傅衣凌、陈学文和日本学者藤井宏的研究也是从徽商人手的。而徽学在八九十年代发扬光大为一门国际显学，也可以说主要是徽商研究之功。徽州之独特，在于徽商的独特，以及在徽商与“小徽州”和“大徽州”的互动中所形成的独特社会、经济结构。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徽商研究是从叶显恩等人开始的。^①此后，徽商研究渐为学界重视。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唐力行、王世华等编的《明清徽商资料选编》（1985）是第一本徽商资料集，成为后来徽商研究广泛征引的资料。^②80年代至90年代初徽商研究主要还处于积累阶段，一大批徽商研究成果逐步面世。这些成果主要围绕徽商的起源、兴起的原因、经营领域、活动范围、徽商的性质、特点、资本来源与出路、徽商的历史作用等方面展开。关于徽商的起源，有叶显恩、李则纲的东晋说^③、傅衣凌、刘和惠等的宋代说^④，张海鹏等认为徽州商帮应形成于明成化、弘治之际，^⑤唐力行认为徽州商帮的心理整合完成，也即徽商成帮应在明代嘉靖年间；^⑥王振忠指出“徽商”一词在文献中较早出现应在明代正德年间（16世纪初），万历年间已普遍使用。^⑦关于徽商兴起的原因，除多数学者认同的徽州山多地少、人多地少以外，叶显恩认为徽商的形成主要得力于徽州经济作物资源和佃仆制；^⑧唐力行则指出徽商的形成与发展得力于宗族势力。^⑨

① 卞利在《20世纪徽学研究回顾》一文中指出叶显恩发表的《试论徽州商人资本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3期）应是“文革”结束后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徽商研究的论文。

② 余英时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有十多处引用该书和张海鹏与唐力行所撰文章《论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4期）。

③ 李则纲：《徽商述略》（《江淮论坛》1982年第1期）、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④ 傅衣凌：《明清时代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刘和惠：《徽商始于何时》（《江淮论坛》1982年第4期）。

⑤ 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

⑥ 唐力行：《论徽商的形成及其价值观的变革》，《江淮论坛》1991年第2期。

⑦ 王振忠：《明清文献中“徽商”一词的初步考察》，《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⑧ 叶显恩：《试论徽州商人资本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3期。

⑨ 唐力行：《论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关于徽商经营的行业，在80年代有王思治、金成基、萧国亮、刘淼、汪士信对徽州盐商的研究；^①王廷元对典商的研究；^②吴仁安、唐力行对茶商的研究等。^③上述的研究成果在张海鹏主编的《徽商研究》和《中国十大商帮》中有所反映。

张海鹏、王廷元所编的《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汇集了一批研究徽商的专家，主要是安徽师范大学的张海鹏、王廷元、王世华、周晓光、李琳琦，另有鲍义来、周绍泉、江怡桐、张健参与了部分内容。分别从徽州商帮的形成与发展、徽商的资本积累、徽商在长江流域的经营活动、徽商与两淮盐业、徽商在茶、木、粮、典和棉布业中的经营活动、徽商与封建势力、徽商的“贾儒观”和商业道德、徽商资本的出路、徽商与徽州文化、徽商个案研究、徽商的衰落等几个方面入手全面研究了徽商。其中“徽商个案研究”一章征引了很多新材料，如胡开文的分家阉书是第一次面世，歙县芳坑江氏茶商的材料也是第一次整理。此前，张海鹏、张海瀛主编的《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与唐力行的《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也包含很多徽商研究的内容。

《中国十大商帮》的最后一章“徽州商帮”由王廷元、唐力行、王世华、周晓光、李琳琦撰写，考察了徽商的兴起、活动范围、经营行业、资本、投资产业，以及徽商的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以心为质等商业道德，还探讨了徽商与宗族势力的关系，以及徽商衰落的原因。认为徽商衰落的原因在于徽商所得利润始终在流通领域，流入封建管道，加之官府敲诈、太平天国运动的战乱、盐商与茶商的衰落等。

① 王思治、金成基：《清代两淮盐商的盛衰》（《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2期）、萧国亮：《清代两淮盐商的奢侈性消费及其经济影响》（《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刘淼的系列论文：《盐商鲍志道及其家世考》（《江淮论坛》1983年第3期）、《徽州盐商的经营特点》（《徽学》1986年第1期）、《清代前期徽州盐商和扬州城市经济的发展》（《安徽史学》1987年第3期）、汪士信：《乾隆时期徽商在两淮盐业经营中应得、实得利润与流向试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

② 王廷元：《徽州典商述论》，《安徽史学》1986年第1期。

③ 吴仁安、唐力行：《明清徽州茶商述论》，《安徽史学》1985年第3期。

唐力行的《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一书的视角虽然已经超出单纯的徽商研究，而是在徽商和其他商帮研究的基础上考察近世社会转型问题。但书中却有多处以徽商为案例阐述商人在近世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作用。

唐力行的《商人与文化的双重变奏——徽商与宗族社会的历史考察》（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包含六章内容，考察了徽州移民社会与徽商形成的关系，分析徽商与宗族的互动、与社会风尚变迁的关系，总结了徽商“贾而好儒”的特征及徽商文化的特点，认为徽商的活动推动了近世中国社会的转型。总之，该书通过对徽商、新安文化、宗族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论述阐明了徽商的形成、特色以及与徽州社会各要素之间互动，并深入探讨中国近世社会转型的特点。

王世华的《富甲一方的徽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分上、下两编，上编主要考察徽商形成、发展、经商地域、从商人数、商业资本、经营行业，以及徽商的特色、精神和徽商的没落。下编是对棠樾鲍氏盐商、墨业巨商胡开文、盐商江春、歙县芳坑江氏茶商等的个案研究。该书细致、系统地研究了徽商形成、发展、衰落的基本过程。

周晓光、李琳琦的《徽商与经营文化》（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考察了徽商形成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氛围、徽商的价值观、经营方式、心理活动，以及徽商对经营环境的营造，还探讨了徽商的“徽骆驼”精神，徽商的商业道德、生活文化。最后，对徽商与徽州文化作了总结，突出了徽商在徽州文化形成中的“酵母”作用。

陈学文的《徽商与徽学》（方志出版社，2003年）为作者徽学研究的论文集，包含徽州商业资本、徽商与江南社会经济、徽州商业文化、徽州土地契约、徽州族谱方志、胡适手稿、徽商与龙游商帮的比较研究等内容。该书认为徽学是“以徽州为中心，积淀和融注于徽州土地上的中华传统文化之精华。既是地域文化，又是中华文化”，称“徽商研究是徽学研究的中坚”。该书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如考证黄氏是最早进入两淮经营盐业的徽商群体，明弘治、正德间至少有七位黄姓徽商在淮盐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以往徽商研究多认为是嘉靖时徽商才进入两淮经营盐业。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李琳琦的《徽商与明清徽州教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分八章。第一章主要论述徽州的社会文化特点与教育概况。第二、三、四章探讨了明清徽州教育的发展及其与徽商的关系。第五、六章考察了徽州的商业教育。第七章为徽商与教育关系的个案研究。第八章探讨了徽州教育与商业发展的互动关系。张海鹏在“前言”中指出了该书的一些新观点，如宋代官学兴起与地方官重教密不可分；书院经费的商业化运作等。该书总结了徽州教育的特点：相对平等性和开放性、传统教育观念的变通和调和、教育内容的丰富和拓展。但该书指出对明清徽州教育不宜评价太高，近代性的因素还是比较微弱的，并将教育对徽商的影响归结为两点：徽商子弟的仕途通达，徽商义利观的形成。有学者认为该书“既是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学术力作，又是徽商研究的创新之作”。^①

王廷元、王世华的《徽商》（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继承了《徽商研究》的体系和主要观点，系统考察了徽商兴起的自然条件、历史背景以及徽帮的形成、发展、经营领域、经营方式、资本积累，分析了徽商对封建势力既攀附、又抗争的两面性，探讨了徽商的婚姻、家庭，特别强调商人妇的贡献，研究了徽商个案，认为徽商的历史作用在于推动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城镇经济繁荣、资本主义萌芽和徽州社会文化发展，将徽商衰落的原因归结为：儒家的义利观、利润的封建化、纲法败坏、徽州盐商衰落、徽茶外销失利及战乱等。该书就徽商言徽商，比较全面和系统地论述了徽商的形成、发展、衰落的过程，以及徽商的经营活动、资本积累方式，兼及其婚姻、家庭等方面。是徽商研究的系统之作。

朱万曙、谢欣的《徽商精神》（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年）以浅显的语言风格论述了徽商所谓“徽骆驼”精神；从徽商的经营网络、“无徽不成镇”的谚语，以及徽商在扬州的经营来说明徽商的开拓精神；还研究了徽商的诚信经营、贾而好儒的文化追求；总结了徽人重科举、依赖传统伦理、参与社会公益、文化投资等趋向；分析了徽商的自卑与自重的矛

^① 阿风、许继文：《2002—2004年徽学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5年第12期。

盾心理，以及回归田园的人生归宿。

冯剑辉的《近代徽商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研究了晚清、民国时期的徽商，考察了近代徽商存续的历史背景，批驳了近代徽商“解体论”，考察了近代徽商在茶业、盐业、典业、木业等行业的经营状况，着重评析了近代徽商在徽州近代社会变迁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对近代上海的徽商网络和婺源江湾萧江氏徽商家族进行了探究，分析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徽商群体和徽商家族的转变。

此外，胡中生专文探讨徽商的人文精神；张浩通过民谣研究徽商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①王日根论述了明清徽商的家族观念及对家族观念的超越；^②徐国利研究了朱子伦理思想与明清徽州商业伦理观的转换和建构；^③梁德阔试图回应“韦伯式问题”，即儒家伦理能否产生现代性转化，为中国资本主义精神提供动力，通过对儒家伦理与徽商精神的考察，作者的结论是肯定的；^④张小坡考察了晚清徽商对徽州社会救济事业的扶持；陈瑞探讨了徽商配合保甲差役的充承对维护徽州社会经济秩序的积极作用；陈艳君梳理了明清时期徽商消费生活的主要内容和消费观及对徽商的商业活动和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有学者对明清时期歙县江村商人进行了个案研究；还有学者考察了徽州绅商的形成，以及其对徽商近代转型的影响。^⑤

① 胡中生：《徽商的人文精神与明清徽州社会》（《安徽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张浩：《从徽州民谣看明清徽商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皖西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② 王日根：《明清徽州商人的家族观念及其超越》，《安徽史学》2007年第1期。

③ 徐国利：《朱子伦理思想与明清徽州商业伦理观的转换和建构》，《安徽史学》2011年第5期。

④ 梁德宽：《儒家伦理与徽商精神——“韦伯式问题”的经验研究》，上海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

⑤ 张小坡：《论晚清徽商对徽州社会救济事业的扶持——以光绪三十四年水灾赈捐为例》（《安徽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陈瑞：《徽商与明清徽州保甲差役的充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3期）、陈艳君：《明清徽商的消费生活述论》（《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孙长城、刘其民：《明清时期歙县江村商人的崛起和发展》（《合肥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梁仁志：《明清徽州的绅商——兼论明清绅商与近代绅商之不同》（《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于徽商中盐商、典商、茶商、木商、粮商、布商、海商、墨商等各类商人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早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日本学者藤井宏等、美国华裔学者何炳棣的研究较早涉及徽州盐商。60年代国内学者杨德泉对两淮盐商的研究涉及徽州盐商。刘焱在1987年发表了《清代前期徽州盐商和扬州城市经济的发展》一文论述了清代前期徽州盐商在扬州城市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的作用。^①90年代王振忠对徽州盐商进行了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其《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1996）一书研究了明清两淮盐政的沿革，从徽州盐商、盐业与城镇、文化的发展探讨徽州盐商的发展与淮扬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有评论者称其“以制度分析为骨干，撑开一个具体而整全的社会经济史实的力作”，认为从盐政制度改革的视角来解释徽商的聚集和淮扬社会风尚变迁将历史研究的因果律落到了实处。^②90年代王振忠有一系列研究徽州盐商的专文，如《歙县明清徽州盐商故里寻访记》（《盐业史研究》1994年第2期）、《明清淮安河下徽州盐商研究》（《江淮论坛》1994年第5期）等。90年代，于海根有专文探讨盐商的文化人格。^③

此外，范金民分析了明代徽州盐商盛于两淮的时间与原因，认为其原因不在制度变迁而在明代中后期两淮盐运的实态和徽商的所作所为，还探讨了清代徽州盐商的销盐纠纷与诉讼；曹永宪考察了明代徽州盐商的移居与商籍，从盐政制度、地缘关系、行业范围以及家族制度来解释明代徽商的迁徙。^④江巧珍、周晓光、汪崇笈等对徽州盐商进行了一些个案研究。^⑤

① 刘焱：《清代前期徽州盐商和扬州城市经济的发展》，《安徽史学》1987年第3期。

② 陈克艰：《历史具体和理论“态度”——评〈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史林》1997年第3期。

③ 于海根：《试析明清徽州盐商独特的文化人格现象》，《学术月刊》1994年第5期。

④ 范金民：《明代徽州盐商盛于两淮的时间与原因》（《安徽史学》2004年第3期）、《清代徽州盐商的销盐纠纷与诉讼》（《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曹永宪：《明代徽州盐商的移居与商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

⑤ 江巧珍：《徽州盐商兴衰的典型个案——歙县江氏〈二房贖产清簿〉》（《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徽州盐商个案研究：〈疏文誓章稿〉剖析》（《清史研究》2005年第1期）、周晓光：《徽州盐商个案研究：〈二房贖产清簿〉剖析》（《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汪崇笈：《清代徽州盐商江仲馨获利案例试析》（《清史研究》2002年第2期）。

韩国学者曹永宪考察了明代徽州盐商的移居和商籍，并对山陕盐商和徽州盐商的力量消长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其原因主要在于盐政制度的变化。^①

汪崇笈对明清徽州盐商亦有深入研究。其《明清徽州盐商研究》(2012)一书包括五章，分别为“明清徽商与中国商品经济社会萌芽”、“明清徽商与淮盐经营”、“清代徽州盐商的文化贡献”、“明清徽州盐商的文化特色”、“余论”。该书着重从文化层面探究徽商的生存之道和文化特色。汪崇笈发表了一系列明清徽州盐商研究的论文，如有关明清徽商的文化贡献、对“徽州盐商垄断”说的商榷、徽州盐商的性质及总体评价等。^②

王廷元于1986年发表《徽州典商述论》探讨了徽州典商发展的原因、特点；王世华也有专文考察了徽州典商的兴衰；日本学者新宫学研究了明末清初徽州典商与常熟县同业组织的关系。^③范金民、夏维中的《明清徽州典商述略》对徽州典商进行了概括性的评述。^④栾成显、王裕明利用徽州文书探究徽州典商的生活和经营状况。^⑤王振忠注重对新发掘的文书史料的利用，发表了一系列论文研究徽商典业的经营规范、商业道德，还着

① 邹怡：《明清以来的徽州茶业与地方社会（1368—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9—30页。

② 汪崇笈：《清代徽州盐商的文化贡献之一：捐资兴教》（《盐业史研究》2004年第2期）、《清代徽州盐商的文化贡献之二：著述》（《盐业史研究》2005年第1期）、《清代徽州盐商的文化贡献之三：园林聚会》（《盐业史研究》2005年第4期）、《对“徽州盐商垄断”说的商榷》（《盐业史研究》2003年第4期）、《明代徽州盐商论述》（《盐业史研究》2001年第1期）、《关于徽州盐商性质的两个问题》（《徽学》第2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③ 王廷元：《徽州典商述论》（《安徽史学》1986年第1期）、王世华：《明清徽州典商的盛衰》（《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日]新宫学：《明末清初苏州府常熟县的同业组织与徽州商人》（赵华富编：《首届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

④ 范金民、夏维中：《明清徽州典商述略》，《徽学》第2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⑤ 栾成显：《明末典业徽商一例：〈崇祯二年休宁程虚宇立分书〉研究》（《徽州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王裕明：《清末民初典当业当簿剖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晚清上海德安押当票探析》（《安徽史学》2003年第6期）、《近代典当业质铺的经营特点——光绪皖南黟城用和质个案报告》（《学海》2004年第3期）、《徽州典商研究述评》（安徽省徽学学会编：《徽学丛刊》第3辑，2005年）。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力考察典商的社会生活。^①

郑小娟深入研究了明清时期徽州典商在徽州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徽州典商为徽商的发展提供了资金融通、商业信息，并考察了徽商发展过程中儒商化、官商化的特点。^②郑小娟、周宇的《15—18世纪的徽州典当商人》（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探讨了徽商的兴起、分析了徽州典商的成功原因，并考察了一些典商个案，研究了典商在徽商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其自身发展趋势，并分析了徽典资本的传承方式及对徽商发展的意义。王裕明的《明清徽州典商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分上下篇，上篇研究有关典商的文本，包括：典业类书、典业营业票簿、典业普通票簿、典商社会生活文书；下篇则是典商活动，包括徽州典商活动时空、徽商典铺经营管理、徽晋典商比较、徽州典商个案研究、徽州典商与明清社会等。

关于徽州茶商研究，较早的有吴仁安、唐力行于1985年发表的《明清徽州茶商述论》，该文对徽州茶商的活动区域和经营之道进行了分析。^③安徽师范大学的一批学者在90年代致力于茶商的研究，如张海鹏、王廷元主编的《徽商研究》、王世华所著《富甲一方的徽商》都对歙县芳坑的江氏茶商进行了个案研究；周晓光、李琳琦、吴晓萍等对江氏茶商也有研究。王振忠利用江氏茶商的抄本《万里云程》考察了清代徽州与广东的商路和商业；通过徽商日记探讨了民国时期汉口徽州茶商的社会生活；还通过对“漂广东”研究，考察了徽州茶商在外贸中的角色、行为及对西方的认识。^④

① 王振忠：《上海徽州典当商生活一瞥——民国时期婺源方氏典商信函研究》（《上海研究论丛》第13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抄本〈信书〉所见金陵典铺伙计的生活》（《古籍研究》2004年卷下，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汪作黼同年哀挽录〉中的徽州典商事迹》（《安徽史学》2005年第2期）、《清代徽州典铺伙计之信函汇集》（《历史文献》第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寄往上海安亭镇的晚清徽州典商信札考释》（《亚洲研究集刊》第3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清代江南徽州典当商的经营文化：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典当秘籍四种研究》（《中国学术》第25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② 郑小娟：《徽州典商在明清徽商发展中的作用研究》，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

③ 吴仁安、唐力行：《明清徽州茶商述论》，《安徽史学》1985年第3期。

④ 王振忠：《清代徽州与广东的商路及商业——歙县茶商抄本〈万里云程〉研究》（《历史地理》第17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徽商日记所见汉口茶商的社会生活——徽州文书抄本〈日知其所无〉笺证》（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编：《文化遗产研究集刊》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邹怡的专著《明清以来的徽州茶业与地方社会（1368—1949）》（2012）对明清以来徽州的茶商、茶业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

90年代学界开始对徽州木商进行系统研究，唐力行的《明清徽州木商考》一文深入分析了明清徽州木商的经营方式、资金流向及与徽州宗族和明清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①李琳琦的《徽商与明清时期的木材贸易》梳理了明清时期徽商进行木材贸易的情况。^②王振忠的《晚清民国时期江南城镇中的徽州木商——以徽商章回体自传小说〈我之小史〉为例》以其发现的徽商自传小说《我之小史》作为分析文本，考察了徽州木商的经营活动和社会生活；王振忠还探讨了《我之小史》发现的学术意义。^③何建木对婺源木商世家西冲俞氏进行了研究。^④

粮食为徽商经营最久的行业之一，学界对徽州粮商亦有深入研究。李琳琦的《明清徽州粮商述论》系统论述了明清徽州粮商在长江流域粮食贸易中的地位、作用和经营特点。日本学者川胜守的《明末长江三角洲新安商人经济动态之一斑》考察了明末徽州米商的米粮贩运线路及原因。此外，吴媛媛、刘朝晖等分别研究了晚清、嘉庆年间的粮食事件亦涉及徽州粮商的研究。^⑤

早在1957年，傅衣凌的《论明清时代的棉布字号》一文就论及徽商的棉布贸易。80年代陈忠平的《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布号与布庄》通过考察江南市镇中的布号与布庄探讨徽商、山陕商人、洞庭商人等商帮在江南市镇的活动。^⑥王廷元的《明清徽商与江南棉织业》论述了明清徽商在江南棉织

① 唐力行：《明清徽州木商考》，《学术界》1991年第2期。

② 李琳琦：《徽商与明清时期的木材贸易》，《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

③ 王振忠：《晚清民国时期江南城镇中的徽州木商——以徽商章回体自传小说〈我之小史〉为例》（《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徽商章回体自传〈我之小史〉的发现及其学术意义》（《史林》2006年第5期）。

④ 何建木：《徽州木商世家——婺源西冲俞氏》（《寻根》2005年第6期）、《徽州木商俞子良的商业经营》（《徽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⑤ 李琳琦：《明清徽州粮商述论》（《江淮论坛》1993年第4期）、吴媛媛：《从粮食事件看晚清徽州绅商的社会作用——以〈歙地少请通浙米案呈稿〉和〈祁米案牍〉为例》（《安徽史学》2004年第6期）、刘朝晖：《嘉庆八、九年间浙江截米案探析》（《内蒙古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⑥ 陈忠平：《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布号与布庄》，《江淮论坛》1986年第5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业的加工、贸易环节中的重要作用。^①日本学者松浦章的《徽商汪宽也与上海棉布》考察了明清以来徽商参与上海棉布交易的情况。^②范金民的《明代徽商染店的一个实例》一文通过《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所收的《万历程氏染店查算账簿》探讨了徽商合伙开设染店的经营状况，指出该染店虽年利较高，但由于历年支出大于投入，导致生产规模不断缩小，成为商业资本未能获得发展的典型。^③刘秋根亦有文章分析明清时期徽商的合伙制经营。^④

日本学者松浦章较早涉及徽商的海外贸易研究。其发表于1984年的《清代徽州商人与海上贸易》考察徽商从事海外贸易的情况；其《徽州海商王直与日本》一文考证王直来历，并分析其经营海外贸易的情况，认为王直主要身份应是经营走私贸易的海商。^⑤

聂德宁于1989年发表的《试论明代中叶徽州海商的兴衰》一文论述了明代徽州海商的兴起及其活动，并评价了徽州海商的作用和历史地位，认为徽州海商王直为首的诱倭私市贸易活动推动了中日官方贸易向民间贸易的转变，冲击了明政府的海禁政策和朝贡贸易体制。^⑥

唐力行于1990年发表的《论明代徽州海商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一文从分析徽州海商的经营活动入手探讨其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该文指出嘉隆年间的“倭寇海盗”并非真正的倭寇，而是出海贸易的海商，其中徽州海商与分布江南市镇的坐贾、手工作坊主，以及两者中介的徽州行商，构成了一个海外贸易的整体。通过对三个层次徽商、尤其是徽州海商经营活动的分析，认为徽州海商的经营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性质。唐力行另有一篇《关于〈日本碎语〉的碎语》考察了徽商汪翼沧所撰《日

① 王廷元：《明清徽商与江南棉织业》，《安徽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

② [日]松浦章：《徽商汪宽也与上海棉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

③ 范金民：《明代徽商染店的一个实例》，《安徽史学》2001年第3期。

④ 刘秋根：《明清徽商工商业店铺合伙制形态——三种徽商账簿的表面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3期。

⑤ [日]松浦章：《清代徽州商人与海上贸易》（《史泉》第60号，1984年）、《徽州海商王直与日本》（《明史研究》第六辑，黄山书社1999年版）。

⑥ 聂德宁：《试论明代中叶徽州海商的兴衰》，《安徽史学》1989年第3期。

本碎语》，指出“商人才是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①

王振忠的《〈唐土门簿〉与〈海洋来往活套〉——佚存日本的苏州徽商资料及相关问题研究》一文通过介绍《唐土门簿》与《海洋来往活套》两份徽商史料，利用中日两国的随笔、笔记、碑刻、墓志、族谱和尺牒等资料，梳理清代中日贸易中的徽商史迹，考察日本与苏州、徽州等地的经济、文化关系。^②

王廷元的《徽州海盗商人胡胜》一文指出胡胜等人的活动有悖于徽州商业资本的运动方向；叶显恩的《明中叶中国海上贸易与徽州海商》一文指出明中叶徽州海商的兴起与16世纪东亚海域贸易格局变化所提供的历史机遇有密切关联；许顺进的《关于明代徽州海商作用的经济学诠释》一文认为明代徽州海商在本质上是追求自由贸易和追逐商业利润为特征的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海商。^③此外，还有日本学者中岛敬、神田辉夫对《日本一鉴》的研究，蒋海波对歙县旅日华侨张友深的研究。^④

王振忠认为徽墨的生产和鉴赏研究涉及墨业和墨商研究，而早期对墨商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胡开文。^⑤如陈平民于1984年发表的《也谈徽墨奇葩“胡开文”——与紫玉同志商榷》和徐子超发表于1985年的《也谈“胡开文”的创业与创名》，两文主要辩论胡开文墨生产、胡开文店名的来历等。其后徐子超、胡毓华、黄秀英、汪庆元、胡云、林欢等人还发表了多篇研究徽墨和胡开文的文章。^⑥此外，王振忠、何建木等另辟蹊径，对

① 唐力行：《论明代徽州海商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关于〈日本碎语〉的碎语》（《安徽史学》1996年第4期）。

② 王振忠：《〈唐土门簿〉与〈海洋来往活套〉——佚存日本的苏州徽商资料及相关问题研究》，《江淮论坛》1999年第2、3期。

③ 王廷元：《徽州海盗商人胡胜》（《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叶显恩《明中叶中国海上贸易与徽州海商》（《明清论丛》第5辑，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版）、许顺进：《关于明代徽州海商作用的经济学诠释》（《黄山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④⑤ 王振忠：《徽学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页、第27—28页。

⑥ 陈平民：《也谈徽墨奇葩“胡开文”——与紫玉同志商榷》，《江淮论坛》1984年第4期；徐子超：《也谈“胡开文”的创业与创名》（《江淮论坛》1985年第3期）、《徽墨印版雕刻评价》（《江淮论坛》1989年第3期）、《胡开文墨业系年要录》（《江淮论坛》1992年第6期）；胡毓华：《徽墨世家“胡开文”》（《寻根》2003年第1期）、黄秀英、汪庆元：《胡开文墨业考》（《东南文化》2003年第9期）、胡云：《胡天注与“胡开文”墨业考证》（《黄山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林欢：《从墨票看胡开文墨业发展的几个问题》（《徽学》第6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婺源墨商进行了细致研究。王振忠利用晚清环川《（璁公房修）詹氏支谱》考察了詹彦文墨庄的经营状况和商业网络；何建木亦有研究婺源墨商詹氏家族的文章发表。^①

徽馆业亦是徽商经营的一个门类，王振忠2004年有专文系统考察了清代、民国时期江浙一带的徽馆以及相关的慈善事业；姚伟钧对清末民国时期武汉的徽馆作了回顾和梳理。^②

徽商与整个江南及其他区域的互动研究历来受到研究者的关注。陈学文考察了明清徽商在杭州的活动；汪庆元认为明清徽商创办的崇文书院加快了徽商子弟的缙绅化；陈忠平、陈剑锋、陈国灿研究了徽商在杭嘉湖市镇的经商活动及影响；张雪慧考察了徽商在西南地区的社会经济活动；周礼、范成梅探讨了徽商与江南士人交往的社会背景、方式和影响；秦宗财、王艳红研究了明清徽商与茶叶市场的发展；黄彩霞分析了明清徽商对江南粮食市场体系形成的推动作用。^③

徽商的同乡会和同业组织亦是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日本学者寺田隆信于1991年专文论述了北京歙县徽馆；^④唐力行同年发表的《论徽商的形成及其价值观的变革》一文中论及徽州会馆或徽商会馆与徽商成帮的直接关联，认为明嘉靖年间北京歙县会馆的成立可视为徽商成帮的标志。

① 王振忠：《从谱牒史料谈徽州墨商的几个问题——以光绪戊戌环川〈（璁公房修）詹氏支谱〉为中心》（《安徽史学》2008年第1期）、何建木：《徽州墨商世家：婺源虹关詹氏》（《寻根》2006年第4期）、《婺源墨作、墨商的分布与徽墨产销》（《徽学》第5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② 王振忠：《清代、民国时期江浙一带的徽馆研究——以扬州、杭州和上海为例》（熊月之、熊秉真主编：《明清以来江南社会与文化论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姚伟钧：《武汉徽馆与大中华酒楼》（《武汉文史资料》2010年第5期）。

③ 陈学文：《明清徽商在杭州的活动》（《江淮论坛》1990年第1期）、汪庆元：《明清徽商与杭州崇文书院考述》（《徽学》第3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陈忠平：《明清徽商在江南市镇的活动》（《江淮论坛》1985年第5期）、陈剑锋、陈国灿：《明清时期浙北杭嘉湖市镇的徽商》（《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张雪慧：《论明清徽商与西南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关系》（《徽州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周礼、范成梅：《徽商与江南士人社会交往研究》（《安徽省徽学学会第二届二次理事会暨“徽州文化与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7年）、秦宗财、王艳红：《明清徽商与茶叶市场》（《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黄彩霞：《明清徽商与江南粮食市场》（《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④ [日]寺田隆信：《关于北京歙县会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其《徽州旅沪同乡会与社会变迁（1923—1953）》一文以徽州旅沪同乡会为视角，从其断裂与延续中观察近代社会的变迁。^①张冠增系统研究了明末清初的北京歙县会馆，指出早期会馆主要为官员和参加科举的士子提供便利，因而官府对其多有支持，但自清代中期，徽商在会馆管理中使用轮番制和共议制，体现了市民意识的增强。^②

王振忠利用《徽侨月刊》等史料探讨了民国时期徽州旅浙硖石同乡会，探讨《徽侨月刊》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陈联的《商人会馆新论——以徽州商人会馆为例》一文通过对徽州会馆的考察指出会馆从功能来看主要还是慈善组织和设施；范金民通过清嘉庆年间的六安徽州会馆案考察徽商与经营地民众各阶层的关系；李晓琴、石涛比较了晋商与徽商会馆在制度安排方面的异同；方利山认为徽商会馆祀朱子对于徽商的儒商化意义深远；黄彩霞比较杭州商会与在杭徽州会馆的公益善举，从中考察国家商业政策和商人自我认识的变迁。^③郭绪印编著的《老上海的同乡团体》（2003）对徽州旅沪同乡团体有详细梳理。

此外，学界对与徽商极有关联的商书也有一些研究成果。如臼井佐知子、陈学文、王振忠、张海英等都有相关论著。^④

① 唐力行：《论徽商的形成及其价值观的变革》（《江淮论坛》1991年第2期）、《徽州旅沪同乡会与社会变迁（1923—1953）》（《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

② 张冠增：《明末清初北京の歙県会館——徽州商人とその同郷組織——》，《アジア文化研究》第19期，1993年3月。

③ 王振忠：《徽州旅浙硖石同乡会与〈徽侨月刊〉》（《福建论坛》2001年第2期）、陈联：《商人会馆新论——以徽州商人会馆为例》（《徽学》2000年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范金民：《清代徽商与经营地民众的纠纷——六安徽州会馆案》（《安徽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李晓琴、石涛：《晋商与徽商会馆制度安排比较研究》（《长治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方利山：《徽商会馆祀朱子释义》（《徽州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黄彩霞：《从杭州商会的公益善举看社会的变迁——兼与在杭徽商会馆比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④ 臼井佐知子：《徽州文書と徽州研究》（《史潮》第32号，1993年）、陈学文：《明清时期商业书及商人书之研究》（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版）、王振忠：《徽州人编纂的一部商业启蒙书——〈日平常〉抄本》（《史学月刊》2002年第2期）、张海英：《日用类书中的“商书”——析〈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商旅门〉》（《明史研究》第9辑，黄山书社2005年版）、《从明清商书的内容看明清时期的商品流通》（《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二期，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明清水陆行程书的影响与传承——以〈一统路程图记〉、〈士商类要·路程图引〉、〈示我周行〉为中心》（《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五期，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4. 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大成：徽州宗族研究

较早开展徽州宗族研究的学者是叶显恩，他在《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1983）第四章“徽州的封建宗法制度”中主要探讨了宗族组织、祠堂族长与族权、家谱和宗法、族田等。荷兰学者宋汉理（Harriet Thelma Zurndorfer）是较早进行徽州宗族研究的学者，20世纪70年代末即完成博士论文《中世纪中国地方背景下的商人与同族：以徽州休宁县范氏家族为个案，800—1600年》；^①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的《〈新安大族志〉与中国士绅阶层的发展（800—1600年）》一文对唐末至明代中期徽州的士绅研究主要是围绕徽州宗族的发展变迁展开，论及明中期徽州宗族的变化，徽商崛起和对科举的重视，以及地主与佃仆的关系等；^②宋汉理的《徽州地区的发展与当地的宗族——徽州休宁范氏宗族的个案研究，800—1500年》一文以休宁范氏为个案探讨了宗族得以长期存在的原因。^③90年代初宋汉理还对清代徽州与福建的科举兴盛作了比较研究，认为两地均有宗族与科举之间的良性互动。^④美国学者贺杰（Keith Duane Hazelton）的博士论文《徽州的宗族与地方精英，1500—1800年》以徽州城居的吴氏宗族为研究个案，考察宗族与地方精英的关系，还探讨了宗族与地方信仰、科举的关系。^⑤其《明清徽州的宗族与社会流动性》一文试图说明移民、进士、徽州之间存在对应关系，认为这三个要素是宗族地位的保障。^⑥邹怡

① Harriet Thelma Zurndorfer, *Merchant and Clansman in a Local Setting in Medieval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Fan Clan of Hsiu-ning Hsien, Hui-chou, 800—1600*,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78.

② [荷]宋汉理著、叶显恩译：《〈新安大族志〉与中国士绅阶层的发展（800—1600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3期、1983年第2期连载。

③ Harriet Thelma Zurndorfer, *Local Lineages and Local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the Fan Lineage, Hsiu-ning Hsien, Hui-chou 800—1500*, T'oung Pao, Vol.LXX, 1984, pp.18—59.

④ Harriet Thelma Zurndorfer, *Learning, Lineages, and Local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ducation in Huichow (Anhui) and Foochow (Fukien) 1600—1800*,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Vol.XXXV, 1992, pp.109—144, 209—238.

⑤ Keith Duane Hazelton, *Lineages and Local Elites in Hui-chou, 1500—1800*, Ph.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4.

⑥ [美]贺杰：《明清徽州的宗族与社会流动性》，《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将宋汉理与贺杰的宗族研究进行比较，认为两者持有相同的区域史观，即通过考察徽州区域来透视传统中国，两者的差异在于，宋汉理以徽州作为考察整个中国的窗口，而贺杰只是将徽州视为长江流域的代表性区域。^①美国学者居蜜也是较早研究宗族问题的学者，他在《1600—1800年皖南的土地占有制以及宗法制度》一文中，考察了宗法制度、土地占有制，以及宗法制度与土地占有制、商业资本之间的关系。他还专文论述了徽州的宗法组织与社会结构、法律地位、租约、股役契约、宗族伦理和土地出租，强调唯有通过研究宗族组织才能理解徽州佃仆的最终性质。^②另一位美国学者基恩·海泽顿通过对1551年修的《新安名族志》和1829年修的《徽州府志》中的进士表进行比较，考察了歙、休两县的望族。^③

宗族与徽商研究

唐力行的宗族研究视野开阔，将商人与宗族的关系置于地域社会中探讨是其特色。他发表了一系列徽州宗族的研究文章。他研究了徽商与宗族的互动关系，认为明清徽商善于借助宗族势力，建立地区性或商业性垄断；深入探讨了明清徽州的家庭与宗族结构，认为徽州在明代后期形成了小家庭——大宗族的格局，影响了徽州社会经济特点的形成，有利于徽商的经营活动，造成徽州社会更富有弹性和流动性。还以徽州方氏为个案研究了16世纪徽州农村宗族制度的转型，指出宗族迁徙方向调整和宗族价值观的变化为地域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创造了新机会。通过考察徽州宗族社会的变迁，认为明清时期徽州地域社会形成了宗族组织、文化科举和商业经营间的良性互动。^④

① 邹怡：《明清以来的徽州茶业与地方社会（1368—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

② [美]居蜜著、叶显恩译：《1600—1800年皖南的土地占有制以及宗法制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2期；[美]居蜜著、黄启臣译、林连书校：《明清时期徽州的宗法制度与土地占有制——兼评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江淮论坛》1984年第6期、1985年第1期。

③ [美]基恩·海泽顿：《明清徽州社会的大家族与社会流动性》，《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④ 唐力行：《论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明清徽州的家庭与宗族结构》（《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兼论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论徽州宗族社会的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唐力行还有徽州宗族研究的专著，如《商人与文化的双重变奏——徽商与宗族社会的历史考察》（1997）探讨了徽州社会的形成及其结构变迁、宗族文化、商人文化对徽商及徽州农村社会的影响，宗法制度与社会生活的相互关系，宗法制度在徽商经营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宗族文化为核心的新安文化的双重作用等。他的另一本徽州宗族研究专著《徽州宗族社会》（2005）分八章，论述了徽州宗族社会形成的因素及分布情况、宗族结构特点及其影响、宗族社会生活实态、宗族与徽商的经营活动互动关系、宗族与科举的互动关系，以及宗族与社会保障、社会控制的关系、宗族的迁徙与定居活动、宗族与社会变迁等。唐力行以宗族为切入点，研究宗族与徽州社会各主要要素的关系，使徽州宗族社会的主要特征得以呈现，宗族研究真正成为解开传统徽州社会之谜的一把钥匙。

日本学者臼井佐知子有一系列的文章从商业入手研究徽州宗族，她的《徽商及其网络》一文通过徽州商人的经营活动，从网络分析的视角考察明清社会构筑于血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之上的徽商网络，认为徽商利用共同始祖的同一性，强化了散布各地经商族人的同宗同族关系。又在《徽州汪氏宗族的迁徙与商业活动》一文中，依据汪氏现存族谱中的移居记载考察了汪氏家族的迁徙及商业活动。^①臼井佐知子的《从文书看中国明清时代的“寄进”》认为明清时代之所以很少有个人向宗教组织进献土地，是因为有着家产属于宗族，个人不能随意处置的观念，可见宗族和宗法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支配地位。^②铃木博之对徽商与宗族互动关系也有专文探讨。^③

宗族结构与内部运作研究

赵华富对徽州宗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宗族自身结构与运作方面，注重

① [日] 臼井佐知子：《徽商及其网络》（《安徽史学》1991年第4期）、《徽州汪氏宗族的迁徙与商业活动》（《江淮论坛》1995年第1期）。

② [日] 泷野正二郎著、张玉林译：《2000年日本史学界关于明清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0期。

③ [日] 铃木博之：《徽州商人の一系譜——溪南呉氏をめぐる——》，《東方学》第98辑，1999年7月。

个案研究。他有一系列徽州宗族研究方面的文章。他分析了徽州宗族繁荣的原因；研究了徽州的宗族祠堂，认为徽州兴起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大建宗族祠堂之风，主要是宗族为了应对由商品经济繁荣和资本主义萌芽带来的冲击而采取的措施；还专文研究了徽州宗族的族规、家法^①。赵华富做了大量徽州宗族个案研究，文章有：《歙县棠樾鲍氏宗族个案报告》（《江淮论坛》1993年第2期）、《黟县南屏叶氏宗族调查研究报告》（《徽州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明清徽州西递明经胡氏的繁盛》（《安徽史学》1994年第4期）、《歙县呈坎前后罗氏宗族调查研究报告》（《首届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文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祁门县渚口、伊坑、滩下、花城里倪氏宗族调查研究报告》（《徽学》2000年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婺源县游山董氏宗族研究》（《徽学》第2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休宁月潭朱氏宗族调查研究报告》（《徽学》第3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古风犹存的徽州名族——黟县南屏叶氏宗族调查研究报告》（《徽学》第5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

赵华富的《徽州宗族研究》（2004）是第一本专门研究徽州宗族的专著。包括九章内容，分别研究了徽州宗族的兴起、组织结构、祠堂祖墓、谱牒、族产、族规家法、重教崇文的传统、经商的风尚，还列举了一些个案研究。并附录“从徽州宗族资料看宗族的基本特征”。总结了徽州宗族的八个特征：有共同始祖、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有明确的昭穆世次、开展一定的集体活动、有一定的聚居地点、有一定的组织管理形式、有宗族的族规、家法，以及有集体所有的族产。该书对于宗族的个案研究主要围绕宗族的来源、形成、谱系、祠堂、谱牒修纂、族田设置、商业、科举、文教等方面。总体来看，赵华富的徽州宗族研究特点在于通过大量个案研究总结徽州的宗族特征，着重研究徽州宗族内部的组织、运作和管理。

卞利对徽州宗族的内部运作，如宗族公约、宗族管理、宗族运行的经

^① 赵华富：《论徽州宗族繁荣的原因》（《民俗研究》1993年第1期）、《论徽州宗族祠堂》（《安徽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徽州宗族族规家法》（《首届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济基础及祭祀仪式等进行了深入研究。^①

由于徽学研究有强大的史料基础，宗族研究多从个案入手。栾成显在《明清徽州宗族的异姓承继》一文中利用婺源腴川程氏宗谱和休宁二十七都五图黄册底籍等资料进行研究，认为明清徽州宗族的异姓承继相当普遍，同宗继子乏人或为保全家产是异姓承继的主要原因。文章指出明清异姓承继的普遍及有关法规的调整，表明封建宗法关系的松弛。^②陈瑞以歙县虹源王氏为例揭示徽州宗族婚姻圈的基本特征，还研究了明清徽州宗族执事人员的经济管理活动，认为其对宗族经济、社会的良性运作起到重要作用；沈昕对明清徽州祁门善和程氏的宗族结构进行了研究；张小坡、张爱萍考察了清末徽州族学的近代转型；曲晓红分析了明清时期徽州宗族与科举仕宦的关系。^③

族产、族会与祭祀制度研究

铃木博之1989年专文考察了宗族祭祀与族产、黄册登记制度之间的关系。铃木博之认为祭祀活动推动了宗族地产的形成，而政府则利用宗族组织进行土地登记，原有以村落为基础的社祭自明代中期逐步被宗族祭祀取代，可见宗族势力的成长，以及与黄册登记制度的啮合。^④

刘淼的族产、族会研究多采用个案研究方法。他的《清代徽州歙县棠樾鲍氏祠产土地关系》考察祠产的设置、祠产结构与地权形态、租佃关系、地权分配；其《清代徽州祠产土地关系——以徽州歙县棠樾鲍氏、唐模许氏为中心》一文探讨宗祠产业的来源、结构以及租佃关系和地租分

① 卞利：《明清徽州的宗族管理、经济基础及其祭祀仪式》（《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明清时期徽州的宗族公约研究》（《中国农史》2009年第3期）。

② 栾成显：《明清徽州宗族的异姓承继》，《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

③ 陈瑞：《以歙县虹源王氏为中心看明清徽州宗族的婚姻圈》（《安徽史学》2004年第6期）、《明清徽州宗族执事人员的经济管理活动》（《安徽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沈昕：《宗族联姻与明清徽州地方社会——以祁门善和程氏为中心》（《安徽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张小坡、张爱萍：《承继与过渡：清末徽州族学转型探析》（《合肥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曲晓红：《古代宗族与科举仕宦的关系研究——以明清徽州社会宗族为例》（《河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④ [日] 铃木博之：《明代徽州府の族産と戸名》，《東洋学报》第71卷第1、2号，1989年12月。

配；其《清代祁门善和里程氏宗族的“会”组织》研究程氏“会”组织的情况；其《清代徽州的“会”与“会祭”》指出以祭祀和信仰为基础而组合的“会”意味着宗族生活开始出现分化；其《中国传统社会的资产运作形态——关于徽州宗族“族会”的会产处置》从产权关系形成的“法”的角度，分析宗族族会产权关系的形成过程及其基本制度，论述了不同族会产业的处置程序和基本制度及其产生相应的社会经济关系；其《传统农村社会的宗子法与祠堂祭祀制度——兼论徽州农村宗族的整合》对徽州地区的宗族组织进行考察，研究了宗子法和祠堂祭祀制度，认为宗族组织的兴起和“宗”的社会地位的提高对于明清时期地方农村社会的整合有深刻的意义。^①

周绍泉的《明清徽州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族产研究》探讨了族产的内部结构、来源、经营、管理、收益分配、作用等。周绍泉的另一篇文章《透过明初徽州一桩讼案窥探三个家庭的内部结构及其相互关系》突破以往家庭史研究单靠家谱或人口册的局限，从诉讼文书入手，结合黄册、土地文书等相关资料，分析徽州祁门县一桩诉讼案，探讨与之相关的三个家庭的内部结构及相互关系。他还整理仁山门东房派的族规家法，出版了《窠山公家议校注》（1993年）。高寿仙的《明初徽州族长的经济地位——以休宁县朱胜右为例》指出明初徽州的族长并不一定由族中的富户担任，一般自耕农即可，甚至以佃人的身份担任族长也不影响其威望和地位。栾成显的《元末明初祁门谢氏家族及其遗存文书》从历史上徽州世家大族入手，阐述徽州文书的遗存与徽州大族的关系，并对徽州文书的由来做了进一步具体的探讨。^②

^① 刘淼：《清代徽州歙县棠樾鲍氏祠产土地关系》（《学术界》1989年第3期）、《清代徽州祠产土地关系——以徽州歙县棠樾鲍氏、唐模许氏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清代祁门善和里程氏宗族的“会”组织》（《文物研究》第八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清代徽州的“会”与“会祭”》（《江淮论坛》1995年第4期）、《中国传统社会的资产运作形态——关于徽州宗族“族会”的会产处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传统农村社会的宗子法与祠堂祭祀制度——兼论徽州农村宗族的整合》（《中国农史》2002年第3期）。

^② 周绍泉：《明清徽州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族产研究》（《谱牒学研究》第2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透过明初徽州一桩讼案窥探三个家庭的内部结构及其相互关系》（《徽学》2000年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高寿仙：《明初徽州族长的经济地位——以休宁县朱胜右为例》（《江淮论坛》1994年第4期）、栾成显：《元末明初祁门谢氏家族及其遗存文书》（周绍泉、越华富主编：《'95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韩国学者朴元焯对徽州宗族有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他曾以柳山方氏为个案研究徽州宗族，在其《从柳山方氏看明代徽州宗族组织的扩大》一文中，分析了明代徽州宗族组织扩大的社会经济契机和原因，指出由于人地矛盾产生祀产纠纷和乡村社会的失衡状况是宗族联合的契机；朴元焯在《明清时代徽州真应庙之统宗祠转化与宗族组织——以歙县柳山方氏为中心》一文中指出，歙县柳山方氏的真应庙北宋初年和清初的两次修建最为重要，前一次修庙由专祠转化为宗祠，后一次则从宗祠转化为统宗祠。其《明清时代徽州的市镇与宗族——歙县岩镇和柳山方氏环岩派》一文同样以柳山方氏为例研究了徽州市镇发展与宗族势力扩大之间的关系；其《方仙翁庙考——以淳安县方储庙的宗祠转化为中心》一文试图说明专祠能否转化为宗祠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①有学者指出朴元焯对于宗族与商业之间关系的看法与唐力行相近，即二者之间是一个良性循环，而这一良性循环又阻碍了二者的近代化。^②

朴元焯的徽州宗族研究专著《明清徽州宗族史研究》（2002）是将其自90年代以来徽州宗族的研究成果结集而成的一部著作。主要通过对徽州柳山方氏的个案研究考察徽州宗族的特点及社会变迁。唐力行将该书特点归结为三个方面：一、从区域整体史的视野研究徽州宗族。“始终抓住了士绅、商人与宗族变迁的互动关系”，由于柳山方氏实现了宗族、乡绅、商人的“良性循环”，在与吴氏、潘氏的竞争中赢得胜利。该书说明“宗族强固、官商交替，对徽州来说是‘良性循环’，对社会变迁而言，这却是‘恶性循环’，因为它延续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二、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徽州宗族。“朴元焯对柳山方氏家庙由专祠而宗祠，再到统宗祠的

^① 朴元焯：《从柳山方氏看明代徽州宗族组织的扩大》（《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明清时代徽州的市镇与宗族——歙县岩镇和柳山方氏环岩派》（《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明清时代徽州真应庙之统宗祠转化与宗族组织——以歙县柳山方氏为中心》（《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方仙翁庙考——以淳安县方储庙的宗祠转化为中心》（唐力行主编：《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山书社1999年版）。

^② 邹怡：《明清以来的徽州茶业与地方社会（1368—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8—29页。

变迁过程的探讨，也就更接近历史真实地反映出宗族制度由汉代至北宋，乃至明清时期演变的大趋势”。三、用历史比较的方法研究徽州宗族。该书专题研究柳山方氏的聚居地——岩镇，将宗族研究引入市镇研究，并将岩镇与江南市镇作了比较。总之，“朴元煊的研究从微观出发，对一个宗族进行精细解剖，进而在宏观层面追索他对中国社会变迁的深层关怀”。^①

陈柯云的宗族研究也注重利用契约文书资料，其《明清徽州的修谱建祠活动》一文论述了明中期以后修谱、建祠的普遍化问题；其《明清徽州宗族对乡村统治的加强》探讨了徽州宗族社会的形成及其结构变化，对乡村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影响力以及在乡村事务中的仲裁权问题，认为从明中叶到清中叶是徽州宗族对乡村的统治不断加强的时期；其《明清徽州的族产》、《明清徽州族产的发展》两文指出，明中叶以后，部分众存族产逐渐转化为祠产形式的族产，从而形成了众存族产和祠产并行交叉、一消一长的发展局面。铃木博之的《徽州的“家”与财产继承的习俗》、《徽州商人的一个谱系》两文探讨宗族与商业关系，认为商业利润的回流虽然促进宗族组织的形成，但宗族组织作为商业活动的后盾却无法得到确认，商业的提携仅限于“家”的层次。常建华的《明代徽州的宗族乡约化》对徽州宗族以乡约化为特征的组织化发展历程、作用及其历史背景进行了分析；常建华的另一篇文章《明代宗祠的特点》指出宗祠建设以嘉靖十五年祭祖令为契机，带有明显的地域性因素及统宗合族的目的。^②

胡槐植的《徽州宗族祭祖制度》一文论述了徽州宗族祭祖的种类、祭日及祭组织、祭仪、酬功与给胙；许水涛考察了桐城宗族，他的《从桐城望族的兴盛看明清时期的宗族制度》探讨了制约宗族制度顺利发展正反两

① 唐力行：《朴元煊著〈明清徽州宗族史研究〉》，《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

② 陈柯云：《明清徽州的修谱建祠活动》（《徽州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明清徽州宗族对乡村统治的加强》（《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明清徽州的族产》（《清史论丛》，辽宁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明清徽州族产的发展》（《安徽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日]太田出著、张学锋译：《1999年日本史学界关于明清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11期）、常建华：《明代徽州的宗族乡约化》（《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明代宗祠的特点》（《南开学报》2003年第5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方面因素，望族形成及其盛衰的原因、宗族制度的社会基础问题；吴仁安也由对上海、苏南等地的望族研究扩展至徽州的望族研究；李琳琦的《明清徽州进士数量、分布特点及其原因分析》一文分析明清徽州地区的进士主要分布于大宗族，论述科举与宗族的关系；周晓光考察了明清徽州民间的众存祀会，指出众存祀会系设置众存产业以祀祖的组织，具有自发性、平等性和灵活性的特点，与宗族组织在祭祀功能上互补共存；黄世福从宗教学的角度探讨了徽州宗祠文化所体现出的宗教特质。^①

何巧云的博士论文《清代徽州祭祖研究》（2010）由六章构成。第一章梳理徽州祭祖活动的演变历程；第二章分析了清代徽州祭祖的物质基础；第三章研究了清代徽州祭祖活动的方式；第四章总结了清代徽州祭祖活动的时代特征；第五章探讨了祖先祭祀与地方社会之间的互动；第六章是结语部分，对清代徽州祭祖活动的思想进行总结，认为徽州祭祖活动是一种伦理道德基础上的功利追求，也是徽州地方精英所追求的儒学理想世界的重要内容。^②

此外，常建华的《明代宗族研究》（2005）有专章论述明代徽州宗族祠庙祭祖的形式及变化，以及徽州祠庙的发展和特点。^③

家谱与宗族研究

家谱是宗族研究的基本史料，历来为徽学研究者重视，其与宗族家庭结构、宗族管理、祭祀制度乃至社会管理、基层控制、社会救济都密切相关，研究者往往力图通过个案研究达到管中窥豹的研究目标。熊远报、陈瑞、卞利、徐彬、徐国利等对此都有专门研究。日本学者熊远报在《联宗族谱与家族史的重构》一文中认为从明代中期开始，徽州出现同姓集团确

^① 胡槐植：《徽州宗族祭祖制度》（周绍泉、赵华富主编：《'95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许水涛：《从桐城望族的兴盛看明清时期的宗族制度》（《谱牒学研究》第1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李琳琦：《明清徽州进士数量、分布特点及其原因分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周晓光：《明清徽州民间的众存祀会》（《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黄世福：《徽州宗祠文化的宗教性探析》（《学术界》2010年第8期）。

^② 何巧云：《清代徽州祭祖研究》，安徽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

^③ 常建华：《明代宗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定共同祖先和统编族谱的动向，形成拟似性的宗族关系。其另一篇《关于徽州的宗族》概括元明以后徽州宗族的形成过程。^①陈瑞的《明清时期徽州族谱的控制功能》一文从社会控制的视角探讨明清徽州族谱的功能，认为徽州宗族发展至明清时代，徽州族谱的功能已由原先相对较为单纯的族史文献发展为突出“谱法劝惩”功能的教化文本，表明其对族人的控制与管理的功能日渐强化；卞利的《明清时期徽州族谱的纂修及刊刻等相关问题研究》一文通过对明清徽州族谱的纂修、刊刻、印刷和避讳等的探讨，系统考察明清时代徽州的族谱与宗族制度；徐彬的《明清时期徽商参与家谱编修的动因》一文特别提到徽商确定商籍的动因在于保证子弟参加科举考试，增强宗族团结和凝聚力，使自己名垂后世等；徐彬的《历史意识与历史编撰理论对明清徽州家谱的影响》一文揭示了史学与家谱的密切关系，另一篇《论明清徽州家谱编修与徽商的互动》则是徽商与宗族关系研究的细化。徐国利在《从明清徽州家谱看明清徽州宗族的职业观》一文中研究了明清徽州家谱族规家训中的职业观。刘平平则利用家谱探讨明清徽州普通妇女的家庭地位。^②

三、研究的深化：徽州文书及相关领域研究

1. 徽州文书的搜集整理

周绍泉在《徽州文书与徽学》（《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一文中就曾指出徽学之所以成为一门新学科，根本原因就在于大量徽州文书的发

① [日]中岛乐章著、张玉林译：《2002年日本史学界关于明清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12期。

② 陈瑞：《明清时期徽州族谱的控制功能》（《安徽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卞利：《明清时期徽州族谱的纂修及刊刻等相关问题研究》（《徽学》第5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徐彬：《明清时期徽商参与家谱编修的动因》（《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历史意识与历史编撰理论对明清徽州家谱的影响》（《安徽史学》2010年第3期）、《论明清徽州家谱编修与徽商的互动》（《学术研究》2011年第6期）、徐国利：《从明清徽州家谱看明清徽州宗族的职业观》（《河北学刊》2011年第6期）、刘平平：《明清徽州普通妇女的家庭地位》（《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9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现，徽学研究为明清史研究带来了革命性变化。可见徽州文书是徽学研究的根基和生命线。

第一本徽学研究的资料集《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内含史籍、方志、谱牒、笔记、小说、文集、契约、文书、碑刻、档案等资料，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徽商与宗族研究的兴起的“酵母”。大规模的徽州文书整理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相继出版的徽州文书资料集有《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徽州千年契约文书》（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徽州文书》1—4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006、2009、2011年）等。

其中王玉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1991）全书分“宋元明编”和“清民国编”两编，每编20卷，计两千万字，搜集宋到民国时期的文书3200件，簿册122册，鱼鳞图册16部。涉及土地房屋买卖、典当、租佃契约，税契凭证、卖身契，合同文书，诉讼案卷，试题，试卷，祠堂、社会祭祀账目，商业账簿等。

由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刘伯山主编的《徽州文书》自2005年至2011年出版了1—4辑，是继《徽州千年契约文书》之后又一次大规模影印出版徽州文书，对推动徽学研究意义重大。

此外，陈智超编的《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正文前介绍主要收信人方用彬的生平事迹及少数其他收信人的情况，以及四百多写信人的类型、相对分布地区。正文为手札原文、作者释文、相关资料三者结合，重现明代后期信中人物的社会活动、文化生活、经济往来的生活画卷。谈家胜的《国家图书馆所藏徽谱资源研究——32种稀见徽州家谱叙录》（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年）介绍国家图书馆所藏的部分徽州家谱。王钰欣等编的《徽州文书类目》（2000）和严桂夫等编的《徽州文书档案》（2005）等都是有价值的工具书。

2. 徽州文书的相关探讨

王振忠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徽州文书的几点思考》一文指出，应注

意搜集土地契约之外的其他文书散件，重视簿册文书史料的发掘和研究，注重从区域比较的视野重新审视徽州的契约文书，推动分类整理出版一批徽州文书，提高徽学研究的整体水平。^①徐国利的《当代中国的徽州文书研究》一文对当代中国大陆的徽州文书研究从六个方面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分别是：1.徽州文书的性质和主要特点；2.徽州文书的史学学术价值；3.徽州文书的上下历史断限，大量形成和存世多的原因；4.徽州文书的数量估测和计量方法；5.徽州文书的分类法与整理方法；6.大陆徽州文书的收藏及其分布。徐国利还总结了徽州文书理论研究与整理方法中争议较多和研究不够的五个重要问题，重申了前文的某些观点，分别是徽州文书的科学定义、徽州文书与徽州历史档案和徽州文书档案的区别与联系、徽州文书的上下时间断限、徽州文书的数量和计量方法、徽州文书的分类整理等。^②卞利考察了徽州文书的由来及收藏整理情况。^③刘伯山对徽州文书遗存的原因、徽州文书遗存的发现、特点进行了探讨。^④翟屯建对徽州文书的由来、发现、收藏与整理进行了系统梳理。^⑤吴光龙探讨了徽州文书史学价值及其搜集整理的状况。^⑥方利山论述了徽州契约文书的价值。^⑦严桂夫、王国键总结了徽州文书档案的特点和价值。^⑧

3. 徽州文书与社会文化史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徽州文书已成为研究土地关系和租佃关系的基本史料。80年代初期，租佃关系与土地关系一度成为热点，进而开始对徽

① 王振忠：《新发现的徽州文书与徽学研究的新进展》（《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12期）、《收集、整理和研究徽州文书的几点思考》（《史学月刊》2005年第12期）。

② 徐国利：《当代中国的徽州文书研究》（《史学月刊》2005年第2期）、《徽州文书的理论研究与整理方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年第4期）。

③ 卞利：《徽州文书的由来及其收藏整理情况》，《寻根》2008年第6期。

④ 刘伯山：《徽州文书的遗存及特点》（《历史档案》2004年第1期）、《徽州文书遗存的原因》（《安徽史学》2007年第2期）、《徽州文书的遗存与发现》（《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6期）。

⑤ 翟屯建：《徽州文书的由来、发现、收藏与整理》，《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⑥ 吴光龙：《试论徽州文书的史学价值及其整理》，《安徽史学》2000年第3期。

⑦ 方利山：《徽州文书与徽州社会——也谈徽州契约文书的价值意义》，《黄山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⑧ 严桂夫、王国键：《徽州文书档案的特点和价值》，《档案学研究》2001年第1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州文书进行经济性的分析，徽州文书中的租佃契约、租谷簿、抄契簿、置产簿等成为经济史研究者关注的对象。

成果如章有义的《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1984），1985年发表的文章有彭超的《歙县唐模村许荫祠文书研究》和刘和惠的《明代徽州洪氏眷契簿研究》。^①80年代末期以来，一些研究者开始尝试从经济史与社会史两个角度来对徽州文书进行经济性分析，通过对土地价格、土地买卖、土地经营以及粮食亩产量等方面的探讨来剖析当时的社会实态。^②如周绍泉研究了明代徽州的土地买卖，彭超研究了明清徽州的土地价格与地租。都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③周绍泉和栾成显还利用徽州文书探讨了农民、地主各自的生活状况和经济结构。^④栾成显对明代徽州的黄册和鱼鳞图册进行了系统研究。陈支平利用徽州文书考察了徽州赋役制度的运作。^⑤由于徽州文书为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根基所在，涉及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多数领域，徽商、徽州宗族研究前已述及，此不赘述。

进入90年代，学界开始从社会文化史角度研究徽州文书，而且徽州文书已不仅仅是研究徽学的基本史料，徽州文书本身业已成为系统研究的对象。王振忠、安徽大学的多名博士生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

王振忠的《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新发现的16—20世纪民间档案文书研究》（2002年）包含前言“徽州档案文书与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拓展”，以及“村落、宗族与社会变迁”、“乡土习俗及民间文化”、“启蒙读物与商业书类”、“‘徽侨’与长江中下游区域社会”等四章内容。此前文书的搜集和研究多集中于土地关系与财产、赋役、商业文书，对民俗、文化和社

① 彭超：《歙县唐模村许荫祠文书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2期）、刘和惠：《明代徽州洪氏眷契簿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3期）。

② 阿风：《徽州文书研究十年回顾》，《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第2期。

③ 周绍泉：《试论明代徽州土地买卖的发展趋势——兼论徽商与徽州土地买卖的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彭超：《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土地价格与地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

④ 周绍泉：《明后期祁门胡姓农民家族生活状况剖析》（《东方学报》第67册，1995年）、栾成显：《明清庶民地主经济形态剖析》（《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

⑤ 陈支平：《民间文书与明清赋役史研究》，黄山书社2004年版。

会生活方面的文书关注不够。王振忠利用自己从徽州民间搜集的村落文书、家族文书、宗教科仪及相关文书、商业文书、诉讼文书、教育科举文书、徽商尺牍等还原明清徽州村落生活及江南“徽侨”生活的实态。王振忠在扩大徽学史料范围、细化和深化徽学研究方面居功至大，开拓了徽州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境界。

刘道胜的博士论文《明清徽州宗族关系文书研究》（2006）系统研究了反映明清徽州宗族关系的相关文书的形式、内涵。论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二部分从文献学的角度对徽州宗族文书作总体性考察，如宗族文书的形成、遗存及其形态等；第三、四部分则考察了徽州宗族文书所反映的各种社会关系。^①

赵尔波的博士论文《明清时期祁门谢氏宗族及其遗存文书研究》（2011）通过对祁门谢氏宗族遗存文书的详细考察，探讨了祁门谢氏宗族的形成、对外扩展、科第教育、宗族财产、收益途径、社会关系等，分析明清时期徽州社会变迁对祁门谢氏宗族的影响。^②

吴亚东的博士论文《明清时期徽州历史档案研究》（2013）系统考察了明清时期徽州档案的来源、保存及其档案的价值和特征。对档案保存和利用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③

《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的《徽州：书业与地域文化》（法国汉学第13辑，2010年）是一部关于徽州文书研究的文集。包括刻书、徽州医籍、戏曲刊刻、宗谱、诉讼文书、善书等方面的研究。

张纯宁通过分析明代散件卖契的分期整理，认为在明代后期散件卖契数量增至高峰，与徽商活动密切关联，土地买卖交易频繁也反映了社会的剧烈变动，如赋税加重、徽商回乡置业或筹措经商资本等，而贫富分化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④

① 刘道胜：《明清徽州宗族关系文书研究》，安徽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

② 赵尔波：《明清时期祁门谢氏宗族及其遗存文书研究》，安徽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

③ 吴亚东：《明清时期徽州历史档案研究》，安徽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

④ 张纯宁：《变动中的明代后期徽州社会——以徽州散件卖契作为观察视角》，《社会·经济·观念史视野中的古代中国国际青年学术会议暨第二届清华青年史学论坛论文集上》，2010年。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4. 徽州文书与基层社会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于徽州基层社会研究，特别是通过徽州文书研究徽州基层社会控制是徽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前文所提及的日本学者中岛乐章和熊远报在该领域用力尤多。中岛乐章的《明末徽州的里甲制关系文书》一文介绍了一系列关于里甲制的合同文书，认为，明末里长户、粮长户赋役负担过重，在徽州宗族、村落中有实力者经过“众议”、“公议”，签订应役合同，共同“完纳钱粮”、“轮流帮解”；其《明代后期徽州乡村社会的纷争处理》一文研究了徽州乡村的纷争处理和与官方正式判决之间的关系；中岛乐章还有《明末徽州的佃仆制与纷争》一文分析了主仆纷争及其引发的诉讼问题。熊远报的《清代徽州地方地域纷争中的社会结构形态——以乾隆时期婺源县西关坝诉讼案为中心》一文考察了在婺源西关水坝的修建过程中在城绅商与在乡的绅商、船民的矛盾以及各县的知县等官员间互相牵制的多重关系。夫马进的《试论明末徽州府的丝绢分担纷争》一文从《丝绢全书》入手，对发生在万历五年徽州府的丝绢分担纠纷进行了考证，探讨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和诉讼制度。韩国学者权仁溶的《从祁门县“谢氏纷争”看明末徽州的土地丈量与里甲制》一文以祁门县谢氏《万历状稿供招》为线索，分析认为明末徽州清丈人役的人选主要是原有的里甲组织和人员，清丈单位也是原有的“里”；权仁溶的另一篇文章《从〈茗洲吴氏家记〉看明中期徽州的里甲制》通过分析明代休宁茗洲村的吴氏族谱，考察宗族与里长应役关系、里甲构成、黄册里长等问题，从吴氏这样有实力宗族承担相当里役的姿态看，这被宗族当作一种生存战略来采用。卞利的《明代徽州的民事纠纷与民事诉讼》考察了明代徽州民事诉讼增多的原因、诉讼基本内容、处理程序、依据标准等，认为商品经济发展和人们法律意识增强是诉讼增多的主要原因。^①韩

^① [日] 中岛乐章：《明末徽州の里甲制関係文書》（《東洋学報》第80卷第2号，1998年9月）、《明代后期徽州鄉村社会の纷争处理》（《史学雑誌》107—9，1998年）、熊远报：《清代徽州地方における地域纷争の構図——以乾隆期婺源县西関壩訴訟を中心として》（《東洋学報》第81卷第1号，1999年6月）、[日] 夫马进：《试论明末徽州府的丝绢分担纷争》（《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2期）、[韩] 权仁溶：《从祁门县“谢氏纷争”看明末徽州的土地丈量与里甲制》（《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从〈茗洲吴氏家记〉看明中期徽州的里甲制》（《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一期，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卞利：《明代徽州的民事纠纷与民事诉讼》（《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国学者洪性鸠著有博士论文《明清时代徽州乡村组织与宗族关系研究》(2003)认为在明清时期的徽州地区,作为国家基层组织的里甲在实际运作中直接借用了既有的宗族组织。韩国学者金仙悛亦有博士论文及系列论文研究徽州乡村组织与民间诉讼的关系,认为明代中期以后里长和老人在民间纠纷裁判中的作用减弱,民间诉讼主要借助地方宗族及其领袖的调停,此外明代后期出现的乡约和保甲并不是要取代自明初实行的里甲制,只是作为其解决民间纠纷的辅助。^①

中岛乐章关于徽州民间纠纷研究著作《明代乡村纠纷与秩序——以徽州文书为中心》(汲古书院200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是日本第一本徽学研究的专著。该书主要以明代徽州文书,特别是诉讼文书为主要史料,以诉讼个案分析为主线,对明初“老人制”在徽州实施的背景,里甲体制下民间纷争的解决方式,明代中期以后宗族的结合和扩大,以及徽州主仆纷争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本书最大的意义,就是对里老人制以及乡村范围的纠纷处理的实态和变迁的论述。”^②

熊远报的专著《清代徽州地域社会史研究——境域·集团·网络和社会秩序》(汲古书院,2003年)利用徽州文书等文献资料描述了徽州村落的外在景观和内在的社会结构,通过从村落到县城,在不同的社会、地理空间层次中发生的各种纠纷与社会冲突的具体案例研究,考察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秩序体制和特征。该书探讨了徽商利润的回流对徽州的社会组织、村落景物、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认为乡村社会的各种纠纷主要通过调停的方式得以解决。^③

卞利的《明清徽州社会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系统考察了明清徽州社会的多侧面,其中第五编“明清徽州的法制与社会”考察了

^① 邹怡:《明清以来的徽州茶业与地方社会(1368—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9页。

^② [日]中岛乐章著、高飞、郭万平译:《明代乡村纠纷与秩序——以徽州文书为中心》,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06页。

^③ 熊远报:《清代徽州地域社会史研究——境界集团ネットワークと社会秩序》,东京,汲古书院,2003年。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明清徽州的民事纠纷与民事诉讼、健讼的表现形式和讼师的作用及乡规民约。卞利的另一著作《国家与社会的冲突与整合——论明清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与农村基层社会的稳定》（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主要论及明清徽州民事纠纷、民事诉讼个案，并以徽州的乡规民约为例探讨民间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整合。

韩秀桃的《明清徽州的民间纠纷及其解决》（2004）包括导论、结语和八章内容。在导论中，作者提出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材料和方法。所要解决的问题是通过对明清徽州法律文书的微观研究，探讨中国传统社会“国法”与“民情”在解决民间纠纷中的互动关系，研究的材料为告状文书、审案文书等徽州法律文书，该书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从整体史观出发，运用法律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围绕民间纠纷及其解决这一主题，研究徽州的法律文献史料，进而探讨明清时期徽州民间社会秩序，明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文化精神。第一、二章主要论述了明清时期中国正统的法律思想；第三、四、五章通过对徽州相关法律文书的文本研究，揭示个人、宗族、官府在民间纠纷中呈现出的一般规则和作用；第六章“清代前期徽州的民间纠纷与基层社会”研究了徽州基层社会的诉讼观念和纠纷的解决机制，特别是地方官在审理民事纠纷中的一些基本原则；第七章“清代例的制定与徽州基层社会”通过清代“开豁世仆”的谕旨在徽州的基层法制运作中没有得到有效实施来揭示基层司法中“例的灵活性和实用性”；第八章“明清徽州坟墓纠纷的初步分析”利用汪、杨两个宗族的坟墓纠纷案例研究在解决纠纷过程中地方官在法律与民情间的平衡手段；结语“法理与私情之间”阐述了该书的主旨，认为在传统的民间社会生活中，国家法律与民间习俗共同控制和约束乡民的行为，两者之间的协作和妥协维持了基层社会的和谐与平衡。

山本英史利用西递胡氏契约文书分析了中人的身份及其参与公共事务的情况；陈瑞研究了明清时期徽州保甲组织的职能及其影响因素；陈勇通过徽州的赋役文书研究徽州乡民对纳税责任的认知和纳税意识；张萍利用徽州谱牒与文书探讨明清徽州民间的纠纷与诉讼；刘道胜等研究了明清徽

州民间契约关系的维系、家庭财产继承、资产生息和经济互助问题；刘岸冰亦有专文论述明清徽州民间社会的契约经济。^①

王振忠有多篇文章利用徽州文书研究徽州基层社会和社会生活。他专文探讨了婺源凰腾村文书《应酬便览》所反映的徽州的自然灾害、民间信仰习俗等；其根据新发现的徽州文书，考辨“叫魂案”在康熙年间就已经存在，而非学界此前主张的乾隆之后，并探讨了“叫魂案”的社会根源及徽州社会应对；以徽州的分家文书探讨徽州乡村的契约意识；以《新旧碎锦杂录》抄本两种为中心，探讨其所反映的晚清徽州民间的社会生活；他还透过绩溪民间文献《应星日记》揭示明清鼎革之际的徽州社会生活图景；根据《庚戌袖珍日记》研究清末徽州学生的行旅生活；王振忠、朱红还利用书信、文书等考察了晚晴、民国时期上海徽帮学徒的社会生活，包括学徒的婚姻选择和婚事消费等。^②从王振忠的一系列文章可见其擅长搜集整理新史料，研究视野在空间方面下移至村落，在研究群体方面则从徽商至农民、学徒、学生等，体现出当代徽州社会文化史研究前沿的特点。

徽州民间会社研究亦得到学界关注。王日根发表于1995年的《明清徽州会社经济举隅》一文考察了明清徽州会社的类型、作用及其田

① [日]山本英史：《明清黔巢西遞胡氏契約文書の検討》（《史学》第65卷第3号，1996年）、陈瑞：《明清时期徽州保甲组织的职能发挥及其影响因素》（《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4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陈勇：《从徽州文书看明清徽州民间的纳税文化》（《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0期）、张萍：《从明清徽州谱牒与文书看当时社会的民间纠纷与诉讼》（《怀化学院学报》2007年第11期）、刘道胜、凌桂萍：《明清徽州分家阉书与民间继承关系》（《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刘道胜：《明清徽州民间契约关系的维系》（《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明清徽州的民间资产生息与经济互助》（《史学月刊》2013年第12期）、刘岸冰：《明清徽州民间社会的契约经济》，《上海经济研究》2009年第7期。

② 王振忠：《清代徽州民间的灾害、信仰及相关习俗——以婺源县浙源乡孝悌里凰腾村文书〈应酬便览〉为中心》（《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从新发现的徽州文书看“叫魂”事件》（《复旦学报》2005年第2期）、《清代一个徽州小农家庭的生活状况——对〈天字号阉书〉的考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晚清徽州民间社会生活管窥——〈新旧碎锦杂录〉抄本两种整理札记》（《安徽史学》2006年第5期）、《从〈应星日记〉看晚明清初的徽州乡土社会》（《社会科学》2006年第12期）、《清末徽州学生的〈庚戌袖珍日记〉》（《安徽史学》2009年第1期）、《徽州商业文化的一个侧面——反映民国时期上海徽州学徒生活的十封书信》（《复旦学报》1999年第4期）、《从婺源虹关文书看晚晴上海徽帮学徒的社会生活》（与朱红合著，《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产来源。^①日本学者涉谷裕子通过徽州文书考察了徽州乡村的各种“会”组织；涉谷裕子还对清代徽州休宁县的棚民进行了研究，认为棚民被当地宗族驱赶或接纳主要取决于棚民垦山是否触犯宗族利益，由于经商而缺少人手，有些地方反倒欢迎棚民租垦。^②卞利对明清时期徽州会社的含义、类型、功能、作用、特点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论述，并对会社规约进行了考察，总结其特点，分析其功能。^③丁华东论述了会社在徽州区域社会研究中的意义。^④徐松如以歙县为例考察了抗战时期民间力量在物价管控中的作用；他还专文探讨了抗战时期徽州基层社会国家与社会权力关系的演变。^⑤史五一探讨了徽州各类会社在基层社会运作中的功能、作用，以及兴盛的原因，并对祭祀性会社进行了系统论述。^⑥

钱会是徽州会社的一个类型，徐越、方光禄通过会书考察钱会性质，认为其为民间经济互助组织。^⑦胡中生根据会书资料探讨晚清以来徽州钱会的类型、基础、运作状况，以及对徽州社会的影响，胡中生认为钱会在近代徽州社会中起到了融资和救助的双重功能，有利于徽州社会稳定和民间工商业的发展。^⑧宾长初对《徽州文书》第二辑所收谢氏家族的会书进

① 王日根：《明清徽州会社经济举隅》，《中国经济研究》1995年第2期。

② [日]涉谷裕子：《徽州文書にみられる“会”組織について》（《史学》第67卷第1号，1997年）、《清代徽州休寧県における棚民像》（山本英史编：《伝統中国の地域像》，东京：庆应大学出版社，2000年）。

③ 卞利：《明清时期徽州的会社初探》（《安徽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明清徽州会社规约研究》（《徽学》第4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④ 丁华东：《会社在徽州区域社会研究中的意义——以明清之际的徽州民间会社为分析中心》，《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12期。

⑤ 徐松如：《以歙县为例看抗战时期民间社会力量在物价管制中的作用》（《史学月刊》2008年第6期）、《抗战时期徽州基层社会权力关系探析——以歙县为例》（《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四期，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⑥ 史五一：《试析明清徽州会社的兴盛及其原因》（《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12期）、《试析明清徽州会社的功能与作用》（《中国地方志》2009年第11期）、《明清徽州祭祀性会社述论》（《黑龙江史志》2010年第20期）。

⑦ 徐越、方光禄：《清末和民国徽州民间的经济互助——以徽州会书为中心》，《黄山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⑧ 胡中生：《钱会与近代徽州社会》（《史学月刊》2006年第9期）、《徽州民间的会书与钱会》（《寻根》2008年第6期）。

行计量分析，并探讨了钱会的性质，认为钱会除融资、救助功能外，还有储蓄功能；黄志繁考察了清代至民国钱会的性质和规制的变化。^①此外，束隆定、熊远报对会书亦有研究。^②

四、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其他专题与区域整体研究

1. 社会救济研究

孙华莹的《徽商与明清徽州荒政》论述明清时期徽商积极参与徽州的荒政事务，并形成了徽州的荒政特色：官商共济、宗族内部救济与政府救济有机结合，救济经费、物资等运作的商业化，从而协调徽州的商民、官民关系，缓和了社会矛盾。吴媛媛的《明清徽州的水旱灾害与粮食种植》通过考察明清徽州地区的水旱灾害与环境变迁关系，以及当地针对水旱灾害对种植结构与耕作制度的调整，研究了明清以来徽州地区灾害与社会的关系。梁诸英的《明清时期徽州水灾与徽州社会》探讨水灾对徽州社会的影响及地方社会的应对。^③

2. 文化教育研究

明清徽州的藏书、书院、科举、教育等是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薛贞芳的《徽州藏书文化》（2007）研究了徽州藏书文化的背景、私家藏书的历程、公藏的构成，以及藏书的风尚、藏书家对藏书的整理，分析了徽州藏书文化的特点、地位等。^④梁仁志、张室龙的《徽商与明清徽州藏书业》一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徽商与明清徽州藏书业之间的关系：徽

① 宾长初：《清代徽州钱会的计量分析——基于〈徽州文书〉第二辑所收会书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4期；黄志繁：《清至民国徽州钱会性质及规制之演化——基于婺源县钱会文书的分析》，《中国农史》2013年第2期。

② 王振忠：《徽学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0页。

③ 孙华莹：《徽商与明清徽州荒政》（《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吴媛媛：《明清徽州的水旱灾害与粮食种植》（《古今农业》2007年第2期）、梁诸英：《明清时期徽州水灾与徽州社会》（《安徽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④ 薛贞芳：《徽州藏书文化》，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商对徽州藏书业的影响；徽商影响之下徽州藏书业的特点；藏书业对徽商的影响，以此揭示商业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①张晓婧的《论明清徽州书院的社会功能——一种社会学视角》一文认为徽州书院教育力矫传统教育在培养人才、开发民智、传播文化、普及教育等方面的不足，充分发挥了教育自身的社会功能，对徽州文化的发达和此后社会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②

台湾学者刘祥光对宋代以来的徽州书院等公私教育机构有专门的研究，其博士论文《明清时期的教育与社会：徽州公私教育的发展，960—1800》（1996年）考察了宋至清代徽州歙县、休宁两县公私教育机构的建立和发展情况，分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③他还有专文探讨宋至清代徽州文人、塾师与初级教育，以及南宋和明代的徽州书院。^④朱开宇则分析了宋明时期徽州科举与宗族发展的关系。^⑤

宋长琨的博士论文《家庭背景与明代徽州双籍进士的地位升迁》考察了明清徽州双籍进士外向流动的城市地区、原因，以及其与本籍进士群体的地位升迁的不同情况。认为两类进士在地位升迁上的不同表现，主要源于他们不同的家庭背景。研究表明由于地域流动，徽州双籍进士的家庭模式发生了重构，他们的家庭不再是徽州传统的大宗族下的小家庭构造，而是由直系血亲和从亲组成的“扩大了的家庭”模式。新的家庭组织模式在科举考试和官场竞争中为徽商子弟的登科入仕和地位升迁提供了支持。^⑥

① 梁仁志、张室龙：《徽商与明清徽州藏书业》，《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② 张晓婧：《论明清徽州书院的社会功能——一种社会学视角》，《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③ Liu Hsiang-kwang,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ublic and Private Institutions in Hui-chou, 960—1800*, Ph.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96.

④ 刘祥光：《中国近世地方教育的发展：徽州文人、塾师与初级教育，1100—1800》（台湾《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7年第28期）、《书院与社会：徽州书院之研究（1200—1644）》（《中国书院》2003年第5期）。

⑤ 朱开宇：《科举社会、地域秩序与宗族发展——宋明间的徽州，1100—1644》，台湾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⑥ 宋长琨：《家庭背景与明代徽州双籍进士的地位升迁》，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

3. 徽州妇女研究

田汝康的《男性的忧愤与女性的贞节：明清时代的中国伦理价值观比较研究》（1988）一书涉及徽州妇女研究，其以明清时期，尤其是明朝中后期徽州、泉州和漳州三府为例，认为明代中国妇女自杀人数的急剧上升，与落第文人数量的增加直接相关。那些落第士子的焦虑忧愤通过称颂那些忠诚地遵从普遍道德规范的妇女们的痛苦和烦恼而获得心理补偿和慰藉，从而将男性的忧愤与女性的贞节联系在了一起。^①有论者认为这是“率先将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与中国史研究实践结合在一起”的成功范例。^②

唐力行在其《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1993）、《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1999）、《苏州与徽州——16—20世纪两地互动与社会变迁的比较研究》（2007）等著作中对徽州商人妇的社会功能有深入阐述。

陈瑛珣的《明清契约文书中的妇女经济活动》（台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利用契约文书考察明清时期妇女的社会经济活动，包括农业劳动、纺织、佣工、做中人、媒证、放款生息等。而在债务契约中有徽州妇女在丈夫后面连带署名的现象。其《清代民间妇女生活史料的发掘与运用》（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亦涉及清末民初徽州妇女的社会生活，并论及“女性持家”等社会经济活动。

阿风利用徽州文书系统研究了明清时期徽州妇女地位和权利。其博士论文《徽州文书所见明清时代妇女的地位与权利》（2002）包含五章内容，第一章对中国妇女史研究进行回顾，并说明徽州文书的发现对于女性史研究所具有的意义；第二章以土地典卖文书为中心，探讨女性在土地交易过程中的地位与权利；第三章以分产继承文书为中心，探讨在家产析分、立嗣、招婿过程中女儿、妻子、母亲分别扮演的角色及其财产权利；第四章则是利用卖身契以及庄仆婚姻文书探讨了婢女买卖及庄仆入赘、仆妇招赘

^① T'ien Ju-k'ang, *Male anxiety and female chastit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ethical values in Ming-Cjing times*, Leiden: E.J.Brill, 1988.

^② 周兵：《田汝康与中国的新文化史研究》，《复旦学报》2012年第6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行为；第五章则是对契约文书中女性的地位与权利进行总结。该文特点是将妇女地位的考察置于当时的土地交易制度、分产继承制度、婚姻关系、人身依附关系中进行分析，以便更好地把握女性在社会实际生活中的地位与权利。阿风还有专文探讨了明清时期徽州妇女在土地交易中的角色地位，分析当时礼法观念与民间实际生活结合的程度与方式。^①

朱琳的《明清徽州女子婚龄浅探——以地方志资料为中心的考察》一文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从女子聘龄、初婚年龄、童养媳抱养及合婚年龄等方面对明清徽州女子婚龄状况进行了量化考察，分析女子婚龄对徽州女性及其家庭的影响；张萍的《明清徽州文书中所见的招赘与过继》一文通过解读在明清徽州文书中有关招赘和过继的契约文献，考察徽州社会的家庭观念、招赘与过继的方式以及社会影响；张晓婧的《明清徽州贞节之风盛行的原因及其社会心理分析》一文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分析明清徽州贞节之风盛行的原因。^②

王传满对明清徽州妇女作了大量研究。其研究了明清徽州妇女对商业的贡献、徽州地理环境与徽州妇女的节烈现象、徽州节烈妇女的特殊婚姻和信仰、节烈观念的强化与实践等。^③此外，宗韵探讨了明清徽商妇在子孙择业方面的重要作用；王丽韞研究了明清徽商妇的生存状态；赵忠仲分析了明清徽州妇女在生活和商业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刘平平考察了明清徽州中下层妇女的日常经济劳作空间。^④

① 阿风：《徽州文书所见明清时代妇女的地位与权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2002年）、《明清时期徽州妇女在土地买卖中的权利与地位》（《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② 朱琳：《明清徽州女子婚龄浅探——以地方志资料为中心的考察》（《安徽史学》2005年第6期）、张萍：《明清徽州文书中所见的招赘与过继》（《安徽史学》2005年第6期）、张晓婧：《明清徽州贞节之风盛行的原因及其社会心理分析》（《合肥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③ 王传满：《徽州地理人文环境与明清徽州节烈现象》（《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明清社会贞节观念的强化及其实践——以明清徽州为中心的考察》（《唐山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明清徽州妇女对徽州商业的贡献》（《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明清徽州妇女节烈现象与徽州社会》（《南都学刊》2010年第1期）、《明清徽州节烈妇女的宗教信仰》（《中国石油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④ 宗韵：《明清徽商妇在子孙择业方面的重要作用》（《历史档案》2006年第4期）、王丽韞：《从徽州贞节牌坊的盛行看徽商妇的生存状态》（《铜陵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赵忠仲：《明清徽州妇女的二元化性格——以社会生活为考察中心》（《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刘平平：《明清徽州中下层妇女的日常经济劳作空间考》（《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4. 民间信仰、社会风俗研究

张崇旺于1992年发表的《谈谈徽州商人的宗教信仰》一文简要考察了徽商的福禄财神信仰以及行业神和乡土神信仰。^①王振忠发表于2003年的《明清徽州的祭祀礼俗与社会生活——以〈祈神奏格〉展示的民众信仰世界为例》通过刊本《祈神奏格》考察了明清徽州的民间祭祀惯例，探讨其中反映出的民众信仰和社会生活，探寻“徽礼”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传播的脉络。韩国学者曹永宪的《徽州商人的淮、扬进出和水神祠庙》一文探讨徽商在运河城市建立水神祠庙及其意义。^②

美国学者韩森（Valerie Hansen）的研究涉及徽州地区的五通神信仰，他认为南宋时期徽州地区的五通神信仰由于徽商的活动而传播到江南。^③另一位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则认为主要是僧道而非徽商将五通神信仰扩散到江南。^④

任职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郭琦涛对五通神和目连戏有深入研究。他认为五猖神是五通神的徽州变种，是民间信仰中的跟班小神，其在神祇中的地位类似于徽州佃仆，五猖神与汪华等徽州地方和大族保护神之间的关系象征着徽州佃仆与地方大族之间的关系，徽州大族为笼络佃仆，极力推崇五猖神信仰。五猖神与五通神、财神结合都是在明中期之后。郭琦涛认为政府、地方精英、徽商出于各自目的推动了五猖神信仰的发展和传播。^⑤郭琦涛的博士论文认为儒释道对徽州目连戏都有直接影响，徽州邻

① 张崇旺：《谈谈徽州商人的宗教信仰》，《安徽史学》1992年第3期。

② 王振忠：《明清徽州的祭祀礼俗与社会生活——以〈祈神奏格〉展示的民众信仰世界为例》，《历史人类学学刊》第1卷第2期，2003年10月；[韩]曹永宪：《徽州商人的淮、扬进出和水神祠庙》，刘海平主编：《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东亚视角（中国哈佛—燕京学者第六届学术会议论文选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③ Valerie Hansen, *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 1127—1276*,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中译本：韩森著、包伟民译：《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④ Richard Von Glahn, *The Enchantment of Wealth: The God Wutong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Jiangna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51, No.2, Dec.1991, pp.651—714.

⑤ Guo Qitao, *Exorcism and Money: The Symbolic World of the Five-fury Spirit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3.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近的九华山为佛教圣地，而道教圣地齐云山则在徽州境内，相比之下，道教对目连戏影响更大，目连戏本身是个佛教故事，但一些道教仪式被纳入了目连戏，此外，一些徽商推崇的儒家义理也融入了目连戏。目连戏体现了自晚明以来三教合一的思潮，影响至民国。^①郭琦涛还系统探讨了目连戏与徽商和徽州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从中探究“儒学通俗化”的明清徽州社会文化现象。^②日本学者田仲一成较早涉及徽商与目连戏之间关系的研究。^③

陶明选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徽州民间信仰的文章。其《徽州宗族的内神与外神信仰——以族谱为中心的初步考察》一文利用族谱探讨了徽州宗族对内神（有血缘关系的祖神）和外神（无血缘关系的神灵）不同的信仰态度，揭示徽州宗族以外神服务于内神信仰，而外神信仰必须以礼法为准则；其《张王、太子及相关诸神——徽州文书所见民间诸神信仰》一文通过对张王、太子等徽州民间诸神的考证，认为徽州民间信仰具有多重性和复杂性，诸神被民间崇奉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符合儒家准则；其《明清以来徽州的演戏娱神与信仰活动》一文考察了明清以来徽州演戏酬神活动及其社会影响，并以此观察徽州的民间信仰；其博士学位论文《明清以来徽州民间信仰研究》除囊括前述文章的研究内容外，还对徽州民间会社、目连戏、建筑景观、楹联等与民间信仰的关系作了系统研究。^④

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明清时期的丧葬仪式与宗族构建》

① Guo Qitao, *Huizhou Mulian Operas: Conveying Confucian Ethics with "Demons and God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4.

② Guo Qitao, *Ritual Opera and Mercantile Lineage: The Confucian Transformation of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Huizhou*,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还可参见《学术前沿论坛学者讲座》，《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5期。

③ [日] 田仲一成：《明代江南における宗族の演劇統制について——新安商人と目連戯》，明代史研究会明代史论丛编辑委员会编：《山根幸夫教授退休記念明代史論叢》（下），东京，汲古书院，1990年3月。

④ 陶明选：《徽州宗族的内神与外神信仰——以族谱为中心的初步考察》（《江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张王、太子及相关诸神——徽州文书所见民间诸神信仰》（《徽学》第5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明清以来徽州的演戏娱神与信仰活动》（《安徽史学》2009年第6期）、《明清以来徽州民间信仰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1989)一文认为尽管官方竭力提倡儒学,但在徽州的丧葬习俗中儒释道杂糅,可见在民间儒家与其他意识形态的竞争、冲突和糅合。^①周绍明(Joseph P.Mcdermott)探讨了晚明徽州的民间宗教仪式,认为地方精英以官方仪式举办民间宗教仪式,以凸显自身的精英地位。^②

对于学界有关明中期以后宗族祭祀组织逐步取代村落等地缘组织祭祀的说法,涉谷裕子的研究提出不同观点。其对《祝圣会簿》的研究表明,祝圣会作为地缘性的祭祀组织,从明末至20世纪30年代长期存在,并在具体运作中形成了血缘与地缘之间的调和状态。^③

日本学者川胜守认为明清时期徽州宗族文化的兴盛阻碍了当地佛教、道教的发展。^④阿风的《从〈杨干院归结始末〉看明代徽州佛教与宗族之关系——明清徽州地方社会僧俗关系考察之一》一文通过历时八年的徽州歙县罗氏家族与寺僧的互控案及歙县其他同类型案件,探讨明中期徽州地方社会宗族与宗教发展的新趋势,文章指出明代中期寺庙与僧人在地方上仍有较大势力,但宗族祭祀始祖也开始兴盛。^⑤

王昌宜考察了明清徽州的汪氏宗族与汪王信仰,认为汪王信仰成为汪氏宗族的重要优势文化资源。丁希勤的专著《古代徽州宗教信仰研究》(2013)研究了徽州的儒教、道教、佛教、民间信仰,以及各种信仰与徽州社会的互动关系。^⑥

① Timothy Brook, *Funerary Ritual and the Building of Lineag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a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49, No.2, Dec., 1989, pp.465—499.

② Joseph P.Mcdermott, *Emperor, Elites, Commoners: the Community Pact Ritual of the Late Ming*, Joseph P.Mcdermott eds., *State and Court Ritual in China*,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1999.

③ [日]涉谷裕子:《明清時代徽州江南農村社会における祭祀組織について——〈祝聖会簿〉の紹介》(一)、(二),《史学》第59卷第1、第2、第3号,1990年。

④ [日]川胜守:《明清时代徽州地方的宗族社会与宗教文化》,周绍泉、赵华富主编:《'98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⑤ 阿风:《从〈杨干院归结始末〉看明代徽州佛教与宗族之关系——明清徽州地方社会僧俗关系考察之一》,《徽学》2000年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⑥ 王昌宜:《明清徽州的汪氏宗族与汪王信仰》(《宗教学研究》2012年第2期)、丁希勤:《古代徽州宗教信仰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李明的《明清徽州区域风俗双重特性成因初探》一文从自然环境的山水相交、宗族制度对本土风俗的双重作用、风俗传播中徽商群体与故乡人的差异、风俗层的纵向传通态势等角度探讨徽州区域风俗双重特性之成因，为徽州风俗研究提供新视角。周晓光、徐彬研究了明清时期徽州家谱与社会风俗的关系。^①

5. 区域社会经济史的整体研究

对徽州作整体性的研究往往是徽学研究者的一个最终的目标。由于明清徽州区域社会经济史包罗广阔，对其进行整体研究是个浩大的工程，所以研究者往往从自己熟悉的研究领域作提纲挈领式的或有所侧重的研究。如高寿仙的《徽州文化》（1993）主要涉及宗族、徽商；唐力行的《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1999）立足于“徽州是一个宗族社会”的认识；卞利的《明清徽州社会研究》（2004）试图在徽学的理论研究和徽州的风俗、社会问题、社会控制，以及徽州文书研究等方面与前人对徽州社会经济史的整体研究有所区分。

高寿仙的《徽州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名为徽州文化，主要还是一本区域社会史的著作。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宗族社会；中篇是徽商；下篇主要是科举教育、风俗、宗教生活、艺术等文化方面。该书首先研究了徽州的地理环境和人口压力，认为徽州土地宜于发展林木业，不宜于种粮。该书许多笔墨花在宗族分析上，认为徽州不存在严重的土地兼并，特别是族田的存在加固了小农经济的稳定性，并简要考察了徽州宗族的族居生活和宗族结构、家谱、宗祠、宗规宗约，将宗族的功能归结为：宗教性、自固性、社会化、司法性、保护性。中篇研究了宗族对徽商经营的推动和束缚，考察了晚清徽商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打击以及政治靠山的式微在盐业、金融业领域逐渐失势。下编的文化部分考察了科举和社会教育、乡约与社会教化、徽州民居、民间信仰、徽州戏剧、画家与新

^① 李明：《明清徽州区域风俗双重特性成因初探》（《安徽史学》2005年第6期）、周晓光、徐彬：《明清徽州家谱与徽州社会风俗》（《安徽史学》2011年第6期）。

安画派、版画、篆刻、盆景等。该书“后记”追溯了徽商研究和“徽州学”的来历，并阐述了该书的史观，强调中国社会的独特性，称“以西方历史的发展模式作为认识中国历史的‘框架’是不可能触及问题实质的”。可见“中国中心论”在国内学界引发的共鸣。

唐力行的《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为作者多年研究徽州区域社会经济史成果的总结。分徽州宗族、徽州商人、徽州文化、徽州社会、徽州人物等五部分。“徽州宗族”部分主要考察了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的关系、徽州家庭宗族结构的形成及对徽州社会经济变迁的影响，并以方氏为案例分析了徽州宗族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徽州商人”部分研究了徽商的形成、特色、群体心理，以及徽商中的海商、茶商、木商等。“徽州文化”部分讨论了徽商文化的内涵、特点、历史地位，强调了新安理学与商人文化的关系。将徽商文化的特征归结为：科学性与实用性、封建性和伦理性、通俗性、广泛性等。“徽州社会”涉及徽州区域研究的基础工程，即徽州区域地理与人口，比较了徽州与苏州两地社会发展的差异，研究了商人社会的社会功能以及徽商的历史命运。“徽州人物”研究了胡铁花和胡适父子。该书体现了唐力行跨学科和系统论的研究方法。

卞利的《明清徽州社会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除“徽学的形成与发展（代前言）”外有七编。第一编“明清徽州的社会变迁”分析了明正德末至清代前期社会变迁的阶段性发展，认为明清时期的徽州地区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问题突出，金钱本位逐步深入人心，社会心态也在改变，民众注重实效、实利，官场形成玩世不恭的心态，游民阶层的地痞无赖心态也很突出，宗族血缘的认同心理更加强化；第二编“明清徽州的社会结构”考察了家庭结构、家庭惯制、家族与宗族、会社等；第三编“明清徽商与徽州社会”就徽商的经营之道、营销方略、法制观念和对公益慈善事业的投入进行了研究；第四编“明清徽州民俗与徽州社会”主要涉及经济民俗和民间信仰；第五编“明清徽州的法制与社会”探讨了民事纠纷、民事诉讼、“健讼”风气的形成及乡规民约等；第六编“明清徽州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的社会问题”对徽州的地痞无赖、棚民等群体及引发的社会问题和政府反应进行了深入研究；第七编“徽州文书与文献资料研究”对徽州契约文书的由来、流传、收藏及其价值作了辨析。法制史和徽州文书研究为卞利在徽州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的显著特点。

动用行政资源，合国内数代徽学研究者之力，费时数年完成的“徽州文化全书”是对徽学研究的系统总结。在20卷本的“徽州文化全书”中，大多是徽州区域社会经济史的内容，如《徽州土地关系》、《徽商》、《徽州宗族社会》、《徽州教育》、《徽州文书档案》、《新安理学》，等等。

此外，近年来徽学研究更加下移、细化。法国汉学家劳格文（John Lagerwey）与王振忠合作主编“徽州传统社会丛书”，主旨是以田野调查所获得的口碑资料和地方文献，描述1949年之前的徽州村落的经济、民俗、社会等。已出版的有吴正芳的《白杨源：徽州传统村落社会》（2011）、许骥的《徽州传统村落社会——许村》和卜永坚、毕新丁的《婺源宗族、经济与民俗（上下）》（2013）等。

其他的研究还有孟凡胜的博士论文研究了明清水利社会。^①胡心怡梳理了明清时期徽州人向南京、扬州和仪征的迁移情况，并分析了移民对迁出地和移入地的影响。^②吴媛媛研究了明清徽州的粮食问题。^③

小 结

自傅衣凌、叶显恩等奠基和开创了徽学研究，唐力行等学者的徽商和宗族研究为徽学搭建起基本的研究框架，使得徽学的学科体系基本成型，王振忠、卞利等通过对徽州史料的拓展将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推向更基

① 孟凡胜：《明清徽州水利社会几个问题的研究》，安徽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

② 胡心怡：《试论明清时期徽州人向淮扬地区的人口迁移情况及其影响》，《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③ 吴媛媛：《明清徽州粮食问题研究》，《安徽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层、细部的研究，并拓宽了更多研究领域。西方学者如宋汉理、居蜜、贺杰，日本学者如臼井佐知子、中岛乐章、涉谷裕子，韩国学者如朴元焯、权仁溶，在徽学领域都卓然有成，且与国内徽学研究者有密切互动，国际学术交流推动了徽学的发展，也促使徽学走上国际，徽学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显学。徽学的进一步拓展，特别是在研究的理论、方法上创新需要中外学者的交流沟通，互相参照，相互启发。

王振忠在《徽学研究入门》中提出徽学的进一步发展在于“新史料的发掘、整理与研究”、“田野调查方法的运用”、“新领域的开拓与深入”。就徽学研究的趋向而言，深以为然。徽学以徽州文书为根基，徽学正是因有徽州文书而成为专门之学，其发展的生命之源亦在徽州史料的不断搜集和扩展。该领域研究的每一次突破都离不开徽州史料的整理、研究。傅衣凌回忆：“50年代末，徽州民间文约大量流入北京，为徽学研究的深入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使我扩大了研究的范围，展开了明清时期徽州社会阶级结构、土地租佃关系诸方面的探索。这些研究，使我对明清时代商品经济在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地位与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亦给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并给我以后有关资本主义萌芽和山区经济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①20世纪80年代徽商研究的热潮也得益于《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的直接推动。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徽学研究很大程度上还得力于思想观念、学术风气的转变，自20世纪90年代徽学的发展更加依赖史料的开掘，王振忠对于村落文书、商书、日记、信函等搜集、利用，对田野调查和村落口述史的重视，直接扩展了徽学的史料范围和研究领域。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推出《徽州文书》1—4辑，将徽州文书本身作为研究对象，使得对徽州文书的研究成为新的研究领域。因此，徽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仍需要深入民间，扩大史料范围，加强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

同其他学科的学术研究一样，徽学研究也离不开理论创新，20世纪

^① 傅衣凌：《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序言〉》，黄山书社1988年版。

80年代，张海鹏、唐力行提出“大徽州”、“小徽州”的概念就是一个区域比较的理论模型。将徽州的核心层与外围层面进行互动比较研究，放宽了研究的视界，真正使徽学研究跳出徽州，也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徽州。也许由于明清以来的徽州是个相对封闭的区域，史学界由“西方中心论”向“中国中心论”的转向在徽学研究领域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但徽学研究领域的拓展确实得益于史学研究由“革命史范式”向“现代化范式”的转变。有学者指出，当代的区域史学研究正发生“生态转向”，提倡引入环境史研究方法，以不断变动中的人与自然关系作为考察一切社会经济事相的视界，通过环境与社会各要素的互动来把握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化过程。^①当然，这种“生态转向”在徽州社会经济史中是否适用可以论证。

新史料、新的理论方法、新领域三位一体，互相启发、相互触动，一处有新变化，也许可以获得整体突破。但作为一门实证学科，史料还是区域史研究最基本的要件，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还需下足史料搜集和田野调查的功夫。

^① 夏明方：《老问题与新方法：与时俱进的明清江南经济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第五章

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史个案 之一：研究机构举例

20世纪80年代初安徽师范大学的张海鹏依托历史系明清史教研室整理徽商资料，启动徽商研究，也带出了一个徽州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团队。今天，有较大规模和影响力的成果也往往出自科研团队之手，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欲更上层楼，须依托研究机构，加强学术团队建设。就已经取得的成就看，一些重要研究成果往往出自江南区域内的少数几个研究机构，如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江南学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的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等对江南区域的研究，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对苏南的研究，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浙江师范大学城市史研究中心对明清杭嘉湖地区的研究，复旦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对上海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安徽大学的徽学研究中心、安徽师范大学的皖南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对徽州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其中的研究中心多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相继设立，从中也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的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大势所趋。对它们进行简要介绍，可能会为我们的江南社会经济史的学术史研究提供一个文本之外的观察视角。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一、关注整体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机构举例

1. 复旦大学历史系和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

复旦大学于1925年正式设史学系，在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史学名家荟萃，如周谷城的世界古代史研究，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周予同的经学史研究，胡厚宣的甲骨文研究，蔡尚思的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杨宽的先秦史研究等蜚声海内外。改革开放后，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步趋时代潮流成为史学界的学术热点之一，复旦大学历史系和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的前辈学者邹逸麟、樊树志等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江南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邹逸麟以历史地理学家的目光，将明清江南史置于历史地理变迁的大背景下，从地理环境特殊性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开拓了一条新路子”。^①樊树志的江南市镇研究著作早已成为江南市镇研究的必读之书。文脉绵延，如今历史系的戴鞍钢、张海英、冯贤亮，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王振忠等都在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卓有建树。

戴鞍钢研究了上海口岸对周边农村地区的辐射，与长江流域腹地之间的商路和经济联系，考察上海与周边及长江流域的经济、社会的互联互通。相关著作有：《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1843—1913）》（1998）、《互联互通：近代以来上海与长江三角洲的交通格局》（2013）；张海英主要研究江南区域内各地之间、江南与全国各区域市场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明清政府对市镇基层社会的行政管理，相关著作有《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2002）；冯贤亮主要研究江南地区环境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相关著作有《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2002）、《太湖平原的环境刻画与城乡变迁（1368—1912）》（2008）、《近世浙西的环境、水利与社会》（2010）。

^① 陈学文：《筚路蓝缕的三十年——明清江南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王家范主编：《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成立于1999年6月，前身是成立于1957年，由我国历史地理学奠基人、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创办的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室。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是教育部首批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亦是历史地理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该中心培养了一批借助历史地理研究的强项，专于江南区域史研究的学者和博士生。

王振忠以研究徽商和徽州文书知名，相关著作有《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1996）、《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新发现的16—20世纪民间档案文书研究》（2002）、《明清以来徽州村落社会史研究：以新发现的民间珍稀文献为中心》（2011）。其指导的博士论文如邹怡的《明清以来徽州茶业及相关问题研究》（2006）、陶明选的《明清以来徽州民间信仰研究》（2007）、吴媛媛的《明清时期徽州的灾害及其社会应对》（2007）等填补一些徽学研究的空白。

此外，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还培养了一批研究江南社会经济史的博士，如苏州大学的余同元对明清江南地区传统工匠的现代转型研究，中山大学的吴滔则主要研究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相关著作有《清代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空间透视——以苏州地区为中心》（2010）。

2. 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

南京大学历史系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由原中央大学的历史系和边疆政治系与金陵大学历史系合并而成。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虽非南京大学历史系的主攻方向，但该系研究明清史的学者逐步开辟了江南史研究园地。已故的洪焕椿教授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垂意于浙江地方文献研究”，先后出版《浙江地方志考录》（1958）、《浙江文献丛考》（1983）、《浙江方志考》（1984）。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洪焕椿将研究重心转向江南经济，其与苏州历史博物馆、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合作编订的《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1981）“成为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几乎必资利用的参考资料”，1988年出版《明清苏州农村经济资料》，全书辑录史料340条，50余万字，亦为研究明清苏州农村经济不可或缺的参考文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献。其《明清史偶存》（1992）中江南社会经济史，尤其是苏州社会经济史文章占了相当篇幅。^①其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薪火相传，弟子如范金民等已是当今该领域研究的名家。南京大学历史系的罗仑亦从80年代开始从事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主编《明清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1993）。

范金民对江南商业、丝绸史、进士有系统深入研究，对江南的农村经济、重赋问题、市镇、商帮、宗族、江南文化等也有专门研究。著作有：《江南丝绸史研究》（1993）、《江南商业的发展》（1998）、《国计民生——明清社会经济研究》（2008）、《赋税甲天下：明清江南社会经济探析》（2013）等。他还注重江南社会经济史的学术史总结，对市镇史研究有专文论述，《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入门》（2012）对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进行了系统总结。

夏维中对明清江南丝绸贸易、商业、农村基层组织以及徽商、徽州宗族都有深入研究。马俊亚曾对近代江南企业和工业资本有深入研究。著作有《规模经济与区域发展——近代江南地区企业经营现代化研究》（1999）、《混合与发展——江南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的现代演变（1900—1950）》（2003）。罗晓翔对明代南京的士绅阶层、城市社会有细致研究。^②

此外，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洪璞对江南农业、乡村社会，以及徽商都有独到的研究。^③

3.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和中国江南学研究中心的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建立于1951年，著名学者吕思勉、吴泽、李平心、戴家祥、陈旭麓等曾执教于此。知名的江南史研究专家王家范从20

^① 范金民：《山高水长忆师恩》，王家范主编：《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② 罗晓翔：《明代南京的坊厢与字铺——地方行政与城市社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4期）、《城市生活的空间结构与城市认同——以明代南京士绅社会为中心》（《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7期）、《明中后期南京士绅家族的社会形态》（《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二期，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③ 洪璞：《明代以来太湖南岸乡村的经济与社会变迁：以吴江县为中心》，中华书局2005年版。

世纪80年代开始深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王家范思想敏锐，学术兴趣广泛，从中国古代史至近现代史，从中国学术史、思想史、史学理论到社会经济史，无不涉猎，江南社会经济史是其研究的一个重心。他在20世纪80年代对江南市镇、士人、消费的研究在学界较有影响，^①90年代以来对江南史研究的相关史学理论多有阐发，对跟风西方史学理论范式提出异见，认为江南区域史研究应立足史料，不能照搬模式，呼吁“让真切的实证求是取代名不符实的宏论”，因为“复杂的历史，需要复杂的头脑”。^②他主编的《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2010）汇集了数代江南史研究者的学术历程和学术体验，是一部生活化的江南研究的学术史。

王家范还主持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江南学研究中心，以构建“中国江南学”为职志，目前汇聚了一批学者，对江南的环境变迁与社会转型、江浙沪城乡互动与农村社会变迁、江南都市大众文化研究、江南文学专题文献、江南意象等课题进行研究。其中如李学昌、董建波对20世纪上半叶江南农村社会经济、陈江对明中后期江南社会生活均有深入的研究。^③该中心主办或联合主办了多次江南史研讨会，如2008年11月在浙江海盐召开的“江南研究的视域与方法回顾”学术研讨会、2010年12月在上海召开的“从江南看中国：文学与历史”学术研讨会、2011年12月在杭州余杭召开的“全球视野下的江南文化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等。

① 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晚明江南士大夫的历史命运》（《史林》1987年第2期）、《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明清江南消费经济探测之一》（《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明清江南消费性质与消费效果解析——明清江南消费经济探测之二》（《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8年第2期）。

② 王家范：《解读历史的沉重——评弗兰克〈白银资本〉》（《史林》2000年第4期）、《中国社会经济史面临的挑战——回应〈大分流〉的“问题意识”》（《史林》2004年第4期）、《明清江南研究的期待与检讨》（《学术月刊》2006年第6期）、《复杂的历史，需要复杂的头脑——从“黄宗羲定律”说开去》（《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1期）。

③ 李学昌主编：《20世纪常熟农村社会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20世纪南汇农村社会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董建波：《20世纪江浙沪农村社会变迁中的文化演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史学田野调查：方法与实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陈江：《明代中后期的江南社会与社会生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该研究中心的特点是试图将文学、艺术研究纳入江南区域史的整体研究中。中心还创建了“明清江南文人集部总汇”、“江浙沪农村社会变迁海内外论著目录索引”、“都市上海大众文化资料”、“江南文学专题文献”、“江南图像”等数据库。力图将“中国江南学”建立在坚实的资料基础之上。

此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方平长期从事近代上海公共空间的研究，^①瞿骏对辛亥革命与上海社会、清末民初读书人的社会网络和社会生活均有独到的研究。^②

二、从事苏南、浙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机构举例

1.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的江南及苏南社会经济史研究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由苏州大学历史系更名而来，社会学院下设历史研究所、地方志研究所、中国近代政治经济研究室等研究机构。此外，江苏红十字运动研究基地和苏州大学的人口研究所、吴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社会与发展研究所等省、校级科研机构也设于社会学院。社会学院的师资成为研究江南、苏南社会经济史的一支重要力量。

苏州大学早期从事江南、苏南经济史研究的有段本洛等。段本洛的《苏州手工业史》（1986）研究了从明清至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间的各历史时期苏州的丝织手工业、棉纺织手工业、其他城镇手工业、工艺美术手工业、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演变。段本洛与单强合著的《近代江南农村》（1994）是国内学者较早研究江南农村经济变迁的专著。

^① 方平：《清末上海民办报刊的兴起与公共领域的体制建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从〈苏报〉看清季公众舆论的生成与表达》（《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戏园与清末上海公共空间的拓展》（《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② 瞿骏：《辛亥革命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人上海与居上海——论清末士人在城市的私谊网络（1895—1911）》（《史林》2007年第3期）、《“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之再思——以“转型时代”（1895—1925）学生生活史为例》（《学术月刊》2009年第7期）。

王卫平主编《苏南社会结构变迁研究》(2004),著有《明清时期江南社会史研究》(2006),合作编写有《苏州史纪(古代)》(1999)。王卫平对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思想基础、明清以来江南、苏南地区的社会保障救济和慈善事业有深入研究。池子华对中国近代流民和江南地区的农民工问题,以及红十字会在江南的活动都有系统研究。^①吴建华主要研究江南区域人口社会史,他提出区域人口社会史的学科新概念,将明清江南人口社会视作一个系统,考察其自平衡的运行和发展。^②余同元研究了明清江南地区传统工匠的现代转型。认为在区域社会经济近代化进程中,传统工匠的现代转型是江南区域早期工业化的内在动力和根本标志,以技术转型与角色转换为要素的工业人力资源开发是传统工匠现代转型的本质内涵。^③朱小田对江南的庙会、茶馆、民俗,以及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有深入研究,相关著作有:《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1997)、《苏州史纪(近现代)》(1999)、《在神圣与凡俗之间——江南庙会论考》(2002)、《江南场景:社会史的跨学科对话》(2007)等。朱琳主要研究昆曲与江南社会的互动关系,对明清徽州妇女也有研究。^④

此外,社会学院的原院长王国平与唐力行主编的《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亦是苏州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资料,王国平主编的16卷本、300万字的《苏州通史》即将面世,此为苏州地方史研究的重要里程碑;苏州大学艺术学院的李明对苏州市民公社和江南民俗史有专门研究。^⑤曾任职苏州大学的单强对于近代江南农村、江南区域市场都有深入和系统的研究。

① 池子华:《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近代流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② 吴建华:《明清江南人口社会史研究》,群言出版社2005年版。

③ 余同元:《传统工匠现代转型研究——以江南早期工业化中工匠技术转型与角色转换为中心》,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④ 朱琳:《昆曲与近世江南社会生活》(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明清徽州女子婚龄浅探——以地方志资料为中心的考察》(《安徽史学》2005年第6期)。

⑤ 李明:《苏州市民公社的衍变及现代意义》(《史林》2003年第1期)、《明清苏州、扬州、徽州三地风俗的互动互融——兼谈“苏意”、“扬气”与“徽派”》(《史林》2005年第2期)等。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2. 浙江有关学术机构的江南和浙北社会经济史研究

陈学文在其《筚路蓝缕的三十年——明清江南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称自己研究的缺憾是“缺乏群体性”。实际上不独陈学文先生，浙江有关研究机构对于明清以来江南区域史或明清以来杭嘉湖社会经济史研究可能普遍“缺乏群体性”。

陈学文曾任浙江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即尝试徽商研究，80年代开始研究江南市镇，主持编纂了《嘉兴府城镇经济史料类纂》、《湖州府城镇经济史料类纂》，虽未公开出版，但在学界有一定的影响。陈学文注重个案研究，有系列的市镇个案研究论文发表，其江南市镇的研究成果体现于《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1993）。陈学文从商品经济发展入手研究明清江南的蚕桑业、纺织业、棉织业、榨油业等，对商人、商帮、市场网络亦有研究。著有《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2000）、《徽商与徽学》（2003）、《龙游商帮研究》（2004）等。

曾任教于杭州大学的蒋兆成是傅衣凌的第一批研究生，沿袭了傅衣凌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思路，^①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杭嘉湖地区的官田、里役改革、蚕桑丝织业、农田水利、乡镇经济等，著有《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曾任教于杭州大学的包伟民对清末民初的江南市镇亦有深入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建立研究中心，组建学术团队成为快速提升学术研究水平和影响力的重要途径。2006年成立的浙江师范大学城市史研究中心由陈国灿主持。陈国灿著有《浙江古代城镇史》（2003）、《江南农村城市化历史研究》（2004）、《中国古代江南城市化研究》（2010），他着重对江南农村城市化作长时段的考察。

该研究中心的张根福著有《抗战时期浙江人口迁移与社会影响》（2001），该书将抗战史、人口史、社会史研究方法结合，考察了战时移民的分布、

^① 陈学文：《筚路蓝缕三十年——明清江南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王家范主编：《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结构，以及难民的安置救济等，分析了移民的社会影响。

三、聚焦近代上海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机构举例

1.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近代上海社会经济史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成立于1956年，属中国科学院，1959年划归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史和城市史研究历来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传统优势，唐振常主编的《上海史》（1989）、张仲礼主编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熊月之主编的《上海通史》（1999）标志上海史研究的阶段性发展。2003—2004年出版了“上海史研究译丛”，包括熊月之和周武主编的《海外上海学》，共计11种。2011年出版的“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是一次由上海社科院牵头对上海学术界有关上海社会史研究力量的整合，丛书目前出至25种，涵盖了上海社会生活史的多个侧面，从不同角度对近代上海城市社会生活进行了考察。

前述上海社科院的重大工程，熊月之或参与，或主持，是上海地方史研究的领军人物。他以研究晚晴时期的西学东渐知名，参与了“上海学”的争论，对上海社会史有全面、深入的研究，如租界问题、公共空间、城市生活等，对近代上海城市的属性、特点有准确把握，而且他注重中外学术交流、整合学术团队，在推动上海地方史的研究方面不遗余力。上海地方史研究能够达到今天这样繁荣的程度，应当说熊月之功不可没。

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汇集了一批在上海社会经济史方面研究有成的学者。宋钻友著《上海通史·第9卷（民国社会）》（1999）、《广东人在上海（1843—1949）》（2007）、《同乡组织与上海都市生活的适应》（2009）、《永安公司与上海都市消费：1918—1956》（2011）、《上海工人生活研究：1843—1949》（2011）等。周武著有《上海通史·第5卷（晚晴社会）》（1999），马学强著有《从传统到近代：江南城镇土地产权制度研究》（2002）、《江南望族：洞庭席氏家族人物传》（2004）、《出入于中西之间：近代上海买办社会生活》（合著，2009）等，还有王健的《利害相关：明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清以来江南苏松地区民间信仰研究》（2010）等。历史研究所的多位学者都参与了《上海通史》和“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的编写，锻炼了队伍，也形成了巨大的规模效应。总体来看，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对于上海社会经济史，尤其是社会史研究方面，至少在力度和规模上明显高于同在江南其他区域的同类研究机构。此外，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樊卫国近年关注近代上海同业公会研究，成果丰硕。

2. 上海师范大学的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和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对于江南和上海的社会经济史研究

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于1998年组建，是一个跨学科的学术机构，中心分为当代都市文化研究、国际都市文化比较研究、都市文化史研究等三个研究室，研究人员主要是以文学和历史学为学术背景。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成立于1993年，该中心以上海师大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学科教师为主干力量。2004年作为主干学科成功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都市文化研究中心，2005年作为主干学科成功申报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本中心拥有一支以唐力行、苏智良、周育民、钱杭、邵雍、徐茂明、高红霞、洪煜教授等为学术骨干、梯队完整的学术队伍，以转型期中国社会研究为中心，形成了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上海城市社会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问题研究三个研究方向。2007年基地创建后，进而确立了以江南研究为主要突破方向，力争建设成为国内外江南研究的一个重镇。

其中，唐力行以研究徽学知名，进而研究明清以来苏州与徽州之间的区域互动，调至上海师范大学后开辟了评弹与江南社会研究，主编多种丛书、举办国际学术讨论，创办专门的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杂志，着力推动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

苏智良、周育民、邵雍发扬了上海师范大学社会史方面的研究特色，苏智良对上海黑社会史、禁毒史、侵华日军慰安妇问题等有系统、深入的研究；^①

^① 苏智良：《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上海禁毒史》（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海上枭雄：黄金荣与上海社会》（合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上海：城市变迁、文明演进与现代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等。

周育民、邵雍都在帮会史方面用力甚多；^①邵雍还对妓女史、土匪史有专门研究；^②郭绪印除对帮会史有研究外，对上海的同乡会组织亦有研究。^③高红霞延伸了上海的同乡会研究，她深入探究了近代以来上海的福建人群体结构与生活概貌以及同乡团体数量、组织制度等。^④徐茂明从关注江南士绅的研究延伸到文化世族的研究，^⑤洪煜主要研究上海小报与上海社会、上海文化的变迁。^⑥团队研究的特色非常鲜明。

四、主要徽学研究机构举例

1.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的徽学研究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是 1999 年重组的实体性研究机构，是教育部批准的首批十五个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王振忠认为此为“徽学”成为独立学科，得到学界认可的主要标志。^⑦中心下设徽州典籍文献研究室、徽州文书研究室、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室、徽州文学艺术研究室、徽文化资源开发研究室等，并编辑出版大型学术丛刊《徽学》。

中心藏有徽州原始文书档案一万二千多份（册），各类抄本、谱牒、徽人文集五百余种，因而在资料搜集整理方面成果显著。由该中心的专职

① 周育民：《中国帮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中国秘密社会史论》（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等。

② 邵雍：《中国近代妓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中国近代土匪史》（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等。

③ 郭绪印：《旧上海黑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老上海的同乡团体》（文汇出版社 2003 年版）。

④ 高红霞：《上海福建人研究：1843—1953》，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⑤ 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 年》（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与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互动与转型：江南社会文化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⑥ 洪煜：《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1897—1937》（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年版）、《近代大众传媒与城市文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⑦ 王振忠：《徽学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4 页。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研究员刘伯山整理影印出版了《徽州文书》，4辑分别于2005、2006、2009、2011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第1辑10卷公布了徽州黟县和祁门的珍贵文书4995件，第2辑5095幅，第3辑7151幅，第4辑有文书6000多份。如此浩大的资料工程是徽学研究的盛举。

中心汇集了一批术业专攻的学者。如赵华富、栾成显、朱万曙、卞利、徐道彬、胡中生、韩秀桃、张小坡等在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皆有成就。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借地利、人和之便成为徽学研究的重镇。

2. 安徽师范大学皖南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徽学研究

安徽师范大学皖南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是以社会学院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中国古代史博士点和多个相关硕士点为支撑的徽学研究机构。安徽师范大学研究徽学不仅有地利之便，也有历史传承。自20世纪80年代，张海鹏、王廷元、唐力行、王世华等投身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一脉相承，不绝如缕。

中心现有徽州商帮研究、徽州学术思想史研究、徽州教育史研究等三个较为稳定且颇具影响的研究方向。且专家荟萃，如王世华的徽商研究、周晓光的徽州学术思想史研究、李琳琦的徽州教育史研究、肖建新的徽州文献研究、马陵合的徽州经济史研究、刘道胜的徽州方志、文书研究，以及徐彬的徽州家谱研究、秦宗财的徽商、徽州刻书研究等。

小 结

从江南地区的有关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机构看，上海凭借地利，在研究平台搭建、团队建设、国际交流方面占有优势，在上海史方面成就斐然，引人注目。但上海的相关研究机构主要着眼于地方史、城市史研究，区域史的观念相对缺乏，上海与江南其他区域、中国其他区域的比较研究相对薄弱，在这一点上王家范、戴鞍钢、张海英等人的研究更具区域史的眼光，须知上海是江南的上海、中国的上海，还是世界的上海，上海史研

究欲有更大突破，可能要有更宽广的历史视界。苏南的研究机构由于有悠久的学术传统和地方史研究的积淀，成果可观。但从地方史到区域史研究不能遽然而至，所以其江南史研究往往以局部的史实考察，却冠以江南的名头，虽说区域内部有些重要的共性特征，如果研究的点过小、过少，以之概括为江南的整体特征，可能离历史真相的距离不是一点点。浙江地区的江南区域史研究队伍颇有青黄不接的景象，专门的研究机构起步较晚，注目于地方史或限于杭嘉湖，不轻言江南，这或许需要借鉴苏南学者的勇气。

徽人研究徽学自然有其独到的优势，安徽大学和安徽师范大学的两个徽学研究的“双子星”得地利、人和之便，在徽学研究方面形成了较强的研究团队。像安徽大学徽学中心这样的实体研究中心因有足够资源保障，可以整理出版《徽州文书》这样庞大的资料集，泽被学林。安徽师范大学皖南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前接 20 世纪 80 年代张海鹏时代徽商研究的传承，渊源有自，与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有合作，亦有竞争，形成了徽学研究的良好学术生态。但徽人研究徽学亦可能会有情感和眼光的局限，且徽州史料丰富至极，沉迷于史料，也可能产生“理论惰性”。

当然，上述只是门外汉的些许观感，略作陈述。总体看来，从上述研究机构的研究实践看，作为整合资源、打造学术团队、对外合作交流的平台，研究中心之类的机构是个事半功倍的平台，有较大的伸缩性和灵活性，其对江南史研究的推动未来可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第六章

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的学术史研究个案之二：唐力行教授的江南区域史研究

因笔者并非研究江南社会经济史出身，对于作深度的人物学术史个案研究有较大难度。但由于读大学时即听过唐力行先生的课，后又随他做博士后，故对他的江南区域史研究非常熟悉，也算是“近水楼台”，且唐先生的学术研究随着他的人生步履由徽州而苏州，再至上海，研究的重心虽有转移，但都在江南，深度和广度俱有，因而选择唐先生作为学术史个案的人物篇亦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唐力行先生以研究徽学知名，从徽州宗族研究切入，研究徽商、宗族、徽州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在整体上把握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的特点，关注区域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研究中国近世社会转型等相关问题。后来唐先生研究苏州与徽州的区域互动、评弹与江南社会等都是其在徽学研究基础上的延伸和深化。唐先生的研究特点是注重新史料的搜集整理，关注本土化的社会史理论创新，在区域史研究和区域互动的理论总结方面颇有建树，研究领域与时俱进，且能一脉相承。他还注重学术团队的建设，以师承、课题、杂志、丛书等为依托，在江南区域史研究方面引领一批出色学者，产生了强大的规模效应。

一、以徽学为底色的区域史研究

唐先生的徽学研究有三个关键词：徽商、宗族、徽州文化。他提出以

系统论关照徽学研究，认为研究一个区域，应首先要将该区域的要素（即局部）提炼出来，在局部与局部以及局部与整体的互动中来揭示区域的整体特征。徽州是一个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相对完整的区域社会，其经济上的徽商、社会上的宗族组织与文化上的科举理学是三个富有特色的要素，三要素的互动形成了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特征。

唐先生是由徽商研究进入徽学领域的。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任职于安徽师范大学，得地利之便，在安徽师大张海鹏教授的支持下，与王廷元、王世华等同事，自1982年起从事徽商资料的选编工作，当年11月在明代经济史学术讨论会上宣读了与张海鹏合作的《论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该文于1984年发表，虽是唐先生的第一篇徽商研究论文，但却在学界引起了相当的反响，余英时名著《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就有十多处征引该文及唐先生参编的《明清徽商资料选编》（1985）。“徽商”成了唐先生徽学研究的一个关键词。

此后有《明清徽商心理研究》、《论徽州海商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1990）、《论徽商的形成及其价值观的变革》、《明清徽商木商考》（1991）、《论徽州商人文化的内涵、特点及其历史地位》（1992）等文发表。1993年唐先生出版的《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便是在徽商研究基础上的延伸，是著将明清商人纳入中国近世社会转型的视野下考察，认为商人是实现近代社会转型的革命性因素。唐先生指出：“近世社会，最先出洋闯世界的是商人，最先睁眼看世界的是商人，最先仿洋改制看世界的还是商人。”^①该书着力在理论层面探讨商人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关系。按唐先生的观点，中国近世社会始于16世纪资本主义萌芽，结束于20世纪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的成熟。其间以1840年为界有两次关键转化，即从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再由商品经济转向资本主义经济。书中指出，完成此转化的最大障碍是基于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封建经济和政治结构。数量极大而单位

^① 唐力行：《商人与文化的双重变奏：徽商与宗族社会的考察》，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7页。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极小的小农自然经济的生产单位与庞大的专制政权的两极统一，形成了异常稳固的同构体，从而造就了中国商人的两难之境，既依托于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又伴随历史的步伐改变着中国社会，却难以突破封建的樊篱。此后唐先生的学术关注基本上也在16—20世纪的中国近世社会。《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初版于90年代商人崛起，中国市场经济方兴未艾之际。如前哲所言，历史是现实与过去之间不断的对话，无论从学术分量还是现实意义，作为第一部全面论述商人与近世中国社会转型的专著，该书都受到了学界的持续关注，后来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修订本（1995），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繁体本（1997），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修订本（2003）、新版本（2006）。

唐先生在研究徽商的过程中认识到“宗族组织是解开徽州社会之谜的一把钥匙”。^①其徽州区域史研究即以“宗族”为抓手。《论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1986）研究了徽商与宗族的互动关系，指出明清徽商善于借助宗族势力，建立地区性或商业性垄断。《明清徽州的家庭与宗族结构》（1991）指出，徽州在明代后期形成了小家庭大宗族格局，徽商对家庭—宗族结构的这一变化起了关键作用，而小家庭大宗族的社会结构对徽州社会经济特点的形成有关键性影响，它有利于徽商的经营活动，造成徽州社会更富有弹性和流动性。《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兼论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1995）指出，16世纪农村宗族制度的转型，首先表现在宗族迁徙和重建方向从由农村到农村转变为由农村到城镇为主，宗族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从而为地域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创造了新机遇。

唐先生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研究徽人胡铁花、胡适父子，有《胡适之父铁花先生评传》（1985）、《胡铁花年谱述略》（1987）、《胡适：徽州历史上的第三个文化伟人——试析胡适与徽州文化》（1993）、《胡适的商业观》、《胡适论商人与社会转型》（1996）等文，因而对于徽州文化有深

^① 唐力行：《论徽州宗族社会的变迁与徽商的勃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

刻体认。并将理学科举、宗族文化纳入到徽州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论徽州宗族社会的变迁》（1997）一文认为，在明清徽州地域社会中形成了宗族组织、文化科举与商业经营间的良性互动。《商人与文化的双重变奏——徽商与宗族社会的历史考察》（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探讨了徽州社会的形成及其结构变迁，宗族文化、商人文化对徽商及徽州农村社会的影响，宗法制度与社会生活的相互关系，宗法制度在徽商经营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以宗族文化为核心的新安文化的双重作用等。

唐先生的《徽州宗族社会》（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是其徽州宗族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书分八章，论述了徽州宗族社会形成、宗族结构、宗族生活以及宗族与徽商、科举制度、社会保障、社会控制、社会变迁的关系等。唐先生正是以宗族为抓手，深入到徽州社会经济史的方方面面。与作者以前著作相比，该书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增加了对民国及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时期的徽州宗族状况的研究，从而将徽州宗族的形成、发展、消亡的全过程都呈现出来。该书研究徽州宗族，并不限于宗族制度本身，而是将之作为徽州人的生存状态加以考察。这一旨趣体现在将徽州宗族研究置于徽州经济、社会、文化各要素的关联中考察，并且历史和辩证地看待宗族在徽州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而不是作简单的价值判断。如徽商与宗族的关系，一方面宗族为徽商提供了强力支持；但另一方面向宗族注入资金影响了徽商的扩大再生产，从而使宗族成为徽商近代化的沉重包袱。历史重在回到现场、还原真相，该书特辟一章记录徽州人宗族生活的实态，通过方志、族谱、宗族活动的会议记录、田野调查等重构了抗战前绩溪县上庄镇宅坦村的宗族结构、宗族生活等。对于我们认识传统中国的基层社会运作，以及宗族在传统社会中的角色尤有裨益。

《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是唐先生此前十多年徽学研究的论文结集。分徽州宗族、徽州商人、徽州文化、徽州社会、徽州人物等五部分。“徽州宗族”部分主要考察了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的关系、徽州家庭宗族结构的形成及对徽州社会经济变迁的影响，并以方氏为个案研究了徽州宗族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徽州商人”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部分研究了徽商的形成、特色、群体心理，以及徽商中的海商、茶商、木商等不同商人群体。“徽州文化”部分讨论了徽商文化的内涵、特点、历史地位，强调新安理学与商人文化的关系。“徽州社会”着重分析徽州区域研究的基础工程，即徽州区域地理与人口，比较了徽州与苏州两地社会发展的差异，研究了商人妇的社会功能以及徽商的历史命运。“徽州人物”部分主要是对胡铁花和胡适父子的研究。该书是唐先生此前徽学研究成果的系统总结。

王学典在其《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一文中，将唐先生列为当代徽商研究的代表人物。在以傅衣凌等为代表的第一代徽学研究者和以王振忠等为代表的第三代徽学研究者之间，唐力行等为代表的第二代徽学研究者颇具承前启后的特点，他们构建了徽学研究体系的基本框架。

因此梳理唐先生在徽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和特点，对于唐先生这一辈学者为创建徽学研究体系所做的贡献也有管中窥豹的意义。唐先生徽州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主要特点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1. 从宗族入手，关注徽州区域社会经济各要素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宗族与徽商、科举、新安理学间的互动关系，强调徽学研究的系统论观点。

唐先生认为战乱中迁徙至徽州的中原士族在徽州复制的宗族生活，是酿造程朱理学的酵母。反之，程朱理学又加固了徽州的宗族秩序。新安文化的内核就是程朱理学酿造出的宗族文化。宗族为了在有限的生存空间里争得生存发展的权利，必得依靠科举张大门第。徽商则为宗族聚居、文教科举提供物质条件。宗族组织、宗族文化强大的内聚力则是徽州商帮强固、富于竞争力的内在机制。徽商借助宗族势力，获取资金和人力上的支持；借助宗族势力，建立商业垄断，展开商业竞争；借助宗法制度，控制从商伙计；借助宗族势力，投靠封建政权。而徽商投资教学、培养子弟业儒入仕，是他们成为官商、取得商业特权的捷径。^①徽商、科举、新安理

^① 唐力行：《论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

学等三要素构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系统，它是一个既封闭又开放的系统，崇山峻岭把徽州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使徽州区域社会系统能稳定运行，新安江等水系则将徽州与江南相连，通过商人、士子与外部世界保持密切的物质与信息交流，使徽州区域社会能持续运行。这样一个社会生活系统便是徽州区域社会的整体特征。^①

2. 关注“小徽州”与“大徽州”的互动关系。唐先生在界定徽州区域的集散效应圈时认为徽州区域研究大体可分为三个层次：徽州本土是它的核心层次；中间层次涵盖沿长江、运河的市镇农村，其中心区乃是无徽不成镇的江南；外围层次则遍及全国远至海外。三个层次互相作用，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核心层次是“小徽州”，中间和外围层次则为“大徽州”。而能够将它们串联起来的则是徽商，徽商又分三类型：坐贾、行商、海商，三类型的徽商各司其职，形成庞大的购销、流通网络。这样一来，就把徽州区域研究纳入了徽州社会系统与环境互动的框架之内，把单一、静态、直观的研究变成了整体、动态的研究。^②从而将徽州区域史研究推上了一个新高度。

3. 注重当时一些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探讨。唐先生对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界关注和争论的“资本主义萌芽”、“近世社会转型”、“封建社会长期性”、“传统文化与中国近代化”等重大理论问题都有深入探讨和自己的思考。这对于当代社会史研究往往回避历史的宏大叙事，执着于琐碎考订、情景再现，流于“玩物丧志”，可做镜鉴。

1994年唐先生回到故乡苏州，在苏州大学工作。学术研究的重心也由“小徽州”转向了“大徽州”，关注徽州与苏州乃至与整个江南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唐先生指出，每一个特定区域的研究，都存在一个小区域与大区域的关系。这个大区域其实就是小区域的集散效应圈，任一区域的发展都必然会与其他相关区域发生人员、经济、文化等的交往与互动。

^{①②} 唐力行：《结缘江南：我的学术生涯》，王家范主编：《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一方面，各个区域的地理、物产、区位、交通、文化乃至经济社会结构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唐先生将苏州与徽州比较，二者虽同在江南，其地理、区位却迥然不同。苏州东有大海，西有太湖，运河傍城而过，乃长江冲积平原和太湖水网平原地区。江南大运河开通后，优越的区位和地理条件，使苏州成为唐朝江南的雄州。宋时，全国经济重心南移，“苏常（州）熟，天下足”，苏州被称为“天堂”，逐渐成为江南经济文化的中心以及全国财货集散、转运和信息交流的中心，有状元、优伶为苏州土产之说。徽州则由于地理闭塞、物产瘠薄，只有用当地物产竹、木、茶、漆及新安四宝笔、墨、纸、砚来换取粮食，因而徽州自古就有经商的传统。要之，宗族与徽商可以说是徽州的两大土产。

另一方面区域之间的互动互补也是各区域形成并保持这些特点的必要条件。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的内涵与变迁规律，只有在区域比较中才能凸显出来。因此区域互动关系的研究必将把区域研究引向深化。^①唐先生的苏州与徽州区域比较研究曾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成果汇于《苏州与徽州——16—20世纪两地互动与社会变迁的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一书，是著研究了明清时期苏州的家庭结构、社区管理、保障系统和社会信仰及社会心态，并将之与徽州比较，揭示出徽商的经营活动一方面加速了苏州近代化的转型，但另一方面却加固了徽州的宗族制度和古旧状态。该研究无论是在实证方面还是在区域比较理论的尝试方面都颇有创新之处。

2000年初唐先生至上海师范大学任教，继续进行“大徽州”层面的区域史研究，其《国家权力下的乡村统合——16至20世纪徽州乡村社会权力关系研究》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唐先生试图将徽州乡村权力关系的研究放在大徽州的视野下，寻求上海与徽州村落间的互动对乡村权力关系所产生的影响。该项研究借助上海市档案馆保存的大量徽州旅沪

^① 唐力行：《结缘江南：我的学术生涯》，王家范主编：《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同乡会资料，揭示近代以来，当乡村自治趋于衰落时，同乡会等城市自治体开始生长。同乡会的经济力以及政治干预力使乡村在经济凋敝、烽火连天的艰难岁月里保持了自治的格局。

在此期间，唐先生发表了《从碑刻看明清以来苏州社会的变迁——兼与徽州社会比较》（2000）、《徽商在上海市镇的迁徙与定居》、《明清以来徽州、苏州的区域互动与江南社会的变迁》（2002）、《从杭州的徽商看商人组织向血缘化的回归——以抗战前夕杭州汪王庙为例论国家、民间社团、商人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历史视野中的徽学——走出一府六县》、《区域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差异与互动：明清时期苏州与徽州的市镇》（合作）、《明清以来徽州与苏州社会保障的比较研究》（2004）、《多元与差异：苏州与徽州民间信仰比较》（合作，2005）等。通过上述研究唐先生拓展了其在徽学领域的研究视野，进行了区域互动理论的探索与实践。

此间，唐先生敏锐地把握到国际学术界“新文化史”研究的转向，在整理其父唐耿良先生回忆录《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应以“新文化史”范式研究江南区域史，即将评弹与江南社会的互动结合起来研究。当唐先生的工作地点由苏州调动至上海，他也在关注近代评弹如何由苏州流入上海，其学术亦随人生轨迹转向。唐先生指出，评弹诞生和成长于江南的这片文化土壤，近代又由苏州走进大都会上海，成为苏州与上海这两个不同类型城市间的文化纽带。评弹还是上海多元文化中显著的一元，20世纪三四十年代借助广播，更是成为上海城市的背景音乐。唐先生尝试在评弹与江南社会的研究中找到社会经济史与社会文化史相融通的方法。该项研究先后获得上海哲学与社会科学基金和教育部重大项目的资助。我们知道，关于评弹的研究一向在文学和曲艺的领域里进行，而将评弹与社会经济史结合起来进行大规模系统研究还属首创。目前唐先生已经集结了一支高效、精干的研究团队，唐先生因得家学、地利、人和之便，进行该项研究自然得心应手，不久即整理出版了《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由台湾商务印书馆（2007）、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2009）一版、再版。唐先生的研究团队还于2010年出版了“评弹与江南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社会研究丛书”，后面有详细解说，此不赘述。

正如唐先生自述：“从徽州、苏州到上海，从社会经济史到社会文化史，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①唐先生的人生学术是一体的，他生活工作的轨迹从异乡的皖南到故乡苏州，再至其童年、少年时的上海，他学术研究的起点从异乡的徽州开始，研究的脚步随着他的人生步履回归苏州、上海，具体来说回到他在成长期时耳濡目染的评弹与江南核心地区的苏州、上海。然而徽学研究终究是唐先生的学术底色，人生的故乡与学术的故乡在互动中交相辉映，也激励着唐先生对于学术与人生不断的思索与创新。

二、注重史料搜集和观点创新，终成一家之言

史料是史学的根基所在，治史者普遍认为史料匮乏是史学研究最大的瓶颈，而在区域社会史领域，这个问题尤为突出，因为系统的社会史资料在正史中不易搜求。唐先生在初涉徽学研究时即遇到这个问题。中国历代，商为四民之末，有关商人的零星资讯，往往散见于族谱、方志、笔记、小说、文集、碑刻、文书、档案之中，搜集相当不易。改革开放后，为将徽学研究立于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唐先生与安徽师大的同事经过数年的艰苦努力，编纂了40万字的《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这也是有关徽学的第一本资料集。该资料集将徽商资料分为七个类别：明清时期的徽州社会，徽商资本的来源与积累，徽商经营的行业，徽商的活动范围和经营方式，徽商资本的出路，徽商的政治态度，徽商与学术文化。每一类别再加细分，如“徽商资本的出路”又分为：购置土地、助修祠堂书院、助饷助赈、兴水利筑道路、抚孤恤贫等义举、奢侈性消费、投资产业。无须多加一字，读者从整理的徽商资料便可窥得徽商的概

^① 唐力行：《结缘江南：我的学术生涯》，王家范主编：《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貌。这部资料集为徽商乃至徽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被评为全国优秀图书二等奖，安徽省优秀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受到了海内外同行的欢迎和好评。在搜集资料的同时，唐先生发表了系列的徽商研究论文，其在《历史研究》发表的9篇论文和评论中有关徽州区域社会研究的就有6篇。

在谈到搜集徽学资料的感受时，唐先生说：“族谱、方志中的资料分散开来看不易发现它的价值，集中起来分类排比，就能看出问题来。族谱中的人物志、家传、寿序、行述、行状、圻志、墓志铭，方志中的风俗、人物类下的义行、孝友、乡善、尚义、笃行、儒行、宦行、文行、质行等都收有商人的传记。省府县志外，乡镇志的记载往往更为翔实，如《岩镇志草》、《丰南志》、《沙溪集略》、《澄阳散志》等。一些文集中商人的传记或资讯也较为集中，如汪道昆的《太函集》、李维桢的《大泌山房集》、许国的《许文穆公集》、赵吉士的《寄园寄所寄》、许承尧的《歙事闲谭》等。明清笔记小说如三言二拍、《儒林外史》、《古今小说》中有不少徽商的故事，当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为了重现区域全面的历史，我们需要区域全面的资料，包括书面的、口述的、实物的等等。徽州保存着异常丰富的历史资料，尤其是中国传统社会后半段的资料，这是徽州学得以成为一门学科的基础所在，也是徽州学的价值所在。”^①

要想在徽学的领域深入下去，做每一具体专题研究时，还必须进行专题性的民间资料搜集。唐先生在研究徽州方氏宗族时，曾到徽州各县以及浙江淳安等地进行过实地民间资料的调查，访得乡民家藏的方氏族谱数十种以及祭祀簿等珍贵资料。据唐先生回忆此事的缘起，称：“作为徽州望族的方氏从未引起历史学界的注意，引起人们注意的倒是方氏的一个叛逆者——北宋末年的方腊。在建国后的农民战争研究热潮中，方腊起义也是热门话题之一。……1976年，该校（注：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组织数十名师生，经历数月时间，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到方氏聚居的歙县、淳

^① 唐力行：《结缘江南：我的学术生涯》，王家范主编：《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安等地乡村搜集方氏族谱，并根据调查所得的材料，撰写文章并出版了《方腊起义研究》一书。今天看来，关于方腊身世之争已是过眼烟云，孰是孰非，完全可以通过历史学的方法心平气和地加以考证，重要的是当年开展的关于方腊家世的调查和对于方氏族谱的搜集，为今天的民间资料的搜集提供了线索。我在安徽师范大学服务期间与学术前辈万绳楠、杨国宜两位教授结为忘年交。他们均是当年方腊的调查者。承他们不弃，向我提供了当年借调方氏族谱的记录，其中有族谱收藏者的地址和谱名，共计54部。重提这段往事，是想说明民间资料的搜集并非易事，是要花大力气的。即使是对一个家族的调查，靠个人的力量也是困难的。但是深入下去，由此及彼，往往可以有新的发现。古祠残壁下的一块断碑，山村野老的一席口谈，或许能帮你解除旧的疑惑，带来新的思维，从而更加贴近社会生活的实态。”^①

唐先生根据搜集整理到的方氏资料，撰成《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兼论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1995），成为唐先生对徽州宗族研究的重要个案。该文揭示16世纪徽州宗族的迁徙、重建、转型，阐明宗族与地域社会、地域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是该类研究的代表作之一。^②

唐先生在苏州大学工作期间的资料搜集主要是与王国平教授共同主编了《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1998），为《苏州与徽州：16—20世纪两地互动与社会变迁的比较研究》（2007）的完成奠定了资料的基础。《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是关于苏州的第三本碑刻集，收录碑文计500件。此前的《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共收碑文370件，其中苏州为322件，占全书的86%。另一本《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则收碑文258件（其中一百余件与《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重复）。三书共收苏州碑刻近千件。这本碑刻集与先前两本碑刻集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取材不再囿于经济史领域，而是以更为宽广的社会史视野来审视、取舍资料。

^① 唐力行：《结缘江南：我的学术生涯》，王家范主编：《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② 朱英：《近代中国的“社会与国家”：研究回顾与思考》，《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在唐力行、王国平为碑刻资料集所作的“序”中，编者指出通过墓志铭可以研究明清以来苏州的家庭类型、家庭—宗族结构等，认为苏州家庭结构以小家庭为主体，而大宗族与累世共居的大家庭则居于次要地位，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在于商品经济发达，社会流动性大；通过这些碑刻还可以了解明清以来工商业发展对苏州社会生活的影响以及价值观的流变等；碑刻亦能透露社会动荡及改朝换代对苏州社会的影响；通过碑刻可以考察以义庄为基础的宗族保障系统等，了解会馆、公所除工商业经营的功能之外，还有社会合作和保障的功能。编者指出“宗族、行业、社会三个保障系统，形成一个遍布苏州城乡的社会合作网络，维持着明清以来变迁中的苏州社会的稳定”。^①事实上，在碑刻资料的编排、研究中，从家庭—宗族入手反映了唐先生一以贯之的研究方法和特点。

此外，编者指出苏州碑刻还集中于社会信仰和社会心态两方面。亦有大量碑刻资料反映了明清以来苏州的商业管理、赋役管理、宗族管理、寺观管理、环境、市政管理等，从中可以管窥苏州社会变迁的踪迹。总之，碑刻集的编纂将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的研究立于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

到上海师范大学工作以后，唐先生在资料的搜集整理方面做了两件事，一是与著名的江南史研究专家、维多利亚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忠平先生合作主编了《江南区域史论著目录（1900—2000年）》。唐先生认为中国史学源远流长，特别是以原始资料的收集、整理和运用见长。这一学术传统也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历史学科的发展。江南地区各类史料浩如烟海，研究江南区域史的学者不仅要对这一地区的文献口述史料继续进行深入的探索，还需要对现有的史学研究成果进行概括提炼，并进而发展出立足于本土的研究方法与理论。20世纪的学者已对江南的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等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探讨，并为我们将来在此领域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编辑江南区域史论著目录不仅是要对以往的

^① 王国平、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江南地方史研究进行回顾，更希望此编能够成为未来江南学发展的一块基石。这项编辑工作早在1987年就在陈忠平先生的主持下启动，后与唐先生商定合作完成这一浩大的工程。2007年《江南区域史论著目录（1900—2000）》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二是进行有关评弹与江南社会的史料整理。此类史料整理分三部分：1.明清以来评弹文本整理。评弹长篇传统话本计有一百多部，但过去在继承传统话本的工作中，有许多失误，导致很多传世话本失传或濒临失传。这些传统话本不仅是评弹传承的基础，本身也具有历史研究、社会史研究以及曲艺史研究的价值，亟待抢救。唐先生及其团队将有计划地开展评弹话本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出版《苏州评弹话本总汇》，约300万字。2.唐先生及其团队从评弹与江南社会互动的角度切入搜集资料。经过数年努力，已从近代报刊、杂志、档案、方志等史料中抄录近千万言，此项工作会持续下去，而预期出版《评弹社会史资料集成》，共三册，约360万字。3.评弹口述史、回忆录整理。开展对老、中、青三代评弹演员的口述采访，出版《百名评弹艺人口述历史》、老艺人与管理者的回忆录等，约200万字。同时，将评弹名家请进高校，组织评弹名家论坛，出版《光前裕后：评弹名家讲演录》，约60万字。

新的史学需要有新的资料作为基础，而穷年累月，东搜西索，披览摘抄，爬梳剔取，更需要耐得寂寞的沉潜和学术奉献精神。在当今浮躁的学风中，以上这些资料集或论著索引的出版，或许超越了其本身的意义。^①

唐先生在广泛搜集整理材料的同时，对于区域史比较研究也总结出一套理论方法。他认为区域比较涉及三个层面：1.区域与环境的互动，区域系统在生存、发展进程中势必会与环境发生信息和能量的交换；2.区域与国家的纵向互动，此间应充分注意国家、地方、民众互动与社会变迁的内在关系；3.区域与区域的互动关系。^②唐先生认为区域比较研究应以区

^① 唐力行：《结缘江南：我的学术生涯》，王家范主编：《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② 唐力行：《序：从区域史研究走向区域比较研究》，唐力行等著：《苏州与徽州——16—20世纪两地互动与社会变迁的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域互动为重点。他对于徽州与苏州的区域比较研究就是着重考察两个区域的互动关系，从两区域的家庭、宗族，到基层社会控制、市镇、民间信仰、风尚习俗、文化等方面，都进行了差异比较，并研究了两区域各要素的互动交流及交互影响。在互动中寻找两区域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在区域的双向流动中找寻其互相影响的线路，寻找传统社会的特质及变迁的走向。

唐先生将区域互动置于相互联系的统一体中进行比较，并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将区域互动总结为区域间的相互沟通、相互作用和相互认知三个层面。区域间的沟通是互动的前提，相互作用是沟通的表现，相互认知是相互作用的深层影响。唐先生曾就此做过专门的论述。

第一个层面：相互沟通。唐先生认为徽州对粮食等物资的需求与寄居苏州为中心的江南核心地带的南迁望族对避难的需求，是两地沟通的大前提。千百年来徽州商人和南迁望族不避艰难，往来于徽州与苏州之间，将两地沟通起来。两地间虽是双向沟通，但由于位势差异，会出现主要由某一区域流向另一区域的趋势。从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发展来看，历史上苏州的发展总是比徽州要领先一步，从而决定了两地基本的流动趋势。

从历时性的纵向线索看，两地人员的沟通可以宋代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宋代之前，徽州虽然经济文化落后于苏州，但是由于其封闭的地理条件及区位，适合于躲避战乱，所以宋代以前两地的互动主要体现为逃避战乱的中原移民对徽州的经济与文化的开发，是由苏州向徽州的流动。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至民国年间，随着徽商的壮大，出现了由徽州乡村向苏州的自西向东流动的趋势。

第二个层面：相互作用。在16—20世纪的传统社会转型期，苏州与徽州两区域之间相互作用的总趋势是：在经济上，苏州是江南的经济中心，并孕育资本主义萌芽；财力雄厚的徽商将巨额的商业资本汇聚到苏州，大大增强了苏州的活力。在社会发展上，苏州随人口和经济发展渐渐变动，承接着传统的经济优势，自发、缓慢地发生社会转型，徽商的经营活动客观上推动着苏州等地的社会转型。但在苏州的徽商将部分商业利润

输回徽州，却加固着徽州宗族社会的旧秩序，束缚了社会转型。在文化上，苏州和徽州都是儒学发达之地，清代又以吴学和皖学相对峙，教育、科举昌盛，人才辈出。徽商把苏州等大都市的经济文化信息和生活方式输入徽州，使徽州社会经济发生变动；同时，徽商把徽州深厚的宗族制度和文带到苏州等大都市，融入当地经济和社会生活之中，一些徽州的精英也在苏州定居下来。徽州、苏州两个区域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发展的不同路径，体现在经济、社会、文化等要素的各方面。

唐先生还指出，应将区域互动的研究超越两个区域的疆界，将它们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共时性背景下加以考察。如明清以来徽商在江南的中心苏州以及江南市镇造成一个由坐贾、行商与海商所构成的商业网络。汪直、许二、徐海等徽州商人，是海外贸易的核心层次；苏州和江南市镇是海外商品的生产地，属海外贸易的外围层次。徽州行商则是将核心层次与外围层次联结起来的中介层次。这一网络又使苏州与徽州的互动、平原与山地的互动，带动起江南与海洋的互动。这个互动也就使得苏州及江南市镇与16世纪形成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了。

第三个层面：相互认知。苏州的徽商作为外乡人，亦是苏州与徽州互动的媒介，希望得到苏州人的认同。徽州人在苏州经商，以儒商自居，讲究以义取利的长久之道，但良莠不齐，不免有欺诈和刻薄的行为，引起苏州人的反感。为改变苏州人对徽人的观感，徽商注意与能够转移社会舆论的士大夫交游，展示自己的儒商风采，以支持子弟科举，努力融入当地社会。亦有苏州文人游徽州，与徽人交游唱和，加深了相互认知与认同。

苏州与徽州的互动渗透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进入社会文化、大众心态的核心层面。由沟通而相互作用、相互认知，这是一个循环往复而逐渐提升的过程。正是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使这两个江南小区域不断走向繁荣，同时又保持了各自的社会发展路向，从而使江南社会呈现多元的局面。

唐先生认为“区域史研究是推动整体史研究深入发展的必由途径”。在进行区域研究时，切忌就局部论局部，以免使研究变得琐碎、零乱。区

域研究还必须放到纵横结合的历史坐标上去，在纵向的时间与横向的空间坐标中找到它的位置。小至一人、一村、一族，我们总要看到它在一县、一区、一国的时空位置。明清时期，中国开始受到西方的冲击，有必要把区域研究放到世界的大局中去考察。惟其如此，才能真正把握区域的本质特征，才能把研究推向深入。例如唐先生的《论明代徽州海商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1990）一文，在对徽州海商研究时，便是将海商（局部）放在整体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纵向时间以及与世界市场、海外贸易相联系的横向空间坐标上加以考察的，从而得出徽州海商的经营活动促进了中国江南资本主义萌芽的结论。^①

在区域史研究的过程中，唐先生运用了多种跨学科研究方法。如历史地理、历史人口学的方法、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计量史学的方法、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动态与静态相结合、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方法等。

在唐先生与贺杰（Keith Hazelton）合作的《明清徽州地理、人口探微》（1989）一文中就运用了历史地理、历史人口学的方法。该项研究根据明代《新安名族志》（1551年）、康熙《徽州府志》（1690年）、道光《徽州府志》（1827年）所列村名，对歙县（该县统计增加了1937年的民国《歙县志》）37都1134个村、休宁33都524个村、绩溪15都439个村的消长衍变作了全面的考察，分别制作了85张《近四百年某都村名考索表》。在这个基础上，精心绘制了三县的分都图，计算出了每一都的面积，并借助电脑绘制出《徽郡三邑人口相对密度分布图》和《徽郡三邑名族密度分布图》。都一级的人口与名族密度及村庄的变迁，对于历史人口学、地理学来说这属于微观研究的范畴，对于区域社会经济史来说却是属于宏观研究的范畴。但区域历史地理、人口的考察，是区域整体研究的基础工程。在利用族谱、契约、文书等民间资料进行徽学研究时，可以使用其数据以确定空间位置和人口分布。

^① 唐力行：《结缘江南：我的学术生涯》，王家范主编：《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唐先生在徽州宗族的研究中注意使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著名史家王毓铨先生在读了唐先生的《论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一文后，于1985年11月3日给唐先生的信中说：“徽商与宗族一文，既可说的本题，也具有启发性。明清徽商的行径亦可于近代华侨中见之。盖远离乡土欲立足异乡异国者，必赖互助而后始能遂其生固其业。互助之纽带多种，宗族联系最为有力。美国之有‘中国城’——‘唐人街’，而唐人街中至今尚保存其祖宗堂号组织，如致公堂等，各堂相结，而自治政事于是生焉。曩在美国为大使时，胡适曾于1939年在东方学会一年会上宣读论文一篇，言民族文化之传播如池水然。投一石子于其中，则波纹逐圈外传，故往往于其边缘处发现其原始中心文化教育之特点。尊论亦为佐证。”^①

唐先生指出群山环抱之中的徽州属于江南的边缘，容纳着、积淀着古代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区域已经消失了的种种特点，因此对徽州作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考察，并与地方文献相结合，是重构区域历史、重新认识中原地区原始中心文化的必要途径。他曾将拥有丰富地方文书资料的绩溪县宅坦村列为田野考察的基地。以新发现的村落文书——徽州绩溪宅坦村胡氏宗族的《亲逊堂宗祠会议录》（1933—1947）为主，结合族谱和其他散件文书，并辅之以社会调查，重构抗战时期徽州农村基层社会的历史场景，探讨村民参与宗族活动的深度与广度，职业与门派、人口、世代的关系；宗族的组织和功能等。这一研究有助于考察进入近代后中国农村在传统向现代转型中的真实态势。在八年抗战的艰难岁月里，传统宗族仍在国统区徽州的基层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宗族与士绅、商人以及由他们构成的地方网络使传统庞大的国家机器与民众之间形成富有弹性的政治结构。正是这一弹性结构，使徽州乡村走过了八年抗战的艰难岁月。

唐先生还尝试以计量史学的方法研究徽州宗族。《明清徽州的家庭与宗族结构》一文，运用徽州家谱所提供的明末和清代家庭、人口资料进行

^① 唐力行：《结缘江南：我的学术生涯》，王家范主编：《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数量统计。从统计数字可以得出，徽州宗族制度下的家庭结构是以核心家庭为主、主干家庭次之。同时，徽州各地纷纷出现联宗现象，宗族却有扩大趋势。统计数字还显示，徽商对徽州小家庭一大宗族结构的形成起了关键作用。徽州人“大半以贾代耕”，疏散了人口，抑制了人口的增长；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家庭的裂变，从而避免了大家庭中劳逸不均和利益不均所造成的矛盾；徽商因其商业合作的需要，不断给宗族血缘纽带输送营养，加固并扩大血缘群体。而这一构成又反作用于徽州的社会经济，使徽州的社会结构富于弹性和流动性，有利于徽州社会的稳定；有利于徽商的经营活动；造成儒家学说的昌盛；强化了对佃仆和妇女的压迫，从而维护了商人家庭和徽州社会的稳定。

在《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一书中，唐先生运用了社会心理学的方法，从群体心理学的角度考察徽商心理的整合，揭示其基本的心理特征，探讨商帮心理与商业的关系。书中还有专章论述近代商人心理整合与商会的建立。

唐先生对于徽州宗族的研究注重动态与静态相结合、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方法。如在徽州方氏的研究中，将方氏宗族置于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的宏观视野中加以考察的。方氏是西汉末年因王莽之乱率先迁入徽州的中原望族。唐先生根据多部方氏族谱、新安名族志以及方志、笔记等珍贵地方史料对近2000年来徽州方氏之源流、移徙、分合、演变作了考证，并以此为基础，采用动态与静态相结合、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方法，考察方氏与地域社会的关系，以及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的关系。唐先生的研究认为：其一，方氏以“变”应“变”，以动态的迁徙来应对社会的动乱。从汉末方氏始居江南歙东乡，到唐末、五代向徽州山区的迁徙以及南宋时在徽州境内的进一步分支移徙，与中国古代北方士民三次大规模南迁大致同步。方氏等“中原衣冠”不仅使徽州经济得到开发，而且也使其成为文化繁兴之区。汉、唐、五代中原各大姓向徽州的移民是以宗族群体的形式进行的，而徽州山区也以它的怀抱使宗族制度得以长久保存。其二，相对静态的徽州农村宗族社会。称其相对静态是因为随人口的自然增殖，宗族还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会有新的迁徙活动，南宋后各大派继续分支，不断向人口更为稀少的地区拓展。当方氏在新的生存空间定居下来时，便迅速地复制宗族组织，以“静”制“静”。宗族还有以“静”制“乱”的功能，北宋末徽州方氏柘田派族人方腊的起义是从打击宗族势力开始的，也是在宗族势力的打击下结束的。此后方氏迅速重建宗族统治，恢复徽州农村静态的生存状态。其三，16世纪初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了徽州前所未有的震荡，其深度和力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乱和灾异。首先是方氏宗族迁徙和重建的方向转为由农村到城镇为主；其次是宗族自身的变化，形成大宗族一小家庭的格局。该文勾画了近2000年来方氏宗族和徽州农村社会变迁的历史画卷，并从时空坐标上找到了徽州的位置：徽州虽然是一个崇山环绕近于封闭的区域，但是千百年来传统中国每一次动乱都会在这里引起反响。徽州与其他区域社会有共同点，它们都受社会整体的制约。徽州的不同点在于，宗族聚居的格局使其具有特殊的应变力，始终保持着本区域的稳定。^①

总之唐先生的区域史研究注重整体中国与区域社会研究相结合、长时段与短时段研究相结合、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研究相结合，强调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创新。

三、组建研究团队，构建学术研究平台

在苏州大学，唐先生作苏州、徽州的区域比较研究时，已带出了一支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团队，包括今日在学术上已有建树的吴建华、徐茂明、张翔凤、李明、申浩、王健等。如吴建华的江南人口社会史研究，徐茂明的江南士绅、文化世族研究，张翔凤的苏州、徽州妇女研究，李明的苏州市民公社研究，申浩、王健的江南民间信仰研究等。

到了上海师大后，围绕评弹与江南社会研究，唐先生又组建了一支精

^① 唐力行：《结缘江南：我的学术生涯》，王家范主编：《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干的研究团队，包括周巍、吴琛瑜、申浩、洪煜等，该团队搜集整理了有关评弹与江南社会的研究资料，并有系列成果推出。唐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整理其父唐耿良先生的回忆录《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是开启其评弹研究和组建评弹研究团队的契机，唐耿良先生的回忆录既是他本人的传记，也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评弹史，还是现代中国艺术的命运史，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间中国社会的变迁史。在是著“整理者的话：逝者如斯”中，唐先生饱含深情地写道：“在古城苏州有一条幽静的小巷，我就出生在小巷深处一座古老的木屋里。夜阑人静，可以听到屋后小河汨汨的水声，以及随着水声而来的悠扬的评弹声。成年后，当我远离古城跋涉在人生的旅途时，我的脑海中常常萦回着这流水声、琵琶声所合成的乡音、乡情和乡思……”^①家学的浸润和历史学的素养使得唐先生认识到如果将这一部“说书人的生命史”佐以其他资料，也可以看成一部“江南社会文化史”。^②而2002年唐先生赴英国参加了一次社会文化史的学术会议，他感受到了国际学界社会文化史研究方兴未艾的势头，这愈发坚定了唐先生步趋学术潮流的信心。这些感触与思考终于促使唐先生将评弹与江南社会研究结合起来。

评弹滥觞于唐、宋，成熟于明末、清初，盛行至20世纪中叶，是有着深厚历史积累的优秀民族文化瑰宝，被誉为曲艺的兰花，江南的明珠。评弹研究以往局限于通俗文学与艺术领域，代表作有阿英的《弹词小说评考》、《女弹词小史》，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陈汝衡的《说书小史》、《说书史话》，赵景深的《弹词选导言》、《弹词考证》，周良的《苏州评弹艺术初探》、《再论苏州评弹艺术》、《苏州评弹旧闻钞》等，海外则有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马克·本德尔教授的《梅与竹：中国苏州唱书传统》等。以上成果为评弹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基础，但迄今为止，尚没有一部大型的有关评弹文本资料和社会史料的集成性文献，也没有对评弹全面系

^{①②} 唐耿良著、唐力行整理：《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441、第442页。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统的学术研究。唐先生认为要有所突破，就必须从两个方面下功夫：其一是扩大研究视野，须将对评弹的研究置于地方戏曲与地方社会相互作用的大视野中去；其二是要重视评弹研究的整体性，实现评弹文献、社会史资料、口述史访谈录、专题研究等基础要素的全面突破。

自2002年确定评弹与江南社会的研究方向后，唐先生着手招收该方向的研究生，从2004年周巍开始，至今已招收9名从事评弹与江南社会研究的博士生，这些博士生从搜集整理评弹资料做起，就说书人与社会变迁、书目传承与社会变迁、苏州评弹与上海社会变迁、评弹艺人生涯、小书场与大社会的关系、女弹词群体、评弹与都市文化圈的演变、苏州评弹与近代传媒中的互动、评弹中的江南社会等课题集中进行研究。为让学生对评弹魅力有直接感悟，唐先生还兴致勃勃地领着弟子，进书场听书、孵茶馆品茗，参观戏曲博物馆和评弹博物馆，还把评弹演员请到学校表演，正是有了滋润智慧的土壤，一批学术论文才得以顺利诞生，并获好评。^①而且这些博士生的学位论文都将纳入唐先生主编的“评弹与江南社会研究丛书”。

这套丛书的主要特点：一是它是开创性的研究；二是扎实的资料功底。现已经出版的有周巍的《技艺与性别：晚清以来江南女弹词研究》（2010）、吴琛瑜著《晚清以来苏州评弹与苏州社会——以书场为中心的研究》（2010）、何其亮著《个体与集体之间：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评弹事业》（2013），还有唐先生整理的《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主编的《别梦依稀：说书人唐耿良文集》（2010）等。另有两部近期出版，从而将评弹与江南社会研究作为江南区域史的新领域逐步开辟出来。

不过，这套丛书只是唐先生对于评弹与江南社会研究的一部分，其宏大的设想包括前已述及的史料整理，此外，还要进行评弹社会史的专题研究，译介海外研究的有关论著，将“评弹与江南社会研究丛书”的出版规模扩大到20本；并建立评弹艺术多媒体数据库和网站，分设多个子库：

^① 李明：《亦师亦友二十春，私淑先生读“江南”——“槛外人”撷拾》，未刊稿。

如文献与资料、音频和视频、评弹脚本、评弹流派、评弹书场、研究动态等，设立评弹网站，及时反映评弹资料及研究信息。

唐先生曾说：“江南研究，不仅需要运用大量丰富的史料，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一套能够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理论框架和范畴。只有掌握了理论话语的主导权，才能使本领域的研究成果达到国际学术水准。我们希望通过构筑江南社会史研究的平台，包括出版《江南社会历史研究丛书》、《江南社会历史评论》杂志，以及每年主办一次江南研究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推动江南社会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①

唐先生主编的“江南社会历史研究丛书”于2010—2013年相继出版，而预期规模达到15本。包括：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城市社会研究》、邵雍著《近代江南秘密社会》、陈昌文著《都市化进程中的上海出版业》、姚霏著《空间、角色与权力——女性与上海城市空间研究（1843—1911）》、安涛著《中心与边缘：明清以来江南市镇经济社会转型研究——以金山县市镇为中心的考察》、王健著《利害相关：明清以来江南苏松地区民间信仰研究》、罗婧著《江南市镇网络与交往力——以盛泽经济、社会变迁为中心（1368—1950）》等。“江南社会历史研究丛书”的出版不仅为江南区域史研究注入了学术活力和增添了多元色彩，也为江南区域史研究的平台建设提供了有益探索。

“丛书”中唐力行主编的《明清以来苏州城市社会研究》分上、下两册，搜集了1996—2010年间入学的硕士生的13篇硕士论文。这13篇硕士论文涵盖了明清以来苏州的社会、经济、文化各层面。有从社会史角度研究苏州的壅业、邮递业、典当业；还有关于苏州各社会群体的研究，涉及脚夫、绣娘、女教师群体；另有三篇论文分别涉及街区、慈善、救荒；与苏州文化有关的四篇论文中有两篇涉及文化世族，另两篇分别研究文人结社和民间信仰。正如唐先生所言：“这13篇文章所拼起的明清以来苏州

^① 唐力行：《江南社会历史研究丛书总序》，朴元熯校注：《崔溥漂海錄校注》，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城市史的图板，或可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苏州，认识这个古老而美丽的江南城市。”^①从该书唐先生所撰的“导言”可以看出，唐先生并非是个挂名的主编，而是实实在在地指导学生，为苏州社会史研究作填空补白的工作。“导言”除了解析每篇文章的主旨及其意义，还详述了每位硕士生从选题、找材料到构思、写作的整个过程。为我们提供了硕士生的学习实景，也为导师如何指导研究生提供了样板。唐先生能将10多年里的硕士生论文结集出版，可见其良苦用心，也体现了他一贯为学、为人、为师的风格。

无论“评弹与江南社会研究丛书”，还是“江南社会历史研究丛书”，作者的主体部分是唐先生的学生，这两套丛书引领学生进入江南区域史的研究领域，锻炼和培养了学生的学术能力，凝聚了学术团队，形成规模效应，并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

唐先生对学生的培养确有独到之处，唐先生自1995年在苏州大学被增列为博导，培养了吴建华、徐茂明、陈昌文、王仲等博士，至今已培养硕士、博士近百人。其中不乏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卓然有成者。有些学生自安徽师范大学追随至苏州大学，自苏州大学又随之来到上海师范大学，与唐先生交往数十年，亦师亦友。唐先生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除了他学术的吸引力之外，主要在于他人格的感召，以及识人、培养人的才干。他善于因材施教，能够充分发掘学生各自的优长，加以指引和培育，并竭尽所能地提供学术研究的助力和平台，使学生们得以快速成长、各得其所。

笔者曾读到苏州大学李明研究员的《亦师亦友二十春，私淑先生读“江南”——“槛外人”捭拾》一文，自述她如何由一个学术研究的“槛外人”入门，并成为江南区域史研究专家的人生经历。颇为感动，亦有感触。感动于李明对读书念念不忘，对学术不改初衷，自学自励，由一名不是科班出身的办公室内勤成长为术业专攻的史学专家；感动于

^① 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城市社会研究（上）〈导言〉》，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

唐先生识才、爱才、惜才，不拘一格，竭尽所能，为有志于学术者提供一切可能的机遇和平台。李明没有跟随唐先生读研究生，不仅是学术研究的“槛外人”，还是师门的“槛外人”，1969年初中毕业，下放知青。自学大专及本科，在苏州大学做教辅，自谓与唐先生“同事不同道”。后在唐先生鼓励和指导下，研读江南区域史的前沿论文，由帮助唐先生组织学术会议的工作人员变身为参加学术会议，以文会友的专家。2000年随唐先生，与吴建华、徐茂明一道参加了在武汉举行的第八届中国社会史年会，并在会上宣读了《苏州市民公社解体缘由》一文，全文收入《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后发表于《学术月刊》2001年第12期，李明渐渐由“苏州市民公社”研究跨入江南区域史研究领域。其后与唐先生的博士生、硕士生一道参与了唐先生领衔的国家社科规划项目“16—19世纪苏州与徽州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差异的比较研究”，随唐先生一行赴徽州做田野考察。在唐先生的指导下终于成长为一名江南区域史研究的专家。她在通过苏州大学的各项考核后由教辅人员转为专业教师。李明的励志故事一方面得益于她自己的执着勤奋和学术天分，另一方面也是唐先生慧眼识得读书种子、指点提携、诲人不倦的结果。

到上海师范大学工作后，作为历史系学科点的带头人，唐先生与同事组织申报，并获批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该学科点先后被评为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上海市重点学科，2008年被列为上海市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作为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唐先生还依托该中心为江南区域史研究搭建了几个重要的研究平台，除了出版江南区域史研究的两套丛书、“转型期中国社会研究丛书”外，还举办每年一届的江南社会历史研究国际论坛，并主编江南研究的专门刊物——《江南社会历史评论》。

事实上，唐先生一直注重国际学术交流，多次组织国际学术讨论会。1998年尚在苏州大学工作时就组织了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七届中国社会史年会，会议以“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为主题，“这一主题的确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立，体现了延续性、导向性和前瞻性”。^①与会的海内外学者 114 人，提交论文 92 篇，会议的成功举办在学界产生了良好的反响。2000 年唐先生调动至上海师范大学，提议由上海师范大学主办第九届中国社会史年会，得到了冯尔康和常建华先生的支持。曾在两年前于苏州大学协助唐先生办会的人马又参与到此次会议的筹办中，2002 年 8 月第九届中国社会史年会在上海如期举行。由唐先生提议，这次会议以“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为主题，契合了社会史研究发展的新趋向。

2005 年，上海师范大学近现代社会研究中心获批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与上海市重点学科。作为学科带头人，唐先生鉴于区域社会史研究方兴未艾，江南社会史研究更趋活跃，受到海内外学者青睐之情况，产生了搭建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平台、打造江南研究学术品牌的新打算，即举办“江南社会史国际学术论坛”，出版《江南社会历史评论》，开辟“重构江南记忆”的锦绣园地。根据这一计划，从 2007 年至 2013 年，社会史界有了连续七届的“江南社会史国际学术论坛”。每年邀请 20—30 位江南研究专家莅临，围绕不同主题，进行热烈而富有成效的讨论，次年出版会议文集，及时反映江南社会史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七届论坛的主题分别为“比较视野下的地域社会研究”、“生活实态·民间文献·学术展望”、“明清以来江南城市的记忆”、“明清以来江南的城市与乡村”、“明清以来江南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视野下的江南社会”、“江南文化与社会”。上述专题，从区域史到整体史、从小缩影到大社会、从比较到拼合，从城市到乡村、从经济到文化，从文化到社会，无一不紧扣江南，既视角多元，又有内在联系，层层递进，这样的一种极富活力和成效的学术交流模式，对江南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具有引领作用。^②而“江南社会史国际学术论坛”业已成为江南地区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学术精品会议。

^① 唐力行、吴建华、徐茂明：《“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历史研究》1999 年第 1 期。

^② 关于唐先生组织国际学术会议的情况参见李明：《亦师亦友二十春，私淑先生读“江南”——“槛外人”撷拾》，未刊稿。

《江南社会历史评论》自2009年出版，每年一期，至今已出五期。主编唐力行，副主编钱杭，编辑部主任徐茂明，副主任洪煜，编辑是王健和申浩。《江南社会历史评论》包括理论探索、江南经济、江南文化、江南社会、学术前沿论坛、学术评论等栏目，作者囊括了国内外研究江南区域史的名家和新锐，如邹逸麟、樊树志、范金民、钱杭、王振忠、张海英、池子华、马学强、卞利、小田、陶水木、邱澎生等，日韩学者如朴元焄、权仁溶、俞莲实、臼井佐知子、中岛乐章等，北美学界有陈忠平、何其亮等。作为主办者，唐力行及其学生亦是该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如吴建华、徐茂明、李明、邢丙彦、吴强华、洪煜、申浩、王健、徐松如等。这本杂志为江南区域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以切磋砥砺的学术园地。该杂志还附录了近年来江南研究的论著索引，从这本杂志可以管窥江南区域史研究的前沿、热点及研究的概况。

在发刊词中唐先生开宗明义地阐明办刊宗旨：“一是重视理论的创新，尤其是本土化社会史理论的建立；二是重视新资料的挖掘，包括档案、碑刻、口碑、实物资料等；三是提倡社会史的新视野，例如在超越社会地域疆界的广阔视野中进行区域间的比较研究、在长时段的视野中研究中短时段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在地方社会与国家互动的整体史视野中审视地域社会的变迁等；四是倡导历史评论，在学术批评中推进学术的发展。”这也反映了唐先生一贯的治史旨趣：即提倡本土社会史理论创新，挖掘新史料，致力于区域整体史的研究。

在江南区域史研究的理论方面，杂志的第一期就刊登了四篇关于理论研究的文章。唐先生的文章指出：进行地域研究首先要“守住”疆界，就是应该有明确的地域界定，但在“守住”的前提下，还须“超越”疆界，“超越疆界，除了要注意横向的区域集散效应圈，还应注意纵向的地方与国家的互动。”^①陈忠平赞同江南区域史研究需要本土化理

^① 唐力行：《超越地域的疆界：有关徽州和江南研究的若干思考》，《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一期，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论的提法，他以位于苏南运河的平望和浙北沿海的乍浦为例，认为在江南市镇的研究中运用西方的中心场地模式和城市网络理论都存在局限性。强调本土理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①徐茂明将文化权力理论运用于江南士绅研究，提出文化权力的“显性”、“隐性”之别，研究了其运作网络及兴衰。^②小田探讨区域社会史研究从人类学、社会学借鉴理论方法的可能性。像这样集中就江南区域史研究进行理论探讨诚属难能可贵。

这本杂志的文章还关注相关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如臼井左知子通过诉讼文书研究寡妇的生活状况；王振忠利用案卷研究徽州大、小姓之间的纷争，利用老船票研究新安江水运；^③邢丙彦利用契约文书、收支账册等档案资料研究松江地区的土地交易价格、土地租佃费用、地租形态变化等，并发表了系列文章；^④此外，洪煜对于上海小报的研究，^⑤洪煜、周巍、何其亮等对于苏州评弹的研究；^⑥李明、潘讯等整理了有关评

① 陈忠平：《明清江南城镇研究中理论模式的反思——以平望和乍浦为中心》，《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一期。

② 徐茂明：《明清以来士绅文化权力的结构性演变——以江南地区为中心》，《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一期。

③ 王振忠：《徽州老船票：新安江水运与江南的城镇与商业》（《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二期）、《大、小姓纷争与清代前期的徽州社会——以〈钦定三府世仆案卷〉抄本为中心》（《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三期）、《〈太平欢乐图〉的创作及其传承脉络——新见上海图书馆馆藏乐闲馆本研究》（《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五期）。

④ 邢丙彦：《清末民国时期松江的土地租佃费用变化——上海市档案馆藏近代松江土地租佃契约文书研究之一》（《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一期）、《20世纪30—40年代松江“典于记”地租形态变化与国家政治变动——上海市档案馆藏“典于记”收支账册研究之一》（《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二期）、《1946—1948年松江县“租成”会议和国民党“减租”政策》（《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三期）、《晚清同光年间松江西部土地买卖交易价格变化——上海档案馆藏近代松江土地买卖契约文书研究》（《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四期）、《20世纪20—30年代松江地方的欠租与催租、追租——以松江“典于记”为例》（《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五期）。

⑤ 洪煜：《近代上海报刊与江南城市近代化——以苏州为例》（《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一期）、《建国前后上海小报及报人群体的社会转型》（《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四期）。

⑥ 洪煜：《地方戏曲与城市生活——苏州评弹在近代上海》（《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二期），周巍：《技艺与性别：晚清以来“女弹词”职业生涯的呈现及其意义》（《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四期），何其亮：《政治娱乐化：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篇评弹》、《英语世界中的评弹研究》（《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三期）。

弹口述史料。^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李明的访谈极具特色，以苏州话对谈，拉近与采访对象的距离，也更具探讨评弹的韵味，以拉家常的方式深入浅出，询问评弹大师少时的读书学艺、演出、师友交往。李明的采访善于将评弹与社会结合，引导采访对象描述当时评弹艺人的衣食住行、生活时尚的细节，还原说书艺人在苏州与上海间的流动，以及由苏入沪后评弹表演的变化和书场的层次。李明等对评弹口述史料的抢救式发掘为评弹与江南社会史研究提供了翔实、生动的第一手材料。这也是唐先生关于评弹与江南社会史研究的宏大计划中的一部分。而以李明这样的评弹老听客、有阅历的苏州人做评弹口述史的工作，再恰当不过了。

就研究的地域看，主要集中在对江南的整体研究，以及徽州、苏州、上海等地的研究。从所刊文章来看，提倡实证研究是其主要特点。

与实证文章相比，理论探讨的文章相对偏少。陈忠平指出：“这种实证研究的长处在于它以原始资料为基础，对特定江南城镇的历史可以做出面面俱到而不太偏颇的历史描述。但它的缺点是缺少对这种历史现象的高度概括及其内在历史规律的明晰揭示，因此也难以受到非专业的读者的欣赏或为相关的研究提供理论启示。”^②陈先生的评断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前江南区域史研究的现状，也体现了他所受西方学术训练的影响。

此外，这本杂志还收录学术名家的讲座，学术会议综述等。每期最后附录近期的江南研究论著索引，可以说也是接续唐先生与陈忠平主编的《江南区域史论著目录（1900—2000年）》，继续做江南区域史研究的学术史工作，附录索引部分搜罗了2000年后江南区域史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使研究者对于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江南研究有概观式的了解。

① 李明整理：《上海“说书先生”的日常生活及演艺生涯——访弹词名家陈希安》、周良、潘讯：《在路上：对苏州评弹历史及艺术特征的探索——一个80后与八十后的对话》（《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四期，商务印书馆2012年12月版），李明访谈整理：《书坛耆宿王柏荫的评弹艺术人生——兼谈评弹与社会》（《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五期，商务印书馆2013年10月版）。

② 陈忠平：《明清江南城镇研究中理论模式的反思——以平望和乍浦为中心》，《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一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小 结

梳理唐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一方面领域多变，从徽学到苏州、徽州的区域比较，再到评弹与江南社会研究。一方面也有逻辑可循，他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小徽州”和“大徽州”的概念，他的研究只是循着徽商们的足迹，走出“小徽州”来到了“大徽州”，来到了“无徽不成镇”的江南。他的学术道路是一个探寻新领域、搜集新史料、思考新理论的过程。在80年代研究徽商的时候，他已注意到徽商的三个层次：徽州、江南、海外，在90年代着手苏州、徽州区域比较研究时，他又提出了区域间互动的三个层次：相互沟通、相互作用和相互认知。我们知道，区域比较的难度在于不同区域有无可比性是关键，如果以唐先生的“区域互动三层次论”来参照，即可判断是否可以做合适的比较。国内学界很多学者认为拿江南跟英国比较有点不靠谱，可能是认为两区域基本无沟通、更谈不上认知，主要是出于理论阐释的需要将两者放在一起。事实上，没有哪一种理论可以穷尽一切历史真相，“中国中心论”与“西方中心论”指导下的历史研究离历史真实或许一样远。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柯文试图通过设定和限制“西方冲击”的范围和限度来证明其理论的有效性，^①这恰恰体现出其理论的局限性。“中国中心论”对于说明前近代的中国发展及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要素的近代转化可能更有意义，但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我想说的是，本土研究可能需要本土的理论创新，这也是唐先生给我们的启发。

但这并不是说要排斥西方史学理论，可借鉴但不必盲从，唐先生正在推动的评弹与江南社会研究也是受到西方学界盛行的文化社会史研究的影响，要从评弹看江南，从江南看评弹，从中探讨文化与社会的互动变迁，在文化与社会的互动中亦关照苏州与上海和江南其他区域的互动。相信随着庞大的评弹史料整理和研究的深入，唐先生应有文化社会史的理论创新吧。

^① 陈君静：《论柯文的中国史观及其史学特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结 语

唐力行先生曾以感性的笔触写道：“江南是日出的江花，是春来的江水，是月下的山寺，是双舞的吴娃……”^①江南是富于历史记忆的地方，经济文化光辉灿烂，是中国最富裕的美丽水乡，也是中西文化冲突融合最早的地方，见证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对明清以来的江南社会经济的研究，尤其可见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特点。尼采说：“我们只有站在现在的顶峰，才能解释过去。”我们研究历史都离不开对当下的关心：中国为什么难以走出近世社会，中国近代化的脚步为何步履蹒跚，通过对江南区域史研究或许会给我们带来更深的思考。^②

因而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对于江南区域史的研究不断拓展、深化，江南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是这一时期江南区域史研究中最耀眼的篇章。就江南区域整体而言，有范金民、徐新吾等对丝织业的研究，李伯重等对早期工业化和江南农村及人口的研究，刘石吉、樊树志、陈忠平、吴滔等对市镇的研究，陈学文、范金民、龙登高、张海英等对商业、市场的研究，黄宗智、段本洛、单强等对农村的研究，小田等对于江南近代社会转型的研究，钱杭等对江南社会生活的研究，王家范等对于江南市镇、消费及江南区域史研究的相关理论思考，吴建华的江南人口社会史研究，徐茂明的江南士绅研究，余新忠的江南医疗社会史研究。就江南的江浙沪而

① 唐力行：《发刊词》，《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一期，商务印书馆 2009 年 6 月版。

② 唐力行：《区域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历史教学问题》2004 年 5 期。

学术寻踪——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概览（1978—2013年）

言，有范金民、夏维中对苏南进士群体的研究，江庆柏、徐茂明对苏南望族的研究，秦子卿对江苏货币史的研究，曹幸穗的苏南农村经济研究，王卫平、段本洛、范金民、张海林、朱英等对苏州的社会经济史研究；陶水木的浙江商帮研究，朱新予的浙江丝绸史研究、蒋兆成对杭嘉湖地区的经济史研究，陈剩勇的吴越社会变迁研究等等；就上海而言，有张仲礼等对于上海城市史的研究，熊月之对于西学东渐的研究，邹依仁对于上海人口的研究，忻平、马学强、薛理勇等对于上海社会的研究，乐正对于上海人社会心态的研究，苏智良、郭绪印、邵雍等对于上海帮会的研究，吴仁安对上海望族研究等，徐鼎新等对于上海商会的研究，樊卫国对上海同业公会的研究。丁日初、洪葭管、戴鞍钢、徐鼎新、黄汉民等对上海经济史的研究都有一定的影响。

就徽州而言，因有徽州文书的支撑，及徽州经济社会的相对完整、独立，自成徽学体系，俨然已经成为国际的显学。有叶显恩的徽州佃仆制研究，章有义等的徽州土地关系研究，唐力行、赵华富、朴元焄、臼井佐知子等的徽州宗族研究，张海鹏、王廷元、王世华等的徽商研究，李琳琦的徽州教育研究，周绍泉、王振忠等的徽州文书研究，中岛乐章、熊远报、卞利、韩秀桃等对徽州基层社会和法制史的研究。

跨区域的比较研究已经成为江南社会经济史继续深化的一个必要途径。黄宗智对于华北与长三角农村的比较研究，范金民、陈忠平等对于江南徽商的研究，叶显恩对于珠江三角洲与徽州宗法制的比较研究，唐力行等的苏州与徽州社会变迁的比较研究等都昭示了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向。

将明清以来的江南区域史研究置于更长的历史时段中去考察。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虽以明清为重点，但就明清论明清，难免局限，应瞻前顾后，明清之前及近现代研究有利于明了明清江南区域社会经济的特点和变化。

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江南社会经济史。许多学者都以自身的研究经验告诉我们，研究社会经济史仅有历史学的方法是不够的，已有学者尝

试以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生态学研究江南社会经济史。拥有多学科背景的学者进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必将带来一些新气象，如有法律专业背景的学者从事徽州法制史研究，还有一些经济学专业背景的学者从事江南其他区域的经济史研究，都是成功的样板。

挖掘新材料与理论创新结合。江南社会经济史的材料丰富，存在于方志、文集、史著、宗谱、小说、杂著、文书、碑刻、信函、账簿等各种文献载体中，当然还有大量田野考察、口碑史料。需要不断将零散的史料整理出版，推动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在这方面，徽州的文书整理出版走在前列。理论创新也是不可或缺的，吴泽先生曾说过，没有理论的指导，就像是手握一把钝刀子，面对满台子的资料，半天割不出一滴血。自80年代以来，理论界唯洋是崇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理论创新不够，很少有国内学者能够走到国际学术前沿的理论话语系统中。此种情形短期内难有改变，但至少我们可以做到以立于材料的研究来检验西方的理论，而不是削足适履。

打造学术团队。从江南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成功经验来看，能够耸动学术界的研究多出自团队的研究。如20世纪80年代张海鹏推动的安徽师范大学徽商研究、安徽大学的徽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上海地方史和城市史研究、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的苏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等都引人瞩目。但至今尚没有真正意义上江南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综合性著作，如欲完成这样的学术工程一定需要跨区域的合作，组建跨区域的研究团队。以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江南区域史研究的积累，从学术准备来说条件基本具备，可能需要有号召力、影响力的学术机构联手，甚至是地方政府的支持。希望这一天能够早日到来。

后 记

这本书稿是我在 2006 年时完成的博士后出站报告的基础上修改而成。此书能够面世当然得首先感谢我博士后时的导师唐力行教授。唐力行师是我在安徽师大历史系读本科时候的老师，那时他已因研究徽商知名，给我们讲一门社会经济史的课，但班级同学近百人，我与唐老师并没有多少直接交往。人生际遇奇妙，没想到十几年后能在上海再遇唐老师。当时，唐老师已经从安徽师大经苏州大学调到了上海师大，当我在上海的安徽师大历史系系友会上再次见到唐老师时，正值博士毕业，没有好去处，唐老师欣然接纳我去他那儿做博士后。唐老师知道我读研究生时学的是史学史专业，就安排我参加了他与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陈忠平教授主编的《江南区域史论著目录（1900—2000）》（2007）一书材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在此过程中对江南区域史研究有了一些了解，唐老师便建议我博士后出站报告以“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史（1978—2005）”为题，在做博士后的两年里，唐老师对学生那种从学术到生活的一体关照，我深有体会，得益良多，此次又蒙唐老师关心，将此书稿纳入“江南社会研究丛书”，且为之作序，惟有感谢。

能够以史学史的方法来写这本书得感谢我研究生时代的导师盛邦和教授，盛老师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自己培养的最早的一批文科博士，有经世致用的情怀，随他在华东师大史学所的几年学习生涯是我学生时代一段难忘的时光，学业上有所收获，且结识诸多师友。史学史与史学理论专业的

胡逢祥、邬国义、路新生、王东、房鑫亮和已故的朱政惠老师都曾教过我的课。学生的点滴收获都是得自老师们的栽培。

感谢 2011 年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访学时的合作导师郭安瑞 (Andrea S. Goldman) 和她的夫君郭琦涛对我学业的指点和生活上的照顾, 在他们家我可以享受中美两种节日的美食, 安瑞还尽可能带我参加学校里有关中国的活动, 这些都是难忘的记忆。最近欣闻安瑞的《清代燕都戏曲表演与政治文化》(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获得美国的列文森奖, 真是替她高兴, 对于勤勉认真的她来说, 这是应得的。

还要感谢夏斯云、黄玮、庾向芳、翟海涛、陈加林、吕佳航、张帅等几位学历史的同事, 能够一起切磋点历史的学问在我们这样一所商科大学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事情啊!

感谢我的父母妻儿, 你们在哪儿, 我的心就在哪儿。

完成本书写作时, 内心是惴惴, 我只是就自己所见的材料做了一点学术史的整理工作, 虽花了些功夫, 但与诸位师友的期望还是相去甚远, 恳请方家们多多指正。

2014.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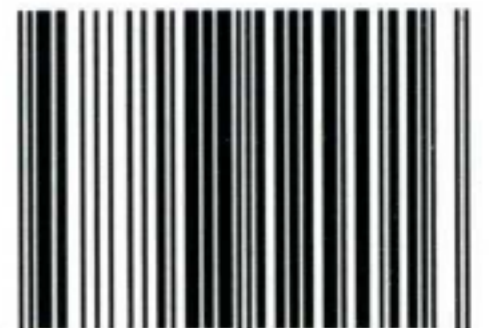
学术寻踪

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
研究概览 (1978-2013年)



上架建议：中国近代社会史

ISBN 978-7-208-12901-6



9 787208 129016 >

定价：55.00元

易文网：www.ewen.co